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与优化路径
文明驱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解码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ChatGPT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驱动及其调适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3. 3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3年5月

探
索

二〇二三年第三期

本期作者简介



张贤明，湖北枝江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廉政研究院院长、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人才项目，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政治学会会长、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系列高水平论文，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系列课题，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余项。

项久雨，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东亚人文学会副会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分别荣获中宣部第四届和第六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专栏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首届年度好文章，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出版《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中国新贡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导论》等专著，咨询报告获中央领导批示、被中央办公厅等部门采纳多篇。科研成果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湖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2022年学术成果特等奖等奖励多项。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索

2023 年第 3 期 总第 231 期

2023 年 5 月 15 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谢金峰

副主任：张 健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

孙凌宇 张志勇 陈 剑 周学馨

杨 杰 侯晋雄 黄建跃 谢来位

谢 菊 谢撼澜

副总编：金华宝 王 慧

本期执行编辑：陈 卓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 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 011153

地 址：重庆市渝州路 160 号

邮 编：400041

电 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zs.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 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每册 15.00 元 半年价：45.00 元 / 全年价：90.00 元

目次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庞金友，高秀楠 1
- 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
- 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林 毅 15

探索笔会

-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与优化路径
- 基于“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性分析 谢 琦，李 亮 27
-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严郁洁，曹胜亮 39

政治学研究

- 文明驱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解码 张会龙，李宇洋 53
- 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李朝辉 65

政党治理

-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
- 以山东B县W村为例 张紧跟，张 旋 76

增强“四力”：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的实践进路 蒯正明，马 鑫 90

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张贤明，段卓廷 102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锁利铭，丁凡琳 113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吴子靖 126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 温丙存 137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结构呈现与实践价值 项久雨，龚安静 149

ChatGPT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驱动及其调适 张爱军，贾 璐 162

从连环画到网络图文：图像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 吴艳东，张金玉 176

Contents

No.3 2023 (Serial No.231) (Bimonthly)

1.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NG Jinyou, GAO Xiunan	1
2.Modernization, Western Paradox of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Solution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N Yi	15
3.The Operation Logic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e-Process-Function"	XIE Qi, LI Liang	27
4.Establishment of Appraisal Index System of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YAN Yujie, CAO Shengliang	39
5.Driven by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Decoding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ZHANG Huilong, LI Yuyang	53
6.Collective Memory: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 Zhaoxue	65
7.Integrated Empowerment: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Farmer Subjectivity in Cooperative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A Case Study on Village W in Shandong	ZHANG Jinggen, ZHANG Xuan	76
8.Strengthening the "Four Forces": A Practical Approach for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trong Battle Fortress	KUAI Zhengming, MA Xin	90
9.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Social B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ZHANG Xianming, DUAN Zhuoting	102
10.The Internal Mechanism,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Public Institutions Lead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SUO Liming, DING Fanlin	113
11.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Healthy Commun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U Zijing	126
12.Retrieving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The Implement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Changing Custom	WEN Bingcun	137
13.Time Structure Present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XIANG Jiuyu, GONG Anjing	149
14.Emotional Drive and Adjustment of ChatGPT's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ZHANG Aijun, JIA Lu	162
15.From Comics to Network Graphics: Ideological Reifi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Visual Field of Images	WU Yandong, ZHANG Jinyu	176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庞金友,高秀楠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探索的全新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独特价值的重要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新样态,具有政治主体的人民性、保障机制的完备性、人民参与的广泛性、政党关系的协商性、政府回应的有效性等内在特质和相对优势,回应了当前西方政治发展所遭遇的价值迷思、制度缺陷、选举困境、政党乱局和治理危机等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持续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主体地位、提升人民群众民主素养、加大民主制度执行力度、健全数字民主保障机制、增强民主国际话语权,才能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逐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方略,进而实现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的政治现代化目标。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01-14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我国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1]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进行了系统阐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出新命题、迎来新发展、进入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如何全面分析并准确阐释中国式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借助比较政治的视野深入探究破解西方民主困境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持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是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提升中国式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1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25},同时也“是以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变局时代西方民主危机与治理困境研究”(20ZGA001),项目负责人:庞金友。

作者简介:庞金友,男,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秀楠,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4]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普遍规律,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这就决定了现代化的渐进发展将与社会文明发展同频共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22-23}。这一重要论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本土特色、领导力量与道路选择、价值归宿与实施方略有机结合,深度诠释并全面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探索,是在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优良元素以及全面反思当前西方民主困境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式民主,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和进程,也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1.1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这些探索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革命和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选择何种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民情决定,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而变化,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从“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些重要论断与表述的演变,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的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的革命性变革,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技术、生态等各个领域。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13-14}其中,政治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地位,是一切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最高体现。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需要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这就决定了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政治现代化是民主与治理的合流与互嵌,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合流,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7]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5]3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8]20}这些提法是继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9]168}这一重要论断后,探索人民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最新发展,充分体现了政治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

1.2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最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23},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效能。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从不同方面强调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1]280}。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首次明确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和意义。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5]37}这一系列重要论断的提出,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最新政治实践成果,是适合中国国情、社情和民情的伟大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内蕴主体上的“人民”、实践上的“全过程”、内容上的“民主”等基本要素,体现了真实的、广泛的、丰富的、高效的民主价值理念,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始终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为谋求人类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全新方案和有益借鉴。

1.3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由“中心”进入“全面”发展期,发展目标开始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和实践优势激发了政治现代化治理效能,开创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源泉。

政治制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依据,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完整的、科学的、有效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12],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实现了人民全环节“在位”,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最大程度汇集、体现和行使了民情、民智和民意,最大范围整合了多元主体结构,形成了国家治理合力,推动了国家治理目标有效实现和治理效能充分转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不是抽象的逻辑推演,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理论构想,而是具体的政治现象、现实的民主实践,它全面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环节,全程倾听人民诉求、回应人民期待,全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实在在地落到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这种人民全过程“在场”,为广人民群众的参与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5]9}这也意味着只有不断提升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全过程“在场”,才能充分保障人民的参与实践,实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探索,是在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优良元素、全面反思西方民主困境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式民主方案。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和进程,也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2 比较政治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色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主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丰富多样性。”^{[13]9}历史上,欧美各国率先启动现代化进程,其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一度是后现代化国家学习与借鉴的素材和典范,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拓展,政治生活与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和精细化。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格局、政治氛围、文化冲突、价值观念和新技术革命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欧美各国的民主困境和治理危机不断暴露,其中以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政治极化的加剧、文明冲突的升级、反智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泛滥、民粹政治与身份政治的纠葛等现象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后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实践取得长足进步,其独特性和优势性日益显现。究竟该如何认识民主的本质和道路,如何定义优异民主与异质民主,如何理解民主化的多样化与差异化,如何区分民主制度的共性与特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借助比较的视野,理性而客观地看待当前西方民主发展的现状,可以为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生性、合理性、创新性和优越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2.1 政治主体的人民性

人民性 is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发点、支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鲜明底色。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以“人民主体地位”为出发点。在西方的民主实践中,“人民”更多被认为是一个又一个独立个体的集合,其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詹姆斯·麦迪逊曾指出:“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14]373}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讨论“人民”的内涵时强调“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此时的“人民”意指现实生活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15]261}。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确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明确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从“以人为本”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个发展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

第二,以“保障人民权利”为支撑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保障最大多数人民权利的民主。西方民主则更多顾及特定的集团利益,“从人民民主到竞争性代议制民主,从实质民主到形式民主,民主等同于选举,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人民主权被置于第二位”^[16],这种竞争性选举民主意味着只有经过普选产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美国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才实现了全民普选权,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对普选权的限制从实质性限制转变为技术性规避。美国一些州试图通过推行偏见性明显的选区划分、颁布选民身份识别法等策略操纵选

举,实际上已偏离民主的价值追求。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家,将民主异化为“选主”^{[17]83},人民的权利由“统治”转变为“表达同意”,如此一来,“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8]419}。这样一来,人民只剩下表达同意的权利,且此权利只能在选举期间行使。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保障人民权利为支撑点,民主权利更加真实、全面和持续。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在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各方面享有全方位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不仅是在选举投票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从“小院议事厅”到“居民议事会”,人们通过多元化民主参与实践实现权利效益最大化,通过更直接、更快速、不间断的意见表达,鲜明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管用的民主。

第三,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落脚点。晚近以来的西方政治发展资本化、寡头化、财阀化趋势开始显露。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的种族冲突升级、宗教矛盾加剧、民粹主义崛起等挑战,西方各政党未能达成充分的共识,自然也就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回应新时代新矛盾的这种变化,习近平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9]人民民主的真谛恰恰在于关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美好需求。

2.2 保障机制的完备性

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乱象频发、国家治理危机四伏,这就使民主失灵、民主困境、政治衰败论等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福山、史蒂文·列维茨基等纷纷表达对西方民主困境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是当前西方民主危机的根源。

一是竞争性民主引发选举合法性危机。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选举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8]395}。公民将选举视为公平和合法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广泛质疑选举的合法性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催生大规模抗议,并引发无法预想的暴力和冲突^{[20]7-10}。2020年美国大选不仅是对美国候选人的严峻考验,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重大冲击。“国会山暴力事件”表明,美国数百年的民主惯例正在遭遇挑战,竞争性选举的合法性开始面临质疑,围绕选举过程和选举程序的共识性危机业已出现。二是分权制衡体制异化为否决性政治。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在国会两院制格局下,西方国家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制衡体制为对方设置障碍,制衡体制逐渐发展为“立法瘫痪”和“政府关门”,演变为对抗政治和“否决政治”。福山认为美国政府运行质量之所以如此低下,其根源在于联邦政府重陷“法院和政党”治国的乱局之中,法院和立法机构联手篡夺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导致政府的行政管理颠三倒四,效率低下^{[21]428}。2013年和2018年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导致联邦政府多次关门,2018年12月竟然停摆长达数周。

相较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内含完备的制度保障程序,还具有完整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机制,实现了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

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中国民主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制度效能,与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形成鲜明对比。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渠道,通过议事规则、议事程序将人民群众分散的意见整合为人民意志,保证人民选举合法性。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协商”与“监督”功能,又包含“合作”与“参与”关系,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不同民族、党派、界别、群体的利益诉求、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反映民意、凝聚共识,有效避免了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而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社会撕裂的弊端。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及各级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等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监督功能“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22][225]}。这有效发挥了政治协商的过程性和全方位监督功能,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决策和依法监督的完整链条。再次,我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证了各族人民权利,保障了基层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保证少数民族公平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23],既体现统一与自治的结合,也体现权利的人人平等,更体现民族与区域的结合。以村民自治制度、居民自治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有效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现象。

2.3 人民参与的广泛性

人民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参与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使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的现象^[2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参与程序和参与途径上的全流程覆盖,还体现在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上的全方位普及,是真实、有效、高质量的民主。

第一,参与主体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过程中。民主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人民代表选举是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形式,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以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人大代表更多的来自人民群众,能够最大限度体现人民意志。截至2020年底,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数占代表总数的94.5%。改革开放以来,12次乡级人大代表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参选率都在90%左右^[23],反映了我国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性,保证了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人民意愿,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广泛性的最生动、最充分的体现。民主选举的广泛性还体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多元结构与基层比例中。数据显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到了16.69%,比上一届提高了0.99个百分点^[24];全国政协十四届委员中,非中共委员占60.8%,56个民族都有人选^[25]。这表明,参政议政的代表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更能够体现普通基层群众和多民族人民的意志、利益与愿望。

第二,参与领域广泛性体现在全流程赋权参与实践。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26]西方选举民主有时呈现政策中断、选民参与间歇性等特征,正如萨托利所描述的:“选举

是一种无连续性的初级行为,在各次选举之间,人民的权力基本上一直处于休眠期,大规模选举中的选择和具体的政府决策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带。”^[13]¹³⁹ 与西方国家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次性消费”的选举游戏,更不是阶段性、间歇性的单次活动,而是始终如一地全程保持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持续状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民主选举中,还体现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流程的赋权实践参与中,环环相扣、相互贯通。人民在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全流程中不是无序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完整的制度建设、多渠道的参与体系,保障人民参与立法活动、政府决策、司法监督、基层治理,在重大决策前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首先,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法律法规草案向社会征集广泛的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法律法规草案在初审和二审后均要向社会征求意见、倾听人民心声,保障了人民群众持续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的权利。其次,在参与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参与式民主的重要内容。在参与司法、监督司法中,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有效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2018年到2021年三年间,“全国人民陪审员共参审刑事案件155.3万余件、民事案件712.1万余件、行政案件64.9万余件,其中由人民陪审员参与组成7人合议庭审结涉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1.8万余件”^[27]。最后,在参与基层治理中,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行使民主权利,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践行“主人翁”主体地位最生动的体现。

由此可见,人民参与的广泛性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运作形式中,同时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保障了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2.4 政党关系的协商性

在西方社会,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选举民主被视为判断民主的唯一标准。在没有硝烟的竞选大战中,国家政权沦为各个政党奋力争夺的终极“标的”^[28],曾经作为联结国家与社会中介力量的政党变成利益对抗和社会分化的工具,不仅未能实现民主的价值和目标,其内在弊端和不足反而日益暴露。首先是恶性党争频发。在竞选中为争取更多选票对权力进行角逐,选举策略从强化党派政策观点转向强化身份意识,党派间互相揭短、攻击、诋毁。其次是政策执行困难。在竞选后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中为了本党利益和中期选举做准备,导致政策倾向于短期迎合多数选民意愿,但是长期导致立法难产、议事阻挠频繁,甚至政府关门。最后是金钱政治盛行。财阀统治的崛起,失控的不平等重构选举政治;财团和超级富豪掌握绝对权力,政策偏好持续向资本和集团利益倾斜。在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竞争性关系模式下,西方国家政党极化加剧、民粹情绪泛滥、社会分裂升级,原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多党竞争深陷僵局而难以摆脱。

中国的政党关系与西方政党关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不以多党竞争为核心,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9]。这种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领导核心一元性。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

政党,超越了党派利益,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轮流执政的一大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30]138}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在法律上享有组织独立、法律平等和政治自由,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政党关系。其次,组织结构复合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协商与监督”的复合性结构特征,构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互利合作、利益相连的良好互动关系。在领导与合作方面,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以及人民政协组织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团结合作,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均占一定数量。在执政与参政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国家中心工作积极参与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协助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协商与监督方面,我国的政治协商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相互牵制,不仅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同时将各族各界代表也纳入进来,通过平等的协商进行意见交换。我国的民主监督借助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凝聚共识,“这种监督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31]。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中国的政党关系与西方政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不以党派利益、集团利益为目标,而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共同而一致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家政权。在改革开放时期,他们的共同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现阶段,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密切合作、相互促进,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这与西方政党制度为维护党派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看来,与西方党争关系的政党制度模式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共同的理想目标、统一的领导核心、复合的组织结构而形成的政党模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谐互动、同频共振、互相配合,形成了良好的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为世界探索出一种合作共赢、凝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全新民主范式。

2.5 政府回应的有效性

政府对来自人民的期盼和诉求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回应,是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保障。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回应指的是政策选择与公民偏好之间的关系^[32]。在达尔看来,回应有效性对于民主具有重要作用,“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33]11}。回应主要体现在政府回应和政党回应,政府回应往往更为关注政府政策是否回应了民众的诉求,而政党回应则关注党派性质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偏好^[32]。近年来随着欧美各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有关经济不平等与政府回应的研究表明,“欧美民主政府对富人的回应程度更强”^[34]。以美国为例,两党以赢得选举获得执政权为根本目的,右翼政党经济问题上采取财阀主义主张,不断扩大财团和

超级富豪的利益,而不顾下层民众的福利^{[35]48-63}。从目前来看,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应对因贫富分化而产生的治理问题仍是未竟之事。

正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意是现代政府回应的逻辑起点,人民政府应该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落脚点,及时有效回应民心之问。“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人民意愿只能表达、不能实现,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23]全过程人民民主及时回应民心之问,全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合理、合法、合情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同时保证人民诉求高质量实现的可能性,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民主成果。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全响应”回应保障机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是实现高质量民主的关键所在。在人民代表回应性方面,我国代表与人民的关系是持续性接触关系,“强调代表与选民间的‘情境同构’关系,即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代表与选民保持长期接触……激发代表的回应性”^[36]。代表不仅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和开会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是代表联系人民、掌握民意、回应诉求的重要渠道,从而建立起一套“全响应”具体、可操作和便民的联络机制,及时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在政府回应性方面,建立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回应保障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如北京市建立12345热线“接诉即办”回应机制^[37]。通过大数据获取人民关切的民生问题,开展“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复杂问题通过部门协调、协同共治,建立无缝衔接、闭环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实现对公众诉求的全响应式回应。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全覆盖”共享发展成果。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既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又能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依靠人民,又惠及全体人民,最终真正实现成果民主。这里包含着三层内涵。首先,共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逐步确立了三个基本价值:平等、共享和正义。这构成今天中国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38]62}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其次,共享主体“全覆盖”,即人人享有,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专享。不同地区、阶层、民族、职业等群体都能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再次,共享成果“全覆盖”,即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是与西方民主逻辑的不同之处,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的不仅是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权利。如在全民社保方面,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在脱贫行动方面,贫困人口“一个也不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新奇迹。这些物质方面的成果切实保障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获得感,与此同时,“全覆盖”的成果共享还包括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发展需求,包括民主权利、文化产品、绿色发展等更多隐性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是绝对平均的分享,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分享,“要求人人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是共享发展价值链的终端”^{[39]208}。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重点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式直接民主,还是近代以降的

代议制间接民主,既不是代表民主的终极模式,也不是垄断民主的唯一定义。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以代表与选举为轴心的程序性民主,在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特征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之外,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探索出一种崭新的民主范式,向全世界展示了现代民主发展的中国方案。

3.1 确保党的领导主体地位

中国的民主区别于其他类型民主的突出特征是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框架,将政党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紧密结合,努力使政党、国家和人民成为一个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的有机整体。这种民主理念使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多元化主体与多样性民主制度协同发力,为最终实现“人民主权”“人民至上”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党的中心功能和统领优势,加强党在政治现代化尤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全方位、全覆盖和全链条的领导。

首先,从领导内容来看,要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的广泛权利,实现对立法、司法、行政、检察机关等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打通各部门和各领域民主生态机制,加强民主实践运作机制,实现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其次,从领导对象来看,要确保党的领导处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整合资源的地位。再次,从领导过程来看,要确保人民真正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确保党在酝酿、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倾听人民声音,反映人民意愿和维护人民利益,确保人民民主的真实有效。

3.2 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和实现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民主素养。“民主素养”是指人民群众通过民主教育、民主实践,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水平,既包括内在的民主意识和思维,也包括外在的民主行为和运动;既包括抽象的民主价值和观念,也包括具体的民主组织和制度。为了培育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必须不断提升民主发展水平和民主科学决策,不断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方面是提升民主知识素养。尤其是加强人民群众有关民主理论内涵、本质特征、发展阶段、制度体系、程序机制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如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平台 and 手段传播民主知识,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培养基层群众的平等参与意识等。李普塞特在研究影响民主进程的条件时发现,人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与其能否推动民主发展呈明显正相关^{[40]32}。因此,必须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消除“民主文盲”,与此同时,提升党员干部知识素养,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另一方面是提升民主实践素养。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仅有民主知识而没有民主实践是远远不够的。人民群众只有通过亲身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活动,才能在体验中获取真正的民主认知,在操作中训练实用的民主技能,在沟通中锻炼理性的民主表达。对于当前日益显现的数字民主趋势,更要及时提升民主信息甄别能力,摆脱“信息茧房”“沉默螺旋”等传播困境。

3.3 加大民主制度的执行力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需要健全完整的制度体系,更需要有效的制度执行力度。制度执行力度是实现人民主体地位^[41]、保证人民权利实现、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执行力度的高低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只有通过制度执行,才能保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全面发力,确保实现更高质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针对当前民主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发挥受限、人民没有有效行使监督权、党内民主“组织热、党员冷”等情况^{[42]156-157},需要着力加大民主制度的执行力度。

首先,构建民主制度执行监督反馈机制。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健全监督、奖惩、问责、反馈机制,做到制度执行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有责可究,确保制度效能有效释放。其次,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通过思想意识的强化、合理知识结构的构建、高效能力素质的提高,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能力”^[43],把民主制度执行力度作为干部任用和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最后,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领导干部要树立问题意识,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真正关切的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多方意见,以调研与民主相结合促进制度的有效落实。

3.4 健全数字民主的保障机制

当前迅猛升级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算法、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正日益渗入现代民主过程的诸环节之中。新技术革命开辟了国家治理的新空间和新领域,拓宽了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平台和渠道,提高了政治表达和利益诉求的速度与效率。但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数字民主”既可以升级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民主样态,也可能形成更为暴虐的“数字利维坦”或导向更为隐蔽的“算法专制”,从而葬送民主的价值和理想。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应健全数字民主的制度保障机制,确保信息技术最大限度服务于民主、最大程度激发出民主的活力。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保证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技术赋能的可持续性,以增强民主的效能感和人民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应健全数字民主的法律保障机制,最大程度将数据赋权的危害和弊端控制在法律可约束的范围内,及时制定并颁布保护个人隐私和政府数据安全、防止泄露个人信息和公共数据、防范数字巨头技术霸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3.5 提升中国式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民主话语权是政治主体对民主实践的“话语阐释力、价值主导力、政治影响力”^[44]。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宣扬基于本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民主价值、民主观念和民主道路,并以此建构起极具西方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民主话语权。实际上,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因此,有必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勾画中国人的民主理想,叙说中国人的民主故事,借以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与理念。通过国际传播渠道,以中国元素、中式话语完整、全面地讲解和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观念与现实探索,在沟通与对话中赢得西方世界对中国式民主的接受和认同。“当今全球化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有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的话语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45]其次,破除西方中心主义,重塑民主话语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源自中国自己的历史、国情和民意,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既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型民主模式,更是与众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艰苦卓绝的探索进程和举世瞩目的现实成就本身就预示着现代民主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当然,在诠释和竞争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表达、有理有节、理性冷静的原则,尽量杜绝极端立场和非理性情绪。再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强化民主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展示中国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诠释人类的共同目标,体现大国之担当;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应对全球减贫、气候、安全、生态等普遍性世界难题时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4 结语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核心内容,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独特价值的重要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新样态,具有主体人民性、链条完整性、参与广泛性、关系合作性、回应有效性等内在特质和相对优势,与当前西方政治发展所遭遇的“选民至上”的价值迷思、“否决政治”的制度缺陷、“权利休眠”的选举困境、“政治极化”的政党乱局以及“低效无能”的治理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法律保障体系,不仅是参与广泛性和持续性的民主,还是合作、参与、协商的民主,更是及时回应民意的高质量民主。但也应该看到,探索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其多重制度框架和复杂实践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偏差,需要在实践中健全完善和探索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主体地位、提升人民群众民主素养、加大民主制度执行力度、健全数字民主保障机制、增强中国式民主国际话语权,才能逐步健全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进而实现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的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探索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路必然无比艰辛,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范式为世界民主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呈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优势和独特魅力。中国式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式民主的国际形象值得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去建构和维护。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2]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 人民日报,2021-10-15.
- [3]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4]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7] 张爱军. 目的与手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关系再建构[J]. 理论建设,2022(2):94-102.
- [8]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2] 樊鹏.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J].政治学研究,2021(4):3-10.
- [13]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14]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5] 张富文.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6] 杨光斌.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J].政治学研究,2022(1):16-20.
- [17] 王绍光.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M].欧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8]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 [20] FERRAN M. C. Contentious elections: from ballots to barricad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21]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2]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N].人民日报,2021-12-05.
- [24] 2977名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N].人民日报,2023-02-25.
- [25] 充分民主协商,广纳各方英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形成[N].人民日报,2023-01-18.
- [2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 [27] 魏哲哲.人民陪审员法实施3年来 人民陪审员共参刑事案件155.3万余件[N].人民日报,2021-07-23.
- [28] 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6-13.
- [29]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
- [30] 刘晓辉,吴祖刚.当代中国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21-06-26.
- [32] 马德普,于保军.代议民主下的政党回应:价值厘定、主要议题与研究前景[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3-30.
- [33]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谭君久,刘惠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4] 严宇,孟天广.修正还是强化:重访西方民主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J].国外社会科学,2022(1):108-119.
- [35]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M].法意,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 [36] 严行健.代表回应性的制度实现机制:比较视野与中国模式探析[J].教学与研究,2022(3):88-98.
- [37] 彭训文.北京探索将“接诉即办”改革成果立法,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8-16.
- [38] 林尚立.论人民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9] 杨宏伟.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40]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41] 孙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与治理优势[J].探索,2022(4):49-58.

- [42] 周敬青. 党的制度创新与执行成效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43] 王智崑,赵继伦. “人民至上”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化[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5-51.
- [44] 杨婷. 论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1):40-45.
- [45] 韩庆祥. 以中国元素的凸显提升国际话语权[N]. 光明日报,2014-12-17.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NG Jinyou, GAO Xiun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is a new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mocratic exploration, a vivid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has the unique value of demonstrating Chinese programme to the world.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politics. It has constructed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peoplehood of political subjects,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the extensiveness of people's participation, the consultative nature of party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response, etc. It has responded to the value myths, institutional defects, election dilemmas, party chaos and governance crisis that are currently afflicting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is a long-term, gradual and continuous proces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only by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democratic literacy of the people,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systems, improving the digital democracy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democracy, can we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gradually implement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n achieve development in explor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beyo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mocratic politics

责任编辑:牟 怡

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

——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林 毅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西方式现代化一度垄断了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解释权,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应透过外在问题深入其资本主义本质及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规定性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原则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体现为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和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对民主的重新赋义体现在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明确民主是解决问题并追求善治的民主、强调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进而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15-1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与近代民主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多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沿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模式开启早期现代化进程。但承认这两点,并不意味着人们要像福山一样重复诸如“就社会效应而言,它们(资本主义——引者)比其所取代的农业社会要平等得多”^{[1]300}之类的陈词滥调。相对而言,倒更应该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真诚相信“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国家往往愿望落空,不但不能突破作为“先行者”和“导师”的西方国家为其设定的发展上限,反而常常跌入“民主化”与西方化陷阱当中;为什么现代化反对民主,或者民主反对现代化的问题会成为西方式现代化体系中的普遍问题。从西方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与民主所施加的本质规定性入手,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西方化的不彻底,而在于西方化这一过程和目标本身所施加的限制。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动力的西方式现代化,虽然使先发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式现代化提供了唯一可行的现代化方案。相反,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矛盾”^{[2]408},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性正日益暴露出来,而要想超越这种局限性,就必须从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体系性弊端起步,在比较中印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1 西方式现代化中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显现

随着西方式现代化在发展与善治维度上的优势逐渐消退,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重点科研项目“共青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和作用研究”(20TZTSKB014),项目负责人:林毅。

作者简介:林毅,男,博士,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现代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悖论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1.1 不平等的现代化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进而加剧民主异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进入后冷战时代,即便是那些已经拥有了先发积累条件的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了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快速增长的趋势。现代西方社会的普遍特征,就是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而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在西方民主没有发生重大制度性变迁的情况下,其应对不平等方面的表现也变得日趋弱势,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时代的危机。于是,当民主政治“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可靠表达”^{[3]299}时,民主与现代化间的关系也就自然会遭到破坏。

事实上,20世纪末西方式民主取得优势的过程,也正是民主被此前那些不成比例地获得现代化好处的阶级改造的过程。资产阶级制造并传播了一种信念,即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的绑定关系是不容置疑、缺一不可的,这就导致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改造和支配。同时,由于选票作为“纸糊的石头”显著降低了精英权力斗争的成本,提供了“文明温和”的竞争机制,并带来了一种周期性的变革预期,整个社会对于变质民主的认同也得到了提升。然而,这种看似和谐稳定的“三位一体”结构并不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与现代化的善治结果间建立必然的因果联系。对于精英而言,它意味着执政绩效与掌握权力间的弱相关性,鼓励以权力本身为目的,不断更新政治道德的下限,降低负责的必要性。对于大众而言,它则使人们将一种并不足额的民主视为民主的唯一可接受形态,同时放弃对现代化成果平等分配目标的追求。令人忧虑的是,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所造成的左翼力量缺场,还导致形形色色的右翼势力填补体系内反思与纠错力量的真空,从而使得西方式民主与现代化间的关联变得更加脆弱。总之,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现代制度中,现代化与民主悖论问题的出现变得不可避免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并非现代社会中“劳动”取代“行动”所导致的“公共性丧失”,而在于弱势民主与不平等现代化的绑定,以及既得利益阶级以民主方式反对实质民主的目的。事实上,尽管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民主始终标榜自由价值,但这种以平等为代价的自由注定不会属于所有主体。对此,今天的西方不乏忧心忡忡的“吹哨人”呼吁“资本主义需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让人民为它服务”^{[4]260}。但这种呼吁终究是无力的,它只能以一种“抗议性的理想”方式存在,而容忍其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又反过来充满讽刺意味地维系着自然趋向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结构。

1.2 先发国家利用世界体系转嫁矛盾,西方化进程导致危机进一步扩散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往往半强制地推动各国实施去监管化政策,以给相关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为理由,“把它们的公司、银行出售给美国,尤其是在危机发生时以低价拍卖给美国”^{[5]222}。同时,西方国家所支持的“民主化”也从未帮助任何一个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目标,只是通过加深后发国家对西方体系的依附以维系其先发者的比较优势地位。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更多的是为了谋求后发国家的资源、市场和主权,而非为其带来政治现代化和善治。于是,由趋向不平等所带来的西方式现代化弊端便会以放大的形态呈现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从而进一步加剧“民主化反对现代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西方还常将那些次要的敌人纳入“民主化盟友”的阵营,这是因为“美国人知道,伊斯兰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所谓“革命”并不会真正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6]250}。总之,西方化体系本身便承载着为西方国家转嫁矛盾的功能,其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则只能意味着一条名副其实的“通往奴役之路”。如此一来,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

化与民主悖论,在本质上遵循着与西方母版相同的“民主地反对民主”逻辑的同时,还增加了一重因输入“民主化”阻碍现代化的新内涵。

2 现代化与民主悖论的根源:资本主义与“只属于西方”的双重规定性

当我们跳出西方化“终结历史”的思维定式时,便很容易发现所谓现代化反对民主的本质就是,西方式现代化倾向于让少数人不公正地占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让多数群体和众多后发国家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而所谓民主反对现代化,则表现为经济逻辑凌驾于政治逻辑的前提下,西方式民主并不致力于改变不平等的现代化后果,而是为其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支持。因此,有必要从资本主义与西方的总体规定性来解释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

2.1 资本主义对现代化与民主的绑架和改造

在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中,“分化”的力量往往被视为引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然而,这种认识或许并不应该被过度诠释为现代化与不平等间天然存在的关联,进而引申出人们在现代化繁荣与平等价值间只能二选一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认知只意味着现代化经验来源的单一性,而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的单一性又必然要建立在的不平等基础上。从增长的意义讲,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它的物质激励作用。然而,在“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7]75}这个资本主义增长公式中,由于前提条件与资本逐利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增长始终无法超越它自己规定的边界。

讽刺的是,尽管自由主义者们总是热衷于塑造市场经济的“自足神话”,但在现实中,“市场经济这个游戏从来无法孤立存在,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和政治”^{[8]26}。从历史上看,除非是面临必须做出改变的迫切压力,否则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民主便不会认真地对待不平等问题。如果说,法国精英在1920年对征收所得税问题的态度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从正面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调适自觉的话,那么后冷战时代资产阶级选择否定和放弃福利国家的模式,则从反面说明了西方式现代化无法摆脱资本理性与社会理性相背离的宿命。因此,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不同,理性的破产往往并不在于理性本身的不可靠,而在于不同阶级理性诉求间的交集问题。民主的衰败及其与现代化“脱钩”的同步发生,也同样要归结到资本主义的规定性上去。

民主原本天然地具有平等的属性,而平等也不仅对应于现代化的进步价值观,更构成了其持久推进的动力。但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民主对于平等的暧昧态度,可能意味着要用自由地使用财产的平等权这种虚伪的平等权来否定分配与福利的平等权,同时也意味着要不断制造出诸如民主与秩序、效率、科学等目标间存在天然矛盾的伪问题,来窄化人们对于民主可行形态的认知。从思想渊源上看,这些问题的本质也不过是对自柏拉图以来怀疑与警惕“群氓政治”陈词滥调的当代注脚而已。柏拉图追随者都忽视了相较于所谓“多数暴政”或者“民主专制”,“少数特权”与“寡头专制”才是真正的历史常态,也是最不兼容于现代社会价值观,最应该被解决的关键政治问题。具体在自由民主理念上,这种问题意识的偏差,将导致人们不再把少数特权者对大众意见的压制视为一个仍待解决的问题,却把大众对少数特权者提出的合理平等诉求视为一种更主要的威胁,一种有待解决的“民粹危机”。于是,在一个基本上不与大众经济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半封闭政治空间内,民主便为寄生在其机体上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保护的外壳。在这个外壳下,人们因为另一些次级诉求得到“包容”,而忽视了平等问题的实质性解决。相应地,即便自由民主因日益为资本主义侵蚀而出现了“民意合法性降低”的情况,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唯一可

被接受的制度选项^{[9]74-75}。

过去,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创造“作为公平的正义”。但现实是,热议正义问题的学术繁荣景象与西方世界在解决发展普惠性问题中的实践走向俨然成了一对平行线关系。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内在动力去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会天然地倾向于维系一个“赛博朋克”的结构。就像萨缪尔森说的那样:“并不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保证自由主义经济能够公平地分配收入。”^{[10]223} 这个结构反映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国家间的马太效应,同时也会以发达国家内部的相对贫困和持续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一事实表明,资本至上的本性决定了自由民主制度所承诺的和它所能做到的事情往往是彼此悖离的,它不可能终结历史,倒可能在“空想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走向衰败。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本质上并非民主的原罪,而是变了味的、以防范多数之名行维护特权之实的自由民主的原罪。相应地,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也不在于给民主做减法,恰恰相反,只有在民主卸下它为少数人的特殊自由服务这一沉重包袱时,它才真正找到了与现代化的共荣共进之路。

2.2 “只属于西方”的西方式现代化对后发国家发展的限定

在以往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研究中,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能动角色往往被忽视或者被低估,而这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人们认识现代化与民主悖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即以往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一限定条件。如果我们要合理地解释和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不可能离开对这一限定的检讨。

首先,在现有的主流西方化方案中,一些先决性的、较之于所谓“西方制度优势”更为重要的条件往往被选择性地忽略了,这就造成了后发国家得到的实际上是不完整的经验。追根溯源,西方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剥夺许多族群追求和探索现代化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可这一前置性必要条件却被刻意屏蔽了。我们可以质疑,如果抽掉了那些与民主无关、甚至是明显与民主价值相悖的元素,比如西方国家全球部署的军事优势、能够从不对等贸易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资源与商品、采用各种手段颠覆他国政权或制造其内部混乱等,我们是否还能够设想西方国家会始终保持其在现代化方面的领先地位?换一种更明确的提法,就是如果一个后发国家获得了上述条件,它是否完全可能在实现现代化方面超越西方国家?相应地,我们倒更应该反思那种污名化自主民族革命的现象。这是因为,此类观点的盛行,不仅遮蔽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经验,而且也使后发国家失去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独立的自觉。

其次,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得到矫饰,控制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依附体系也得到了强化。对于西方人而言,这意味着殖民史被美化成其先人“开拓蛮荒”“传播文明”的进取史,而对于原殖民地的人们而言,则意味着殖民史被美化成“文明进化史”。西方主流的现代化与“民主化”理论中,常常充斥着诸如“被宗主国实行传统威权制度的帝国统治要好于被宗主国实行民主体制的帝国统治”^{[11]76}之类的谰言。甚至也不乏将“英国人的统治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与“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内广泛建立”联系起来的论调^{[12]309-310}。那些持有西方中心立场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彰显殖民历史给殖民地带来的现代化文明元素,比如基础设施、行政体制、财政与户籍系统、法律体系、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有利于向民主转化的现代文化等,乃至所谓的“主体性意识”。相对地,那些殖民时代的残酷事实,比如大规模种族灭绝、财富掠夺、奴隶制、扶植凶残腐败的代理人,总之所有那些与现代化与

民主标准格格不入的内容,则往往因为处在“文明世界”的视野之外而被无情地遗忘了。当“民主化”危机到来时,西方国家还得到了一个推销“帝国主义解决方案”的机会。以至于有学者声称:“今天,阿富汗和其他有问题的地区迫切需要当年那些自信的戴着太阳帽穿着马裤的英国人曾经提供过的那种文明的外国统治。”^[13]即便当他们承认北方工业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损害非洲的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短期前景”时,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纠正这种不公正,而是进一步剥夺后发国家的自主权。

2.3 西方化方案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误导

在造成后发国家现代化与民主悖论的误导方案中,有两个分别涉及现代化与民主问题的关键矛盾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繁荣愿景与其现实中带来的重重危机间的矛盾。“自由主义理论所描述的不过是这样一条轨迹,它以资本主义的绝对性为起点,最终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14]5 尽管“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以不文明的方式贩卖‘文明’”^[15],但在西方推销给后发国家的方案中,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具有不可置疑的地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化”既是一种思想和学术领域的运动,也是一种不乏强制性的政治运动。“第三波民主化”与“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间的时间重合关系绝非偶然,诸如“涓滴经济学”这样的经济思想也恰恰是在“民主化”的助推下才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毕竟,就像罗斯托所言:“经济发展就是收入转移——即从那些用于较无生产性用途(窖藏起来或贷出)的人手里,转移到那些用于(或贷出)较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手里——的结果,这是经济学上最古老和最基本的观念之一。”^[16]48 而财产转移的实现就必须有政治的介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限制和排斥公共权力发挥纠正不公正后果的作用,来保证少数人的“消极自由”。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由西方所推销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方案中一定要强调现代政府只能以小政府的形态存在。

二是“民主化”的善治愿景与“选主民主”日益衰败现实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在“民主化”过程中被提供给后发国家的民主判断标准是高度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的,即“如果一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或者不是受一个可辨认的独裁者统治,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民主国家”^[17]137。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部分西方学者的懒惰或者无知,而是表现为主流民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西方中心立场和国家利益取向。从本质上看,“民主化”与真正的民主并无关联,它的推动者所关心的问题,仅在于如何遴选出符合“合法程序”标准的傀儡而已,而这也恰是民主反对现代化的又一种现实形态。在经典的“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中,人们被告知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独立的贵族阶级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这一多元主义概念有着坚实的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18]431 而这个独立的贵族阶级便是资产阶级的自画像。对于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则需要加上“买办”的前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发国家真正的两难困境,并不是维持主权、实现民主,或是以此两者为代价在追求现代化增长间作出选择,而是在对抗西方的控制,抑或放任共谋的国内外精英开启掠夺式的现代化进程间做出选择。

总而言之,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对于后发国家不具备可行性,并不是因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是受限于西方秩序和西方意志的现代化道路。它的弊端集中暴露于当下的逆全球化时代,只不过,在西方自身陷入危机之前,其主要表现形态是更加“温和”地为后发国家设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上限。而到了西方国家感到其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时,则表现为更赤裸裸地干预和破坏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或是借援助之名削弱其力量^[19]95。人们都十

分熟悉亨廷顿关于“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0]31}的判断,但这个颇具欺骗性的论断隐去了西方国家在制造动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以资本逻辑展开的^[21]西方现代化与民主理论那里,我们从来不曾看到后发国家的民主建设与现代化发展超越西方的表达。这并非偶然,而是作为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与民主理论服务于论证和维系西方世界永久的优势地位使然。相应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倾向于把后发国家的赶超成绩视为一种“必须应对的威胁”,而其原因也不仅仅是心理层面固有的“文化优越感”,更是基于维系“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格局的理性判断。毋庸置疑,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统治阶级,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277},而且在于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自觉且有效地建构起全球统治网络的阶级。这个统治网络强大血腥的暴力机器,也有着塑造“单向度人”的规训体系,而西方式现代化作为连接这一网络的重要节点,则在论证和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内部和世界体系内,西方式现代化都制造了“西方文明贵族气质的幻象”,同时也试图使市场竞争中“谴责受害者”的逻辑成为一种“道德共识”。

2.4 西方式现代化出现悖论的总体解释

历史地看,当现代化创造了个体追求福利的可能,而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又引导着普选民主制的发展时,民主与现代化间确实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自洽关系。但当对大众民主的恐惧占据了上风时,现代化的进程却开始转向与民主相分离的方向。西方式现代化在部分国家的成功确实验证了所谓“价格体系自发调节”的有效性和“明智的利己主义”的激励作用,但这种证明并不是定理式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价值目标的日益疏离而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资本主义原则主导下的现代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所以,当“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23]146}时,它的积极示范价值也便随之逐渐消耗。在西方式现代化的上升时期,自由民主制度的成长侧重于发挥其制衡现代化过程中的剥削压迫的作用,而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衰弱时期,由于自由民主本身丧失了反思向度,其功能也越来越局限于为现存制度和不合理现状提供辩护支持。于是,扮演着为价格体系和利己主义提供政治支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随之转向了现代化的对立面,它不再发挥助推作用,而是以权力、规则与意识形态阻碍现代化成果的辐射。

西方化与现代化绑定的突出弊端在于,以现代化的普遍性之名遮蔽了西方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条件(比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又以西方阻碍这些条件重新出现或西方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出现的形式,否定经由西方化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再往下深究就会发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陷阱的本质在于西方化。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造成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间矛盾的激化,而激化的后果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就是诸如金融危机、产业去实向虚等问题。这些问题本来是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但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化进程却提供了将这种内部矛盾转移出去的条件。于是,无论是以遭到遏制的形态,还是以受到误导的形态,后发国家都不得不承受这种由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之间必然矛盾而产生的后果。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即不平等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现代世界中它又服务于维系西方世界的比较优势。而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与民主理论并没有提供可信的解题思路,更谈不上贡献有效的解题方案。

3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克服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以自身的“文明标准”来评判他国现代化水平这一行为本身,不仅反映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心态,而且具有一种更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驯化功能。对于西方自身而言,将“文明化”等同于“西方化”首先是反历史的,它遮蔽了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形成于现代化进程之前的史实。同时,这种不可靠的假设也意味着一种“致命的自负”,它无助于提醒西方世界直面挑战与风险。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突破这种西方化方案解决了一切问题的盲目迷信则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认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主要矛盾的成因,从而规避其中的风险,进而也在探索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新路过程中,将现代化的真正普遍规律从其西方化的单一形态桎梏中解放出来。有鉴于此,在系统批判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在比较的视野中认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題新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非西方式现代化探索,其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这两方面。

3.1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反映在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上。从表面上看,除了尚难称之为主流的后现代理论外,主流西方语境中现代化概念也大抵对应于积极的意义。然而,如果结合现代化理解的生成语境,不难发现西方人对现代化的积极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西方中心的优越感基础上的。就其本质而言,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及其民主理论也是一种东方学取向的产物,它以西方为标准而度量“他者”世界,不过是为了塑造一种“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24]10}。因此,它需要建立一系列看似“科学”的指标体系,去论证诸如“封建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其规模一定比集权的官僚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规模要小”^{[20]50}之类的伪命题,或是强调即便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工业阶段”上实现了某种赶超,也仍然在民主指标上难以望及西方项背。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积极理解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起源。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印象直接来源于近代以来的冲击。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的“超稳定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结构,中国人直观地感受到了现代化赋予一个国家的巨大力量,从而也产生了自身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强烈诉求。同时,不同于西方国家依靠殖民掠夺奠定了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依靠的是内生的革命动力,以及建立新制后立足本土资源的发展模式。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像西方式现代化那样去不断地矫饰和掩盖其历史原罪,更不需要用笼统地“反思”现代化本身来转移矛盾,使人们忽略所谓“现代化病”的实质其实恰恰便在于现代化西方病的蔓延扩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于现代化本身积极赋义的观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才可能激发一个古老文明共同体探索延续其历史辉煌的动力,同时也为一个以革命性地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执政党指明革命建制任务完成后新的革命目标。就其对实践的影响而言,正如一些对于“西方化=现代化”的假设抱有怀疑态度的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文化将共享现代特征,如对科学的信仰、理性的管理方法、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不必成为西方文明”^[25]。而当更多的后发国家在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以较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目标”^[26]的事实,见证中国“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27]497}的胸怀,并由此意识到西方体系的存在本身恰好构成了对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阻碍时,这种将西方化与现代化脱钩的行为无疑就变得更为

积极主动。此外,不应忽略的是,这种积极的现代化观还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不断进取、实现自我超越的品质。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许多现代化困境其实并非源自现代化本身的属性,而是源于人们放弃进步进取的立场,转而用一种消极默认不合理现状的态度来看待充满矛盾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很少用反思的目光来审视现代化概念和现代化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滞后”于西方,而是体现出中国人在实践中直面与克服现代化现实矛盾问题的勇气与智慧。有了这样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就不会像西方式现代化那样,在享受话语霸权荫庇的同时,丧失自我超越的自觉与能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还体现在其对平等价值的强调上。从源头上梳理,西方式现代化体系内出现的问题,既是源于现代化经济现状的问题,也是根本的政治性问题。其本质是一个经济基础捆绑上层建筑、以自由之名侵蚀现代化平等价值的问题。以往,伦理学家们总是从过分抽象的宏大叙事视角出发,笼统地将个人主义“失去更高的目标感”视为西方现代性的隐忧^{[28]2},将“社会的自我”取代“真正的自我”^{[29]84}视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然而,如果将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视为一种掠夺式发展历史的延续,人们就会意识到真正无处安置的并非抽象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不平等的个人主义。换言之,真正的现代病其实是攫取私利的阶级理性被伪装为普遍的工具理性所致。而西方的主流理论之所以无法正确解释现代化与民主悖论的成因,也是因为自由派学者将社会变迁与大众的现代化诉求人为分割成两个领域:前一个领域直接关联“民主化”,而后一个领域则对应于“实现现代性的努力”。因此,如果对“民主化”的考量是第一位的,那么现代化的需求就得服从于“民主巩固”的秩序要求,如同“阿拉伯之春”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反之,如果可以用一些其他概念,比如“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与增长的诉求”或者“防止自由制度受到威胁”^{[20]409-410}来代替平等取向的现代化诉求,则民主就要更加“节制”,如以“只限于自由投票的自由竞争”的形态以获得可行性^{[30]398}。于是,在去平等化的前提下,对于许多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与民主就变成了二选一的问题。而要根治这个问题,就需要把平等找回来,使之重新成为现代化过程的背景色。

相应地,如果人们不满足于在完成时态下理解现代化的话,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选项。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规定了“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31]171}。这既是一种庄严的政治宣示,也代表着中国对于维系现代化可持续性的力量蕴含于大众当中这一科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平等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善治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以及他们的帮佣们所声称的那样,主要来源于所谓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低人权优势”,或是“搭了西方发展的顺风车”,而恰恰是更趋向平等的现代化相对于日趋不平等的现代化的胜利,是共享的现代化对分化的现代化的胜利。同时,这也提示着我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重视和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坚信在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之处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是能够造就“发展惠及人民—人民认同发展—认同助推发展”良性循环格局的制度密码。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2]465},从而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调。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人们越主动地摆脱现代化的西方化定义思维,就越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又为重新定义现代化创造了实践基础和认同条件。

3.2 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的重新赋义

在更新人们对于现代化学理解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通过对民主定义的重塑来奠定克服西方化陷阱的基础。依据西方式的标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方式或许会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的体现,因为自由民主制下,不可能想象政府可以违逆少数“富民”的意愿而发挥对普通群众负责的主动性。但在以人民为前提的民主概念中,政府服务于多数人而拒绝少数人的绑架,才意味着真正的民主。换言之,应该改变的其实并不是中国民主的现状,而是人们理解民主的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对于民主的重新赋义。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民主定性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试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参与制”的幻想形成对照,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民主的定性与制度化表达两个维度上提供了发展真民主、好民主的条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立场,坚持人民民主的人民既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民群众,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主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理念中,同时兼顾了人民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权利,而不像西方“选主”体制那样偏执于一端。而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特征,又广泛涵盖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有利于实现人民意志与执政党宗旨属性高度契合,进而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如此一来,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到底是谁的民主的问题,而且也形成了一套兼顾民主的稳定与活力、程序性原则与实质性内容的民主实践体系。在这一民主体系中,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广泛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过程,既始终保持着民主主体的地位,又获得了充分的民主训练和磨合机会,从而真正使中国的民主得以成功运转起来,成为更有序、有效的民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是解决真问题、追求善治的民主。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化体系内之所以会普遍出现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关键并不在于民主与现代化之间的固有张力,而在于拥有民主解释权的统治阶级的阶级理性与治理理性间存在着固有矛盾,在于西方式民主颠倒了特定民主程序与民主实质,颠倒了民主的制衡属性与民主的善治目标的权重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只是片面地在价值层面上反复吟唱“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信条,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悖论问题,而只能促使大众由对治理失败的不满转向对民主本身产生不满。有鉴于此,在解决了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化表达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重新赋义就更需要突出体现在对民主与善治关系的重塑上。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建设就高度重视民主建设的结果导向,使得“乡村社会以往黯淡衰败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社会侵蚀’景象为生机勃勃的乡村动员景象所取代”^[33]。进入建设与改革时期,党和国家更是始终秉持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4]168}的理念,注意民主建设的推进与现代化发展目标间保持有机统一的关系。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像西方式民主那样,将由竞选体验带来的合法性认同作为民主建设的终点,而是力求在实践中重建民主与善治间的统一逻辑,追求“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35]73}基础上民主“选对人”“做好事”的目标。数十年间,中国“从一个被别人瞧不起的穷国转变为中等繁荣的,以及用国际标准来看,非常平等主义的国家”^{[36]288},与接受西方式现代化与“民主化”方案而陷入发展陷阱的诸多后发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对应的这种“既好看又有效的”民主,就必然能创造出“民主带来善治、善治强化民主认同”的良性循环格局,从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民主重新赋义,

以及将民主的普遍规律从其单一的西方“选主”形态中解放出来的重大意义。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还促使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回归到了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的正常轨道。西方式现代化与民主化道路的重要弊端之一,就在于其所创造的“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的神话妨碍了人们探索西方式民主之外的可能性。在过去的70多年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在国家发展、惠及民生、发展民主等方面取得全方位成就,正是得益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道路。也正因为中国的民主从来不是西方式民主的翻版,而是从回应时代问题、中国问题与中国人民的关切中成长,它才能深深地扎根于本土,逐渐褪去其为“舶来品”的颜色。西方化与民主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耦合,前者既不能永远把持民主的解释权,更无法穷尽民主的科学规律。中国的成功证明,要实现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愿景,既不能靠先发国家的恩赐指导,也不能指望“自发秩序”的调节,而是要始终立足于自身、立足于人民。此外,与西方化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来都无意于垄断民主的解释权,更不会以“促进现代化”或者“推动民主自由”之名剥夺其他国家人民追求平等发展的权利。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37]16}的要义,是在于启发各国人民,只要后发国家勇于突破所谓“转型范式的常识”,立足本土、立足人民,就完全可能摆脱西方式现代化与“民主化”所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重重魔咒,在夺回应有的现代化发展权的同时,也夺回人民对民主的解释权。

4 结语

西方式现代化固有矛盾的暴露及中国式现代化对其的超越,都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动力逻辑使中国具有了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现代化是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另一方面,不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限制逻辑又将影响中国优势的发挥。因此,无论从既往成功经验的正确总结角度着眼,还是指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做得更好的未来愿景,都应更强调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角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经验。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系统的阐述,就其五大特征而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在描述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客观条件,更是在强调评判现代化成效的主体;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平等价值取向的进一步诠释;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恰恰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意味着彻底摒弃了此前西方国家损人利己的“剥夺性积累”的道路,而所有这些认识的核心又在于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规定性。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带来中国这种赶超优势的关键,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4]163}。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对现代化与“民主化”西方病的矫治,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纠正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来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蕴藏的制度与治理互洽的巨大潜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验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一旦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能够创造何种的发展与平等奇迹^[38]。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步所凝练出的理论,更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 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M]. 李陈华,许敏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4] 安妮·凯斯,安格斯·迪顿.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M]. 杨静娴,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 [5]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自由市场的坠落[M]. 李俊青,杨玲玲,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 [6] 丁一凡. 民主悖论[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 [7]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8] 沙烨. 跨域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
- [9] 王绍光. 中国·政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10]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斯豪斯. 经济学(第19版)[M]. 萧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1] 弗拉季斯拉夫·伊泽诺姆采夫. 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M]. 徐向梅,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12] 尼尔·弗格森. 帝国[M]. 雨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13] 陈学明. 评J. B. 福斯特论述“新帝国主义”的三篇文章[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12):77-84.
- [14] 奥斯瓦尔多·卡丁内斯.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M]. 高静,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 [15] 韩喜平,郝婧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蕴[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2):102-111.
- [16]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郭熙保,王松茂,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7] 安东尼·阿伯拉斯特. 民主[M]. 孙荣飞,段保良,文雅,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18] 巴林顿·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M]. 王苗,顾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19] 迈克尔·帕伦蒂. 少数人的民主[M]. 张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0]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1] 陈艳波.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6-21.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25] 罗维. 现代化≠西方化——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另一种解读[J]. 理论导刊,2006(2):24-27.
- [26] 辛向阳.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8):15-19.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8] 查尔斯·泰勒. 本真性的伦理[M]. 程炼,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 [29] 艾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 [30]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3] 应星. 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2(3):97-111.
- [3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6] 戴维·施韦卡特. 反对资本主义[M]. 陆泓,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8] 漆思. 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命题[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6-9.

Modernization, Western Paradox of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Solution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N Yi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once monopolized the right to interpret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ut it also produced a series of se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drawbacks. Therefore, the reflection on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should touch on its essence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its service to the modernization regulation that “belongs only to the West” through its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The s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the problems of westernization is precisely along the principle opposite to that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The gis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coming the shortcomings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i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redefini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democracy. On the one hand, the redefinition of modern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istent adherence to a positive view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e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definition of democracy is reflected in the i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ose democracy”, clarifying that democracy should solve problems and pursue good governance, as well as emphasizing the respect for democratic diversity and autonomy. The suc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ll also fundamentally overcome the paradox of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under the westernization system, thus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ization, so that the law of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could be completely liberated from the single westernized form.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the paradox of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责任编辑: 牟 怡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性分析

谢琦,李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在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时都把党建引领作为一条主线。目前,学术界对于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缺少针对性的研究。如何系统地阐释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问题,据此提出与之匹配的优化路径,是一项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本项研究课题的开展提供系统性、可行性的研究视角。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集中体现了推动结构耦合、激活过程调适、提升治理功能的有机统一。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结构层面的低耦合运作、过程层面的低韧性调适、功能层面的党建“悬浮化”等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索结构上的耦合型治理、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完善功能上的融合式治理,是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优化路径。一言以蔽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体系是一个涵盖结构、过程、功能相互作用、动态调整的整体性运作。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党的数字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27-12

近年来,随着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快速发展,如何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探索把党建优势转为基层数字化治理优势的模式、方法,成为各地党政部门关注的热门话题。如北京的“回天大脑”赋能治理模式,上海的“社区通”智能化平台,重庆的“1+3+3+7+N”基层智慧治理数字化体系,深圳的党建引领“全域数治”的“龙华模式”,杭州的“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模式等。目前,既有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视角、模式、逻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特征、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类型、问题、对策;党的领导与数字化治理的关联性议题。针对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目前学术界缺少针对性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体系是一个涵盖结构、过程、功能相互作用、动态调整的整体性运作。“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提供系统性、可行性的研究视角。通过本文的系统性研究,一方面,在理论上可以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在应用上可以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智能化背景下上海基层党组织数字领导力提升研究”(2022EZZ002),项目负责人:谢琦;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2022BSH08),项目负责人:谢琦。

作者简介:谢琦,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李亮,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既有研究对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命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认识,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新课题的开展提供了研究基础、重要参考。然而,纵观既有研究,目前对于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呈现出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存在哪些现实问题,可以采取哪些优化路径,缺少针对性的回答。由此,本文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视角、模式、逻辑。针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主题,代表性观点分别从网络治理^[1]、整体性治理^[2]、空间治理^[3]、社会资本^[4]、组织学^[5]等视角进行理论解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已经形成了一些代表性模式,学者们分别从“授权赋能”模式^[6]、“超行政治理”模式^[7]、“统合型联动”模式^[8]、“平台党建”模式^[9]、“政党整合社会”模式^[10]、“实践型党建”模式^[11]、“多层次整合”模式^[12]、“资源整合”模式^[13]进行了总结。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学者们分别从创新逻辑^[14]、行动逻辑^[12]、治理逻辑^[15]、理论逻辑^[16]、实践逻辑^[17]以及政治整合与社会建构逻辑^[7]、组织激励逻辑、风险规避逻辑、灵活调适逻辑^[5]进行了专门探讨。

二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特征、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具有多重功能,既有研究认为,这些功能包括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升基层治理绩效,破解科层制困境^[18],实现基层治理善治。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特征,代表性观点分别从“一核多元”^[19]^[31]、“一核多能”^[20]、“党治社会”^[21]、“党领共治”^[22]、“党社双强”^[23]等关键性特征进行诠释。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将其概括为政治引领、激励驱动、网络整合三大机制^[24],愿景塑造、共识形成、主体规范、协调沟通、行为监督五大机制^[25],议题聚焦与拓展机制、小组机制、双委员机制、联合党支部机制、项目合作机制、文化交流机制六大机制^[26],枢纽链接、组织嵌合、行为垂范三大机制^[27]。

三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类型、问题、对策。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类型,学者们提出“主导式引领—协商式引领—自治式引领”三类型说^[28]、“价值引领式—平台搭建式—资源整合式—机制保障式”四类型说^[14]。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还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有的学者从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方面进行了剖析^[29];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社会信任衰减引发社会动员困境、形塑作用失灵导致行为引导成效不彰和参与网络缺失降低主体互动水平等方面^[4]。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对策,有的学者认为,应发挥好党建引领的价值倡导和行动倡导作用、政治整合和资源整合作用、利益协调和组织协调的作用^[30];有的学者提出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的方案^[29];有的学者提出涉及政党的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关系重塑和治理资源的方案^[28]。

四是党的领导与数字化治理的关联性议题。近年来,随着各领域数字化治理的广泛开展,探讨党的领导在数字化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成为新近的议题,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体制、结构、能力等方面展开。有的学者基于数字化治理体制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31]。有的学者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结构,认为党委政府是数字治理生态构建的核心力量,发挥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行动者网络和激活新兴治理资源的主导作用^[32]。还

有的学者基于组织领导能力的维度,探讨了各级党组织的组织领导能力对于确保社区数字化治理的关键作用^[33]。

既有研究对于党建引领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机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提供了理论积累和经验素材。党建引领是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关键机制,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在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时都把党建引领作为一条主线。然而,无论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相关研究,还是党的领导与数字化治理的关联性议题,都缺少对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现象的专门探讨,如何系统地阐释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问题,据此提出与之匹配的优化路径,是一项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目前,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呈现出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存在哪些现实问题,通过对运作逻辑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把握,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效能,可以采取哪些优化路径,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还缺少针对性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领导力、数字化领导力、党的数字领导力等相关理论,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尝试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系统性回应。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还可以在实践上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文以领导力理论、数字领导力理论为基础,界定了党的数字领导力这一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党的数字领导力的结构与要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对结构、过程、功能的系统把握,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尝试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2.1 理论基础:从领导力到党的数字领导力

领导力一直是政治学、管理学、领导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詹姆斯·马奇将领导力视为涵盖疏通水管(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书写诗歌(寻找意义的能力)的结合体,作为疏通水管的领导力是一种有效应用已知技术的能力,涉及胜任力、主动性、认同感、不引人注目的协调力四个要素;作为书写诗歌的领导力是指在行动中寻找意义、为生命涂抹颜色的能力^{[34]187-188}。领导力是领导者对个体、团队、组织的目标、愿景、行为的一种影响力,指向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领导力,多指对单个个体或若干原子化个体的一种影响力,是一种塑造他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权力^{[35]3}。团体层面的领导力是指影响一个群体实现愿景或目标的能力^{[36]295}。组织层面的领导力,是指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涉及确定组织的发展方向、创建成员之间的联合以及获得员工承诺积极投入工作中去的综合能力^{[37]453}。对于党的领导力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行了诠释和概括^{[38]15},它主要体现为组织层面的领导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从领导力迭代到数字领导力成为相关部门今后的着力发展方向。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数字领导力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成为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时髦词汇。艾沃利奥等人较早对数字领导力进行了界定,在他们看来,所谓数字领导力是指在信息技术媒介下,内嵌于近端、远端情境中的促

使个体、团体、组织在态度、情感、思维、行为、绩效上发生变化的社会影响过程^[39]。在艾沃利奥等人认识的基础上,罗曼等人进一步将数字领导力视为以技术为媒介,旨在改变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和绩效的一系列社会影响过程,这一过程有赖于领导者清晰适当的沟通能力,提供充分的社交互动,激励和管理变革,建立和维持负责任的团队,说明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知识以及培养对虚拟环境的信任感^[40]。

国内学者方跃将数字领导力视为数字领导者的变革愿景、前瞻性思维、基本的数字素养、变革导向等一系列基础能力^{[41]87-88}。在中国数字化治理情境下,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其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数字领导力更多地表现为党的数字领导力,即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通过影响本组织、其他组织、团队、个体的价值、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带领大家参与数字化治理实践、构建数字化治理共同体、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的综合治理能力。从结构上看,党的数字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领导数字化治理的具体体现,存在于上下党组织之间、党政之间以及党社之间,包括数字号召力、数字统领力、数字协调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动员力等六大能力要素。

2.2 分析框架:“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具体来说,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体系是一个涵盖结构、过程、功能相互作用、动态调整的整体性运作。结构是基层数字化治理中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表现形态,包括纵向维度的多层级关系、横向维度的多元化关系。结构的核心是治理权力的相对固定配置,是基层数字化治理中不同层级、领域、类型治理主体的权力配置、组织方式及其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制度化关系^[42]。过程是基层数字化治理中不同治理主体围绕权力获取、利益协调、资源配置、权力行使等展开的持续性互动。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它对过程具有形塑作用。过程具有动态调适性,它对结构具有反馈作用,在条件成熟时甚至能够根据治理情况的变化再造新的结构。功能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定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结构和过程演化产生的治理效能。从结构、过程、功能三者的关系来看,结构、过程的复合效应影响着基层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功能,功能对结构与过程具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着结构的运行和过程的调适。基于对结构、过程、功能的系统把握,本文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从“运作逻辑是什么?存在哪些现实问题?采取哪些优化路径?”的问题链条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该分析框架将解释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为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3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

综观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样态及其总体特征可以得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集中体现了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的结构耦合逻辑、结合“赋权赋能”优化基层数字化治理运行的过程调适逻辑、提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便捷性的治理功能逻辑。这三大运作逻辑内在关联、互相影响,共同塑造着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本质与规律。

3.1 推动结构耦合: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

从结构上看,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主体涵盖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行政主体(各条线部门、各层级地方政府、派出机构)、市场主体(各类企业)、社会主体(群团组织、自治组织、NGO)。这些主体具有纵向的层级性和横向的多元性,如何将其联结、整合、协同起来,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是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结构耦合逻辑。一言以蔽之,结构耦合不会自发形成,它需要发挥“元治理”主体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庞大的组织体系以及强大的统领能力,赋予其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元治理”的角色。依托党建引领的总体势能,通过全方位发挥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能够穿透纵向多层级主体,整合横向多元化主体,推动“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一是通过党建引领,构建纵向多层级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具体来说,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通过综合发挥省、市党组织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激励设置的作用和区、县党组织的搭建平台、资源整合、上传下达的作用以及街镇、村社党组织的识别问题、塑造网络、探索机制的作用^[43],“以党领政”自上而下地破解条块矛盾,建立党政同体的纵向多层级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二是通过党建引领,构建横向多元化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把“以党领政”“以党领社”^①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行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建立“党组织网络引领为主导—数字化连接为支撑—整体性治理为要义”横向多元化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如重庆市探索的“1+3+3+7+N”^②基层智慧治理数字化体系,就是一个纵向多层级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横向多元化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的集合体。

纵向多层级、横向多元化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体现了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的整体过程,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发挥“一核引领”“多元协同”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无论是纵向多层级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还是横向多元化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都是政党领导组织型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网络的两种表现形式。正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将党的全面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整体性优势,基层数字化治理结构得以实现“政党统领式耦合”,这对于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数字化治理共同体来说至关重要。

3.2 激活过程调适:通过“党建赋能”实现治理机制的动态组合

从过程上看,基层数字化治理涉及不同治理主体间权力、资源的情境化配置以及多重利益关系的协调。基层数字化治理机制主要有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数字机制,党建机制作为“元治理”机制在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通过“党建赋能”实现与四种治理机制的动态组合,这是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过程调适逻辑。一般而言,这四种治理机制各有优势和缺点,通常不会自动地组合在一起或独自发挥作用,它需要具有统领功能的党建机制来激活治理过程,实现治理机制的动态组合及其与治理情境的匹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基层数字化

① “以党领社”中的“社”指的是“大社会”,包括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

② 1个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党务、政务、综合治理3类数据,市、区县、街镇3级政府,市、区县、街镇、社区、网格、物业、楼栋7级管理,N个基层智慧治理应用场景。

治理的高效运行,关键在于根据具体情况的动态变化将党建机制与四种机制进行动态组合。根据治理情境的不同,党建机制与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数字机制主要有“党建机制+数字机制+行政机制”“党建机制+数字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党建机制+数字机制+行政机制+社群机制”“党建机制+数字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等四种组合类型。当面对不同的治理情境时,与之匹配的治理机制组合类型以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复合效应,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向善治的理想状态发展(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层数字化治理机制分析表

	适用范围	核心优势	主要表现	主要角色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类型四
党建机制	适用范围广	统领协调	价值引领、平台搭建、资源整合	引领助推	+	+	+	+
数字机制	适用范围广	赋权赋能	平台化、可视化运作	支撑保障	+	+	+	+
行政机制	行政事务	分工效率	政策制定、行政指令、绩效考核	负责落实	+	+	+	+
市场机制	社会事务	资金技术	购买服务、项目外包	参与		+		+
社群机制	社会事务	自主灵活	正式或非正式契约、信任网络、伙伴关系	参与			+	+

3.3 提升治理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功能来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归根到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全方位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聚焦“问题导向”“效率导向”“公平导向”三条主线,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治理功能不断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全方位、高效能、公平地获得满足。即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治理功能逻辑,就是不断提升治理功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聚焦“问题导向”这一主线,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把当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纳入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不断提供全面、丰富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全方位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聚焦“效率导向”这一主线,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让数据多“跑路”,打通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注重高效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的“一网通办”“一网通管”、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等探索均强调以最迅捷、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提升基层数字化治理效率。三是聚焦“公平导向”这一主线,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将打破“利益藩篱”与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成果重点向基础条件薄弱的治理单元以及老、弱、病、残、孤、寡等弱势群体适当倾斜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成果的普惠化、均等化,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公平地分享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最终成果。

4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现实问题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作为一项新的治理探索,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提升基层数字化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

治理都是一项“一抓就灵”的治理方案。基于“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结构层面的低耦合运作、过程层面的低韧性调适、功能层面的党建“悬浮化”等现实问题。

4.1 结构层面的低耦合运作

耦合度的高低是评估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的关键指标。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把多元主体塑造为高耦合度的治理共同体,对于党建引领来说并非易事。从我国一些地方反映的情况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在主体结构、关系结构、数据结构等层面还存在低耦合运作的现实问题。

一是主体结构存在“党政强、企社弱”的不平衡问题。从表面上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是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推动的结果。然而,事实上这些实践基本上都是党政主体单向引领、创制、助推的结果。在党政主体的主导下,市场主体、社会主体被吸纳进基层数字化治理场域,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呈现“被动式参与”“依附式参与”的状态,一些地方的党政主体甚至将市场主体、社会主体视为党政主体工作链条的延伸,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度处于低位状态。总体上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在主体结构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党政强、企社弱”的不平衡问题。二是关系结构尚未形成“紧密型的网络化结构”。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场域存在政治、行政、市场、社会四个子场域,各个子场域有着性质不同的关系逻辑,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般而言,政治主体遵循“权威—服从”逻辑,行政主体遵循“科层—分工”逻辑,市场主体遵循“成本—收益”逻辑,社会主体遵循“信任—互惠”逻辑。鉴于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场域中多重子场域的事实,需要构建跨越多重子场域的网络化结构,形成基于治理场域的复合型、整合性秩序。然而,从关系结构上看,这四个子场域被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场域后并没有很好地形成整合各子场域逻辑的跨场域、整体性局面,通常政治逻辑、行政逻辑主导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呈现党建引领式的行政负责型网络结构,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尚未形成基于整合多重场域逻辑的“紧密型的网络化结构”。三是数据结构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受整体规划不到位、技术标准不一、低数据权限、条线数据多头管理的影响,目前我国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在数据结构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碎片化”问题。如数据系统开发上存在各个部门各自一套、独立开发、互不共享的问题;数据平台建设上缺少容纳各个部门系统服务端口的统一性平台;数据共享推动上虽然打通了一些网络和数据库,但因技术、标准、格式的原因,这些网络、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衔接并不顺畅。这些情况的存在导致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数据相互区隔、彼此独立,无法充分地实现数据交换、共享与分析,出现一定程度的“数据烟囱化”现象。

4.2 过程层面的调适性不强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不是简单的“党建+技术+治理”的物理叠加,而是一个涉及复杂治理过程的动态调适。这些调适类型包括纵向型调适(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的调适)、横向型调适(同级党政部门之间的调适)、虚实型调适(线上平台与线下治理之间的调适)、内外型调适(党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等之间的调适)四种类型。从这四种调适类型在实际运行中的综合表现来看,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在过程层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调适性不强的现实

问题,具体表现在组织联动不强、制度适配不强、技术韧性不强等方面(如表 2 所示)。

表 2 四种调适类型及其调适性不强的表现

	纵向型调适	横向型调适	虚实型调适	内外型调适
组织联动不强	下级缺少权力、资源以及调适的自主性	同层级部门协同不力,存在调适乏力的问题	线上平台场景不能及时跟进线下治理情境的变化	表现为党政吸纳式调适,市场、社会主动性较低
制度适配不强	制度赋权增能有限,制度刚性有余、韧性不足	相关制度难以操作,实施难度大	缺少相关制度指导或相关制度难以操作	缺少相关制度指导或相关制度难以操作
技术韧性不强	技术呈现科层化趋势	部门主义带来技术平台、标准不一,无法发挥整体性效能	线上平台场景多集中于日常治理事项,缺少对棘手事务的模拟仿真	技术的简约治理确保了效率,但无法适应多元主体互动的多样性

4.3 功能层面的党建“悬浮化”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有助于把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效能优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各地在探索基层数字化治理实践时,都把党建引领作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抓手。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并不是“一抓就灵”的治理工具,一些地方的党建引领和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两张皮”现象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范围内还存在党建“悬浮”于基层数字化治理的问题。一是党建内容与基层数字化治理业务的融合度不高,无法有效地提升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效能。一些地方的党建引领,实际是“就党建抓党建”,其党建内容基本上是“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党务活动,缺少基于基层数字化治理业务的融合式引领。二是一些党建主体存在与基层数字化治理不适应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党建主体文化程度较低、治理本领不高、学习能力不强,数字化治理意识薄弱,对数字化治理技术不了解,缺少应有的数字化领导力,在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习惯老一套做法,无法在解决基层数字化治理问题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三是党建方式方法不适应基层数字化治理的现实需要。一些地方的党建工作方法、活动方式过于单一,形式不够灵活,缺少融入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党建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

5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针对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在结构、过程、功能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索结构上的耦合型治理、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完善功能上的融合式治理,是具有可行性的优化路径。

5.1 探索结构上的耦合型治理

破解结构层面的低耦合运作,需要基于主体结构、关系结构、数据结构的优化,探索耦合型治理。一是通过党建引领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体赋权增能,打造“党政强、企社强”的均衡型基层数字化治理主体结构。党建引领并不是为了让执政党和各级党组织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唱独角戏,而是通过充分发挥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培育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成长,助推其积极参与,党建引领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扮演的是“引领而非替代”“培育而非包办”的角色。一方面,

依托党建引领,进一步为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市场主体赋权增能,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依托党建引领,进一步为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社会主体赋权增能,激活社会主体的人才优势、专业优势、服务优势。二是通过党建引领打造多元型、紧密型的网络化关系结构。把党建引领寓于基层数字化治理之中,基于治理逻辑整合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推动党建引领下多重治理关系的重塑,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打造多元型、紧密型的网络化关系结构。三是通过党建引领构建具有整体集成性、彼此互嵌式的数字结构。首先,依托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技术标准、通用规范的制定、出台、实施,完善基层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标准化建设,为各类数据平台间的集成、互嵌提供统一的规范和参考标准。其次,依托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一体化平台的建设,整合各部门不同层级、不同标准、不同渠道的系统,集成为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渠道的应用单元或大数据中心。再次,针对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各种数据共享具体难题,依托党建引领,建立数据资源整合专班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方数据协同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形成互嵌式、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格局。

5.2 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

针对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调适性不强的问题,始终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案。这里的调适性治理,是指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党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等不同属性的治理主体,基于合作治理和组织学习机制而形成的主动适应治理情境动态变化、反复修补治理梗阻的一种治理模式。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需要从推动组织的快速联动、完善制度的弹性适配、提升技术的韧性效应等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探索具体路径。一是推动组织的快速联动。以问题、事项为导向,通过党建引领统筹协调组织间的互动联动,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流程链条的基层数字化治理组织联动机制,实现组织的快速联动与相关问题、事项的全过程衔接。二是完善制度的弹性适配。一般而言,基层数字化治理问题可以分为简单问题和棘手问题,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制度建设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思路以适配这两类问题的精准治理。一方面,针对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简单问题,通过党建引领将一些成熟的经验制度化、体系化,探索符合简单问题治理特点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针对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通过党建引领把制度的弹性留白和制度的规范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具有刚柔并济特点的制度体系。三是提升技术的韧性效应。依托党建引领,通过技术赋权、技术增能两种机制的持续优化,不断推动基层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党政关系和党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系统重塑以及治理流程再造、治理方式创新,建立“技术赋权增能驱动—治理系统变革重塑—治理环境动态适配”的技术驱动式韧性治理体系。

5.3 完善功能上的融合式治理

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出现的党建“悬浮化”问题,推动党建引领与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深度融合,完善功能上的融合式治理是今后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一是系统梳理党建引领内容与基层数字化治理业务的契合点,建立健全融合式内容体系。在全面把握党建引领内容、基层数字化治理业务的基础上,寻找党建和基层数字化治理在各个环节的契合点,建立健全内容彼此支撑、有机衔接的融合式内容体系。二是加强党建主体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培训,建立融合式人才队伍。针对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发展趋势、一般规律和总体特点,结合基层数字化治理不同领域、过程、环节的具体要求、特点,推动党建主体数字化治理能力培训的制度化、常态化,持续提升党建主体的数字化治理意识、思维、素养和能力,把党建主体培养

成为“懂党建引领、善治理业务、精数字技术”的融合式人才队伍。三是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创新方式,建立健全融合式运行机制。如党建主体与市场及社会的嵌入机制、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整合机制、党建平台与治理平台联动机制、党建空间与治理单元对接机制、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共享机制、党建铸魂与治理文化濡化机制等。

6 结语

准确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需要对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系统把握。本文基于领导力、数字化领导力、党的数字领导力等相关理论,建立“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尝试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问题和优化路径。从运作逻辑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集中体现了推动结构耦合、激活过程调适、提升治理功能“三大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现实问题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存在结构层面的低耦合运作、过程层面的低韧性调适、功能层面的党建“悬浮化”等主要问题。从优化路径来看,在遵循运作逻辑和把握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可以从探索结构上的耦合型治理、推动过程上的调适性治理、完善功能上的融合式治理等三个方面探寻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本研究把解释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理论、实践上看,既可以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可以为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需要指出的是,深入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这一命题,还应该分析和解释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机制。后续研究将立足解释性研究,通过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例分析,提炼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一般机制。

参考文献:

- [1] 何艳玲,王铮.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 管理世界,2022(5):115-131.
- [2] 陈秀红. 整体性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 学习与实践,2021(12):93-102.
- [3] 彭勃,吴金鹏. 以空间治理破解基层党建“科层化旋涡”[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34-142.
- [4] 潘博,王立峰.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路径——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2020(5):110-117.
- [5] 高卫星,郑子端. 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多重逻辑:一个组织学解释——基于对S市辖区街道的观察[J]. 河南社会科学,2021(8):49-55.
- [6] 姜晓萍,田昭. 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5):64-71.
- [7] 彭勃,杜力.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2(1):59-75.
- [8] 陈纪. “统合型联动”: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模式——以T市社区治理创新为例[J]. 行政管理改革,2022(10):59-67.
- [9] 陶建群,聂志刚,周艳. 平台党建:超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桂园探索[J]. 人民论坛,2021(18):47-49.
- [10] 潘泽泉,辛星. 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3-163.
- [11] 望超凡. 实践型党建: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J]. 兰州学刊,2021(3):136-146.

- [12] 张勇杰.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19(6):125-132.
- [13] 咸鸣霞,周义程.市场合作、民间协调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基于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90-98.
- [14]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探索,2018(6):109-115.
- [15] 布成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J].社会科学,2020(6):71-82.
- [16] 周云冉.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59-65.
- [17] 温丙存.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21(6):97-104.
- [18] 黄六招,顾丽梅.超越“科层制”:党建何以促进超大社区的有效治理——基于上海Z镇的案例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6):62-70.
- [19] 徐永祥.宜城模式:百强县域城市社会治理新常态[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 [20]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1):95-98.
- [21] 刘笑言.党治社会:区域化党建过程中的内卷化倾向研究[J].社会科学,2020(6):46-57.
- [22] 朱健刚,王瀚.党领共治:社区实验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再生产[J].中国行政管理,2021(5):6-14.
- [23] 卢艳齐.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目标梯次、进阶阻碍与突破思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3-21.
- [24] 黄晓春.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21(6):116-135.
- [25] 容志,孙蒙.党建引领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上海“红色物业”的实证研究[J].理论与改革,2020(2):160-171.
- [26] 陈亮.跨区域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及其作用机制——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观察[J].探索,2021(5):103-114.
- [27] 孟燕,方雷.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J].探索,2022(6):85-97.
- [28] 陈毅,阚淑锦.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三种类型的分析及其优化——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探索,2019(6):110-119.
- [29] 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J].理论视野,2019(4):78-85.
- [30] 叶敏.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4):18-24.
- [31] 蔡跃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J].管理世界,2021(8):30-46.
- [32] 孟天广.数字治理生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J].政治学研究,2022(5):13-26.
- [33] 陈冠宇.新型智慧城市背景下社区数字化治理研究——基于“公共价值三角模型”的拓展性分析[J].电子政务,2022(12):60-69.
- [34] 詹姆斯·马奇.马奇论管理[M].丁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 [35] 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M].章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36] 斯蒂芬·罗宾斯,等.组织行为学:第16版[M].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37] 辛西娅·D.麦考利,埃伦·V.韦尔索.领导力发展手册:第2版[M].翁文艳,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 [3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9] AVOLIO B J, KAHAI S, DODGE G E. E-leader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0(4): 615-668.

- [40] ROMAN A V, VANWART M, WANG X H, et al. Defining e-leadership as competence in ICT-mediated communications: 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9(6): 853-866.
- [41] 方跃. 数字化领导力[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9.
- [42] 韩志明. 基层治理悬浮与下移的张力及其辩证分析[J]. 人民论坛, 2021(24): 54-57.
- [43] 陈亮, 李元.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J]. 探索, 2022(3): 120-131.

The Operation Logic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e-Process-Function”

XIE Qi, LI Li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various localities have taken Party building as a main line when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acks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How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operation logics, realistic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is 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e, process, function” can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feasible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is research topic. The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which reflects the organic unity of structure coupling, process adjustment and governance function improvement. The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is generally in the overall exploration stage,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low coupling operation of the structure, low resilience adjustment of the proces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in floating of the func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ploring coupling governance in structure, promoting adaptive governance in process, improving integrated governance in function, which are the optimization paths of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From the research, we can summarize that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is a holistic operation that includes structure, process, func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Key words: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primary-level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责任编辑: 王 慧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 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严郁洁¹, 曹胜亮²

(1.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主要通过组织人力、理念认同等内源动力因素与制度支持、资源注入等外部助推因素将党组织引领优势转化为社会组织治理效能。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效能评价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检验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其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环节,因而建构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建构这套评价体系应以促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基本思路,坚持统筹性与典型性相统一、可行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将评价指标细分为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以及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等四重维度,建构起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建构这套评价体系,以期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治理效能进行量化评价,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规范化发展。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评价体系;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39-14

自社会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社会组织^①被定位为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之一,并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65}。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肩负着这种重任^[2]。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8}。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登记社会组织90万个,社会组织共建立基层党组织17.1万个,基本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4]。自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以来,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加强党建引领以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也得到高度重视。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逻辑机理与实践策略研究”(19BDJ011),项目负责人:曹胜亮。

作者简介:严郁洁,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胜亮,男,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的社会组织指新社会组织,即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相对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等。

治理之间的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及领导作用,凝聚社会组织人心共识、提升社会组织业务能力、扩展社会组织资源渠道,从而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增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这成为当前和今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政治要求和实践需要。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评价指标呈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具体状况,以客观评价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状况,从而通过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来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目前关于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结构耦合方式以寻求地方治理策略。大部分研究以理论迁徙为视角,以某地区或多地区案例分析为依据,结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与本土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提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之上建构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具体评价标准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已成为国内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作用机制、现实困境、实践路径以及治理现状等方面。对于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纪莺莺认为,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过程中,社会组织在资源、合法性、制度支持等方面的嵌入和国家意志与目标的嵌入形成“双向嵌入”结构,进而形成“双向赋权”,以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治理能力^[5]。对于党建促进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困境,杨静娴认为部分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地位虚化、党建主体不明确致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运行不畅,党组织行政化导致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不能有效融合,工作方式僵化造成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缺乏活力,保障不足影响社会组织党建作用的发挥^[6]。李德从理顺管理体制、培育枢纽型党组织、加强人才培养、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四个方面提出要形成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合力,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以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7]。对于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的现状评价,褚松燕认为社会组织党建从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两个方面形成我国社会整合和政治吸纳的新路径,在总体上呈现出以党的政治整合引领社会团结协同以及贴近实际创造性地满足差异化公众需求的宏观趋势^[8]。韦克难和陈晶环通过对社会组织样本的实证分析认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与党建呈现正相关发展状态,党建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而促进社会服务型治理^[9]。侯利文认为,党建既融洽了社会组织在场域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也显著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治理绩效。社会组织党建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巩固党的社会组织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机制^[10]。吴丹和石锦澎认为,党组织作为关系网络中强关系的中介,在党建机制的作用下使社会组织的成员通过高度互动逐渐产生信任并形成强关系结构,使得开展社会服务效果显著^[11]。赵一红则认为,党建引领完善了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体制

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组织发展成绩斐然^[12]。

对于社会组织治理效能评估体系与评估指标的研究,俞可平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维度,并从“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万人社会组织数量”“社会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指标设计^{[13]269-281}。史传林认为,政社合作治理的绩效评价应当以“善治”为目标,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可以从合作过程和合作结果两个维度来进行,应该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业评价机构来组织实施^[14],并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投入、管理、产出、结果四个维度构建了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5]。孙莉莉和钟杨认为,社会组织的“参与”嵌入“行政体制”与“民生政治”的宏观结构中,合法性与有效性是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理论考量,应当从制度支持、社会支持、参与能力和参与效能四个维度研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水平的绩效评估模型^[16]。

1.2 问题提出

治理评估是对基层社会创新的总结并通过设定指标引领改革发展方向^[17],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社关系改革的有效政策工具。目前学界关于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效能的评估已经展开初步探讨,但对这一议题大多着重论证社会组织治理工作评价的理论意义及现实必要性,以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为中心点构建不同评价维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提出指标设计的目标、原则与方法。对于以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关系为中心点的静态评价标准与动态评估模型构建较少涉及,因而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目前关于基层“党的建设”宏观质量评估以及评价体系和指标建构已经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等院校和“党的建设”学科等领域有了初步研究,但在社会组织领域甚少涉及,针对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标准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日渐成熟和规范化的现实情况下,亟待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进行具体可量化的评价分析,以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开展效能评估能够将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常态化与精细化,将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与社会治理工作更为紧密相嵌,有助于领导者、决策者与研究者全面、有效、真实地掌握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相关进展与信息,形成“反馈—修正—再反馈”的正向循环,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增强与提升治理效能起到积极效应。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问题。

2 党建引领与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多元化需求的重要力量,势必要与党同频共振、同心而行。党建工作作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的必要前提,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提升体现在社会组织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能够有效地提升治理能力。

2.1 党建引领有助于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提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体系下,唯有党建的有效引领,才能克服社会治理中的种

种问题和短板,不断优化和升级社会治理体系。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机制在于通过党建载体在人力、理念、制度、资源等方面进行政治整合,克服组织间的相互冲突,最终达到以党建促社建成效,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协同治理的有生力量。

整合与增强组织人力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抓手。首先,党组织通过政治吸纳加强社会组织的组织力。党组织通过及时发现并吸纳社会组织中的精英群体强化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力,使专业社工、志愿者等自愿将自己视为政党“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其次,党组织通过双向任职提升社会组织凝聚力。一些社会组织本身即由上级党委牵头设立,许多社会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在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专业能力过硬的党员也在党组织中承担重要工作,双重身份保障有助于将党的意志上升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决策,从而发挥党组织的引领效能。

贯彻落实党的先进理念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力量。政党不仅仅为了获得选票来分配资源,而且还以党的思想立场来进行更深入的认同动员,获得社会群体一定的政治支持^[18]。党员在社会组织活动中亮明党员身份更易取得群众及其他主体的信任,党员通过带头学习党的各种会议文件精神、党内法规以及党史知识形成先导效应,引导社会组织成员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党的主张和理念。同时通过主题学习、志愿服务等党建活动潜移默化地将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社会组织之中,内化为社会组织的价值愿景与行动源力,以内在价值认同促进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形成“理念共同体”,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完备合理的制度规范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的基本保障。社会组织除落实党支部“应建尽建”与党建活动的全面覆盖要求外,还应当在组织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这不仅是对国家政策的具体落实,也是党建引领作用发挥的外在制度化表征。社会组织是否将党组织纳入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去、党组织自身是否落实“三会一课”等规定动作都是组织活动标准化与否的体现,这关乎社会组织成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不同社会组织还可根据自身情况在民主评议、重大决策、员工述职等方面参照党员管理的规章制度对本组织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优化,同时党组织通过党员表彰、先锋模范评比等制度激励党员发挥榜样力量,以制度效能促进整体效益。

丰富多样的资源注入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提升的物质保证。近年来,在各地政策扶持之下社会组织虽逐渐改善资源不足的现状,但在社会建设角色中依旧处于资源弱势方。党建工作有利于社会组织获得党和政府的信任,为社会组织整合各类资源提供有利条件。通过建立党组织能够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关活动场地及办公设施等硬件资源,同时引进教育培训、对外宣传、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软件资源,在降低社会组织运营成本的同时动员党的群团组织拓宽组织资源链接渠道。一些地方政府还设立社会组织党建专项基金用于党组织日常工作运行及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由上级党组织牵头发动公益创投项目、构建地方长期公益创投机制,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2.2 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提升要求党建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19]。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社会组织中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依法执业、诚信从业,教育引导职工增强政治认同,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并强调给予社会组织党支部工作经费支持。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导社会组织沿着正确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壮大离不开党建工作引领正确政治方向、提供合法政治身份、链接丰富政治力量的功能发挥。

第一,社会组织需要党建工作引领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属性和高度政治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思想路线的纯洁性是党永恒的政治底色。要确保社会组织认同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就必须加强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建工作的开展能够确保社会组织认清当前政治形势、保持正确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领悟力,精准捕捉到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和优惠扶持措施,从而将其与组织发展长期规划相融合,把握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同时,党组织通过对社会组织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政治审查以及对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正确性与安全性进行严格把关,严防境外势力与不法势力通过社会组织活动渗透进我国基层生活之中,确保社会组织业务开展行稳致远。

第二,社会组织需要党建工作提供合法政治身份。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从政策视角而言既是落实“两个全覆盖”的政治要求,也是社会组织自身为获取政治正当性与减少政治风险的内在需求。在政社分开改革之后,社会组织拥有更大空间的自主发展权,同时要求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党建工作为社会组织提供政治指导,向社会组织提供政治授信,为社会组织业务工作开展提供政治身份保障。同时,社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这一政治身份媒介打造自身业务的突破口,以党建引领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抓手进行更多创新实践,成为地方基层治理创新的工作亮点。

第三,社会组织需要党建工作链接丰富政治力量。党组织拥有资源的重要性、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是部分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党建的直接动因^[20]。社会组织需要党建工作扩大组织群众覆盖面、增强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社会组织和成员被党和政府赋予政治身份,使社会组织负责人、主要任职者有机会参加地方党代会讨论,通过社会组织党组织的身份获取政治支持。上级党组织对该组织授予政治荣誉、进行相关表彰也体现对该组织党建工作开展的认可,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社会知名度和舆论好评度,在无形中拓展了社会的政治资本。根据目前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社会组织成员所缴纳的党费全额返还给社会组织用于党建活动的开展,党建工作还能为组织引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硬件配套资源。

3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建构的基本原则与体系建立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由若干个项目、多个层次指标一起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坚持系统科学、行之有效的建构原则,以突出党建引领的政治性方向,明确党建嵌入社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激发社会组织的

活力为基本思路。

3.1 建构效能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

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是指标设计的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南,并贯穿指标设计的始终。应当对指标选取进行系统把握,兼顾宏观政策应用与具体指标可操作性,坚持统筹性与典型性相统一、可行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原则。

一是统筹性与典型性相统一。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强的复杂工程。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纷繁复杂,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有“全局性”与“引领性”站位,充分发挥系统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对本指标体系的建构力求系统和全面,既包含党建嵌入社会组织的积极效应,又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既包含主观层面,又包含客观层面,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统一。同时典型性原则还要求所选取指标不仅能够如实地反映当前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概况,而且能够有效突出一时或一地在党建嵌入社会组织治理过程中的特色经验。应抓住能够集中反映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建设发展及其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的重点内容、关键内容和覆盖面广、综合性强的主要指标,紧紧围绕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现突破式发展,以创新社会治理与提升治理效能为中心,加大善治指标权重。

二是可行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要真正为党组织的功能强化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实现而服务。各项指标的确立在后续评估过程中要清晰可量化,避免定义模糊与主观性过强等问题,对于各类社会组织具有普遍可行性。评价指标同时也是跨越时间维度的发展规划,不仅意味着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适时变化,也意味着在这一作用机制下对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与促进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持续推进。在分类标准确定后,应适当增加部分动态性指标,充分反映地区、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做到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地反映对社会治理作用的实效。动态的评价指标体系还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做到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以保持社会治理效能评价指标的先进性与适时性。

三是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既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同时又要能反映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情况。在制定指标体系时,一方面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另一方面指标体系必须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客观的抽样描述。一级指标完备稳定,二级指标及具体内容有特色、可拓展。科学化的评价体系是评估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与否、成效大小的重要依据。将科学化的评价体系作为参考,以此裁量这项工作的成效,发现和改进实践中的不足,提升治理效能的科学化水平和实效性价值。同时针对社会组织地域、规模和发展状况差异还应当设置部分可变动和可扩展指标,以便具体情况真实呈现和数据的进一步精细化处理和分析,达到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3.2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指标体系建构

指标体系的建构是进行预测或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是将抽象的研究对象按照其本质

属性和特征的某一方面的标识分解成为具有行为化、可操作化的结构,并对指标体系中每一构成元素赋予相应的权重。为确保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基础层等三个逻辑层次,即首先确立评价体系的最终目的,再将目的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拆分细化,提升评价指标的精确度,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可靠。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各个层次目标,并结合社会组织评估标准中有关党建工作的指标形成初步问卷,在收集专家及社会工作者的意见之后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权重确定与赋值评价,形成这一议题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标的初步构建,以具体可量化指标衡量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具体提升情况。

本文课题组采用德尔菲法即专家访谈法进行各项指标及其权重的确立。通过问卷设计请专家给各层次的指标进行重要性打分,并以算术平均值的形式进行判断矩阵合并和赋值排序。2019年9月—2021年3月,课题组发放《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评估调查问卷》(以下简称问卷)360份,回收346份,其中有效问卷342份,问卷有效率达95%^①。通过SPSS17.0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得出问卷Alpha系数为0.879,KMO值为0.815,说明问卷整体具有较高可信度与操作性,能够达到问卷设计目的。课题组先后在上海市、贵阳市、武汉市、长沙市等地对十余家社会组织党建情况进行调研,所调研的社会组织涵盖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类型,业务类型分布在教育、公益慈善、文化艺术、体育等不同领域;与60余名调查对象结合问卷内容以及《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评估访谈提纲》进行深度访谈,所访谈的对象包括民政部门公职人员、社会组织机构负责人、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社会组织项目负责人、社会工作者等。所调研社会组织种类比较全面,调研对象普遍具有丰富的党建经历和经验,确保调研成果能够反映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状况,评价指标具有普遍适用意义。

根据专家的综合意见,得出本指标体系的评价对象是已开展党建工作的社会组织,评价目标是评估社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其治理效能的状况,以便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优化,提升社会组织协同促进社会治理的效能。具体可划分为社会组织运行情况及党建引领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社会组织自身基础指标情况,后者包括通过党建嵌入社会组织的情况及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引领程度,进而将引领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情况,因此准则层指标包括: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以及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

在访谈中,访谈对象作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参与者”“负责人”“管理者”以及“评估者”角色从多视角提出了自己对党建工作的感受和建议,许多访谈对象认同目前社会组织普遍重视党建工作,但党建工作发挥作用程度与社会组织本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建立时间长、人员规模大、业务能力强的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意识更强,并认为党建引领作用发挥的基础在于党组织通过何种方式及路径合理融入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及业务运行,因此对社会组织本身的运行

① 本课题组还采用了华东理工大学发布的“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作为补充验证资料。该调查于2019年6月至10月在全国57个城市展开,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最终获得社会工作机构有效问卷979份,社会工作者有效问卷6776份(含民政、医务社会工作者)。

状况指标和党建嵌入指标权重不宜过低。同时由于本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重点在于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提升状况,因而应当重点考察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进行全方位引领的状况以及引领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情况,党建引领指标和治理效能指标的权重应当适当高于前两项指标的权重。经过多次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修正,使专家的意见逐步趋向一致,最终得出各评价指标基础层的权重分布(见表1),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P_{(总分)} = A_1 B_1 C_1 + A_1 B_1 C_2 + \dots + A_i B_j C_k$ 。其中, $P_{(总分)}$ 代表社会组织所获得的总分, C_k 代表在三级指标具体问题中所获得的分数, B_j 代表与 C_k 所对应的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所占权重, A_i 代表 C_k 所对应一级指标在总分中所占权重。

表1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权重分布

目标层	准则层	基础层
社会组织通过党的领导提升其治理效率和能力的状况	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 0.2	组织结构指标 0.25
		财务状况指标 0.25
		内部管理指标 0.25
		人才保障指标 0.25
	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 0.2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指标 0.3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公开与示范指标 0.3
		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双向嵌入融合指标 0.4
	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 0.3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理念引领情况指标 0.25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技术引领情况指标 0.25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资源引领情况指标 0.25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人才引领情况指标 0.25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 0.3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指标 0.25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指标 0.25
		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 0.25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内/外部评价指标 0.25

4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具体评价指标设计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四重指标从社会组织自身运行情况出发,观察社会组织在党建嵌入与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水平,以及将治理水平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能力,层层递进,对社会组织党建以及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水平进行全方位评估。

4.1 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

在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中,包含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组织结构、财务状况、内部管理和人才保障(见表2),目的是通过关键环节评估社会组织内部运行状况。其中“组织结构”指标考察社会组织设立与登记的合法性、内部章程的完善性和内部组织设置的规范性;“财务状况”指标考察社会组织财务制度的规范性、组织经费来源与支出的合规性;“内部管理”指标考察社会组织各项具体制度设置的完备性,尤其是具体业务管理制度的完善性;“人才保障”指标主

要通过社会组织专职工作者数量与志愿者人数配比考察该组织人力结构的专业性与丰富性。

表 2 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具体内容

序号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	评分标准
1	组织结构指标	1.是否符合当地关于设立社会组织的法人资格规定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是否制定符合当地关于设立社会组织规定的章程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是否按当地关于社会组织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等要求进行登记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是否有明确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与办事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财务状况指标	1.是否配备专业财会人员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是否制定专门财务管理制度,有独立财务账户,经费来源合法,账目清楚	是,得1分 否,得0分
		3.财务各项支出审批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是否依法进行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内部管理指标	1.是否制定本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印章、档案、资产、重大事项、会议、业务活动、民主决策等内部管理制度	4项及以上,得2分;1-3项,得1分;0项,得0分
		2.本年度社会组织的业务或项目是否有专门管理制度,事前评估审议充分,事中台账规范,事后形成项目档案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是否有被上级管理机关提出违规整改或被投诉的情况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是否按时参加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或递交年报	是,得1分 否,得0分
		5.本年度是否做好本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总结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人才保障指标	1.本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是否占到工作人员总人数的50%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是否与建立劳动关系的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落实各项薪酬和社会保险等待遇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是否建立与本社会组织开展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数量配置合理、招募及管理规范	是,得1分 否,得0分

4.2 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

在社会组织党建嵌入指标中,包含三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指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公开与示范指标、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双向嵌入融合指标。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要求:“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3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指标主要考察社会组织是否落实党组织“全覆盖”和“应建尽建”要求,以及该组织对“三会一课”及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情况;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公开与示范指标考察党建工作的公开性与积极性,同时为下一步接受各项监督与检查提供数据材料;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双向嵌入融合指标考察社会组织与党组织的融合程度,观察党建工作是否“不缺位、不越位”而合

理融入社会组织(见表3)。

表3 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具体内容

序号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	评价标准
1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指标	1. 专职人员党员人数3人以上的是否成立党支部,不足3人的是否建立联合党支部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是否制定完善的党组织工作制度并发挥良好作用,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是否健全党建联络机制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是否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社会组织章程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工作要求,严格按照“三会一课”开展支部活动	是,得1分 否,得0分
		5.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每月开展一次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	是,得1分 否,得0分
		6.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形成工作总结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公开与示范指标	1.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在社会组织中按规定进行党务公开,有党建文化墙或机构网站等宣传阵地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主动积极宣传政府政策,向组织党员及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公开党费收支情况并接受群众监督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分党员责任区、提供党员志愿服务	是,得1分 否,得0分
		5. 本年度社会组织与党组织是否积极创建党建工作示范点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社会组织与党组织双向嵌入融合指标	1. 社会组织主要任职者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是否进行交叉任职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对社会组织中的人才进行政治吸纳(不低于总人数的1%)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针对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将党组织活动与具体业务相融合,且载体和形式新颖、有成效(不低于三次)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本年度党组织是否积极关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以不低于每月一次的频率进行思想辅导	是,得1分 否,得0分
		5. 社会组织是否参考党员述职、民主考评等党内相关规章制度应用于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提升组织管理水平	是,得1分 否,得0分

4.3 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

在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中,包含四个二级指标(见表4),分别是党建对社会组织的理念引领情况指标、技术引领情况指标、资源引领情况指标和人才引领情况指标。其中理念引领情况指标主要考察党建是否提高社会组织开展业务时的政治敏感度、社会组织人员的精神面貌提升状况;技术引领情况指标主要考察党建对社会组织引进技术服务以及社会组织通过技术手段创新服务的状况;资源引领情况指标主要考察党组织运用党建经费的合规性,以及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直接或间接促进政府购买、吸引社会资本的情况;人才引领情况指标主要考察党组织对于党员培训与党员慰问、表彰、奖励的落实情况,以及党员是否在社会组织中的关键岗位任职,发挥人才资源引领作用。

表 4 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具体内容

序号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	评价标准
1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理念引领情况指标	1.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对社会组织的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受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进行政治审核,确保社会组织的业务活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组织章程要求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党组织是否通过党员表彰、树立先进模范等方式鼓舞群众,提升组织整体精神力及精神面貌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党组织是否带领党员和志愿者深入社区(村),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机融入社区(村)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理念认同、思想认同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在社会组织进行重要决策、项目开展等环节中,党组织是否给予意见与指导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技术引领情况指标	1.本年度党组织是否通过技术服务方式(专家讲座、短视频、云课堂、AI、VR等)创新拓展党建活动形式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利用好党建工作指导员及其他技术服务方式为本组织党务人员进行党建工作培训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党组织是否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QQ群、微信群等技术方式提高党建工作效率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党组织是否通过上述技术项目的引进与开展融合社会组织业务活动,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资源引领情况指标	1.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建工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拓展政府资源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党组织所上缴党费金额是否全额返还并全部用于党内活动	是,得1分 否,得0分
		3.党组织是否对党建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设立党费独立账户并实行项目管理,做好账目登记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建工作拓展社企合作,获得资金投入、党费支持、优先购买等社会资源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党建对社会组织的人才引领情况指标	1.社会组织中的党员是否在组织内部重要岗位上任职(任职党员数量不低于党员总数的50%)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党组织是否按时订阅或购买用于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党组织是否按期做好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党组织是否组织慰问、表彰、奖励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	是,得1分 否,得0分

4.4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

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中,包含四个二级指标(见表5),分别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指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指标、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对社会组织的内/外部评价指标。其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指标具体考察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能力,主要通过平衡供需、专业服务、项目联动、共建共治等方面观察是否通过党建使社会组织构建长效业务创新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指标主要考察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在重要治理及服务领域(社区治理、公益慈善、乡村振兴)发挥治理效能的情况,以及该组织孵化党建服务特色品牌的状况;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主要考察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自身降本增效的状况,主要通过制度、资源、人

力三个方面呈现;社会组织的内/外部评价指标主要从社会组织内部人员这一视角以及社会公众、社会媒体、政府机关等外部视角评测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满意程度。

表5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具体内容

序号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	评价标准
1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指标	1.本年度党组织是否促进社会组织以“清单”形式精准匹配群众需求,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建立长效供需机制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党组织是否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或组建专业服务队,深入城乡开展为民服务工作,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党组织是否积极推动社会组织成为“五社联动”有效载体,以项目化运作、公益创投等方式创新联动机制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党组织是否积极探索与其他“两新”组织、机关事业单位等党组织组成党建联盟,或被纳入党建联席会和群团联合会等共治平台,构建共建机制	是,得1分 否,得0分
2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指标	1.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是,得1分 否,得0分
		2.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举办慈善公益活动或参与公益活动,服务于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外来人员等弱势群体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开展系列帮扶活动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开展社会组织创新项目,创建社会组织党建服务特色品牌	是,得1分 否,得0分
3	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	1.本年度党组织是否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技术、人才等支持降低社会组织自身运营及运作项目的成本	是,得1分 否,得0分
		2.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规范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任一项即可)	是,得1分 否,得0分
		3.本年度社会组织是否通过党组织引领吸引社会资金,提升资源承载力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离职率是否低于当地县(区)平均标准	是,得1分 否,得0分
4	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外部评价指标	1.本年度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对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评价	差,得0分 一般,得1分 较好,得2分 好,得3分
		2.本年度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满意度评价	差,得0分 一般,得1分 较好,得2分 好,得3分
		3.本年度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否获得县(区)级以上官方媒体以线上/线下方式进行正面宣传	是,得1分 否,得0分
		4.本年度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成果是否获得县(区)级以上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表彰奖励	是,得1分 否,得0分

5 总结与讨论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深入贯彻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其他工作融合发展,在社会组织人力、理念、制度、资源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社会治理评估是

国家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进行评估,既巩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效进行检验,在社会治理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理论出发点,以增强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为根本目的,立足于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理论基础,不囿于现有社会组织治理评估理论框架,尝试通过实证调研分析建构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具体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标,以期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但限于调查区域和调查样本收集的有限性和能力所限,本指标体系未针对区域治理经验总结个性化、可替换的指标与主观性指标。一些评价指标结论的确定需要单独进行收集评价,更有赖于评价指标的动态运行以形成完整的评价过程。因而,在具体评估实践过程中应当注意评估材料收集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参照现行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流程,先由社会组织进行自评自查,再由政府主管机构或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现场考察。社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也应做好内部台账记录及管理以便接受监督检查。期待后续在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基础上,在专家学者、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方主体参与下,打造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权威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对不同区域及层级社会组织的具体评价指标进行设计,推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赵长芬.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功能论析[J].探索,2018(1):138-143.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十年回顾[EB/OL].(2022-09-16).
<https://chinanpo.mca.gov.cn/xwxq?newsType=1938&id=20470>.
- [5] 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J].浙江学刊,2017(1):49-56.
- [6] 杨静娴.社会组织党建的制约因素及质量提升[J].河南社会科学,2019(5):25-30.
- [7] 李德.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产生的党建新问题和新要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7):35-40.
- [8] 褚松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及其逻辑[J].探索,2020(4):99-110.
- [9] 韦克难,陈晶环.新时代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时代议题与现实景观——基于四川省176个样本的调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7):85-91.
- [10] 侯利文.社会组织党建的过程与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1(3):15-24.
- [11] 吴丹,石锦澎.中心性与强关系: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87-96.
- [12] 赵一红.党建引领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成绩斐然[J].中国民政,2022(13):36.
- [13]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4] 史传林.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4(5):81-88.

- [15] 史传林.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绩效评价探讨[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5): 33-37.
- [16] 孙莉莉, 钟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 理论框架和评估模型[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5): 115-119.
- [17] 王成豪, 慕浪泽. 社会治理评估的反思与重塑——基于场域结构转型的视角[J]. 河北学刊, 2022(3): 195-200.
- [18] 王杨. 党如何塑造社会群体? ——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1): 130-138.
- [19] 习近平. 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20.
- [20] 李健, 郭薇. 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J]. 探索, 2017(5): 121-127.

Establishment of Appraisal Index System of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YAN Yujie, CAO Shengliang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arty-building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Party-buil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mainly converts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manpower and concept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resource injection. To appra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buil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he inherently meaning of itself,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art to test whether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ing their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to establish an appraisal index system of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ing their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ppraisal index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laying a prior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mbining the entirety and typicality, the feasibility and dynamics, the scientificity and flex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e system is sub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scientific index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peration, the embedded index of the Party-buil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leading index of the Party-buil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index of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 to improving their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above four sections constitut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appraisal index system of the Party-building leads social organization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this appraisal index system, it is expect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Party-building achievement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further promoting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building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the Party-building leading,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appraisal system,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责任编辑: 陈卓 蒋英州

文明驱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解码

张会龙,李宇洋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文明是促使一个民族不断延续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又不断浸润和定义中华民族。党的二十大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列为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探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之源,需要对长周期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进行深度解码,即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炼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学理性资源。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包容和合的天下观以及共享智慧的轴心时代,是保障中华民族历史赓续不断的文明驱动力;不断延续的“大一统”传统、成熟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以及多民族国家交融一体的族际整合实践,构成了中华现代国家最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家国一体”的集体价值、“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与“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伦理根基。

关键词:中华民族凝聚力;文明驱动;中华民族;族际政治整合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53-12

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相互连接、彼此认同并团结协作的聚合性力量,是一个民族在应对外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危机与挑战时,能将最广大的民族成员系统地整合在一起的核心力量。民族凝聚力蕴含在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血脉之中,它是人类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就通过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形式应对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无论这种形式是部落制国家、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无论其构成主体是氏族、部族还是民族,只要人类社会继续以政治共同体的形式组织与聚合在一起,它的生存与发展就离不开这种民族凝聚力。作为学术命题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关成果主要以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为主,两个学科相互交融阐释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意义和增进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华现代国家的解构。但已有研究缺乏一种历史政治学的宏观视野,因而难以深入认知作为文明驱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于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的深远而又持久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先需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驱动力,从文明的精髓中寻找凝聚力的生发逻辑。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支撑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赓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中华文明长期的影响与熏陶之下,中华民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研究”(22XZZ007),项目负责人:张会龙。

作者简介:张会龙,男,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宇洋,男,云南大学中国陆地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政治传统,塑造了中国国家形态的基础性框架,同时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在这样一套政治框架与文明体系中形成了独有的伦理价值规范。由此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驱动力、以政治传统为支撑体系和以个人伦理为精神内核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密码。

1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动力之源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又不断浸润和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动力之源,正是在其与中华民族相互嵌入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激发广大中国人在面临国家危难、民族危机时团结在一起,促使中华民族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浪潮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由此探寻并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文明驱动力需要具备长周期的历史政治视野,在对中国历史脉络进行深度解码的过程中逐步提炼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明核心,进而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知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明滋养。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滋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包容和合的天下观促使中华文明不断包容并吸收不同社会的文明与精华,最终促使中华文明成为轴心时代共享智慧的文明之一。

1.1 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

人类文明是不同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的集中体现。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4}。不同文明阶段对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依据此标准恩格斯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的诞生与国家的产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工,由此也产生了阶级社会的分裂,为了弥合分裂、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国家由此诞生。人类选择以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形式适应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不同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同样也决定着国家的性质。

人类文明的形态受到外部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人类根据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人类生态。王明珂将人类生态定义为:“一人群所居环境、所行经济生业及其社会结群(社会组织与群体认同),这三方面共构的生物社会体系。”^{[2]7} 人类生态影响着不同群体如何利用所在环境的资源进行自身维持与发展,进而不同群体构建出不同的社会组织,以及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区分。由此,不同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早期人类文明之间的分野和未来的历史走向,奠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是一种以农耕生产为绝对主体、游牧生产为次要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社会生产体系。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是促使这种混合型农业体系形成的根本性因素,差异具体表现在一个区域内是否具备充足的水资源,这直接决定着此区域内人类社会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别。有着充沛水资源的大江大河流域孕育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华先民,黄河、长江中下游有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遗址^[3]。雨水的分布同样也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差异,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例,它是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4]。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外的人类族群从事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的人类族群以农耕生产为主,同时长城的修建沿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度重合,“华夏形成与长城建立之后,长城之外的游牧世界也相应形成”^{[2]186}。

古代典籍与神话故事同样也反映着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在《周易》中,记载着神

农氏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古代传说,即“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5]285}。虽然这一段历史传说无法得到完全验证,但古籍上神话故事的记叙与撰写方式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所共有的集体历史记忆,《周易》中所关注的历史问题正是当时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状况^[6]。早在上古时期,从事农耕生产的历史经验成为刻在中华先民身上的文明密码,在《史记》里同样记载着大量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异的游牧社会。例如司马迁对于匈奴的描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7]509} 匈奴并不存在定居的农业,也没有固定的城郭,他们跟随着牲畜到处迁移。

自然地理环境塑造着人类族群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政治组织之间的分野。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族群构建了一个中央化、阶层化的政权,并且这样的国家体制则意味着高度的集中与统一^[8];游牧各个部族因为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的主要财产是需要四处移动的牲畜,这一系列客观条件决定着他们无法构建一个固定的、集中化的政权,分散、平等与自主成了他们普遍的生存原则^{[2]156}。农耕相比较于游牧则有较为明显的生产力优势,农耕文明生产的大量物质财富滋养着众多人口,同时也吸引着游牧各个部族,他们一旦因为气候等自然原因导致部族牲畜的减产,就会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逐鹿中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血与火的战争冲突,但两种不同社会体系在相互碰撞、相互竞争中加深了彼此的深入了解,并在此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这种极具特色的混合型农业社会为中华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历史的根基,同时也为天下观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包容和合的天下观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主轴,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一个以农耕生产为绝对主体、游牧生产为次要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社会生产体系,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分别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互动尽管存在着战争冲突、劫掠与反劫掠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但并未完全形成一种所谓的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反,在尚未形成民族国家边界的时代里,不同文化、彼此相异的社会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汇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交互不断为中华文明未来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性,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只是汉族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同样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构成这样一种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互嵌入的历史格局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独特世界观有直接联系,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先民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从根本上宰制了古代先民的国家认知。古代先民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基于一种对“天”“地”“人”的朴素时空观念的认知:“空间与时间相通,人间与天、地相联。人类世界,不是人类独自的家园,而是人类与天、地共存的空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天、地共同度过的时间;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规律,也处处体现了天、地的意志。”^{[9]7}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世间万物的思考都离不开“天下观”的影响,无论是从纵向上观察王朝交替的历史逻辑,还是从横向空间中剖析国家构造,都可以寻找到“天下观”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与制衡。

从纵向上王朝交替的历史逻辑观察,王朝之间的兴衰更替是中国历史十分正常的现象,统治者的合法性是依据“天”的意志,即所谓的“天命”。“受命于天”的对象也包含中原周边的各个民族,他们充分学习中原文化,同样也依据“天命”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从横向空

间中剖析国家构造,“天下”体系尽管依据地理空间范围内与“王畿”(天子直辖的领土,亦称中国)之间的距离而划分出不同的政治秩序,出现了所谓的“华夷之辨”。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像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学按照某种“客观”的科学标准所进行的严格辨别。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学的兴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民族学通过结合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诸多学科,按照人群之间的体质、文化、语言等所谓的客观标准区分不同的民族,进而强化本民族的优越感,以此为西方殖民统治边缘地区的人群提供合理化的依据^{[2]374}。事实上“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区分主要的依据是文化与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并不是当代人所认为的民族歧视,古代中国早已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中心论^[10]。在天下观的引导下,中国历代的王朝国家既将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天下的一部分,同时通过“羁縻”“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方式进行间接统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民族拥有自我管理的权利。

就是在包容和合的天下观指引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传统,不同的文明在天下体系中共同发展、相互交融,共同塑造出了具有高度普遍性与适应性的文明体系。天下观既具备着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精髓;同时它也能够包容并整合周边各民族,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尽管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时代,天下体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并逐渐解体,但天下观仍然深刻影响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并且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1.3 共享智慧的轴心时代

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创造出新的历史与辉煌,中华文明诞生的时代是人类共享智慧的轴心时代。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并认为“这个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11]9}。轴心时代的文明分别来自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雅思贝尔斯否定了黑格尔所说的“所有的历史皆走向基督,也皆来自基督”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他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论述历史与文明,意图实现人类历史根本性的统一。轴心时代则具有以下特征:“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他体会到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无力。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在深渊之前,他力求解脱和救赎。通过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他为自己树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自我存在的深处和超越的清晰性中,他体会到绝对性。”^{[11]10}轴心时代的人们开始通过思辨哲学的方式,将自身放到整体中并意识到自身而逐渐超越自身。中华文明作为轴心时代文明的一部分,它既是文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是人类历史遇到困难与挫折时自我反思的客观标尺之一。

中华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体现在它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形式,诞生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地理环境中,但其所蕴含的智慧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智慧。在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众多派别纷纷兴起,人们开始超越以往神话时代对于鬼神的迷信,开始以理性的方式阐释神话:“通过宗教的伦理化,神性得以加强。而神话则成为一种语言的材料,这种语言用它表达着与其原意完全不同的意思,使它转变为寓言。”^{[11]11}神话故事转变为寓言则反映现实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与政治实践早已脱离神话的超验范畴。例如,《论语》中孔子与季路有这样一段对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2]157}对于孔子而言,鬼神是否存在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首先通过“事人”的手段推之而“事鬼”,最后再由“事鬼”推之“事人”。“事鬼”在这里不只是一种宗教的手段,更

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需要。通过祭礼而“事鬼神”,从而教化人们遵循礼的秩序,最终实现治国的功能^[13]。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和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一样,跨越了不同文明信仰之间的差异,逐渐发现了理性的存在,并且也构成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历史的一部分。

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诞生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产生重大灾难与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面对先秦时代的“礼崩乐坏”,孔子以振衰起弊为使命,重修礼乐,于是王道“自此可得而述”^[14]。在同一时代,老子面对诸国之间不断的纷争,认为统治者应该尽快顺应“天道”,这样天下万物就会顺从他:“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15]67}统治者一旦遵循“道”,天下人会归顺他而不会互相伤害,这样天下也就安泰了,即“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15]73}。“天道”在这里尽管是一种根本性的、形而上的理念,但对于老子而言是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16]。

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激发他们伟大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他们所处的时代潜藏着一系列灾难与社会危机,他们想要通过一系列洞见与改革挽救自己所在的社会。这十分契合雅思贝尔斯所提出的“边界处境”,即当人使其现实存在不可避免的经验,如死、罪孽、痛苦等成为其处境的历史性时,他就陷入“边界处境”^[17]。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在“边界处境”中诞生的人类智慧,每当人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时代危机以及社会变迁,我们依然可以回到轴心时代的文明中汲取思想的力量,重新进行自我的反思。

2 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支撑体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8]7},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文明与政治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塑造出中国特有的政治传统,支撑着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延续与发展。中国的政治传统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政治底色,总能够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撑中华民族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中国所具有韧性与包容性的政治传统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保证了中国疆域与领土的延续性与完整性,成熟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使得中国能够高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口,多民族国家交融一体的族际整合实践巧妙地化解了社会矛盾。

2.1 不断延续的“大一统”思想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到王朝的兴衰起伏对于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无论中国经历了何种重大的历史变迁以及深刻的民族危机,国家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即便是近代以后,以“天下”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第一次遭遇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天下”国家始终无法与民族国家相互兼容,并逐渐濒临解体,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时,“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也开始了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19]7}。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入侵之下,要么彻底被征服,沦为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么国家经历大规模的族群崩溃与领土沦丧,分裂成为一个又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避免了这样一种悲惨的命运,成为世界范围之内唯一一个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19]10}。要想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为何能够在历史持续演进、变迁的过程中仍然能够在大体上保障领土疆域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就必须回溯考察“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意思包括对王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对疆域的占有和“私言”的控制^[20]。前文所述的“天下”思想区分了“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差异,并且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也就是著名的“五服制”。“五服制”与“天下”思想相结合构成了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基础,其目的是以捍卫周王的统治为核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衰微,各个诸侯国围绕着“中国”的统治权竞相争霸,最终败于来自西戎的秦国,但秦国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以周王后继者的身份,在“王”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皇帝”作为天下权力的核心^[21]。伴随秦朝建立的还有一整套郡县制,不仅加强了国家政治整合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郡县制的建立为“大一统”观念的实践提供了核心区域^[22],后世的统治者(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控制这一片核心区域的合法性都来自他们是否遵循“大一统”的政治秩序。

王朝兴衰更替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但中国的疆域版图并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更替而大规模缩减,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为了能够统治并管理人数众多的中原地区,便有意地学习中原的文化,按照“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将自身的统治塑造为“正朔”;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重新解释了“大一统”所影响的范围,例如清朝的统治者在承认“大一统”前提之下淡化了其中关于“华夷之辨”的要素,提出“合中外为一家”^[23];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改造中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辐射范围也由此进一步拓展,不仅仅只是传统中原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涵盖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区域,进而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政治形态。“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既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政治智慧。

2.2 成熟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

中国拥有幅员辽阔的领土以及数量庞大的人口,为了有效管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除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外,还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魏特夫认为,中国等一系列东方国家在面对治理水患这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之时,首先必须要获得稳定与充足的财政收入,所以各种各样的组织与官僚机构就成了治水的先决条件^{[24]61}。许多学者批判其所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遮蔽了丰富的事实,上层政治遮蔽了基层社会^[25]。事实上,中国社会治理的运作方式既包含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层自治。如黄宗智所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即将一部分权力授予基层,它们并不是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并没有正式的薪水,但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基层治理事务:“考虑到统治者坚持的世袭制集权,而又同时企图把世袭制统治内的分裂最小化,并承诺把税收最小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简化政府机构的愿望,使用纠纷解决方式的半正式行政可能是维护整个体系的高效率、低负担的办法。”^{[26]100}

但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而言,大型的水利工程离不开成熟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福山将中国视为一个早熟的国家,通过对比中印两国政治模式的差异,他认为:“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27]137}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躯体与骨骼,承载着“大一统”思想的灵魂,贯彻并实践“大一统”的政治理想。首先,面对中国的超大规模,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除了要面临一系列的大型公共工程(例如治水)来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外,同时还需要一

整套统一的权力来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抵御外来入侵者的威胁,只有通过整体的、统一的国家力量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并保障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指出中央集权制所建立的“大一统”是为了“小而分”才存在的^[28]。

其次,“大一统”思想的权力核心来自皇权的力量,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则是皇帝的政治抱负能够有效实现的制度载体。经过科举制等一系列复杂的人才选拔制度所挑选的政治精英,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皇权,即便是那些未取得功名的学生,他们在长期备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儒家思维模式,促使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29]。官员一系列的任免、调用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上,理论上政治精英无法超越皇权,服从与效忠皇权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皇帝通过行政官僚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全国,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皇权有效的前提是皇帝必须满足最基本的德治标准,没有哪个王朝可以无限延续,只要皇帝“德不配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朝代与皇权更替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古代的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主要依据个人能力选拔官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理想化官僚组织。科举制的诞生促使着广大贫民能够依据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血缘或者家族势力担任行政官员,实现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族制弊端造成的政治衰朽。尽管这一套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并未能促使中国的王朝国家走向现代化,并且在“历史周期率”的影响下,封建王朝无法阻止国家的衰落。但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带给中国的影响并未结束,直至中国建立崭新的民族国家,其与现代科层制的混合,推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首先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平稳发展;其次,借助于高基础性权力,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与物质管控能力,能够在市场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30]

2.3 多民族国家交融一体的族际整合实践

“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成熟的科层制以及中央集权制为中国构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制度背景,同时也为当代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实践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而言,族际整合的过程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不只是中国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甚至中国族际整合的历史早已超越民族国家范式本身,历史上的中国早已拥有多个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实践经验。早在秦汉之际中国就开启了这样的尝试,秦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不仅开创了“大一统”的历史先河,也将周边的国家以及少数民族整合进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尽管秦朝本身的历史并不长远,但秦朝建立的王朝国家制度不断延续^[31]¹⁵⁷。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延续了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传统,即以保障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维护各个民族多元的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利益。

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指的就是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国,它不只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构建的国家,同时也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政治共同体。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对于大一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体现在其对于各种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上^[32]。例如鲜卑人入主中原以后大量学习汉王朝的文化,他们所建立的地方官学与历代官学相比,并不是沿袭汉魏地方官学的传统,而是直接沿袭汉魏中央官学的传统^[33]。观察中国处于分裂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重新统一的任务往往是北方的政权推动并完成的:“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34]¹⁹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以后都会有

意识地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王朝国家的统一,真正实现“大一统”。

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会依据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域之间的地理差异,制定针对性的管理制度。除了前文所述的“羁縻”制度以外,类似的管理制度还有“土司”制度,其在将地方政权纳入中央的前提之下,承认少数民族拥有管理地方的自主性,保留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同时土司们通过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广开田亩等一系列手段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在构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化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尽管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民族间的冲突,但对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维持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并不能按照一种“帝国—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去认知。葛兆光指出:“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35]28} 维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利益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继承多民族国家融合优秀历史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也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自身拥有的传统与文化,维护和扩大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

3 伦理根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力量

伦理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共同遵守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行为规范。尽管时代早已发生重大变迁,许多社会规范早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但中国人的伦理根基并未完全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认识中华民族的伦理根基是解读“何谓中国人”这一基础性身份认同问题的关键,“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有效地厘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差异;“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构成了中国人交往的基本规范;“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智慧。

3.1 “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

“家国一体”是传统中国人特有的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它是“以伦理秩序为政治本体所建构而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管理结构”^[36]。尽管在伦理上家与国是有所差异的,并且国在伦理上的优先性往往高于家庭,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舍小家而顾大家”的说法。但在利益方面,家与国之间的利益高度同构,国家成为维护家庭利益的代表。如何认识“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需要从家与国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入手。

家构成了国的基础分析单位。区别于西方将“个体—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国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与其对于国家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割裂,并且只有先认识家庭才能够认识国家。赵汀阳所提出的“天下体系”,不同于西方将“个体”视为“国家”的基础,他将“家”视为“天下体系”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37]17}。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将“家”视为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初始阶段,一个人只有首先做到“修身齐家”,后面才能“治国平天下”。正如《孝经》所说的那样:“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38]164} 古代统治者想要成为天下人之典范,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深深依附于家庭结构中,并且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来自集体(也就是家和国)所赋予的社会价值。

国是实现家利益的根本保障。费孝通将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差序格局,在依据差序格局而形成的社会里,公与私是相对模糊的:“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

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39]33} 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国家与家庭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界限,在中国,家与国的利益有时会因为模糊而形成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全貌,更多情况下家与国的利益往往能够相互均衡。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在渗入社会、提取资源等一系列国家能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倡导“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能够有效增强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力,并且伴随着古代中国科层制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深入,“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进一步被渲染。这促使中国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家户制”,即“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40]。“家户制”能够保障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大的宗族对于分散、个体家庭利益上的侵蚀^[41]。当然在前现代时期,对“家”“国”集体价值的执念压制了人的个体价值,在当下社会如何在保障“家国一体”集体价值的前提下尊重并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同样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3.2 “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

“仁者爱人”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既规定了人与人之间最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准则,同时也是古代哲人想要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同时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集体认同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要想达到“仁”,就必须做到“爱人”,而这里的“爱”并不是现代汉语字面意义上的“爱”,即一种饱含着主观偏好、有差别的“爱”。“仁者爱人”的“爱”指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主观偏见与喜好的、纯粹的、无差别的“爱”。“爱人”将其他与我无关的“人”相互关联在一起,并且这些陌生人并不一定存在血缘上的天然联系。这种“爱”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质,并逐渐构成凝聚个体最为重要的“关系”纽带:“正是在这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之中,在这样的被作为关切的爱所充满和维持的‘关系’之中,他人才能作为他人存在。”^[42]可以说“仁者爱人”的伦理要求勾勒出一幅古代思想家追求理想社会所需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提供了一整套超越地域与血缘纽带的关系网络,为王朝国家提供了一套有效的价值认同符号体系。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仁者爱人”的关系网络同样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将逐渐碎片化、个体化的中国人凝结在一起,重新赋予他们一套指导个体社会行动的价值与意义。

“仁者爱人”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范畴中拥有一定的规约性,它不仅适用于普通人,更重要的是它约束的对象是统治者。阶层性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的基本特征,正如王明珂所言:“文明是集中化政体、阶序化社会产物,它靠着燃烧被剥削者的脂膏而发出光芒。”^{[2]6} 就是在这样的阶序化社会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政治哲学既非常崇拜王权的统治,但对于统治者在道德规范层面上的约束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2]12}

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德治”,而“仁爱”是德治的核心命题,这便要求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措施善待人民。尽管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手段对于皇权的约束十分有限,并且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也总是以“内儒外法”的面貌呈现出来。但对于封建王朝而言,这一套倡导“仁者爱人”的统治秩序还是有限地保护了被统治者的尊严。特别是在中国独有的历史叙事传统下,古代君王多多少少还是会遵循“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来治理国家。

3.3 “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

“中庸”最早出现在《论语》庸也篇中,孔子将其视为最高的道德品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民鲜久乎。”^{[12]83}有学者概括了孔子中庸之道的两个特征:一是反对过头和不及;二是提倡和而不同^{[43]205}。“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既是对“家国一体”集体政治观念的遵循,也是对“仁者爱人”个体道德品质的实践。“中庸之道”所蕴含的智慧既体现在个人社会生活经验的维度之中,也体现在治国者的政治实践维度里。

第一,“中庸之道”是中国社会重要的生存经验。中国的传统社会网络结构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完全消失,到了当代依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人际间的交往以及个体身份的认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结构难免存在着“义”与“利”之间的张力:只取“小利”而舍弃“大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消失,关系社会也失去存在的必要条件;只顾“大义”而尽舍“小利”同样也无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义”与“利”成为维持关系社会的关键。“中庸之道”所要解决的正是道德伦理与利害冲突之间的“义利”张力^[44]。“中庸”也就意味着在保障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同时,尽可能保证个体道德伦理的完整性,从而维持社会关系的基本存续。“中庸”之道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去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舍弃原则,倘若因为“取小利而舍大义”,这样的关系也将会因为利益的争夺而变得岌岌可危,维持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同样也是“中庸之道”所需要把握的尺度。

第二,“中庸之道”是治国者政治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庸”思想不仅仅只是“修身”的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45]。孔子思想诞生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经历极大变迁的时代,诸侯各国之间的相互征战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庸之道”在孔子眼中是统治者最高的政治道德,同样也是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政治品质。“中庸”意味着统治者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既不能过于激进,也不能拘泥保守,更不能将“中庸”思想庸俗地理解为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实际上,孔子的中庸思想同样也是一种平衡的思想:既主张克己复礼,又主张社会改良。“中庸之道”也适用于政治改革,在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效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对于治国者来说,如果不能坚持“中和”或“中庸”原则,就会流于“偏”,也就是陷入“异端”。

4 结语

时代的演变会促使人们对于特定的思想产生新的认知与看法。解码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一战略目标,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政治传统—伦理根基”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价值、政治结构以及基础性力量。只有透过长周期的历史政治学视角,才能够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之源,从而有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政治学知识,并将这一套知识体系转换成能够应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不竭的智慧源泉,并且在文明不断滋养下,中华民族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与辉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政治传统诞生于中华文明之中,正是在中华文明的不断熏陶下,这一套政治传统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百折不挠的坚韧性,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华儿女齐心协力,铸就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独有的伦理根基,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迁,这一套伦理思想都能为团结凝聚广大中国人提供精

神资源。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3] 任继周,张自和. 华夏农耕文化探源——兼论以粮为纲[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2):21-26.
- [4] 李雪萍,史兴民,王阿如娜. 中国典型等降水量线年代际空间演变[J]. 中国沙漠,2016(1):232-238.
- [5] 王弼,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 [6] 欧阳康,孟筱康. 试论《周易》的原初意义与现代意义[J]. 周易研究,2002(4):3-13.
- [7] 司马迁. 史记[M]. 刘兴林,点注.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 [8] 王希恩.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J]. 民族研究,2006(3):1-12.
- [9] 王柯.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10] 刘擎. 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J]. 学术月刊,2015(8):5-15.
- [11] 卡尔·雅思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李夏菲,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 [12] 论语[M]. 张燕婴,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 朱俊艺. 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104-112.
- [14] 杨华. “礼崩乐坏”新论——兼论中华礼乐传统的连续性[J]. 社会科学辑刊,2020(1):111-120.
- [15] 道德经[M]. 靳永,胡晓锐,注译. 武汉:崇文书局,2015.
- [16] 王雅,于昶. “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利”思想解析[J]. 社会科学,2019(12):110-117.
- [17] 张汝伦. “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J]. 哲学动态,2017(5):5-14.
- [18]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9] 李怀印.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0] 杨念群. “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J]. 南方文物,2016(1):12-15.
- [21] 李元晖,李大龙.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42-50.
- [22] 李大龙. 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3-12.
- [23] 衣长春.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J]. 河北学刊,2012(1):57-61.
- [24] 卡尔·A·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 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25] 徐勇. 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J]. 政治学研究,2017(4):15-22.
- [26] 黄宗智.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7]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8] 徐勇.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J]. 政治学研究,2020(1):2-9.
- [29] 赵成福,田杨. 论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1-37.
- [30] 王世柱. 传统科层制与理性科层制的表达与实效分析——基于韦伯理论的展开[J]. 学术研究,2019(4):49-55.
- [31] 周平.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32] 青觉,王伟. 政治整合视角下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启示[J]. 探索,2017(4):175-181.
- [33] 胡克森.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J]. 史学

- 月刊,2016(6):23-38.
-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5] 葛兆光.宅兹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6] 柳俊杰.“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6):12-17.
- [37]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38] 大学·中庸·孝经[M].王国轩,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12.
- [3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0]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
- [41] 徐勇,叶本乾.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J].云南社会科学,2020(4):2-10.
- [42] 伍晓明.“爱(与)(他)人”——重读孔子的“仁者爱人”[J].中国文化研究,2003(4):79-92.
- [43] 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
- [44] 沈毅.人缘取向: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模式的再探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5):130-137.
- [45] 孙建伟.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J].江汉论坛,2015(2):102-107.

Driven by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Decoding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ZHANG Huilong, LI Yuyang

(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resource to promote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long history has created a broad and profound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also infiltrates and defines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nrich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ves of our people,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appeal of Chinese culture” is listed as the main task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highlighted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quires deep decoding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tracting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olitics. The driving force ensuring the continuou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rom the deep-roote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tolerant harmonious thought of tianxia, and the axial period of shared wisdom. The basic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is composed of continuous tradition of great unification, mature bureaucracy, system of 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rracial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inner world is formed of collective value of home-state unity, the moral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 behavioral standard of the doctrine mean.

Key words: national cohesiveness, driven by civilization, Chinese nation, inter-ethnic politic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赵超

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李朝辉

(云南大学 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特征。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激发、传承过程中,集体记忆都需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得以呈现和传承,其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和传媒型四种类型。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其对内形塑“我者”促进融合,对外区分“他者”实现“划界”;此外,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因此,形塑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需要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展开必要的反省,并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积极发掘和再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推行“体化实践”;注重传播、传承及巩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策略、平台及受众导向。

关键词:集体记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65-11

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新的时代背景、党对民族工作主线的确认,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给学术界从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宽视阈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命题,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文献回顾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更是国内学界共同探讨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兼具的热点议题,积淀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意义^[3],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4]。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和弘扬中华文化^[5],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6],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是维系民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越两国边疆治理政策比较研究”(20YJC810006),项目负责人:李朝辉;云南大学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集体记忆研究”(P2022-02),项目负责人:李朝辉。

作者简介:李朝辉,男,博士,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讲师。

良好情感的精神支撑^[7]。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意识,是“共建”意识、“共享”意识、“共担”意识的有机统一^[8]。其不仅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体感觉、内在认知、态度偏好等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也包含了概念判断、理念认同、演绎推理等理性层面的心理过程^[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就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重维度^[5]。如果借用心理学范式进行简约性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致可以划分为感性符号层次、知性身份层次和理性省思层次^[10]。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仅从加强民族团结的路径来推进是不够的,还须从增强国民意识的路径来推进”^[3],国民意识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11]。学者们青睐文化路径,如发挥文化符号系统的整合与建构作用^[12],强调将“象征的再生产”作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13],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主体说服、动力激发进行的利益性诠释、情感性共通、心理性契合汇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15]。同时,有学者强调社会心理路径^[16]、民族政策机制^[17]的作用,以及基于社会资本建设视角提出的社会化路径^[18]。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维视角,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价值性阐释较多,绝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建设、民族认同等方面,较少从社会心理层面尤其是集体记忆层面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中华儿女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了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这种来源于历史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影响中华民族认同。本文从集体记忆理论出发,明晰集体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聚焦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发掘、再造以及传承进行系统阐释,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集体记忆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及显著特征的学术概念,经历了脉络分明的概念演化过程和多学科研究进程。从政治学视角来审思,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集体记忆不仅攸关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者”,还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2.1 集体记忆的内涵及其特征

记忆原本是一个被心理学集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特指人们对感知过的、体验过的、想象过的东西的识记、保持和再现。”^{[19]598}伴随心理学的发展及细分,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关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基于个体层面逐渐转向对记忆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如心理学家巴特莱特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20]3}。而真正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中来研究的是哈布瓦赫。受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概念。“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

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21]335}之后,康纳顿将集体记忆研究延展至社会记忆^{[22]40};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将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升华为“文化记忆”;诺拉则强调“记忆之场”概念^[23]。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已近百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档案学等学科均对其展开了研究,但就概念本身来看,由于大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界定集体记忆,使得集体记忆成为“一个看起来一目了然但细想下去又捉摸不定的概念”^{[24]1}。摒弃概念界定的纷争,从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资源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是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集体记忆是属于集体的记忆,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记忆。从纵向结构来看,集体记忆包括集体拥有和分享的“过去”,以及正在发生或建构的“当下”;就横向结构而言,集体记忆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构成^[25]。

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所共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及现在全部认识的总和,包括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想象的各种形态。“集体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深层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方面。”^[26]集体成员可以在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和物质存在中感受到集体记忆,前者如节日、庆典、仪式、风俗、纪念等,后者包括广场、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图书馆内承载集体记忆的各种文献图书资料等;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认识到集体记忆;还可以在本集体与其他集体的互动中体会及感悟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等特征。一是建构性。“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重构。”^{[21]59}哈布瓦赫认为,集体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并非简单地用新思想代替已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通过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实现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的目的^[27]。这种建构性既包括对过去的累积性的建构,也包含一种对过去的穿插式的建构,这取决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主体自身的主观需求,即基于客观条件之上巩固自身主体的同一性。“作为共同体选择、组织和推广的结果,集体记忆的建构通常被运用于同一性的凸显、延续性的展示和合法性的诠释。”^[25]二是客观性。集体记忆虽然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但这种重构不是搭建海市蜃楼,并非凭空建构,而是需要基于过去发生或存在的客观的事物来进行主观建构。三是社会性。“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集体记忆,也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交流这些集体记忆并获得认同。”^[28]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和共享的记忆,是在集体成员的社会互动、交往、交流乃至交融中形成的,不是个体化的旧梦重温,也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记忆,不是“集合的记忆”,而是“集体的记忆”。

2.2 集体记忆攸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

首先,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个面向,既包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分界意识、命运意识,也包含团结意识、奋进意识以及发展意识,但其核心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3]。而集体记忆的构建及强化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

集体记忆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认同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

的,这些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特征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础。”^[29]民族认同形成和得以强化的重要来源是民族成员具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历史记忆和共同命运^[30]。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凭借、基点及基本依据,因为它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事实基础,指引情感及叙事方向,引导群体认同的发展方向。集体记忆的遗忘及其新的建构还会影响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31]98}

集体记忆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历史记忆对于建构全体成员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具有重要的作用。”^[32]即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都相互认识,更别说相遇相知了,但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能够活在集体成员的心中。民族的本质是每个成员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成员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33]6}。这种“相互联结的意象”和“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很大程度上指涉民族的集体记忆。超越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而萌发的主观认同,是个体得以想象共同体并维持这种想象的关键机制^[34]。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尤其如此。中华儿女基于过往的集体记忆来想象中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不管是在中华民族强盛时共享荣光,还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万众一心、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经历及精神,抑或中华儿女在中国这片广阔土地上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都成为大家想象和憧憬未来的素材、信心和基石。集体记忆一旦消失或抹去,中华儿女将凭借什么来想象中华民族?

其次,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将直接危及中华民族认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钱穆强调:“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35]2}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是其集体记忆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一个失去历史来源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明白现在身处何处,自然不清楚未来要走向何方。一个集体记忆薄弱、断裂甚至失忆的群体很难维系下去^[36]。“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势必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37],更遑论共同体的认同及其意识的铸牢。

2.3 集体记忆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者”

“集体记忆是对一个共同身份的探索,这个共同身份将一个社会群体联合起来。”^[38]任何共同体都希望营造一种身份归属感,这样的营造离不开时间维度的延续及空间维度的共融,蕴涵在集体记忆之中的共同体历史以及历史遗忘,有助于实现“我们是谁”的集体考量,进而实现铸牢集体意识的理性自觉。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化,体现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壮阔命运,蕴涵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永葆的共同理念及价值追求。这样的集体记忆有助于中华儿女体认何谓“我们的历史”,进而形成一种“我者”的融合意识及归属情感,从而可最大限度地将原子化的个体联结起来,形成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既是引导个体走向集体的“磁石”,也是集体内部消弭分歧形成共鸣的“桥梁”。

集体记忆的过程还伴随着“我者”与“他者”的比较和区分。在对外区分的过程中实现“划界”,同时生发一种共属一体的强烈情感。“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39]10}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以“他者”为身份参照,以集体记忆为认同依据,才有可能在“我者”与“他者”的镜像互动中固化、澄清及确证身份归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要进行不同内容及方式的系统比较,以区分“我

们的记忆”和“他们的记忆”,他者的不同往往凸显自身的鲜明特征和精神气质,而这种区分同时又增强了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认知^[40]。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41]

2.4 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21]71}借助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历史及经验连成一体,从而获得关于集体的总体性感觉和认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集体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素材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立足当今社会主导思想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可以展开对过去意象及记忆的重构。同时,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从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回溯源远流长、苦难和荣耀并存的历史,透过集体记忆,中华儿女追寻民族的起源,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和圣贤搭建起文化心理及情感归属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这种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42]124}。

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多样化载体

集体记忆是集体共有的,在集体中由集体成员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事或物。在集体中发生的或者与集体有关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可能具有典型性或强大的冲击力和刺激性,甚至扩展至国家这样的集体层面。当然,也可能是碎片化的、民间化的、片段性的。随着集体的主观意愿和需求以及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些事或物被集体不断地加以整合、赋予意义,甚至使之典型化。此时,这些事或物很可能转化为集体记忆中标志性或典型性的元素或因子,并固化或铭刻在集体的记忆中。集体记忆以物质或非物质的方式不断地被建构、复制、传承、激发。就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而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建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43]。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传承、激发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都需要依托多样化的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物质客体、物质现实,也包含众多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这些载体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承载物及中介,是用来形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而建构起来的构造物,因此它是可塑的,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3.1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载体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44]1}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需要通过各种符号来承载、再现及传承,包括语言符号、文字符号以及图画符号。不论中华民族集体规模如何演变,中华儿女都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而语言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共同体都凭借特有的文字进行书面交流和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文字,中华儿女凭借文字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与此同时,在文字符号中,历史教科书由于记录着中华民族如何从历史中走来,记载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苦难、荣耀及梦想,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成为极其重要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载体。图像符号和

语言符号一样,属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每个集体都有标识性的独属于自身的图像符号,其承载着深厚而重要的集体记忆。总而言之,就当今的中华民族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用语言和文字,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地图等国家象征符号都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极其重要的载体。

3.2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

“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45]32} 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像中华民族这样的集体,一旦要形成记忆,离不开特定的地点及场所。基于便于日后的仪式展演和记忆重构的角度,集体记忆还趋向于将记忆空间化,以形成独属于本集体的且打上集体烙印的多样化场所。集体成员一旦身处其中,或者想起该场所,便会勾起往昔回忆,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这种载体看得见摸得着,属于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对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而言,其场所型载体包括各类建筑物,如广场、雕塑、文化遗迹、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等。这些特定的场所承载、记录、保持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华儿女处于这些特定的场所时,能够自然地回忆、想起、再现中华民族所共享的事或物及其展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属于典型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中华儿女一旦深处其中,看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姓名,观看承载着那段苦难而屈辱历史的影像,就能够唤起中华民族成员有关共同苦难与屈辱的集体记忆,有助于领会中华民族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还有益于凝聚中华民族成员的爱国主义热情。

3.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仪典型载体

地域性、周期性的节日、庆典以及独特的仪式是展演集体文化,传承及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集体通过各种节庆活动及仪式来制造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通过和现在一代的群体成员一起参加纪念性的集会,我们就在想象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否则,过去就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地飘散。”^{[21]43} 各种节日、庆典及仪式能够帮助中华民族集体成员回忆过去将共同体聚合在一起的重大事件或故事。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凭借反映在日历上的节日庆典及仪式来隆重纪念这些事件,同时,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正是通过这些“集体欢腾”的仪典型载体,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之外,保持其自身的活力。这样的欢腾时刻,是中华民族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因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22]4}。通过参与仪式性的操演及康纳顿所说的“体化实践”,来传承和维持集体记忆,将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勾连在一起,形成绵延不绝的统一体,并在这样的“欢腾时刻”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和身份坐标。每年的12月13日被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之后,国家公祭网上线,设计了包括在线公祭、海外公祭等版块在内的线上公祭仪式。因此,在每年的12月13日,中华儿女可利用线上线下公祭平台,亲历公祭仪式,实现对这一段集体记忆的固化及刻写,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价值共识。

3.4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媒型载体

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普及开来,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要的传媒型载体。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能够重组集体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为中华民族的生活带来以声音为尺度的技术变革,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延续中华民族文化

认同,但其存在声画分离的问题。电视的出现弥补了广播声画分离的不足。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电视具有逻辑性和理性,在传播行为的组织化程度方面具有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特征。电视主要通过再现、突显以及屏蔽的方式,实现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强力建构^[46]。电影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集体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集体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随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当今时代集体记忆的颠覆式载体,它“正在剧烈改造社会发展现实,深度干预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同时也从‘当下’出发重写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37]。

4 以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因此,基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媒型载体的重要性、多样化及全面性,应该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省思、重塑及传播传承等维度,谋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4.1 省思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不仅应该反思过往,更应直面并应对目前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

一方面,需要深刻反省中华民族对待文物古迹的行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将民族的记忆符号化约为压迫符号”^[29],以及许多城市基于发展的逻辑开发和改造旧城的需要,加之不够重视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各种载体,导致包括字画、艺术品、寺庙、楼阁等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古迹、遗产、遗址、古建筑被不可逆地损坏甚至毁灭。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一旦毁灭,不仅意味着许多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被抹去,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更意味着许多能够唤起中华儿女自豪感、归属感、同一感的载体也消失了。因此,对待多样化的富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蕴的物品及场所,应从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以及唤起中华儿女归属感、自豪感的视角来加以认知和对待。

另一方面,亟须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当下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如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国。由于其本身的迷惑性、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加之社会思想氛围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该思潮在中国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帮手,其本质是凭借歪曲历史来证明“学习西方”是必由之路。具体而言,它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这种思潮会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产生强大的解构后果,尤其是对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否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否定,将动摇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关于近现代以来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事实上,在集体记忆代际衰减效应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下,一些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陷入“相对主义泥沼”。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遭受质疑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瓦解。

4.2 重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每个时代都依据一定的社会现实、社会框架、社会理念和社会需求进行历史与往事的集体

筛选和现实诠释。”^[25]全社会都应积极发掘及再造能够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万众一心、敢于拼搏的集体记忆。

首先,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历史教科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以及普及性,能够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深深嵌入国民的脑海。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要注重故事、史实及反思三个重要书写要素的有机结合。讲故事的方式能够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触动心扉的情感打动读者,使读者有兴趣了解历史;同时应尊重史实,历史叙事并非叙事者想象力的任意驰骋,需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激发情感共鸣,促使人们产生深层次的理性的思考,拥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成为理性的爱国者^[32]。

其次,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在强化总概性象征符号和总详述性象征符号的意识时,主要是通过国旗、国徽、国歌,以及红色景点、红色文化符号、革命历史故事来建构;在复兴传统关键象征和关键详述性象征符号、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时,主要是通过长城、黄河、大运河、故宫、天安门等具有中华民族历史符号的景点,还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儒释道文化”“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人合一”等历史传说、传统经典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来建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应该关注过去,更应该关注当下及未来,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对当下的某些事件进行建构,形成新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比如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

再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纪念性公共空间为重点,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情感品质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底蕴,因而新的记忆之场的建构不必然追求高大宏伟,而应注重营造纪念性氛围,传达纪念性情感。同时,应重视受众和记忆场所之间的互动,可充分依托大众传媒及互联网,打造一系列网络化虚拟记忆之场,以便打破时空的限制,使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们能够借助新技术介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在开发记忆之场时,尤其要重视灾难符号的构建。“记录灾难的符号可以激发民族自强”^[29],与战争和灾难有关的遗址的保护以及相关纪念物的建设,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至关重要。

最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涉的事件、人物、典礼、仪式等为导向,积极推行体化实践。“节日和仪式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和演示方式。”^[29]集体记忆不仅沉淀在具体的符号、空间、物件、历史教科书中,还积淀在人的各种行为之中。人的规定性操演式身体行为,指涉历史真实事件、英雄人物,能够传递信息、提供有效的记忆系统,是传递及维护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及载体。可充分挖掘现有的节庆,比如春节;亦可再造新的节庆,如中华民族日。

4.3 传播及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会自动进入个体的头脑,需要集体成员的交流互动、传递信息。换句话说,集体记忆需要重视传播问题,它是在长期持续有效的传播中得以传承和巩固的。

一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并优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内容及载体,谋划一套长期而有效的传播策略,促进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规范、有序、持续、精准传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很可能造成各行其是、信息混乱、无效传播甚至有害传播。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将与之相关的记忆内容整合起来,充分利用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传媒型载体,并在综合考量记忆内容、传播媒介、时代特征、受众特点、大众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谋划传播策略。

二是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性,与时俱进地动员及整合各方力量,搭建一个线上线下、“体化实践”“刻写实践”相融合的传播平台,推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常态化及大众化传播。该平台的目的是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成员了解、认知、承认、接受、内化乃至主动传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动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想象朝着同一性方向前进。为确保该平台持续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还需制定及完善平台管理制度,严格把关传播的主体及内容,并积极探索构建合理且可行性强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实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及有效性。

三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受众为导向。充分发挥受众的能动作用,注重与时俱进地增强传播时受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从而提升传播效果。“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集体记忆传承的主要途径”^{[22]40},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身体实践为主要方式来展开。在设计纪念仪式活动时,应注重丰富及创新操演方式,如注重情景体验、多元互动,目的是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长期处于激活、唤醒及巩固状态。在此基础之上,应充分考虑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尽可能实现集体记忆的二次传播。让那些被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所动员及感染的受众,主动去感染和影响其身边的人,最大化地实现传播的效果。

5 结语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从历史深处一直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专属于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这种源于历史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影响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对内促进融合,对外实现划界;还紧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具备多样化的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媒型四类载体。基于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多样化载体,可以从省思、形塑以及传播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这三个基本方面来深入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总而言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指标及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将集体记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基于集体记忆的视角来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触及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及核心,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更宽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3] 周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J]. 学术界,2020(8):5-16.
- [4]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 民族研究,2018(1):1-8.
- [5] 高承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24-30.

- [6] 刘永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10):17-23.
- [7] 杨鹏飞.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83-94.
- [8] 范君, 刘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梦认同的民族意蕴[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5):17-22.
- [9] 青觉, 赵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4):5-13.
- [10] 朱碧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探微与学理阐释[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1-9.
- [11] 黄金辉, 陈崇仁. 国民意识培育: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及其进路[J]. 探索, 2022(1):63-74.
- [12] 胡仕坤. 文化符号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109-115.
- [13] 赵超, 青觉. 象征的再生产: 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6):103-109.
- [14] 罗强强, 钱佳乐. 新时代文化认同危机及建设路径——兼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84-91.
- [15] 张前, 张晓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32-37.
- [16] 龙金菊, 高鹏怀. 民族心态秩序构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12):9-15.
- [17] 白利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策机制分析[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14-20.
- [18] 陈纪, 曾泓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57-66.
- [19] 冯契. 哲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 [20]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 记忆: 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M]. 黎炜,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 [21]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2]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3] 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 2009(3):10-14.
- [24] 张庆园. 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5] 詹小美, 康立芳. 集体记忆到政治认同的演进机制[J]. 哲学研究, 2015(1):114-118.
- [26] 汪新建, 艾娟. 心理学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112-116.
- [27] 黄晓晨. 文化记忆[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6):61-62.
- [28] 周海燕. 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 检讨与反思[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9):39-50.
- [29] 李达梁. 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J]. 读书, 2001(5):104-107.
- [30] 赵超.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J]. 探索, 2016(6):51-58.
- [31] 戴维·莫利, 凯文·罗宾斯. 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 司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32] 吴玉军, 顾豪迈.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3):69-76.
- [3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叻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34] 孔结群. 难民认同: 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0(1):43-53.
- [35] 钱穆. 国史大纲(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36] 李静. 共同的记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之四[J]. 中国民族教育, 2020(12):22.

- [37] 胡百精. 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3):98-106.
- [38] 阿龙·康菲诺, 张淳, 赖国栋. 集体记忆与文化史:方法问题[J]. 文化研究, 2019(3):17-36.
- [39] 江宜桦.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 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40] 熊文景. 以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160-164.
- [41]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3-21.
- [42] 丹尼尔·贝尔.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 李琨,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 [43] 麻国庆. 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1):5-14.
- [44]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45]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46] 付晓光, 袁月明. 媒体融合语境下电视的集体记忆建构[J]. 传媒, 2016(4):25-27.

Collective Memory: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 Zhaohui

(Institute of Ethnic Polit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sum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hared by collective members, which has prominent constructive, objective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Whether in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ing stage, or in the process of excitation and inheritance, collective memory needs to rely on diversified carriers, including symbolic, place, typical and media carriers.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maintains and strengthen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further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demarcation of the other, in addition, collective memory connect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refore,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ink deeply about the factors that d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nd r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build a set of symbolic systems carry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social practice, actively develop new memory fields, and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Fin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es, platforms and audiences' orientation of spreading, inherit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赵超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

——以山东 B 县 W 村为例

张紧跟,张 旋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如何提升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基于山东 B 县 W 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遵循党建引领、资源整合、还权赋能与均衡共赢机制,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社集体治权、促发权责一致意识形成了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从而激活农民主体性。整合式赋能之所以能有效运作,在于其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权利逻辑和制度逻辑促进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与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双向互动。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再造村社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不仅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而且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进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和产业发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内源式发展道路选择。

关键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整合式赋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76-14

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1]¹⁹ 一直是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明确规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因此,激活农民主体性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着力点,有利于增强乡村振兴政策的实践效能。但是,农民主体性面临参与意识与安全感不足、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社会主体意识缺位、主体权利缺失与主体能力缺乏等困境^[3],制约着农民从事乡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2017 年,山东省开始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农民主体性相结合,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生产基地+农户”和“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等十多种发展模式促进农民合作,重建了村集体与农民新的经济联结纽带,蹚出了一条实现村强民富和乡村善治的新路径^[4]。为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在《关于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到 2022 年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覆盖全省 40% 以上的行政村。在山东实践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真正确保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实现了党建引领和农民主体性的有机融合^[5],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激活农民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尝试。基于此意义,本文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提升党建引领广州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研究”(2022GZYSB060),项目负责人:张紧跟。

作者简介:张紧跟,男,博士,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旋,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试图探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逻辑机制,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方向,进而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路径选择。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当前有关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探讨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关注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促进乡村有效治理中的重要意义。既有研究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证实了党建引领乡村有效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相互嵌入的组织形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利于将党支部的政治优势与合作社的经济组织优势结合。其中,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牵头成立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可以借助村干部等乡村精英的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合作社经营效能^[6]。因此,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7]。具体而言,党组织通过土地“虚拟确权”方式对细碎化土地进行整合,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合作社,不仅能够带动村民参与市场竞争获得更多利润,还可以使村民通过股份分红分享合作社的经营利润。由此,合作社通过入股分红、就地用工等方式,在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建立了一种股权型和合作型的利益联结^[8]。与此同时在党组织监督下,帮助合作社明晰经营管理模式、利益分配原则,从计划和分配环节实现对农业公司的有效控制与监督,有利于提高合作社收益。总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党组织在土地流转、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制度设计以及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创新等环节的直接领导与治理实践,踏出了一条新型集体经济自我实现与引领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9]。

其二是讨论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多重路径。研究者意识到激活农民主体性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并针对农民主体性的实践困境提出了党建引领、制度创新、产业发展、组织再造、文化涵育等激活路径^[10]。具体而言,党建引领路径强调通过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来更好地倾听农民主体诉求,维护好农民利益^[11]。制度创新路径关注健全公共性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自治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和保护性的城乡二元制度以激活农民主体性^[12]。产业发展路径主张凭借产业发展维护农民市场权益、培育农民市场经营能力以激活农民主体性^[13]。组织再造路径认为,农民自组织具有主体承载、资源对接、能力提升等优势而成为农民主体性建设的重要抓手^[14]。文化涵育路径则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看作农民主体性建设的内在要求^[15]。

总体而言,既有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研究不仅讨论了其在发展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建和实现村庄治理有效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关注到要尊重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和发展能力,但主要聚焦于党建引领将农民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而有关激活农民主体性的研究虽然剖析了农民主体性的现实困境并构建了相应的提升路径,但要么偏重于对策设计,要么缺乏党建引领元素分析。毋庸置疑,党建引领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既往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动员和组织农民的制胜法宝和优良传统,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抓手,也应该成为新时代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可行选择。但是,完全自上而下地动员和组织农民,农民只能被动参与组织化的决策与管理等,可能会导致党建引领与农民主体性之间的二律悖反^[16]。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实践载体,探究党建引领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机理,以期实现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长效发展与农民主体性有效激活的良性互动。

回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历程,烟台的试点创新不仅快速扩散到山东全省而且辐射到全国,山东实践无疑符合案例研究所强调的典型性。为此,本文选取山东B县W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建构整合式赋能的分析框架,力图通过深度案例分析回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何激活农民主体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何能激活农民主体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意味着什么?在本案例研究中,一手资料来自笔者从2022年3月至今对B县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展开的调研,对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同时,也对乡镇党委工作人员、合作社负责人、村党组织领办班子以及村民进行访谈;二手资料来自B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等。

2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分析框架

新时代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而激活由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受动性构成的农民主体性,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再造村社共同体,并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平台,吸纳整合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来自外部的要素资源,进而真正发挥农民主体作用^[17]。换言之,激活农民主体性需要双向作业: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基于村庄本位实现有效自治,处理好村民个体与村集体的关系,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赢^[18]。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了村社集体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发展^[19],能够为激活农民主体性注入持久活力。这是因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支撑载体,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以强化村社统筹能力为逻辑起点,以利益契合为核心取向,以还权赋能为具体内容,建构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整合式赋能”。

2.1 整合式赋能的框架建构

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过程中,党和政府不断加大“资源下乡”力度,极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等发展的外部条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使得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从家族或集体中脱嵌出来的村民逐渐个体化或原子化。至此,传统的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其承载的村庄公共性日渐衰微,大多数乡村难以形成内生发展动力。碎片化的分散小农既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资源,也无力对接市场资源,更无法有效应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如此结构性困境必然使得亿万农民成为失去主体性的“弱势群体”^[20]。因此,要成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将分散的小农有效组织起来。相较于市场化、自发性组织体系,村社组织作为新时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重要组织载体,是真正组织农民和服务农民的重要载体,成为实现小农户组织化的可靠出路^[21]。

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社组织作为乡土社会中国家与农民的连接桥梁,是根植于村庄内部兼具政治和群众基础的组织体系,发挥着政治引领、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组织动员等多重功能^[22],在将农民组织起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一方面,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抓手,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以激活村社组织的统筹功能,进而对村庄发展要素进行优化整合、对个体化的农民进行组织动员;另一方面,村社组织有效承接下乡资源、整合土地要素搭建合作社平台,既有效发挥了村庄精英的示范带头优势,又以农民利益为

行动目标、以农民意愿为行为准则为农民创造适应性和保护性发展空间,进而在合作社的产业发展实践中对农民还权赋能,不断回应与提升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层面的主体性价值。由此,村社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动员农民,同时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重构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生成农民对村庄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激活农民参与村庄发展的主体性,实现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

具体而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作用过程。一是以党建引领乡村整合。面对村社组织统筹能力弱化的客观现实,需要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抓手来强化村社资源整合能力,突出村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这有利于乡村借助国家优势推进自身整合,重建乡土自信^[23]。二是以整合促进动员。凭借村社组织的整合能力能够为合作社带来更多政策、资金、人力等资源,充分发挥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力量,持续扩展增值渠道,为以产业发展动员农民提供支持。三是以动员带动赋能。在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以合作社内生治理事务为抓手对组织化的农民进行全方位还权赋能,提升农民物质获得感和自我实现感,促发农民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责任意识,最终落脚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四是以赋能实现共赢。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进程中,借助合作社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农民广泛参与到合作社发展中,参与权利得到保障。在党群循环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农民对党组织的认同,也重塑了农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公共性,由此达成各方互惠共生的良好局面。

综上,“整合式赋能”的分析框架(见图1)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通过党建引领强化村社组织的统筹功能,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进行村社组织重建,进而整合村庄内外多重要素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且凭借村社组织的统筹机制,在有效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维护农民市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服务供给、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全方位的整合式还权赋能。以党建引领和产业赋能的融合回应农民发展诉求,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和行为逻辑,最终激活农民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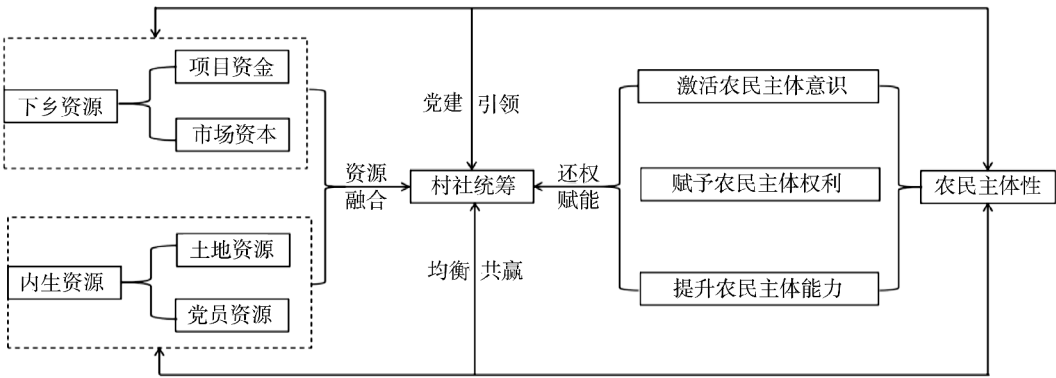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式赋能的分析框架

2.2 整合式赋能的二维分类

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整合式赋能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成效需要考察村社统筹力、农民参与性及其两者形成的整体性合力,确保实现在强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全方位赋能农民。村社统筹力是指在资源下乡过程中村社组织的资源获取力和整合动员力,以村级党组织为主要载体,运用政治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治理村庄、增进村庄公共利益的能力,构成激活农民主

体性的前提条件。农民参与性是指合作社发展是否得到了农民本身的响应,是农民主体性是否得到激活的外在直接表现,也是村社集体功能发挥的内在价值要求。基于“村社统筹力—农民参与性”的分析框架,可以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绩效。

第一种类型是“耦合共赢”型发展。作为整合式赋能的正向样态,村社组织能够有效建立与外部资本和农村资源的良性互动关系,凭借其强大的资源获取力完成资源整合,助推合作社发展壮大,同时契合村庄公共利益以公共规则撬动村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此时,农民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实现最大程度重合,农民主体性得以有效激活,也进一步强化了村庄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重塑了村庄公共性和农民公共精神。

第二种类型是“消解脱嵌”型发展。在外部资源大量涌入村庄过程中,大幅度挤压了村庄自主治理空间。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村庄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之外,从治理“主体”变成被动接受服务的“客体”,造成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失衡^[24],也降低了农民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农民主体性难以被激活。

第三种类型是“分利秩序”型发展。在此治理生态中,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经济能人基于自身能力优势垄断村庄公共利益空间,普通农民的利益诉求未得到应有重视。村社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低下,面临着难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惠及广大村民并被村庄精英架空、俘获的现实困境^[25]。

第四种类型是“低效动员”型发展。村社组织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村民并没有获得来自村社集体的直接收益,合作社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力。但是经由高强度的政治动员,农民被动参与合作社,呈现为个体农民的机械联合,在事实上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漠然。

可见,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整合式赋能激活农民主体性的目标达成需要村社统筹力和农民参与性的双强,任一维度的缺失都不足以深入理解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机理与互动逻辑。二者基于合作社这一载体开展良性互动,使得合作社因村社统筹力强化而得以有效赋能农民,农民参与性也因高质量的合作社发展而得以广泛彰显,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式赋能格局。

3 B县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的整合式赋能

本文选取被评选为山东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B县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案例分析,以解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逻辑机制。W村总人口702人,共256户,其中党员22名,耕地面积1218亩,属于人多地少的普通农业种植村。2009年7月,现任W村支部书记回乡流转土地350多亩用于种植反季节蔬菜,初见效益后动员村内党员干部加入创建了YT蔬菜种植合作社。目前,W村所有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00余亩(含W村全部土地和附近一个村庄的部分土地),建设冬暖式高标准蔬菜大棚、拱棚大棚54座,发展有机蔬菜种植。村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日益提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加入合作社,呈现出农民的“主体性回归”^[26]。

3.1 党建引领:整合式赋能的保障机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自产自销的小农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集体弱化了与农民的制度性关联,越来越难以发挥统筹和组

织功能,难以实现对农民的统合和动员。只有强化村集体的统筹能力,重塑与农民的联动机制,整合式赋能的治理功能才能逐渐显现。为此,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整合纷繁复杂治理力量的核心领导责任。在党建引领下,村社组织能够有效发挥资源统筹功能,将复杂的利益诉求融合到具体的治理任务之中,从而凸显村庄发展的公共性^[27],谋求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28]407-408}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可为激活农民主体性提供组织支撑和根本保障。

2021年B县研究制定了《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B县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其明确规定,坚持因村制宜领办,指导各镇街本年度按照不少于行政村总数的80%确定本年度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全面推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着力提升农村党组织统筹乡村发展、治理与服务的能力,发挥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生力军作用。

一方面,以履职培训增强党建引领能力。B县着力强调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带头人队伍建设,针对基层组织推动发展缺能力、服务群众缺实力、争先进位缺动力的现实问题,深入开展农村干部素质提升年活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采取“走出去”方式,每年组织两次村党支部书记到先进地区学习,并根据村庄基础不同,分类组织精准培训;围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双基”重点工作,聘请外地先进模范人物、“圣地名师”等涉农专家以及组织部分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授课,开设村党支部书记大讲堂。此外,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双向挂职,薄弱村党支部书记到经济强村挂任党支部副书记,强村党支部书记挂任薄弱村“第一书记”,潜力村党支部书记到B县地域相近、发展较好的先进村挂职学习,担任党支部副书记。通过融入式锻炼,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难题共解、发展共促。W村党支部书记说:“县里多次组织外出培训,学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还开展‘双向挂职’活动,开阔了我们的眼界。通过党支部书记大讲堂,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相关知识,现在村民都愿意跟着我干,热情很高,我也有底气干好。”

另一方面,通过督导问责压实党支部发展责任。B县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纳入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考核,将合作社成效作为镇(街)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的重要内容和村党支部书记绩效考核的重要评价,实施党支部“星级评价”方案,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硬任务压实压紧镇村干部领办责任。B县党委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探索实行村级大考核大排名,由原来各镇街单独排名变为全县所有行政村统一考核排名,让所有村党支部书记在全县范围亮相排名。”通过落实好乡镇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方向强队伍,定期组织召开专题党委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以严肃党的组织生活,提升基层党组织权威,进而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真正落地。

3.2 资源整合:整合式赋能的统筹机制

掌握资源以及确保村社集体资源分配与村社成员利益建立起基于公共规则与共识的联系是激活村社集体的两个关键条件^[29]。整合式赋能强调村社集体是承载农民主体性的社会基础。通过激活村社集体的组织力量,有效承接乡村社会外部资源,使村集体有能力回应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进而使乡村能够具有重构内生秩序的能力。

一是统筹项目资源以完成配套基础设施。W村“两委”多次向省市政府申请各种荣誉称号,先后获得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县级乡村振兴先行区等荣誉,W村党支部书记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以此争取到倾斜政策。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被纳入美丽乡村党建示范区范围内,在乡镇政府领导和党建示范区干部的支持下,合作社的土地流转进程较为顺利,使村社集体的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得以统一起来,实现了村庄土地利益关系的再整合。此外,W村所在镇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通过项目生产获得中央和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拓宽资金渠道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原始动力。在镇党委、政府带领下,W村依托YT合作社、阳光农科成功申请到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已经建成300吨果鲜保鲜库1处、包装车间1个,农产品交易仓储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正在建设当中。

二是链接市场主体以推动合作社提质升级。村社组织与市场主体之间依靠利益互嵌建立紧密连接。一方面,W村与农牧公司签订协议,合作社以厂房、设备作抵押,年底根据公司盈利进行二次分红。调研了解到,目前每亩地每年分红在350元左右。在此过程中,充分论证外来企业的稳定收益以及对本村劳动力的吸纳,慎重稳妥保障村民和村集体利益。另一方面,W村积极对接市场、统筹产业布局,通过多重资源的深度整合,发展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合作社提档升级。W村党支部书记表示,“咱这个基地有自己的保鲜库,有自己的初加工,咱们这边的蔬菜也能销往青岛、北京、上海的商超。我们是种养基地,不光种植蔬菜,还搞养殖,新希望六合的肉鸭就在我们这里,我们与他们搞联营。肉鸭养殖每年可产生粪便约一万方,经粪污处理厂转化为有机肥,用于合作社种植蔬菜,不仅省去了化肥钱,售卖有机肥每年还能村集体增收十多万元”。合作社发展带来村集体收入相应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党组织工作经费,使基层党组织有能力提供社会福利,实现党的服务功能回归。W村利用村集体收益购买了农机设备,免费为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提供收割庄稼服务,开办“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低价就餐。同时,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村集体收益用来为全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购买农村养老保险,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三是党员动员增强了村庄集体行动能力。通过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群体的政治担当和带头作用,村社组织形成以党支部书记为带头人的“内核—圈层—外围”的扩散,对其他党员和村民起到示范引领作用^[30]。村社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农业转型的先行者与服务者,其先期探索与试验为普通农民的跟进打下了基础。W村党支部书记表示,“一开始(2009年)建的是反季节蔬菜种植大棚,很多村民是不理解的,离不开自己的传统种植模式,认为发展大棚不稳妥。(加入合作社)主要是党员带头,每一名党员最少承包一个大棚。首先把村里的党员动员起来,村民看到村‘两委’和党员都加入了合作社了,村民也陆续加入合作社了。这是有个过程的,其间我们做了不少实事才得到村民的认可”。同时,W村成立由支部书记任队长,在家党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等组成的“党员操心人”志愿服务队,主动为群众办理难事、烦事、操心事。在党群互动过程中,增加了村民对党组织的信任和依赖,在循序渐进中提升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完成对村民的动员。总之,通过发挥村“两委”的资源整合优势,让农民无成本或低成本加入合作社,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进而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实现,为整合式赋能的作用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

3.3 还权赋能:整合式赋能的实践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关键是权利和能力问题^[31]。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实践

载体,通过民主协商、教育引导等方式充分赋予农民发展权、表达权,逐步培养起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责任感,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升农民主体能力。

一是以认同强化激活主体意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形成了一种保护型结构,契合农民家庭结构分工与发展需要。首先,“一肩挑”的村干部内生于乡村社会,成为“保护型经纪/精英”,始终把村庄利益放在首位,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其次,合作社提供就业岗位为留守村民创造了较为和谐的社会交往空间和理想的主体沟通情境,实现以集体力量来分摊个体老化过程中的生活风险,维持稳定的家庭关系,为主体性激活创造重要条件。农民主体性的形塑是一个内化为责任、外化为行动的过程,通过提供物质资源和情感支持形成社会保护,意在使村民内心产生一种回报感和责任感,形成互惠关系^[32]。在调研中,W村一位村民说,“现在地里有草,我都会主动薅一薅,合作社发展越好,我家分红就越多”。因此,以合作社发展为纽带,让农民感受到乡村发展与个体利益的紧密关联,逐步形成主体发展的责任意识并转化为村庄治理行动,村民自主性就会随之增强。

二是以民主协商赋予主体权利。W村于2021年开始推行“马扎议事会”的党群民主协商议事形式,在协商民主的原则要求下最大限度地向村民赋予自治权利。村两委成员、普通党员及村民坐在村内广场上,就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村庄产业发展项目、移风易俗、冬季清洁取暖、污水管网铺设等内容进行协商议事,充分征求村民意见。W村党支部书记表示,“‘马扎议事会’是一种有话说当面、有事大家议、有难众人帮的议事方式,和村民们坐在一起聊天议事,可以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出谋划策、共同商议解决村内难题。村民人人都有话语权,会议的大部分发言机会倾斜给前来开会的村民,比如土地流转承包、集体资产盘活使用问题,还有合作社今年种什么蔬菜更畅销,我们都会和村民商量”。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公共协商议事平台,将村务村事决策权交给村民,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村集体公共事务的讨论,形成村集体发展的强大合力。在此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主动了解村民偏好,并依据相应协商程序达成决断性结果回应村民意愿,增进村民的效能感,使得村民对自身的主体地位、行动能力进行再确认,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自觉性。

三是以技能培训提升主体能力。培育具有全面能力素质、理性行为方式与和谐社会关系的新时代农民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内在要求。W村注重通过技术教育与培训增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行能力,及时回应市场多样化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实现对农民的技术赋能。B县成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培训推广组、技术服务组、为农服务组四个专项推进组,建立领导、培训、服务与指导全方位配套扶持体系。W村所在L乡镇与某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利用高校的人才与智力支撑定期对农民进行相关生产环节的技术指导。同时带领农民参观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帮助农民改变传统保守思想观念,推动农民掌握现代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通过培育农民现代化职业素养,进而确保农民既能体会到因操作技能精湛而收获个体融入社会方面的成功喜悦,又能享受到因创造潜能激发而获得的自我认知建构层面的心灵洗礼,满足农民之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能力需要,由此增强农民从事乡村振兴建设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33]。

3.4 均衡共赢:整合式赋能的动力机制

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中,整合式赋能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长效发挥,需要以实现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共赢作为动力支撑,实现村社集体与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的关系均衡。

一是以使命激励提升党员服务动力。W村党支部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将“党员党性”的纪律要求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追求内化为支部书记和党员的行动要求,结合每月“红色先锋”评选活动,对“进步快、意识强、靠的上、贴的近”的优秀党员进行公开表彰,优先撬动党员资源,发挥好这一关键群体的动员表率作用。此外,L镇近年来持续将党建红色元素植入街巷、村党群服务中心等空间角落,通过道路两侧的宣传栏、墙绘打造“红色美丽街巷”,营造出“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氛围,激发党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也为村民群众接受和认可村党组织的领导奠定了潜在的心理基础。这提升了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感和亲密度,形成对党员干部的正向激励与反馈,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领导力^[34]。

二是以利益联结激发农民生产活力。在W村实践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浮动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形成全民参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村“两委”一方面鼓励村民以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流转每亩地每年补贴村民1000元;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经营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村庄不同阶层群体均能在此分享发展机会,充分激活了农民主动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动力。W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我们与新希望六合有联营,老百姓把地拿出来加入我们合作社之后,六合的用工优先用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当然,这是严格控制在60周岁以下的。(工人)工资很高,加上绩效每月收入八九千块钱,这在我们这个县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合作社每天的用工量也在500多人,村民在合作社打工,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

三是以利益保障维系农民合作动力。为推动实现共赢发展,在收益分配上村集体更多考虑留足积累以应对潜在发展风险,优先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为农民持续参与合作社发展提供了稳定保障。诚如W村党支部书记所言:“上级资金给咱们1000多万,咱们建的基础设施、大棚、冷库都是来自上级资金。建好之后每年纯利润的20%都提出来,叫风险金。如果说不巧赶上天灾……我们就拿出来这20%的生产发展基金和风险金,首先保证我们村民每亩地1000元的保底收益。”由此可见,以加强基层党建为突破口,塑造强有力的动员结构,以利益联结增强了农民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铸牢乡村共同体意识,使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成为一种共鸣性选择。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整合式赋能的运行逻辑

从上述案例来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党建引领、资源整合、还权赋能与均衡共赢机制,加强基层党建、强化村社集体治权形成了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激发了农民的参与动力,并以民主协商、教育引导等方式充分赋予农民发展权、表达权,提升农民主体能力,逐步培养农民对乡村建设的参与感、责任感,达成以还权赋能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效果。而整合式赋能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还在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内含的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权利逻辑和制度逻辑,最终促进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双向互动。

4.1 政治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在既往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根本保证。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

产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在有力回应民众和社会需求中不断夯实自身执政地位,增强凝聚力和引领能力。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成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整合式赋能也需要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主线,夯实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着力提升党组织统筹乡村发展、治理和服务的能力。具体而言,通过强化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提升村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实干能力,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发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服务群众、创新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彰显村级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能力本领、公认业绩影响和带动农民,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进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

4.2 利益逻辑:增强农民获得感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所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的整合式赋能并不会自动激活农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积极性,而是需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持续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制度结构,以及处理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35]。换言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需要扎根基层村庄场域,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充分考虑对农民诉求的关照与回应。这是因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是农民,要激活农民主体性,就需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利益诉求,以增强农民对农村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然,利益作为联结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村级组织的关键枢纽,是影响农民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通过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能实现集体增收、农民致富,而且能够提升为民服务、保障民生的能力和实力,从而有效提升村民的物质获得感和生活满意度。在山东 B 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中,一方面,村党组织在统筹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动员农民以资金、劳动力生产及经营理念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提升了农村集体创富能力,带动了农民增收,为激活农民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从集体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投入村庄公共事业之中,如免费为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提供收割庄稼服务,开办为老人提供低价就餐的“幸福食堂”,为全村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购买农村养老保险等,使村民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规则,为激活农民主体性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4.3 权利逻辑:增进农民参与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一些乡村之所以出现“党和政府忙着干而农民站着看”的尴尬处境,以及“替代农民决策,代替农民做主”的现象,是因为农民主体性没有被充分激发。没有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参与,必然会导致诸多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难以奏效。当前,农民在诸如土地流转、产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组织性的议价能力,政府主导型乡村振兴往往进一步弱化了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为此,整合式赋能的目标导向是激活农民主体性,其遵循的内在逻辑是权利逻辑。只有赋予农民充分的主体权利,农民主体性才能彰显出来。而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中,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使农民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参与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在村民参与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利用协商议事、教育培训等方式循序渐进实现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的再确认,塑造村民权责一致的认知,不断增强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终,通过分享发展机遇、协商参与决策、规范生产经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使农民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夯实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基础。因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整合式赋能能够以乡村社会为本位,以

农民权利的获得与实现为中心,为激活农民主体性找到了有效的实现方式。

4.4 制度逻辑:规范运作是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长治久安之道

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中,整合式赋能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长效发挥需要实现村“两委”、村民以及企业等主体间的责任共担和有效共治,而多元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归根结底需要制度规则来保障。制度作为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36]1-2}。在合作社场域内,通过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可以明晰成员之间的权力、义务与责任,增强治理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从而构建稳定有序的多元主体网络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有效。村级党组织作为合作社的领办主体,应当将合作社发展成效作为村干部履职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对优秀村级党组织的薪酬激励。强化镇街党委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内监督机制,将合作社的运营管理情况纳入审计重点,避免产生一些村“两委”和党员干部因其资源、信息优势造成的贪污腐败和合作社资金运营风险。同时也应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建设,形成鼓励带头人干事创业的氛围,为村庄探索创新营造包容性空间。此外,尊重村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规定关于合作社的产业规划、盈余分配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民主程序由村民集体商议决策,为村民建立参与村庄治理、表达自身利益的通道,进而使多方主体致力于共识性的村庄发展规则,维护村庄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公共性的生产凸显出基层党建引领的效能,塑造出强有力的动员结构,也正是依靠组织支持结构和村庄公共性的双向作用,农民主体性得以激活,并转化为投身村庄发展的自觉行动,保证了整合式赋能作用的发挥。

5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37],而激活农民主体性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山东实践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内生发展,为基层党建与激活农民主体性融合发展以实现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为深入揭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践机理,本研究以山东B县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立足于整合式赋能的分析框架,发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所以能激活农民主体性,在于借助党建引领、资源整合、还权赋能与均衡共赢机制,以基层党建强化村社集体治权形成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在此基础上,以农村合作社治理事务为依托,通过激活农民主体意识、赋予农民治理权利、提升农民主体能力来增进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实现农民对自身主体价值的再确认,最终激活了农民主体性。而之所以能实现整合式赋能,在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蕴含的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权利逻辑和制度逻辑,促进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双向互动。

据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以党建引领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既有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讨论多围绕政党整合逻辑展开,关注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强调通过组织与工作覆盖,发挥党组织的倡导、整合以及协调作用赋能基层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38]。相对忽视了农民主体性的重要性,缺乏对党建引领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过程机制分析。与既有的“政党整合”“政党统合”等研究话语相比,“整合式赋能”不仅强调要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关键优势,而且明晰了政党何以能够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形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理。质言之,“整合式赋

能”立足村社本位和农民主体,强调村社组织的功能发挥和农民深度参与,而不只是对基层党建整合资源与主体的经验概括。具体而言,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进程中,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来强化村社集体治权,但是村社统筹能力的强化不在于“整合社会”的政治行动,而在于赋能农民增进农民可行能力,将农民生存韧性与生活理性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动能,将农民再组织化的实现根植到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进而激活村庄社会培育各方共治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对党动员和组织农民这一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是融合党建引领与农民主体性的新型合作社模式,彰显出“以人为本”的乡村发展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合式赋能”聚焦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活农民主体性,揭示出基层党组织动员农民、统合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多元合力的深层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

另一方面,为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以村社为主体承接外部资源真正内化于乡村发展,实现外源式发展要素与内源式发展动力的有机融合。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村庄失序化、村民原子化、集体松散化困境日益凸显,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未能充分发挥下乡资源调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作用,农村集体行动能力衰微进而弱化了资源下乡的效果。可见,村社组织化的弱势和农民主体性意识的缺失是村庄内源性发展动力缺失的重要原因^[39]。当前迫切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提升农民参与能力,激发农民参与热情,为乡村内源性发展格局形成奠定基础。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实践来看,一是以高质量党建为起点,通过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强化村社集体资源统筹能力,整合外部资源进而启动乡村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党建与乡村治理的互促共进;二是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抓手,重建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互动的制度性渠道,加强党群联系促进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并通过能力建设培育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可以看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和产业发展有效激活了农民主体性,实现外部资源、村社组织和农民主体的有机结合,通过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推动了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实现。鉴于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提升农民集体行动能力、激活农民主体性具有正向功能,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条内源式发展道路选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EB/OL].(2021-04-29).<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8777a961929c4757935ed2826ba967fd.shtml>.
- [3] 吴春宝.新时代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主体性功能及其实现[J].长白学刊,2022(1):124-131.
- [4] 李志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乡村振兴的烟台路径[J].小康,2022(24):68-69.
- [5] 江宇.“烟台经验”的普遍意义[J].开放时代,2022(6):13-26.
- [6] 潘劲.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4(2):26-38.
- [7] 刘燕舞.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山东省招远市西沟村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6-82.
- [8] 马良灿,李净净.从利益联结到社会整合——乡村建设的烟台经验及其在地化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1-104.

- [9] 叶娟丽,曾红.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80-90.
- [10] 霍军亮.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0.
- [11] 刘碧,王国敏.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J].探索,2019(5):116-123.
- [12] 王进文.农民主体性在场的乡村振兴事业:经验局限与拓展进路[J].理论月刊,2020(11):51-60.
- [13] 关庆华,吴晓燕.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9-58.
- [14] 徐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建设的自组织路径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1):20-28.
- [15] 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60-69.
- [16] 叶扬兵.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6):51-59.
- [17] 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4-81.
- [18] 叶娟丽,曾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J].探索,2023(2):127-140.
- [19] 高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75-85.
- [20] 吴重庆,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24.
- [21] 钟丽娜.村社集体:小农户组织化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载体[J].现代经济探讨,2021(6):126-132.
- [22] 望超凡.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8-36.
- [23] 季乃礼,许晓.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3):192-198.
- [24] 桂华.国家资源下乡与基层全过程民主治理——兼论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J].政治学研究,2022(5):27-38.
- [25] 李祖佩,钟涨宝.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实践境遇与再造路径——治理视角下对四类发展典型村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2(4):101-112.
- [26] 郭倩倩,王金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困境及其纾解[J].江海学刊,2021(5):146-153.
- [27] 沈迁.村社统筹合作社的嵌入过程、社区基础与治理机制[J].北京社会科学,2021(9):111-120.
- [28]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9] 贺雪峰.如何再造村社集体[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8.
- [30] 田先红.政党如何引领社会?——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J].开放时代,2020(2):118-144.
- [31]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1):31-40.
- [32] GAO H, TYSON A. Poverty relief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inship contracts in four provinc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0(126):901-915.
- [33] 梁成艾.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形成机理、生长逻辑与发展旨归[J].学习与探索,2022(1):129-136.
- [34] KARITA K, HOK B K. Serving the people, building the Par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work in China's urban villages[J]. The China Journal, 2020(85):75-95.
- [35] 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J].浙江社会科学,2013(2):4-11.

- [36] 道格拉斯·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 [3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2022(21):4-35.
- [38] 张紧跟. 党建引领:地方治理的本土经验与理论贡献[J]. 探索,2021(2):88-101.
- [39] 叶林,雷俊华.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J]. 理论与改革,2022(1):87-101.

Integrated Empowerment: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Farmer Subjectivity in Cooperative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A Case Study on Village W in Shandong

ZHANG Jingen,ZHANG Xuan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Enhancing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and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society is the ke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case of Village W in Shandong,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empower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activating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cooperatives led by the Party branches. The study found that cooperatives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follow the mechanism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resource integration, empowerment, and balanced win-win situation, and form integrated empowerment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ing collective governance of village and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the sense of consistent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which in turn activates farmers' subjectivity. The integrated empowerment works effectively because it's embedded political, interest,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promote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activ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Cooperative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re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llage collective and the farmers, whi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attraction and appeal of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but also reshapes the public spirit of the farmers, and then stimulates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operative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effectively activates farmers' subjectivity and providing a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option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cooperative led and run by the Party branch, activation, farmers subjectivity, integrated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王 慧

增强“四力”: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的实践进路

蒯正明¹,马鑫²

(1.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新时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需要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既是筑牢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的应有之义,也是其重要的目标指向。当前,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尤其需要做到:一是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二是着眼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三是加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四是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完善的组织体系是组织基础,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是统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是实践要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090-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1]177},“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67}。“大的样子”不仅指党员人数和组织体系的超大规模,更在于党的政治理想、使命追求等所彰显“大党的样子”。强大政党建设需要不断增强党自身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党的“四力”的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3]599}。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增强“四力”取得的成效,并明确指出,“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4]15}。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核心和灵魂,党的政治领导力以党的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支撑,党的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寓于党的政治领导力之中,受党的政治原则、政治规矩的指引和约束。基层党组织是党聚合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直接组织者,增强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要论述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2XDJ007),项目负责人:王慧。

作者简介:蒯正明,男,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鑫,男,博士,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的“四力”首先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四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4]67}。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既是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应有之义,也是其重要的目标指向。新征程上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既需要立足于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需要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新要求,坚持整体性思维,系统思考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的有效途径。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学界围绕如何将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的视角来看,学界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的时代意义。有学者认为,“新时代强化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应然逻辑”^[5]。新时代伴随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不断增多,“基层党组织通过服务重构社会基层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基层再组织化成为基层党建的重要任务,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建设也遂即成为议事日程的重点”^[6]。

第二,从问题角度分析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就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来说,“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政治担当、大局意识,对于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贯彻过程中做选择、搞变通”^[7]。就基层党组织思想宣传工作来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宣传阐释能力欠缺,只会做上传下达的工作……不能够用自己的言行感动群众、发动群众、带动群众”^[8]。就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工作来说,“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意识淡漠,为谋取私利置农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招致农民群众的不满与反感”^[9]。

第三,从推进路径角度提出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的对策建议。有的学者提出,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要以“提升思想认识为先导、政治建设为统领、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实际工作为载体、标准化建设为抓手”^[10]。就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而言,要“理顺上述单位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体制,根据基层党组织的相关工作条例制定各项具体制度,以充分保障其领导作用的发挥”^[11]。就乡村自治来说,要“注重把党的领导地位体现在民主程序、民主环节之中,坚持和健全农村重大事项、重要问题、重要工作由党组织讨论决定的制度”^[12]。就提升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来说,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鲜活的语言,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3]。就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来说,要“将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建设贯穿于基层党建全过程,通过技术赋能、组织优化和资源聚合等多种方式打造服务型党组织”^[14]。

总的来说,学界围绕如何“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等主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直接以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为主题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在具体分析中,尤其需要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实践经验与创新思考结合起来。

2 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

政党组织是政党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政党物态化了的“载体”。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重视组

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组织优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性。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5]⁵⁶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4]⁶⁷

在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力度,基层党组织覆盖面不断拓展。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93.6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7.8万个,总支部31.6万个,支部434.2万个”^[16]。就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来说,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基本实现应建尽建,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日益增长,大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两新”组织具有面广量大、类型多样、变化频率快、人员流动快等特点。新时代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需要我们坚持系统思维,在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农村、城市以及机关、国企、高校等单位的基础上,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弱项短板、盲点堵点,创新组织设置方式,不断织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2.1 以产业为依托,强化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

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是新时代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党的组织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尤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推行“支部+”。如在原有村党支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党支部+合作社”“支部+协会”等农村基层党建方式,把党员、乡土人才集聚到产业中,推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村企党支部“联建”。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了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可以推行“支部+公司+基地”“支部+公司+基地+电商”等模式,探索建立“村企联建”的党组织设置模式,实现基层党组织由传统的地域性、单一性、行政性设置形式向以产业支部为代表的功能性、多样性、专业性设置形式转变。三是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推动产业链党建。如贵州省六盘水市为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实行以一家园区党工委为主导、一个首位产业为重点、一家头部企业为核心、N家上下游企业为支撑,链上企业组建产业链党委,推动链上企业从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转变^[17]。各地党组织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特点,整合区域内属地、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科研院所等资源,分类组建“一链一党委、一企一支部”的党建模式,推动“链”上组织联建、活动联办、难题联解,以“党建链”串起“产业链”。

2.2 以“地”为基础,创新区域内基层党组织设置

创新区域内基层党组织设置有利于突破传统单位制党建制约,推动区域内资源整合、社会治理和党员管理等。当前,创新区域内党组织设置尤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设置“联合型”党组织。如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可以采取“强村+弱村”的模式,跨村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开展结对帮扶、项目共建、党建互联等活动。二是在网格社会治理中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网格社会治理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的重要创新,有利于打通社会治理“神经末梢”。新征程上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也为了拓展党组织覆盖面,需要按照“一网格一支部”要求,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构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

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将创新党组织设置与网格化治理结合起来,形成党建网格和社会治理网格“两网融合”的格局。三是坚持因“楼”制宜,优化楼宇商圈党组织设置。深化楼宇商圈党建联建有利于共享党建资源,推动商业繁荣发展。为此,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楼宇商圈党建过程中,要广泛依托楼宇商圈业主、物管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等设立基层党组织,推动楼宇商圈综合党委、党支部等应建尽建。在组织设置方式上,可以采取单独建、企业联建、楼层联建、挂靠建等多种方式建立党组织,构建“街道大工委—楼宇商圈综合党委—企业(社会组织)党支部”的党组织体系架构。四是在建筑工地、农民工市场等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区域,建立以同一流出地党员为主的流动党员党支部,为流动党员“安家”。为了推动基层党组织覆盖有形、有效,还可以依托微信群、智慧党建 APP 等网络互动载体,构建全面覆盖、灵活高效的网上支部,使流动党员更好融入党组织中。

2.3 以“趣”和“公益活动”等为纽带,推动基层党组织向各种社会团体延伸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趣缘型”党组织建设,即在具有相同艺术爱好、活动兴趣的党员群体中,或者文体团队中建立党组织,既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又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培育艺术骨干、繁荣社区文化、服务居民群众中的引领作用;二是注重在各种公益性组织、志愿者协会中建立党组织,通过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引领志愿者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志愿活动。实际上近年来很多地区都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安庆市迎江区新河路街道地质社区就根据党员不同的兴趣特长成立书法、曲艺、剪纸等 8 个兴趣党小组,为辖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18]。上述探索对于拓展党组织覆盖面、凝聚群众力量、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2.4 以完成重大项目、重大任务为着眼点,建立临时党支部

新征程上,各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一系列攻坚克难的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遇见各种困难,成立临时党组织有利于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各种力量,推动党的领导任务的贯彻落实。当前发挥好临时党支部作用尤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将支部建在项目上。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就是按照“一项目一支部”“一工程一支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的要求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党的建设和项目推进深度融合,做到支部建在一线、党员攻坚在一线、组织关爱在一线,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完成项目、推动发展的动力。二是在完成党的重要任务、重大决策部署、应对自然灾害等重大事故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如目前一些纪检监察机关在开展巡察工作中成立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严格教育管理党员干部,既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也学习巡察业务和被巡察单位相关业务知识,共同讨论复杂疑难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提升巡察干部发现和研判问题的能力。再比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很多基层单位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临时党支部凝聚组织力量、攻坚克难,构筑落实党的政策、完成重大任务的坚强堡垒。

总之,新时代我国“两新”组织蓬勃发展,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必然要求打破行政、区域、单位等传统党组织设置方式,按照“地域相连、产业关联、要素相聚”的原则和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要求灵活设置党组织,通过广泛设置产业党支部、联合党支部、临时党支部,积极推进“党建+”,如“党建+产业发展”“党建+社会治理”等,推动党组织由区域性设置向功能性设置拓展。上述努力不仅有利于完善党的组织体系,也有利于党凝聚现代化建设力

量,做到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为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3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上通下达、惠及基层。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的关键就是要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4]67}。

3.1 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

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是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前提和基础。不过,由于基层党组织在类型、任务、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各类基层党组织中实现党的领导的要求也必然不同。从当前来看,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主要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村(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党的二十大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19]25}当前加强村(社区)党组织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行村(社区)“两委”正职“一肩挑”,以及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制度。当然,在推行村(社区)“两委”正职“一肩挑”制度的同时,需要注意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尤其要注重建立健全“一肩挑”干部的产生程序,既要尊重群众的选择,又要依法办事。同时要注重拓展选人用人视野,注重从素质优良的致富能手、产业协会负责人、复员退伍军人中选人,使“一肩挑”得以“挑得稳”“挑得远”。二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把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当前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需要落实“党建进公司章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党组织会议、董事会、经营班子议事规则,明确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具体内容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国有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既保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又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运行。三是全面落实党委(党组)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明确的……在中小学、医院、科研院所,党组织领导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还没有建立起来。”^{[15]561}202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党组织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新征程上,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需要按照《意见》要求,细化制度规定,厘清中小学校党组和校长的职责范围,完善中小学校党组织议事规则,建立健全中小学校党组织运行机制。同样对于公立医院和科研院所来说,也需要全面落实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党委领导下的院长(所长)负责制,完善与新的领导体制相适应的内部治理制度。

3.2 树牢“党建+”理念,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

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20]605}。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思想

局限,着眼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唯有如此,党的基层组织才能真正得到巩固和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四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党建工作和单位中心工作中没能将两者有效融合,出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的不良现象。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没有能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有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将党建等同于党务,将党建工作局限于开会、读文件、做好会议记录等;有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存在“抓业务工作是硬任务,抓机关党建是软指标”的片面认识,担心党建工作做多了会影响、冲淡业务工作。上述现象必然导致党的建设的统领性作用得不到体现,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基层党组织边缘化,也会削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21]317} 新时代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要求基层党组织树牢“党建+”理念,坚持党建与中心工作一体发展的基本原则,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实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目标同向、合力合拍、同频共振,把党建工作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引领和推动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对于“两新”组织党建来说,为了实现党建促发展的目标,可以推行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做法,广泛开展“党员+项目”等活动,做到关键任务有党员引领、关键技术有党员攻关、关键时刻有党员冲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健康发展,以党员先锋模范行为助推党的政策贯彻落实。

3.3 完善政策落实机制,提高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强不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21]261} 新时代提高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力需要在加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增强他们对政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基层政治监督机制。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注重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强化政治监督,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有效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监督格局。其中尤其要发挥好政治巡视巡察的“利剑”作用,强化对重要环节、重点岗位和重点工作的监督,同时通过持续压实巡视巡察整改政治责任、强化巡视巡察成果运用等举措,推动党的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二是提高政策创造力。政策创造力是指领导干部在坚持政策原则性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执行政策。提高政策创造力要求基层党组织尤其是领导干部注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寻找政策与实践的契合点,防止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转发文件,搞形式主义。三是建立健全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建立健全基层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让基层领导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为其创造性执行党的政策、决策部署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首先要制定科学的“界错”,严格区分“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性质,科学划清“可容”与“不容”的政策界限,通过制定“可容不可容”清单,精准确定容错的范围。其次要完善容错纠错工作流程,细化容错申请提出、调查核实、结论认定、启动纠错等各个环节的规定,推动容错纠错可操作、具体化、流程化。此外,为了让党员干部深化对容错纠错机制的认识,各级党组织还需要加强对容错纠错的典型案例的宣传,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激励、示范和导向作用,营造激励干部担当实干的社会氛围。

总之,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要将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以及提高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力有机统一起来。在这三个方面中,完善基层党

组织领导体制是基础和根本保障,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提高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力是重要内容。其中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将执行党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提高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力,有利于将上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与基层党组织的创造性探索结合起来。

4 加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

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要求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高群众对党的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了宣传思想工作力度。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其专门对乡镇(街道)、国有企业、高校、国有参股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宣传机构设置和宣传人员配置作了规定,为推进基层党组织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基层宣传思想工作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问题。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宣传思想工作自身还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基层党委(党组)对宣传思想工作没能予以足够重视,一些基层党委(党组)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做表面文章、被动应付,宣传思想工作手段落后,不能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为此,需要通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理论政策宣传、创新思想宣传方式和载体等举措,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

4.1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领导干部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思想自觉

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重要手段。为了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宣传思想工作首先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办法》的贯彻落实。如依据《办法》制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清单,包括基层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清单、基层党委(党组)书记和党委(党组)成员“一岗双责”清单等,以责任清单倒逼责任落实。基层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述职报告、履行党建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考察考核、执行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各级党委在巡视巡察工作中要注重对基层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查找薄弱环节和不足,通过专项督查检查、传导压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得到切实落实。

4.2 加强理论政策宣传,让党的理论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4]43}的任务。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新征程上加强党的理论政策宣传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要宣传阐释好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在思想宣传过程中,要注重大众化的表达,把透彻的思想讲透彻,把鲜活的理论讲鲜活,以小故事诠释大主题,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增强理论政策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政策的宣传和阐释。加强新时代党的政策的宣传和阐释,有利

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基层党组织在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政策宣传、阐释中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尤其要找准政策措施与群众利益、百姓关注的结合点,把政策讲清楚、把道理讲明白。三是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党组织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注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与感人事迹、正能量故事等结合起来,同时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着力营造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四是做好群众对热点问题认知的引导。经济发展、物价走势等经济热点以及就业就学、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民生热点,都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很容易牵动社会关注,也容易对人们的思想认知产生影响。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时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媒体聚焦、互联网追问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对热点难点问题加以引导,既阐明“怎么看”,又回答“怎么办”,解疑释惑、疏导情绪,特别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线上线下同步处置,尽快把矛盾隐患发现在苗头、消除在萌芽。

4.3 创新思想宣传方式和载体,增强思想宣传工作成效

增强思想宣传工作成效需要积极探索思想宣传工作新方法、拓展新载体,不断提升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当前来说,尤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信息化的今天,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紧扣“互联网+”,利用“两微一端”,积极构建全媒体平台,加强信息推送,把党的政策精神及时、便捷、精准地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中。二是组织各类特色宣讲团贴近讲。通过组建市民宣讲团、老干部宣讲团等,广泛开展理论宣讲进企业、进协(商)会、进园区、进商圈、进楼宇、进学校、进医院,有利于让党的最新理论政策与基层群众“零距离”接触,推动理论宣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理论宣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是以县域为整体,以县、乡镇、村三级为单元,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的理论宣讲平台和教育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功能和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思想宣传阵地。为此,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的领导,围绕工作机制、队伍建设、督导管理等方面任务建立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运行机制,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将理论宣讲与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即一方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将党的声音送到群众身边;另一方面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组织志愿者深入村、社区,开展代购代办、医疗保健、维修家电、关爱残疾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实现思想宣传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有机统一。

4.4 发扬斗争精神,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观点和错误言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一一直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不断斗争中开辟前进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要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22]363} 应该看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多样杂陈。在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一定范围滋长蔓延。为此,要求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各级宣传部门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努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斗争意识,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发声亮剑,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总之,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3]435} 党的思想引领力既取决于思想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依赖于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征程上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宣传工作要求紧紧抓住意识形态责任制这一总抓手,将加强理论政策宣传与创新宣传思想的方法载体、正面宣传与破除错误思想观念、线上与线下、思想宣传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让党的思想理论真正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

5 加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要求做好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通过构筑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并且随着国家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党组织需要同时承担来自上级党政部门和基层群众的双重压力。所有这些都要求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加大群众工作力度,在创新群众工作中践行党的宗旨、落实党的政策。

5.1 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机制,推动群众工作制度常态化

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从“路线”走向“实践”的“转换器”。群众工作机制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推动“转换器”有效运转乃至高效持久工作的重要手段。新征程上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机制需要做到以下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健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包括完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度、领导干部基层挂职锻炼制度等。二是拓展群众反映利益诉求渠道。基层党组织要采取“敞开门来听”与“走出门去问”相结合的形式,通过市民热线、民情网、领导信箱、公开电话、网络舆情、定期走访等途径,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同时要严格执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梳理、归类、分析,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回复。三是完善群众矛盾调处机制。利益关系多样化的今天,群众矛盾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面对复杂多样的群众矛盾,要着力构建“党建+矛盾调处”工作体系。基层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排查各类隐患和潜在的矛盾纠纷,及时掌握和发现不稳定苗头和不安定因素。为了有效推动群众矛盾解决,基层党组织还需要积极推动建立乡镇(街道)、村(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机构,积极引导各类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进驻调解机构,受理、分流、指派、调处矛盾纠纷;对于调解不成功的,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对于一时无法及时化解的矛盾,要定期走访,争取群众的理解和信任,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5.2 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评价考核机制

评价是检查、监督,也是导向。建立健全基层群众工作考核机制有利于形成党的群众工作的“指挥棒”和“助推器”。就当前来说,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考核机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考核指标的内容上,要将群众工作制度建设情况、落实党和政府惠民政策、落实群众工作纪律、开展便民服务情况、群众矛盾调处机制完善度、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考核内容。二是在考核方式上,上级考核部门除了要查阅资料、翻阅台账、考察群众工作制度完备情况之外,尤其要注意深入群众,听取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的评价,开展党委(党组)成员的民主测评等。三是在考核结果运用上,要将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干部选拔任用、激励约束紧密挂钩,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3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工作有效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是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工作,关系群众最切身的利益,涉及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时代推动群众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效结合不仅有利于创新党的群众工作,也有利于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就当前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拓展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基层党员干部要树立民主协商意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搭建党组织领导下不同形式的协商议事平台,如村(居)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民情直通车、居民论坛等多种民主形式,拓展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渠道。同时要采取措施完善民主协商议事机制、民主协商结果反馈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各项协商成果落地有声。二是积极探索“党建+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基层党组织需要自觉将党的建设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带动基层服务体系建设”^[24]。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将党的组织体系嵌入网格治理单元,形成党组织体系和网格化治理体系“一张网”;另一方面要将党的服务工作融入网格,通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健全党员“双报到”^①机制,构建“党建+志愿服务”工作格局,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化为民服务效应,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同时为了更有效开展服务群众活动,还需要利用信息化手段,尤其是充分利用智慧党建 APP 等载体,党员可线上报到,主动认领志愿服务,推行群众“点单”、平台“派单”、党员“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水平。

总之,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从“路线”走向“实践”的“转换器”。加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既要通过完善群众工作机制、评价考核机制推动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又要依据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求,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6 结语

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党自身的优良传统。党的五大党章明确了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更明确提出要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25]447}。之后,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提法开始在党内外广泛使用,并得到全党的认同。

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之治”优势更加凸显,同时也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征程上“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4]26}。所有这些要求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4]26}。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然要求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战斗堡垒”意味着党的基层组织不仅自身要坚强有力,更要强化自身落实党的领导的政治功能;不仅要着力提高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还要使自己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① “双报到”是指单位党组织到驻地社区报到、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进而服务基层社区与群众。

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树立整体思维、系统推进,尤其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二是着眼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执行力;三是加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四是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严密基层党的组织体系是基础,没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四力”就无从谈起。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居于统领地位,能否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在基层能否得到落实,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实践效应。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本身构成基层党组织“四力”的重要内容,但其意义又不局限于自身,对于提升党的政治引领力和号召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李磊. 新时代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探论[J]. 理论导刊,2022(6):26-34.
- [6] 孙林.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路径探析[J]. 理论视野,2021(6):79-84.
- [7] 李俊斌,冉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论析[J]. 党政研究,2021(3):48-58.
- [8] 常亮,杨春薇. 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和突出政治功能的路径探析[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2(5):74-82.
- [9] 周永伟,李彦霖.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宁夏社会科学,2023(2):66-73.
- [10] 易新涛.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定位、逻辑和路向[J]. 探索,2023(1):89-101.
- [11] 徐丙祥. 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思考[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4):25-32.
- [12] 文丰安. 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1.
- [13] 丁向群.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努力把基层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J]. 党建,2020(7):10-11.
- [14] 邓正阳,向昉. 从政党重塑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透视[J]. 社会主义研究,2021(5):132-140.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6]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2022-06-30.
- [17] 高晓昀. 产业链党建助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J]. 党建,2023(3):52-54.
- [18] 洪放. 党群结“缘”聚人心[N]. 安徽日报,2018-07-05.
- [19]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 蒯正明.村(居)民自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23(3):19-25.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Strengthening the “Four Forces”: A Practical Approach for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trong Battle Fortress

KUAI Zhengming¹, MA X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the “last mile” in implementing the decisions and deploy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strong fighting fortresses requires efforts to enhance their politica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leadership, mass organizing power, and social appeal. Strengthening the “four forces”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s not only the proper meaning of building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strong fighting fortresses, but also its important goal. At present,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four forces”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first i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The second is focusing on implementing the Party’s line, principles, policies, decisions and plans, and enhance the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third is strengthening the primary-level propaganda ideological work, and strengthen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fourth is improving the mass work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ir mass organizational force. The above four aspects are interconnected, interactive and complementary, forming an organic whole. A sou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and execu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mass organizations is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tica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leadership, mass organizing power, social appeal

责任编辑:牟 怡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张贤明,段卓廷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国家安全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的系统工程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保证作用,为自下而上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夯实方向指引、活力之基、稳定之源;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着力突出人民群众的参与,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坚持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依靠专业社会组织的全过程嵌入,实现精细化治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其有助于及时发现安全风险点,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总的来看,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讲求合作的“协同治理”、讲求高效的“敏捷治理”以及讲求覆盖全局的“整体性治理”。在“三治”合一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构建,也为国家安全夯实社会基础。

关键词: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党建引领;公众参与;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3)03-0102-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52}。国家安全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斥着复杂性的社会,不确定、不稳定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人们虽然生活在一个繁荣且富足的环境中,但也同各类安全风险相伴而行。因此,现代性下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不安全中寻找安全的过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国家安全的范畴已经超越了狭义层面的理解,构成了系统化、整体性的“大安全”问题。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政治学的视域下,国家安全建设的系统工程要以分层的视角切入,着眼于治理体系、聚焦于治理机制,提出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应该遵循国家治理的一般思路,从顶层和基层共同发力,打造一个纵向互联互通、横向相互协同的国家安全治理格局。

基层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防线。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基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大强调,“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以及“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2,54}。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共同体的意蕴相结合,创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体系与方法。基于此,社会治理共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与推进路径研究”(21AZZ007),项目负责人:张贤明。

作者简介: 张贤明,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段卓廷,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

体是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国家安全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那么,如何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又体现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何种思路和方法,是当下亟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1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共享”中的“共”并不是机械的聚合,而是在特定主体引领之下多元主体的有机整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前提在于党建引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视察时强调:“社区工作很重要,一是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二是要抓好服务,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要以问题为导向,力争实现各种服务全覆盖,不断满足百姓提出的新需求。”^[2]在基层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也是新时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中之重。

第一,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党建引领,有效解决了基层资源整合与动员问题,是从“凝聚党心”到“汇集民力”的基本思路,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空心化”的结构性梗阻。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工作方法。“支部建在连上”是保障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能力、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例如,对于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就曾号召:“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3]348}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在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体现为资源整合与有效动员的能力。随着社会的深刻转型,原有的基层治理制度随之解体,如何保障“破”与“立”的有效衔接,防止基层治理陷入空心化、碎片化的窠臼,是基层治理亟须面对的问题。反面经验表明,由于基层党建的缺位和基层党组织一定程度的弱化,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内在驱动不足,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方面的动员能力下降,导致基层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基层党建的战斗堡垒作用不仅难以发挥出来,基层人心涣散也严重削弱了人民群众生活的获得感与保障感^[3]。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人人有责”意味着“治理”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偏好和需求中凝聚社会治理共识,如何将原子化的社会关系重新组织到一起,聚沙成塔般整合基层群众的力量,就成为基层治理的首要问题。

有效的治理需要特定的目标指引和明确的原则遵循,党建引领的根本价值之一就是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通过“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整合多元主体的力量,将多元主体的观念统合到治理的集体行动上。其一,党建引领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统一的价值。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制度执行,统一协调的观念是机制设计科学性以及集体行动有效性的重要基础。从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来看,党建的目的在于用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实现三者的统一^[4]。在党建引领之下,基层的多元主体能够在治理活动中拥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遵循的原则,将碎片化的社会观念重新聚合在一起,把基层群众的思想统一到社会治理的愿景中来,使基层群众能够明确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二,党建引领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平台。任何治理活动都需要特定的制度载体,在基层场景中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也必然依靠特定的制度机制。多元主体的合作有赖于持续有效的沟通对话。在党建引领之下,党组织通过设计与提供各式各样的对话平台来保障多元主体的有效沟通,例如社区内部的议事制度、协商平台以及区域化党建平台等,都为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

和协商治理提供了相互协调、凝聚共识的载体。这些各具特色的制度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形式运作,有效培植了基层社会的社会资本,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合力。

第二,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社会场景中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分散有效赋权之间的关系。同国家治理一样,基层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微观层面的治理更要讲求精细的科学方法,实现治理技术和治理艺术的高度统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现了整体性建设和系统性建设的方针和思路。所谓整体性建设,就是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目标和整体性责任,实现基层分散的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统筹与分配,在社区、单位、行业中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形成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格局^{[6]3-4}。所谓系统性建设,就是多元主体在统一目标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功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分散赋权中发挥不同主体的“个体性责任”,实现自身功能与特定治理场景及治理问题的高度适配。党建引领下的分散有效赋权强调了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在协同中“涌现功能”的重要价值,多元主体在不同的治理问题和治理场景中切实发挥功能,适当转变角色,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在协同与协商中共同解决问题。

集中统一领导和分散有效赋权共同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韧性”。现代社会的风险往往是不确定的,因而基层社会治理所嵌入的环境处于变动之中,时时刻刻面对着偶发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社会的风险治理强调社区应具备一种“社区韧性”,既表现为多元主体所构成的具有适应性、灵活性的关系模式,也表现为面对特定风险时所彰显的协同能力^[7]。在中国特殊的基层治理场景中,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调适需要在特定主体的协调之下达成,因此党建引领的社区韧性建设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的必由之路。党建引领为社区韧性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并有利于推动完善社区韧性治理体系、培育社区成员公共精神以及创新社区韧性治理工具^[8]。党建引领通过集中领导和有效赋权增强了基层治理体系的灵活性,契合了韧性能力的核心要素。在集权和分权的平衡中,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制度能够有效地适应不同治理情境和治理环境,既保障了多元治理主体在资源整合、力量协同、角色互补中共同面向特定的治理目标,又能够使得不同的治理主体根据充分有效的赋权并基于自身的职能参与到特殊问题的回应当中。这体现了基层治理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方法,有效规避了基层治理中制度僵化导致的资源浪费。

总的来看,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一种“政党建设社会”的思路^[9]。这是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法,也是构建和谐国家—社会关系的价值遵循。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充分嵌入,能够将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传导到基层社会当中,以党组织的政治与社会整合能力带动基层社会的资源整合与力量整合,有利于将基层社会力量统合到治理的统一目标之下,理顺人人有责的基本关系,为共同体建设强基固本;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充分嵌入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员行动者的作用,在党员尽职履责的示范中影响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行为。换言之,在党员“人人尽责”的带动下,基层社会能够营造出一种共同尽责的良好风气,基层的社会成员在公共精神的牵引之下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基层治理的各项工作。如此,不仅在协同中提升了公众对基层治理各项制度和安排的认同,也让公众在“人人尽责”中实现了“人人享有”,在提升共同体“温度”的同时夯实了共同体中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

2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广泛参与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如何体现“共同”。社会治理的动能在群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靠群众^[10]。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本要求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旨在突出人民群众的地位和功能,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中打造一个群防群治的安全体系。这不仅是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坚持的基本方略。

从历史来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成功密码之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1]376}“放手发动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工作方法和治理策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哪一个领域的治理,都不能将群众参与排除在外,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有赖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在群防中实现群治。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宗旨^[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13]18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之后,面对的最为复杂的城市管理任务就是维护城市安全,防止残留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同时保障城市管理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这一时间,群众路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是有了党的统一领导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有效打击了敌对势力,保障了城市的安全稳定,为城市的各项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在群众路线之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建设得以不断推进,不仅在重新确立城市秩序的基础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为党的城市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安全局势的复杂化,人民群众更应该在国家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整体审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集中表现为公众参与平台建设,公众参与的有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探索,社区协商的渠道、方式与规则等方面的创新。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鲜明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广泛参与强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基础。国家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具有充分的治理信息以供决策参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何治理的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操作性问题,具体的治理实践是从处理信息开始的,也体现为不同形态和信息的内容,信息的处理及其利用决定了治理是如何运行的,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14]。尤其对于各项安全治理议题,信息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社会治理领域,一些社会安全问题具有潜伏性特征,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到这些社会风险的信息,就可能会造成风险的发生与扩散。因此,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正是通过公众来弥补治理中的信息盲区,构建社会治理的信息基础。情报学研究指出,在社会治理中,公众具有良好的全源情报功能,作为社会安全的“眼睛”,公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身边的安全风险点,并且反馈到治理议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安全的“源头治理”。进一步讲,公众作为基层空间的重要主体,对自身生活空间的地理环境、人口构成、人际关系等信息有着最为直观和充分的了解,因此,公众对基层已然发生或者潜在的异常状况有着最为清晰的感知。在公众广泛的信息提供之下,治理主体能够进行有效的循证决策,针对特定的安全风险点或者安全

问题进行精准把握与精准回应^[15]。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这意味着基层群众都有义务参与到风险防范和回应当中,并与有关部门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参与就是构建一个基层社会的“安全情报网”,实现基层社会安全的“自我保护”以及“非正式的社会控制”^[16]。

第二,通过公众广泛参与分担社会治理的工作成本。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在治理过程中,“共同性”不仅体现在公众彰显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权利中,也体现在公众对治理成本的分担上。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旨在化解党组织和政府“独木难支”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如果将社区内的安全问题都传导到公共部门,那么在人多事杂的情境中,公共部门不仅会疲于应付,也会在繁复的治理工作中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发动人民群众就意味着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放心交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通过协商等方式化解矛盾;人民群众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通过特定的信息反馈渠道交给有关部门。对比来看,国外的社区警务工作强调构建良好的警民关系,例如在打击社区犯罪的行动中,社区中的多元主体要和执法部门相互配合^[15]。我国的“枫桥经验”同样表明,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关键要靠人民群众自己。“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创造性地建构和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把复杂的社会需求及个别化的社会行为妥帖地整合到国家总体秩序安排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于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其蕴含的基层治理内在机理在于构建国家权威主导下的多元基层治理体系^[17]。简言之,在公共部门和公众的合作中夯实基层社会安全的基础防线,不仅是基层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的有效融合,也是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必由之路。

总的来看,构筑广泛参与的基层安全防线,本质上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众参与对维护公共安全、应对和预防安全风险非常关键。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13]156}为了让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行之有效,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多元主体和谐的伙伴关系以及拓宽公众低成本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塑造公众对基层各项工作的认同度,让公众能够在真实有效的参与中提升参与效能,实现参与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参与渠道有利于高效率地将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所见所闻整合到治理议程中,保障基层政治沟通的有效循环,在信息的高效“输入”和治理效能的切实“输出”中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合作格局,切实地将人民群众的优势发挥出来。

3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社会组织嵌入

基层社会中的安全问题具有密集性、多元性、专业性等特征。一旦不能科学精准地回应这些问题,那么风险就会沿着治理体系向上扩散,或者横向跨域传导,进而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失。在多而杂的基层事务中,治理议题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公众的利益诉求也愈发多元化。由此,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强调“精细化”,在场景特殊性的基础上夯实治理的专业性,在专业知识的支持中寻求治理的最优解。在这个意义上,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依靠专业社会组织的全过程嵌入,在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治理议题的专业性中实现有效适配,以精细化治理的模

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已经形成了各具功能的多元模式。这本质上体现了在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基本要求下,社会组织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的优势塑造了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专业服务为支撑、以有效治理为目标的政社合作网络。然而,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契约层面上的合作,而是深层次的嵌入与全过程的参与。一方面,社会组织要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基层的日常生活当中,基于自身的专业性解决基层社区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社会组织还要根据自身对基层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各项事务的决策中来,为基层治理提供专业化的意见,提升基层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从目前社会治理的案例来看,社会组织对于构筑基层安全防线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提供各类服务来修复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例如,社会组织可以调节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参与安全风险沟通、协助维护社区内部治安等,在构建和谐稳定基层秩序的基础上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简要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发挥取决于如下两条基本原则。第一,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目标在于“嵌入”,而嵌入的前提条件在于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社区的特定问题。例如,我国一些地区的基层治理面临较大的综合治理压力,尤其在一些“三不管”地区,基层矛盾纠纷频发。故而,这些地区的基层社区开始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方法,引入以人民调解为职能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当中,为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协调邻里纠纷等。如此,不仅塑造了基层社区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从侧面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这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已然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助力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18]。第二,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新问题的出现,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的基层治理需要某种“适应性”。这意味着基层治理新问题出现后,要有能够适配该问题的专业化组织,实现基层治理对外部环境的动态回应。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由于公众在疫情期间易产生各类心理问题,一些社区开始引入以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为主要职能的社会组织或者专业社工人员,参与到社区居民的心理疏导工作当中,有效缓解了社区居民的情绪,也在风险沟通中带动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疫情防控事务^[7]。《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9]¹⁵。为了保障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根本的举措在于构建良好的国家—社会关系,打造以国家权威为主导、以治理问题为导向、以特定场景为行动界限的社会组织参与模式。

其一,以国家权威为主导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合作模式。国家权威主导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设定了基本的规范和目标,是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的基本保障。但这种主导模式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要成为公共权力的“附庸”,而是在公共权力充分授权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提供公共服务。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超越了西方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在“强政府”与“强社会”的格局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深度合作,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目标^[20]。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的生长有赖于相对开放与稳定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对功能完备、服务有效的社会组织给予适当的政策与物质支持,推动社会组织的高质

量发展;社会组织也要履行好合作的角色,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中协助国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

其二,以治理问题为导向是精细化治理的必然要求。精细化治理聚焦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改进和质量提升,通过各个领域工作业务流程优化、管理服务方式转变等机制创新,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和行为服务的满意度^[21]。无论是政府治理还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前提都在于精准回应公众的各项需求以及准确把握面对的治理问题。基层治理并不是要将各类社会组织无差别地吸纳到治理过程中,这种思路本质上也同粗放式管理并无差异。精细化治理要厘清基层社会所出现的特定问题,进而引入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来看,“项目制”已经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的重要方法。基于特定的治理问题和治理需求,基层通过委托授权和外包机制引入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基层治理中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精准有效地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也能够帮助基层政府分担相应的治理成本,使其从繁复冗杂的基层公共事务中脱身而出,集中精力解决重要问题^[22]。项目制有利于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第一,在政社合作中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优化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第二,给予社会组织充分的履责空间,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效能,有利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的深层次嵌入;第三,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组织进行低成本的监管与评价,保障社会组织能够始终合理合法地运行在公共服务的轨道之上。

其三,以特定场景为行动界限在于划定社会组织的服务范围,为社会组织减轻治理成本,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的聚焦度。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要以特定的场景为界限,即针对特定的社区提供服务。为社会组织的行动划定范围,并不是限制社会组织职能的发挥,而是为了保证社会组织能够聚焦于某一场景,全身心投入针对特定对象的服务当中。一般来说,社会组织的规模较小,人力、物力、财力也极为有限,如果将社会组织的服务范围无限扩大,反而会将社会组织拖入疲于奔命的困境中,不利于社会组织实现基层的精细化治理。因此,基于特定场景的服务有利于为社会组织减少治理成本。与此同时,聚焦于特定场景也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和基层公众之间的互动,培养社会组织对基层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强化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感。有研究指出,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同是社会组织得以在社区中长期延续的根本。社会组织只有精准地回应公众的需求、满足公众的需要,才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同,使社会组织深度嵌入基层。相应地,社会组织也会在“嵌入”中表现出对社区的归属感,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服务的积极性^[7]。

4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技术赋能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3]⁶随着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建设”的提出与落实,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要将技术治理、数字治理等价值和手段整合其中,要求加快精细化、专业化以及智能化的治理步伐^[24]。对于提升基层社会的安全水平来说,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有助于及时帮助治理主体甄别与发现安全风险点,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

安全风险治理是一个贯穿于事前、事中与事后,以及整合预防与应对的链式结构^[25]⁷,低成本、高效能的安全治理在于精准的事前防范、科学的事中应对、及时的事后总结。其中,对于数

据的使用至关重要。第一,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海量的数据,有效利用数据是循证决策的核心基础。通过对各类数据的整合与分析,能够为识别安全风险点提供参照。在情报学中,对分布在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上的各类开源情报进行搜集与利用,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决策的重要依据,一些案例也显示,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风险,防患于未然^[26]。在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中,一些社区开始重视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例如根据社会矛盾案件分析区域社会矛盾的集中风险点,进而未雨绸缪,提前将社会风险点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物理距离为治理带来了相应的限制,在权力、资源、信息等治理要素存在一定物理距离的情况下,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可以使要素流动的速度加快。因此,信息技术可以将科层制结构变为扁平化的结构,极大地缩短沟通时间,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例如,很多社区引入线上反馈的程序,公众可以足不出户地将遇到的矛盾纠纷或者安全风险反馈给相关部门,推动相关部门的及时响应^[15]。第三,目前的安全问题呈现出跨领域的特征,这意味着一项安全问题可能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在跨域中生成并存在着跨域的影响。在这种事实之下,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平台、不同主体的数据能够在相互融合中为识别与应对跨领域的安全问题提供助力,实现安全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虽然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助力,但由于体系结构、治理流程以及技术本身等原因,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仍存在亟须破解的梗阻,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制于治理体系仍存在碎片化的事实,数据与信息的使用难以形成协同机制,“数据孤岛”削弱了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能力,降低了信息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为此,应尽快建设基层治理的数据共享机制,将“数据孤岛”连接起来,为治理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虽然目前治理体系中的各个单位都开始强调信息化建设,但治理体系中“条”与“块”的协同能力仍有待提高。这种关系导致信息的联动能力不强,降低了信息的使用价值。有鉴于此,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才能够激发出数据的价值,其中“协同”是数据分析的重中之重。一方面,碎片化的数据可能仅仅提供了某一安全问题的侧面,只有将碎片化的数据整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对某一安全问题的完整认识;另一方面,协同的数据搜集和分析有利于打破数据分析之间的认知偏见,提升信息的相关性与可用性,保障分析出的信息能够真正地用于回应特定的问题^{[27]293-298}。从当下的现实来看,数据共享的平台和机制缺失是导致基层治理“数据孤岛”的重要原因,虽然有的职能部门已经愿意进行数据共享,但是尚未建立相应的数据共享制度规范以及数据共享交换的信息化平台,导致各个部门对于信息的使用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28]。

第二,在路径依赖之下,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着对信息技术的认知程度不足等问题,导致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沦为形式。故而,提升技术赋能水平的关键在于转变认知,真正地将技术“用起来”。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在于“有”技术,而在于“用”技术。在实践中,虽然一些社区引入了智能化的工作手段和工具,但由于对技术价值的认知不足以及技术使用能力弱等问题,这些技术手段与工具更多成了摆设,未能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治理工作中。与此同时,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中,一些基层政府普遍重立项建设、轻运行维护和推广应用。为了满足数字化的考核目标,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信息系统,并且这些信息系统类型复杂、功能重复。有学者指出,在改革任务下压和各部门信息化系统泛滥的作用下,考核任务不

断被指标化、数量化,基层政府为了应付检查而编造数据、捏造材料,于是便出现了政务 APP 上“考勤打卡”,基层干部走访“先拍照、找信号”的闹剧^[29]。因此,提升技术赋能水平,关键要提升技术应用主体和客体对技术的“体验感”。以我国某些地区的政务微博使用为例,当政务微博真正能够成为公众及时反映问题以及政府回应问题的平台时,政务微博才展现出了真正的价值,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工具^[30]309-313。而将技术用到实处,还需要治理主体及时转变思维,善懂技术、善用技术,打破技术的“形式主义”,让技术赋能社会治理。

第三,数据安全仍然是数据使用的棘手问题,为此不仅要提升数据安全技术保障能力,而且数据使用要恪守相应的法律和伦理,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前提,防止数据泄露对公众权利的损害。数据应用要以维护安全为目标,不能将数据沦为造成安全风险的源头,因而在数据使用的过程中强化数据安全,是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中之重。当下治理中的数据安全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一些掌握公众数据的平台未能履行数据安全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里,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23]22 以我国对滴滴公司的处罚为例,根据国家网信办的调查,滴滴公司共存在 16 项违法事实,包括过度搜集用户信息,对数据进行不合理的分析等^[31]。另一方面,数据的储存与使用存在安全漏洞。例如,在我国政府的数据安全治理过程中,算法风险成为数据安全治理的关键。当前地方政府更多关注大数据发展与数据安全,尚未有单独的政策提及算法安全^[32]。基于上述问题,其一,要完善数据搜集与应用的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加强数据搜集与使用的监管制度,形成数据平台履行社会责任的倒逼机制;其二,要限制政府、企业平台数据采集范围,严格根据法律保护公众隐私,使数据采集流程透明化、数据采集权责规范化;其三,要完善网络数据监管平台,强化各网络运营平台和监管部门数据实时往来,以安全的环境为治理提供保障^[33]。

5 结语

“共同体”既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整合了多元主体协同、人民群众与社会组织参与以及信息技术赋能等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讲求合作的“协同治理”、讲求高效的“敏捷治理”以及讲求覆盖全局的“整体性治理”。其一,协同治理不仅意味着不同主体的合作,更意味着不同主体在合作中能够涌现出新的功能,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在党建引领下,人民群众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统一目标之下凝聚共识、有序分工、相互配合,能够形成治理最大的合力、最明智的决策以及最优质的结果。其二,敏捷治理讲求敏锐感知、高效响应和灵活管控。在平台、过程、场景的搭配中,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的场景中通过精准识别治理问题,协同合作解决问题,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实现问题的最优解决,彰显了公共服务的效能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其三,整体性治理强调了社会治理中应秉持系统思维,要全方位地搜集问题、整理问题,全覆盖地整合解决问题的各类资源,以及全链条分析问题的解决对策并加以落实。在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中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最大化。简言之,在这种“三治”合一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构建,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得以夯实。面对新时代复杂的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政治学对于国家安全的研究要立足时代特征、把握安全规律、夯实理论

根基、创新研究方法,在锚定学科特色、整合多学科资源的基础上,从宏观处着眼、在微观处把握,在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结合中共同回答国家安全的时代之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EB/OL]. (2016-02-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3/c_1117985476_3.htm.
- [3] 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 曹海军.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 政治学研究,2018(1):95-98.
- [5] 陈亮,李元. 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 探索,2018(6):109-115.
- [6]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7] 张力伟,高子涵. 人心与治理:如何通过提升社区温度塑造社区韧性?——基于D社区的个案研究[J]. 社会政策研究,2022(3):94-110.
- [8] 王杰,陈义平. 新时代推进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与议题聚焦——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考察[J]. 湖北社会科学,2022(5):57-63.
- [9] 汪仕凯,王冠亚. 超大规模政党的建党逻辑: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共同推进[J]. 中国治理评论,2019(1):97-110.
- [10] 张贤明,张力伟.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逻辑、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J]. 理论月刊,2021(1):61-68.
-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2] 唐皇凤,杨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J]. 江汉论坛,2022(7):5-1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4] 韩志明. 国家治理的信息叙事:清晰性、清晰化与清晰度[J]. 学术月刊,2019(9):82-94.
- [15] 张力伟,胡玥,卢婷. “5Is”框架下的社区社会安全情报网——理论模型与案例检验[J]. 现代情报,2022(12):109-116.
- [16] 张丽娜,孙书琦. 超大城市基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困境与提升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的调查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1(12):142-147.
- [17] 李振贤. “枫桥经验”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模式[J]. 云南社会科学,2019(2):47-54.
- [18] 张力伟,肖晨卉. 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综合治理的模式、问题与优化——基于深圳市ZH组织的个案分析[J].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18(1):262-274.
- [19]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0] 杨立华. 建设强政府与强社会组成的强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目标[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6):57-62.
- [21] 蒋源.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社会治理转型的机制性转换[J]. 云南社会科学,2015(5):6-11.
- [22] 尹广文. 项目制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3):127-133.
- [23]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4] 徐顽强.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构建路径[J]. 求索,2020(1):161-170.
- [25] RENN O. Risk governance: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world[M]. London:Earthscan,2008.
- [26] 胡雅萍,洪方. 社交媒体情报研究[J]. 情报杂志,2018(3):15-21.
- [27] CHEN H, RAGHU T S, RAMESH R, et al. Handbook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national security[M]. Boston:Elsevier,

2007.

- [28] 赵欣.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优化策略[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5): 80-89.
- [29] 文宏. 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与挑战[J]. 国家治理, 2020(38): 11-14.
- [30] 侯镔. 问政银川: “互联网+社会治理”方法论[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5.
- [31] 16项违法事实 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处以80.26亿元罚款[EB/OL]. (2022-07-21).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2/07-21/9808616.shtml>.
- [32] 马海群, 张涛. 我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 特征及对策[J]. 电子政务, 2023(3): 118-128.
- [33] 黄未, 陈加友. 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J]. 改革, 2022(11): 144-155.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Social B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ZHANG Xianming, DUAN Zhuot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bedrock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current complex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systematic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should be enhanced by diverse aspects.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which everyone fulfill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shares in the benefits is the social b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Firstly, Party-leading is a political insurance for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forms the direction, vitality and stability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Secon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ought to focus on public engagement. This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summariz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 fundamental strateg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irdly,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also dependent upon the whole-process embeddedn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iming to achieve the targeted governance. Fourthl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in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can assist to find the risk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sum,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tegrates the valu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gile governance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In this way,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can be built, and the social b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enhanced spontaneously.

Key words: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national security, Party-leading, public engagement, empowerment of technology

责任编辑: 赵 超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锁利铭,丁凡琳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双碳”目标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与区域治理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要求。公共机构率先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减量、带动与政策效应。当前公共机构在节能降碳过程中存在地方性权责与测算标准尚不明确、地区间治理成效差距较大、数据与信息共享不足、示范带动效果尚未显现等现实困境,结合“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新要求,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存在“央地—部际—区域—主体”多重协同机理。在“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可通过整合权责以统筹协调降碳行动、弹性协作以搭建政策协同平台、促进数据共享以完善区域治理网络、公私合作以提升降碳协同效能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助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增效提质,实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带动。

关键词: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低碳治理;绿色低碳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113-13

通过节能降碳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中国为此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围绕“双碳”的战略及政策。2021 年 3 月,“双碳”目标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10 月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了中国各阶段的降碳指标,体现出中央政府实现“双碳”目标的决心。

公共机构作为能耗综合体,碳排放产生量仅次于工业、建筑和交通产业,是中国节能降碳的主要阵地之一^[1]。各级党政机关作为公共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能源的消费者,还承担着环境政策制定、执行与监督职能^[2]。2020 年,全国公共机构约 158.6 万家,人均综合能耗 329.56 千克标准煤、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18.48 千克标准煤、人均用水量 21.53 吨,与 2011 年相比分别下降 24.12%、20.75%、28.07%,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3]。2021 年 11 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印发《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公共机构年度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1.89 亿吨标准煤以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 4 亿吨以内,

基金项目: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项目“公共机构低碳协同发展:功能定位、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F3005062),项目负责人:锁利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重异质下产业转移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影响机制与协同治理研究”(22YJC630018),项目负责人:丁凡琳;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面向网络型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机制、结构与模式创新研究”(ZB21BZ0219),项目负责人:锁利铭。

作者简介:锁利铭,男,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凡琳,女,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在2020年的基础上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碳排放下降7%,并提出创建和遴选公共机构绿色低碳示范单位的规划。该《方案》的实施,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公共机构节能降碳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以公共机构低碳发展引领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要求和现实可能。“十四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公共机构作为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在资源高效利用和低碳治理中的实践措施与机制选择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区域低碳治理协同体制机制建设等,均具有指导性意义。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国内学者近年来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多元性研究,通过与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分析,探讨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存在的困境与解决路径^[4]。有学者认为,当前政策主体间利益规制协调不足、制定与执行存在偏差等是制约低碳协同的主要原因,气候环境类公共问题的有效处理和解决,有赖于政策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互补、合作,以及政策之间的协同聚合^[5]。与理论研究相比,实证分析则主要聚焦于对碳排放现状与成因的描述,以及对节能降碳类政策的效果性评价。目前,对碳排放规模的测算以基于能源消费量估算的碳排放系数法^[6]或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模拟法为主^[7]。为了便于监测与分析碳排放变动,中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CEADs (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for Emerging Economies)数据库,向全社会共享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多个层面的碳排放测算数据,以供国内外学者直接用于对其变动成因、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此为基础,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在中国得以验证^[8],并得出经济集聚、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优化等效应能够起到显著的降碳增效作用^[9]。政府行政干预行为的降碳效果也不可忽视^[2],碳排放权交易、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等被证实有助于区域低碳发展^[10]。

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机构在“双碳”目标实现中的直接或间接作用逐渐引起学者关注。虽然早在“十二五”规划中便提出公共机构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但由于能源消耗低估、思想意识偏差和运维管理能力不足等原因^[1],其在现实中的实践效果差强人意。“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机构赋予了新的使命,即在完成自身节能降碳规划的同时,其技术应用、治理模式或协同机制等将对全社会低碳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于公共机构的特性与职能,不同国家的释义不一,主要体现在公共机构所承担的职责、包含的主体及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但整体而言,公共机构在公共事务中均起到中介职能,以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2008年颁布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指出,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各级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既是能源资源的消费者,也是生态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其功能定位决定了公共机构在低碳发展中需起到示范性作用,并将自身节能降碳实践作为政策制定、制度完善和考评标准制定的依据。

诚然,针对碳排放及其减排路径的研究在中国已日趋成熟,但所提出的降碳机制或措施仍聚焦于对生产端的企业或消费端的居民等主体的能源消耗进行控制。即通过分析产业或居民碳排放的成因,倒推出抑制源头碳排放、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对策,并据此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加清洁能源对高碳能源替代^[11]、鼓励企业低碳创新^[12]、引导居民形成绿色低碳消费意

识^[13]等措施。然而,公共机构作为能耗综合体、碳排放“大户”^[1],却鲜有研究关注其在“双碳”目标下的节能降碳行为、实施效果以及对整体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方案》的出台为契机,将“双碳”目标的研究视角由私人部门转向公共机构。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究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其次,结合中国公共机构能源消费现状,分析其节能降碳管理的新职能与实施困境;最后,通过网络化思路归纳各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与纵向协同机制,探讨“十四五”期间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跨区域协同机制,为推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政策优化方向。

2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

公共机构的职能定位与社会影响决定了其节能降碳工作的推进,不仅会引起当地能耗与碳排放总量的波动,还会影响当地乃至邻近省(区、市)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基于此,通过分析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对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改革方向进行指引和把控。

2.1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三重效应

基于公共机构内部角色多重性、主体多元性、作用重要性等特征,公共机构在完整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减量效应产生规模经济、政策效应驱动技术进步以及带动效应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等三重效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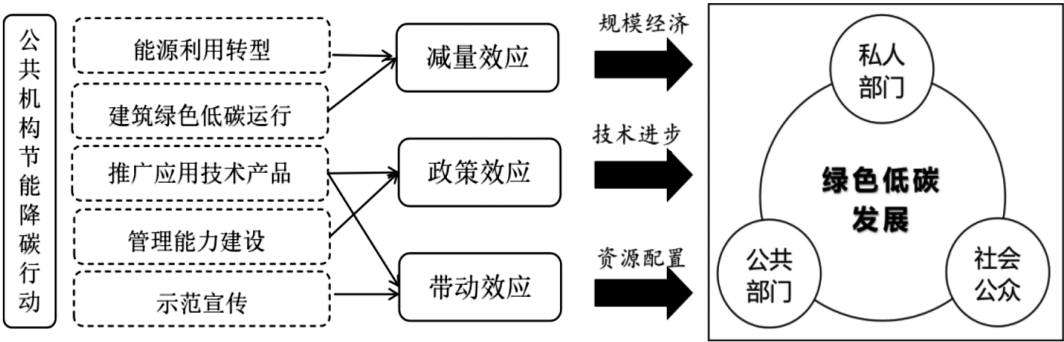


图1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三重效应

2.1.1 减量效应产生规模经济

公共机构处于能源消费端,主要能耗途径包括采暖空调及生活用水、照明、办公、信息机房和公车用油等,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和电力为主^[14]。作为能源消耗大户之一,通过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增加清洁能源替代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途径,均可以直接降低碳排放规模;而通过有效提高外购电力、热力等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进一步减少间接性排放^[15]。同时,公共机构也可以作为创新“试验田”,为检验与应用低碳类技术提供实验平台,筛选高效技术向私人部门进行推广。因此,在公共机构中率先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宏观上可以直接减少本地碳排放总量;中观上可以通过低碳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而产生规模效应,联动减少相关企事业单位的碳排放规模;微观上通过率先培养公务人员的绿色低碳意识,并通过日常生活与消费行为影响周围人群,

有助于形成降低居民消费能耗的规模效应。

2.1.2 政策效应驱动技术进步

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的政策效应,一方面以目标导向倒逼机关部门碳排放评价的标准化与低碳治理体系的健全化,另一方面以政策信号鼓励节能低碳类技术创新与研发,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积累技术经验。规范性制度和统一性标准可以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提供政策依据和评价标准,通过与原有节能政策的衔接与叠加,有助于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受到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政策效应影响,私人部门也会根据相关要求对自身碳排放行为进行调整,以尽快适应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加速推动区域低碳治理政策体系的形成。同时,公共机构可以通过率先使用并推广低碳技术、节能设备和新材料以促进技术进步效应,鼓励节能低碳类技术研发,扶持绿色企业发展,以“关键少数”为切口,带动社会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

2.1.3 带动效应促进资源配置优化

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公共机构是社会行为与公共道德的示范和标杆^[16]。由于政府行为规范对公众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17],因此公共机构在推进节能降碳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实施上可以产生示范引领作用^[18],为全社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培养公众绿色低碳消费意识树立典型和榜样。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带动效应,可以引领私人部门应用低碳类技术、引导居民低碳消费行为,从而产生资源配置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降碳的可持续性。政府机关通过集中采购绿色低碳类产品或技术,促进要素资源向清洁型企业优化配置。公共机构通过以清洁能源替代火力发电,实施建筑节能化改造、绿化环境营造和智慧化管理应用等项目,带头减少能源消耗、增加碳中和能力,推动要素市场能源结构优化。机关干部通过带头践行绿色低碳办公、资源循环利用等行动,向居民传播低碳生活理念,降低市场中的高碳产品消费需求。

2.2 “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职能创新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一般隶属于各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负责对本地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推进、指导、协调与监督。2021年发布的《方案》为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了使公共机构的减量、政策与带动三重效应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发挥,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在原有职责基础上还需承担低碳行动的统筹者、部门联动的协调者和区域协同的执行者等多重角色。

2.2.1 统筹节能降碳行动

《“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提出:公共机构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这就要求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推进过程中,机关事务管理部门需要规范公共机构碳排放的考评标准、健全法规制度体系,对各类政府机关、科教文卫体机构的节能工作实施统筹管理。同时,由于公共机构涉及行业领域广、机关部门多,彼此间的能源需求与消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保证节能降碳的实施效率,需要各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牵头,合理分配各单位的节能降碳任务,统筹利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并协助各类机构间的横向协调,通过统一的宏观调控对公共机构能源消耗进行总量控制。

2.2.2 协调部门间联动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涵盖文件宣发、联合行动、低碳技术共享和宣传活动等多个领域,需要多部门、多层级政府机构间的有效协同与配合。各层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在形成纵向对接的基础上,还需要与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等多类政府职能部门做好任务与权责的协调,在具体项目上形成有效对接,以此保证尽快推动节能改造、能源替代、电气化改造等试点项目落地、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与绩效评价标准,避免由于职能缺位而导致项目在地方无法开展,或由于对接不畅导致的“碎片化”管理。

2.2.3 增进区域协同

由于碳排放具有空间外部性^[19],地方上的节能降碳工作不能“各自为政”,在自我调节的同时,更需兼顾区域间的联动。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并非竞争关系,因此要避免“运动式”降碳导致的逆向选择,通过协调与合作,加强地方政府间技术与信息共享,最终实现区域碳排放的整体性降低。另外,各地区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基数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对于公共机构的节能降碳工作还要避免“一刀切”,需因地制宜制定阶段性指标,并通过地区之间的碳权交易与碳中和联动,以组团式协同降碳替代逐顶竞争^[20]。

3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现实困境

面对“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新要求,当前面临地方上的权责归属与测算标准不统一、地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基数差异大、地区间低碳技术与信息共享不足、公共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引领绿色低碳发展效果的发挥。

3.1 地方性治理权责与测算标准有待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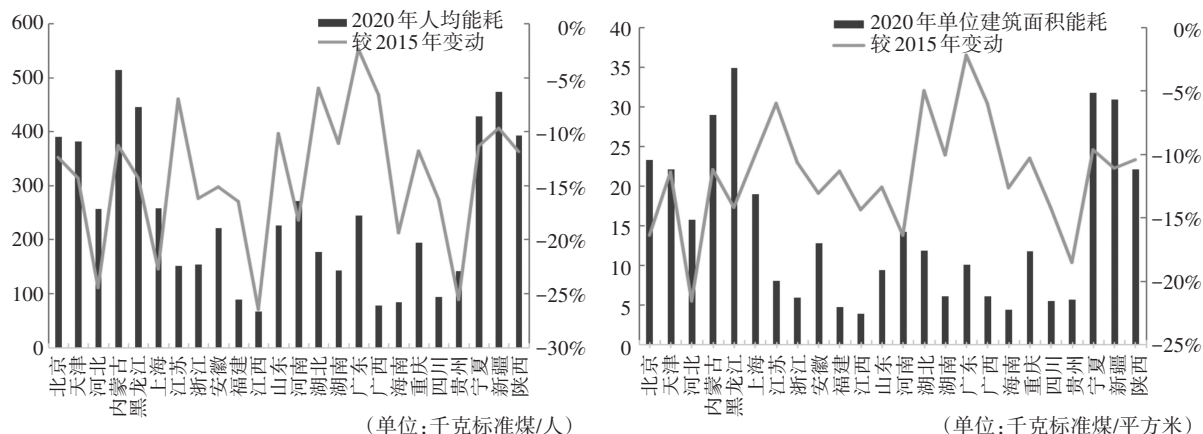
公共机构由所属部门机关管辖,而其节能工作则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组织与协调^[21]。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中易导致权力交叉或多头管理问题。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权责归属在地方上也不统一。虽然省级行政区均已建立地方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但由政府直属的占 80.7%、属行政单位性质的占 77.4%。其中,广东、西藏、青海的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尚未直接负责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地方上部门机构设置不一致,使得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各级机关事务管理的统筹难度增加。又因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所对接的部门不同,增加了节能降碳府际间横向协同的沟通成本。权责归属不明使管理效率受限,易导致相关项目无法及时对接与落地,或实施过程中产生责任推诿等现象,出现无处追责等问题。

目前,国内尚缺乏专门针对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的标准(或指南)。自 2008 年《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公布以来,虽然各级机关按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要求,定期逐级上报能耗统计数据,但其中并不包含碳排放相关数据^[15]。在各地区针对重点排放单位^①的碳排放核算中,公共机构中仅部分高等院校或场馆在列,其他类型公共机构尚未纳入,对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效果无法进行量化评价。同时,由于地区间碳排放核算指南对核算边界、核算范围、各类能源计算碳排放量的排放因子尚未统一,导致区域间数据难以进行横向比较。

① 指碳排放量在 5 000 吨/年以上的公共机构。

3.2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成效存在区域差异

根据“十四五”规划要求,以人均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作为评价标准,分析2015、2020两年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增效差异。从2020年24个省(区、市)公布的能源消耗数据来看,内蒙古、新疆等地公共机构能耗基数相对偏大,人均能耗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均位居全国前列(见图2)。黑龙江、北京、天津紧随其后,人均能耗均超过了300千克标准煤/人,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在22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以上。相反,南方省(区、市)公共机构能耗强度相对偏低,广西、江西公共机构人均能耗均低于90千克标准煤/人,海南、贵州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在6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以下。从节能成效来看,与2015年相比,2020年江西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幅为26.5%,阶段性节能效果较为明显;北京、贵州、河南公共机构建筑节能效果较好,降幅在16.4%及以上。而广西、湖北、江苏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幅均低于10%，“十四五”期间推进节能降碳仍有一定空间。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区、市)《“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中相关数据整理并绘制

图2 2015、2020年部分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指标变动情况

从区域组团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内部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特征相近。京津冀地区2020年人均能耗为342.98千克标准煤/人、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平均值为20.4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分别是长三角地区的1.75和1.78倍、是川渝地区的2.37和2.35倍;较2015年的降幅也偏高,均超过16%。人均能耗基数大、节能降碳潜力高是“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地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主要特点。相比之下,2015、2020年,西北地区的能耗基数大、节能成效居中,“十四五”期间公共机构节能压力仍相对较大。因此,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政策不能“一刀切”,应结合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区域协同治理。

3.3 各省(区、市)政务公开程度不同,信息缺乏共享

各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信息的公开程度、数据维度以及政策进度存在差异,使得地区间缺乏信息互通、协同受阻。虽然各省(区、市)均相继发布了地方性“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提出本地区2025年的节能降碳目标。然而有些省份在规划中未给出基期数据,无法对其目标进行估算。在关于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和公开程度上,广西多个地级市将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纳入城市规划,先后出台地方性文件58个,江西和江苏发布相关政

策性文件也超过 50 个,省内 60% 以上的地级市有关于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地方性规范^①。

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成本,带来逆向选择风险,降低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动力。在实践中,长三角地区政务公开的一致性较高,较早提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协同思路。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于 2018 年共同签署区域合作备忘录,从组织架构、市场一体化平台等领域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区域协同。四川和重庆在 2022 年联合发布的《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推进方案》中强调推动两地公共服务信息互联、标准互认、资源共享,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区域协同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地区在公共机构节能领域的联动则以节水宣传为主,而节能降碳专项合作较少,尚缺乏区域性制度建设与联动机制。虽然各级政府在机关事务工作区域协同政策方面有所探索,但就公共机构节能降碳领域的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实践仍相对有限。

4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协同机制

作为碳排放治理的“关键少数”,为了加快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示范引领作用,需要央地、区域、部门与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协同与配合。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在横向上形成扁平化的区域协同,在纵向上推进各系统的有效运行。通过体制机制的优化改革,解决当前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实现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4.1 央地间协同

各省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由各级政府直属或由办公厅(室)管辖,使得央地间公共机构节能事务的对接、国管局与地方各级机关权责划分过程的协同成本较高。国管局除对中央机关和中央直属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进行组织与管理外,还承担总量控制和统筹协调的职能。地方单位负责政策与信息的上传下达,因地制宜制定本地节能降碳计划,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组织、指导与监管。通过向各地下放碳排放量控制目标并跟踪评估落实情况,对收集上来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从而对全国公共机构低碳发展格局进行全局统筹、总体部署与适时调节,以保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科学、稳步推进,避免地区间发生碳转移或“降碳运动”现象。央地协同不仅强调了政策与信息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及时、有效传递,还要求建立健全“全局—局部”的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考核体系。

4.2 区域间协同

区域协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区域合作与政策联动。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实施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原因,以地理区位、经济联系和战略目标等因素作为关联依据形成区域碳排放治理共同体,对区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进行规模管理^[5]。在区域治理共同体中,成员可以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和区域综合影响力形成集聚优势,以集聚外部性推进全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进程。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共建和风险共担,以联合发文或联合行动、低碳技术的合作研发与使用、共同组织研讨或培训活动等方式,提高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效率,继而提升政策效能。2015 年签订的《晋陕豫公共机构节能合作倡议书》是中国在这一领域较早的区域协同实践。通过建立公共机构节能联席会议制度,轮流承办专题会议,共同推动节能工作的跨省份、跨区域

^① 数据来源:根据各省(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北大法宝检索信息整理。

合作。

4.3 部门间协同

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部门间协同是指由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牵头,与政府各职能部门间形成的横向协调与合作机制,主要涉及的协同部门包括发展改革、财政和生态环境等,合作进行文件发布和活动组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项目实施、资金管理制度建设、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成立领导小组和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是促进地方性职能部门间协作的组织路径(见图3)。以此为平台,以扁平化的专项专议替代各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审批与传达,提升了办事效率与部门间协同效能。截至2021年末,省级行政区均已设立关于公共机构节能专项的省级领导小组,有161个地级市设立了市级专项领导小组。其中,有13个省级行政区和29个地级市已创办并召开过部门间联席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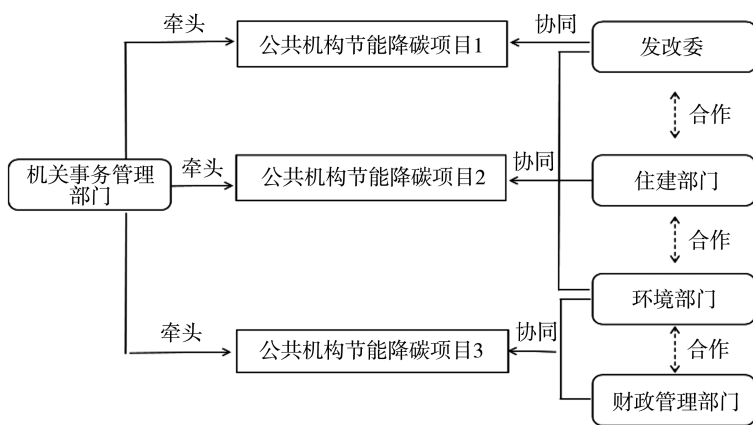


图3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部门间协同机制

4.4 主体间协同

主体协同是将多元共治思路应用到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中,以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示范效应和市场化进程。其中,公众可以对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效果进行监督,在过程中获得节能知识,逐渐形成低碳消费意识;私人部门可以参与公共机构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通过借助社会资本力量进行用能系统改造和运行维护,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市场化。在主体协同机制中,公共部门可以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节能降碳工作,以此为契机发挥其带动效应和政策效应,在区域内构建形成以公共机构为媒介,政府引导、机构履责、市场支撑、全员参与的绿色低碳治理新格局。“十三五”期间,全国公共机构引入社会资金共计约84亿元,投资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项目约2900个^[22]。多地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机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应用、能耗监控系统智慧平台或示范创建单位能源审计等项目中。

5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优化路径

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仅需要在央地、区域、部门以及治理

^①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网站发布信息和北大法宝关于相关政策文件的查询结果整理。

主体四个维度上的高效协同,而且其实施效果还取决于制度安排、执行能力和信息安全等。基于此,在探讨协同机制优化改革的基础上,结合公共机构特征,进一步从权责整合、弹性协作、数据共享和公私合作四个方面具体探究其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优化。

5.1 权责整合:统筹协调降碳行动

权责清晰是保障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为了避免在推进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过程中,由于公共机构上级主管部门与节能降碳任务对接部门不一致所可能导致的权力交叉或多头管理问题,需要进行权责整合。一是适度赋权。可以将公共机构资源能源利用的奖惩权力适度下放到地方单位。地方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区公共机构组成及其能源消费结构,锚定重点领域进行制度设计。同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在公共机构推动节能降碳工作的具体权责需要予以明确,在机构内设专人进行相关政策或行动的对接。二是权责统一。政府的组织结构是各种控制权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方式^[23]。将上级机关对下属公共机构的能源管理费用、节能绩效评价等权力剥离出来,划归机关事务管理单位下属的公共机构节能部门进行统一管理。通过统一的标准进行节能降碳绩效考核,并挂钩相应奖惩机制,可以对公共机构资源能源利用情况和碳排放规模进行直接把控,还可以进行灵活、动态地调整。三是政策打通。利用区域协调政策与绿色低碳政策条款之间的关联性,打通并建立区域节能降碳政策网络,完善协同机制建设,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过程中,可以引入区域化发展思路;而在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过程中,也可以纳入以公共机构为引领带动区域低碳发展的具体要求。通过对多层级、多部门政策的关联与打通,完善公共机构节能部门权责,增加政策覆盖范围与实施力度。

5.2 弹性协作:提供政策协同平台

“弹性”通常用以描述组织对意外中断的反应和恢复其正常功能的能力^[24]。埃洛兰塔等人认为各个组织在一个网络一起工作能够保证获得“弹性的整合”,快捷、弹性的协同联系是一个组织生存的关键^[25]。在公共机构节能组织网络中,采用弹性组合机制进行部门间协作,可以提升项目执行和调整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需要将地方政府封闭环境下的机关事务工作放置于区域开放大环境之中,建立区域性标准和联合行动方案,以实现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整体性带动。

针对不同类型的工程或项目,可以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牵头成立临时部门间协同小组,以此作为政策协同平台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机构节能降碳项目的组织、规划、执行与监督。小组成员包括该项目所涉及职能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员,各部门责任清单、工作任务和权益划分明确。组内职级横向打通,以部门间直接沟通、协调和业务对接来替代上下级的层层审批;当该项目完成后,小组随即解散。由于实现公共机构低碳引领涉及多部门间职能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这种弹性协同方式可以增加部门间联动的灵活性、提升项目执行效率。如长三角地区建立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联席会就是一种尝试,专门为区域内各级职能部门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虽然目前中国大部分区域尚未成立此类专项组织,但省一级有公共机构节能节水工作联席会、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置,可以以此为雏形搭建区域节能降碳协同平台,以统一标准、合作项目、联合培训、共享信息与技术等。

5.3 数据共享:完善区域治理网络

数字经济浪潮加速了社会发展步伐,以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重塑社会关系及组织架构,也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渠道。数据共享既是数据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亦是保持治理高效实施的外部诉求^[26]。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畅通政企数据双向流通机制等要求,为公共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提供了政策指导。以数据流为载体的治理网络将各主体连接起来,打通层级结构、简化治理流程,为不同参与者交流思想、数据和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渠道^[27]。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涉及多重领域协同,以网络为媒介可以为其提供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协同治理路径。

在数字治理网络建构中,机关事务管理等相关部门以数据为媒介建立各种直接的紧密联系或者间接的传递关系并形成特定结构,结构中每一个行动者的行为都将成为其他行动者的约束。一是以数据共享推动节能降碳指标测算标准统一。2022年4月,江苏省制定了中国首个地方性《公共机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对省内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进行规范性统计,为其他省(区、市)乃至全国核算标准的统一提供了资料参考。通过指标与数据共享,地方政府可以完善相关指标的计量方法并形成区域统一标准、对各地区公共机构低碳管理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和相互监督的同时,也可以接受私人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二是以党建引领打通共享网络。以机关党建为引领建立跨区域协同与合作机制,以此为平台增进公共部门间交流频率,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标准、技术和经验共享,也可以巩固与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此外,在数据共享过程中,需注重政府数据的确权及保护。如通过“合同”“协议”“备忘录”等书面形式或电子形式缔结双边或多边共享关系,以避免政府间的利益博弈与分歧,保障数据安全性和准确性^[26]。

5.4 公私合作:提升降碳协同效能

国家治理强调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调、共治且相互赋权的重要意义^[28]。在这一框架下,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和政府对网络的管理能力是构建区域低碳协同网络的前提^[29]¹⁷。如京津冀地区,虽然绿色低碳已被纳入最新的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中,但属地利益博弈与区域低碳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公私部门跨区域协同的效率和动力^[30]。因此,若以公共机构引领带动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则更需增进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互动,并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私人部门可以助力完善公共部门项目市场化机制。如通过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建立聚焦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产学研合作智库,围绕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制度标准、管理机制等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再如,在节能降碳类项目中引入社会资本,与政府机构形成联合生产与风险分担机制^[31],以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或参与碳权交易的市场配置,通过降碳规模与机构效益的直接挂钩,将环境外部效应内部化。

借助公共部门行为对公众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实施节能低碳治理,可以引领系统性变革^[18]。政府机关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形式加强教育培训,增加网页、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的宣传频率,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案例启发公众和私人部门绿色低碳的生产与生活意识;公共机构可以结合所服务人群特质,以开放日、宣传周为窗口进行针对性的绿色低碳生活意识引导。此外,

推动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设置碳排放管理员相关岗位并执行持证上岗,以完善新时代低碳治理体系和政策规范。通过这种公私部门的双向协同,增加公共部门政策下达与实施效率,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的低碳协同效能。

6 结论与讨论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在党和国家出台的多项重大政策中均可见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强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2]41}的新时代发展目标,提出要“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32]52}的愿景。至2022年7月,江苏、上海、甘肃、贵州等4个省市先后发布关于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天津、浙江等7个省(区、市)在地方性规章中提到关于公共机构低碳发展的内容要求。公共机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与执行部门,是推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关键少数”。通过促进公共机构率先落实节能降碳行动,以此为契机加快部门职能改革,并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可以为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公共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在梳理了节能降碳治理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学理论探讨了“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率先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可以通过减量、政策和带动三重效应驱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由此提出新时代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在统筹节能降碳行动、协调部门间联动、增进区域协同方面的职能改革方向。然而,当前在治理权责、治理效能、政务公开水平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实际效果。为此,为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行动的示范引领作用,从央地、区域、部门、主体四重协同机制出发,进一步提出权责整合、弹性协作、数据共享和公私合作的政策优化思路。

诚然,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探究了公共机构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对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并从协同角度提出了实现和放大这一驱动作用的政策优化方案,但作用效果还需要实践予以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展开:一是从网络治理的视角切入提出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种治理网络结构,三种效应的呈现可以探讨其网络结构的差异性以及这些网络之间的内生嵌入关系;二是从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研究公共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与社会其他主体之间影响关系中表现出的治理能力,进而探讨形成这种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三是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进一步研究在形成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进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缓解机制,评估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 [1] 赵月娥,张晓民.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研究——基于图书馆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21(7):137-145.
- [2] 朱呈义.完善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体系[J].中国机关后勤,2022(6):8-11.
- [3] 国管局:节能增效 低碳降耗 公共机构积极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工作[EB/OL].(2022-06-12).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2022qgjncxz/bmjncx/202206/t20220612_1327152.html?code=&state=123.
- [4] 吴茵茵,齐杰,鲜琴,等.中国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视角[J].中

- 国工业经济,2021(8):114-132.
- [5] 张娜,梁喆.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与气候政策协同的经验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9(3):155-156.
- [6] 宋德勇,徐安.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1):8-14.
- [7] 马忠玉,肖宏伟.基于卫星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分省碳排放时空模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9):143-150.
- [8] 丁凡琳,陆军.居民能耗碳强度测算及其空间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J].当代经济科学,2020(2):92-103.
- [9] 邵帅,张可,豆建民.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19(1):36-60.
- [10] 吴力波,钱浩祺,汤维祺.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J].经济研究,2014(9):48-61.
- [11] 张伟,朱启贵,李汉文.能源使用、碳排放与我国全要素碳减排效率[J].经济研究,2013(10):138-150.
- [12] 徐佳,崔静波.低碳城市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78-196.
- [13] 曹翔,高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推动了城市居民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2):93-103.
- [14] 朱晓姣,宋波,柳松.公共机构节能现状与技术发展展望[J].建设科技,2019(16):63-66.
- [15] 邢丽峰.公共机构“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探析[J].中国机关后勤,2021(4):29-31.
- [16] 周强.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扎实有效地做好公共机构节能工作[J].中国机关后勤,2009(11):10-11.
- [17] 董新宇,杨立波,齐璞.环境决策中政府行为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8(1):33-45.
- [18] 赵峰涛.公共机构要为碳达峰碳中和作更大贡献[N].学习时报,2021-06-21.
- [19] 徐盈之,王书斌.碳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50.
- [20] 薄文广,徐玮,王军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异质性:逐底竞争还是逐顶竞争?[J].中国软科学,2018(11):76-93.
- [21] 杜倩博.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与策略——基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5-133.
- [22] 李军.在多元共治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负责人答记者问[J].中国机关后勤,2021(6):5-7.
- [23]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1(5):80-96.
- [24] 刘浩华.打造弹性供应链[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5):63-68.
- [25] ELORANTA E, LEHTONEN A, TANSKANEN K. Fast flexible and cooperative supply chains—key issues for the survival of European industry [J].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1995(3):238-243.
- [26] 陈兵,顾丹丹.数字经济下数据共享理路的反思与再造——以数据类型化考察为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122-137.
- [27] MIKKELSON M.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as a strategic tool for the voluntary sector [J]. Policy Studies, 2006(1):17-26.
- [28] 张长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国家能力理论视角[J].法学评论,2014(3):25-33.
- [29]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0] 赵新峰,袁宗威,马金易.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协调模式绩效评析及未来图式探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9(3):80-87.

[31] 王俊豪,付金存.公私合作制的本质特征与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政策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14(7):96-108.

[3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The Internal Mechanism,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Public Institutions Lead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SUO Liming, DING Fanli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two-carbon” goal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Public institutions take the lead in implementing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actions, which have a reduction, driving and policy effect on promoting regional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ublic institutions face some realistic dilemma including unclearness between the loc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measurement standards, a large gap between reg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sufficient data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has not been shown. Combined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energy-saving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under the “two-carbon” target, there is a multipl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central—local—interministry—regional—entity” to promote regional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coordinate carbon reduction actions by integrating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flexibly cooperate to build a policy coordination platform, promote data sharing to improve regional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promot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rbon reduction coordination, so as to boost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work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effectively drive regional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public institutio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low-carbon governanc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金华宝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吴子靖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健康社区能有效应对风险、提升社区整体韧性水平、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尤其在防范化解基层危机常态化阶段,健康社区建设为完善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应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25个典型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揭示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即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应急组织资源构成的结构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应急卫生服务、应急教育培训、应急文体活动、应急技术构成的过程要素;由居民个体应急素养、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构成的结果要素。结构要素作用于过程要素并生发出结果要素,进而型塑出基层应急治理“结构—过程—结果”的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这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破除基层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系统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和常态化治理效能提供了策略选择。

关键词: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构成要素;作用机理;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126-1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此将健康促进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积极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专项建设行动,这标志着健康社区建设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健康社区作为健康城市在社区层面得以实现的“细胞”,其核心要旨在于强调城市社区内部行动主体通过有效合作,为居民提供社区健康生态环境、社区健康基础设施、社区健康服务项目等内容,从而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增强社区整体健康性能,进而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近年来,突发风险事件频发,实践证明基层社区是有效抵御风险冲击的重要前沿阵地。健康社区作为一种将“危机应对”内含于“常态治理”的基层治理模式,经过诸如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抵御突发自然灾害等各类危机事件的不断淬炼,健康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做好充足准备”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模式。健康社区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社区健康服务、型塑生动活泼的社区健康文化、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社区环境,降低了突发危机冲击导致的高昂社会成本,有效促进了危机有效应对、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正常生活三重目标的达成。因此,针对基层危机应对常态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充分揭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基层风险应对的抵抗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运行效果评价研究”(22CZZ018),项目负责人:吴子靖。

作者简介:吴子靖,男,博士,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力,为推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构筑强劲坚韧的基层社区应急防线。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筑牢城市社区这一基层应急管理防线的“前沿阵地”,着力提升基层社区有效化解危机的能力,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的基层环境,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健康城市理念,继而将社区作为实践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不断深化社区健康发展与社区应急管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主要从核心理念、体制机制以及路径选择等视角进行不断探索。一是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核心理念。马亮等人对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读,指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核心要义应该包括稳定、安全、公平等内涵,充分论证了将健康社区纳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并指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进而完善当前的基层社区应急治理体系^[1]。孟冲等人基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核心理念,进一步辨析了健康社区所蕴含的“健康”和“防疫”两大属性,提出应该充分发挥健康社区“日常”长效预防与“战时”应急管控的重要功能,进而指出建设健康社区是未来提升社区韧性的有力抓手^[2]。二是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袁媛等人分别对广州市Y社区、佛山市W社区防疫过程进行细节刻画,清晰地指出了因当前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而导致社区应急管理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提出通过构建基于多主体协作的常态化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模式来化解基层应急管理部门之间协作机制失效的难题,从而畅通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而提升基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水平^[3]。三是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路径选择。王兰等人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囊括健康环境、健康交通、健康设施、健康公共空间等多个方面,并倡导将以上多个方面融入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规划当中,主要通过充分发挥健康社区防患于未然的功能特性来提升健康社区化解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4]。李煜等人着眼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战时需要,建议在社区规划中重点关注效率与安全、流通与管控等关键问题,主张通过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等技术改良方案来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平非结合”,进而精细编制城市社区专项健康设计行动导则,以满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战时应对的特定需求^[5]。

纵览相关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多从建筑规划角度来探讨健康社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鲜有研究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微观机制运行角度来深入揭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进而建立健全基层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全方位、系统性地提升基层社区应急管理的能力水平。在研究样本选择上,过往研究多是基于单案例分析来推演研究结论,无法避免单案例的代表性与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均不高等局限。本研究遵循科学抽样方案设计,在全国范围内抽取典型社区应急管理案例,以保障研究样本的广泛覆盖性及结论推演的可靠性。在研究方法选择上,采用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方法,用以深度挖掘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核心构成要素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构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因果机制模型,为进一步畅通当前健康社区应急管理运行机制、提升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2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扎根理论分析

本文以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基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实践运作场域,提取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并充分揭示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运作机理,进而构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

成效的因果机制理论模型,彰显我国基层社区应急管理机制的独特优势。

2.1 案例选取

本研究选择理论抽样方法,首先,考虑入选案例样本的典型性,从“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①获选名单中,以健康社区标准^②作为衡量准则,抽取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典型案例,形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资料库;其次,考虑社区类型覆盖的广泛性,包括老旧型社区、商业住宅型社区、单位型社区、混合型社区;最后,考虑样本地区的分布特点,兼顾不同省份的样本,增强样本总体的代表性。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共抽取 25 个案例作为分析样本,分别记作 $A_1 \sim N_2$,在全面收集案例数据的基础上完成数据清理工作,为保证扎根理论研究的质量奠定数据基础。

2.2 编码分析

依据扎根理论分析流程,本文运用 MAXQDA 软件对案例资料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来系统分析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结脉络,进而揭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核心要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数据逐字逐句进行赋码,从数据中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使主题脉络逐渐清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选取 $A_1 \sim I_2$ 等 17 个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阅读并编码,其余 8 个案例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在对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后,剔除重复频次极少(频次少于 2 次)的,共计得到 71 个意义单元(见表 1)。

表 1 开放式编码(节选)

原始语句	意义单元	概念范畴
A_1 社区党委立即整合市、区、街、社区四级党员力量,成立社区防疫工作临时党支部,及时将市、区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文件、精神传达贯彻给每一名党员	成立临时党支部	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管理
B_2 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功能,在 5 个值守点位设立党员示范岗,认真做好点位值守、车辆人员出入检查、外地返津人员排查、帮助困难户采买等工作	区域化党建统筹	
E_2 社区举行应急处置演练,在模拟社区出现突发危机后,街道演练指挥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知各处置小组迅速到位,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预案演练	社区应急处置保障制度设计
C_1 市总工会向全市社区,按每个社区 3 万元标准为一线社区工作者购买所需物品	应急工作经费投入	
B_1 社区构建入户、海报、横幅、电话、微信、小喇叭“六位一体”的社区应急宣传体系	多渠道宣传 应急知识	社区应急宣传教育
B_2 社区依托红色老兵营地的优势,将健康知识和社区开展的防疫工作以丰富多样、通俗易懂、老百姓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推广	创新宣传形式	

① “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由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成都市多个党政部门承办,旨在及时总结、推广我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成果,搭建全国社区治理创新交流平台,探讨深化新时代社区发展治理新思路新举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② 案例入选标准参考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主编并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发布的《健康社区评价标准》,编号为 T/CECS 650-2020 T/CSUS 01-2020。

2.2.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通过对零散意义单元进行不断分析比较,将开放式编码中提取的范畴进一步归纳和聚焦,从而建立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过程。经过主轴编码分析,最终形成 9 个主范畴和 24 个副范畴,各主范畴与对应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详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内涵释义
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	应急管理政策制度设计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相关政策制定、落实以及监督
	应急管理规章制度设计	健康社区应急主体行动运转所依照的规章制度
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	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管理	基层党组织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中的引领作用
	基层政府主导社区应急	地方政府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能力	居民参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活动的意愿和能力
	社区自治组织协同应急	社区居委会统筹健康社区应急的沟通协调作用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应急	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健康社区应急协同的程度
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	社区生活空间规划	健康住宅、公共活动空间、交通等社区建成环境要素的规划情况
	社区生态空间规划	关于空气、水、绿地等社区自然环境要素规划情况
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	涉及预防保健、诊疗、辅助检查等社区医疗卫生设施完善程度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流程	社区医院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流程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队伍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人员规模与工作能力
健康社区应急教育培训	社区应急教育内容	社区对居民进行应急教育培训时所涉及的内容
	社区应急教育手段	社区开展应急教育活动时所运用的方法及形式
健康社区应急文体活动	应急文体活动开展内容	社区举办应急文体活动主题及类型的内容设计
	应急文体活动开展效果	应急文体活动居民参与情况以及取得成效
健康社区智慧应急技术	社区流动人口管理	智能技术对社区人口流动情况的监测能力
	社区精准对接需求	智能技术对社区应急资源的灵活调配能力
居民个体应急素养水平	居民应急知识知晓率	居民对应急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
	居民应急理念认同度	居民对社区应急观念的认同程度
	居民健康行为养成度	居民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程度
	居民个体身心健康状态	居民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
健康社区整体韧性水平	当前健康社区韧性水平评价	目前居民对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整体满意度评价
	未来健康社区韧性水平期许	未来两年居民对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期望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凝练出核心范畴,并建立起范畴之间的逻辑链条,从而提炼理论模型。本研究围绕“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这一核心范畴,对主范畴所构成的逻辑链条进行描述,进而刻画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和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共同构

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构要素;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健康社区应急教育培训、健康社区应急文体活动、健康社区智慧应急技术等作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五个关键环节,共同构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过程要素;居民个体应急素养水平和健康社区整体韧性水平共同组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果要素。基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三个核心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揭示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构要素作用于过程要素并得出结果要素,其中结构要素是过程要素和结果要素的基础,即由适当的应急制度设计与充足的应急组织资源所构成的结构要素,是健康社区应急关键环节得以顺利开展、居民个体应急素养和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同时,结果要素的核心内容受到环境规划、卫生服务、文化活动、智慧管理等环节工作成效的影响。

2.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的检验标准是当新增数据不能再带来新编码时即可判断达到饱和状态。为确保所提取主范畴的信度和效度,对未参与编码的8个社区案例($J_1 \sim N_2$)进行相同形式的编码分析,结果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及关联逻辑链条,表明所构建的“结构—过程—结果”因果机制模型已经达到理论饱和度的检验标准。

3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构成要素的内核释义

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基础上,发现“结构—过程—结果”这一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因果机制模型,强有力地解释了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来源,分别对其内核含义进行充分释义并借助访谈资料加以佐证,有助于清晰展示其内在作用机理的逻辑链条。

3.1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构要素

适当的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作用于充足的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形成了灵活高效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结构要素。适当的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是指充分结合属地管理的地方性原则要求,对健康社区应急预案、防控管辖政策、应急组织运行和应急资源配置等行动规则的合理灵动安排^[6]。完善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制度设计为相关行动主体形成适当的组织系统提供制度保障,得以充分调动内外部应急资源并迅速采取行动。因此,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中,适当的系统设计和充足的资源供给是基本前提,二者之间有着紧密关联。

其一,制度设计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提供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导。适当的制度设计结构能够提供形态稳定的应急管理行动框架,使得应急行动主体能够及时动态调整危机应对方案,形成应急管理资源优化配置的适当行动方案。正如一位社区书记所说,“经受过疫情的大考,基层应急管理制度已经较为健全,当前如果社区出现突发危机情况,向街道应急演练指挥组报告后,我们会立即启动社区应急处置预案,街道也会调配各类应急防控小组迅速到位,实施现场应急处置来遏制危机蔓延”。

其二,组织资源是指应急管理行动主体可以调动的人力、信息、流程等各类组织要素,其数量规模和协同程度是衡量组织资源充沛程度的重要指标。以党政统领为核心、以基层群众自治为基础、社会力量发挥协同作用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体系设计,为应急管理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资源支持。首先,基层党政部门及时部署指挥,以保障基层应急工作有序开展。如一位社

区书记所说,“社区党委立即成立社区防疫工作临时党支部,及时将市、区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文件、精神传达贯彻给每一名居民”。其次,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应急管理中起到风险沟通与组织协调的重要作用。社区居委会依托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及时向居民传达灾害最新消息、解读相关规章制度、宣传科学知识,从而提高群众危机预防意识和互助能力,使得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减轻或者免受危机的侵害。再次,外来危机促使居民个体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专业优势得到有效激活。社区居民通过团结互助的方式来共同抵御外来风险的冲击,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组织优势。最后,社会力量在细分专业领域提供应急专业服务。社会力量间实现职责明确、科学分工和资源有效配置,是充分利用自身灵活性、机动性、公益性优势的关键。社会应急力量扎根基层社区,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以低成本实现快速沟通和资源共享,并有针对性地帮助特殊困难群体,切实保障了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社会力量与其他应急主体共同形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力量整合、齐抓共管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7]。

3.2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过程要素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过程要素由外部环境规划和内部服务供给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健康社区环境规划隶属于外部环境规划,健康社区卫生服务、健康社区教育培训、健康社区文体活动是内部服务的核心环节;而智慧应急管理作为近年来重要的新兴技术,贯穿于应急管理行动的全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其一,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处于应急管理全链条的前置阶段,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外部环境支撑条件,主要包括生活空间规划和生态空间规划两个部分。在社区生活空间规划方面,首先,宜居舒适的健康住宅设计最为关键,它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8],需要着重考量社区生活空间的合理布局,营造健康有益的社区生活空间环境;其次,合理的社区公共空间规划能够助力应急工作有序开展^[9],比如公共场所可以临时转换为应急避难场所,进而实现对受灾人员的临时妥善安置,有效减缓突发危机对社区正常运行秩序的冲击程度;最后,合理的交通规划是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避免在突发危机发生时出现交通堵塞等情况,严重影响应急救援工作的正常开展,进而怠误应急救援工作的黄金时间。在社区生态空间规划方面,社区绿化等社区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助于缓解危机时刻居民焦虑情绪的密集程度。正如很多社区居民所说的,“居家这么久,现在拼的就是小区的绿化,绿植空间充足,自然体验丰富,有助于调节低落的情绪,帮助我们度过很多非常困难的时刻”。

其二,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供给是有效抵御风险的关键措施。不断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专业化能力,不仅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必要举措,也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同时,增强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供给与储备能力,提升社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设施的覆盖比例,是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防护屏障的基本前提。但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暴露出基层应急卫生服务专业水平不高等问题。疫情期间支援过社区的医护人员表示,“社区基层卫生工作者缺乏必要的救护技能培训,尤其是在危机应急时刻显得救助行动实施成效一般”。为此,未来要注重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技能培训,以提升突发危机时刻基层公共卫生的医疗供给能力水平,进而增强健康社区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三,健康社区应急教育是促进居民提升应急技能的重要手段。健康社区应急教育培训的

主要包括居民应急逃生技能、消防器材使用以及基本医疗救助手段等。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社区居民深入浅出地讲解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方法,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先期预防意识和快速反应能力,进而提升群众的应急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推动全民安全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其四,健康社区文体活动开展是有效提升居民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健康社区文体活动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居民保持良好的健康身心状态,能够极大增强居民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10],进而有效抵御或者降低突发灾害的影响程度。同时,社区定期组织特色主题的社区应急文化活动,以增强居民个体之间的社交网络密度,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应急文化氛围,提升居民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11],从而有效减轻突发灾难造成的损害程度,也有助于受灾群体快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其五,智慧社区应急技术嵌入是贯穿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全过程的关键技术支撑。一方面,智慧应急技术作为信息采集和传导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异常的人流量进行实时监测,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方案制定提供数据信息;另一方面,智慧应急技术嵌入在实现精准供给应急物资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了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精准有效程度^[5]。很多健康社区都采用智能化统一管理,通过搭建需求与供给双向信息对接平台,使各类资源及时精准地对接社区应急需求,实现了应急物资和服务需求的精准供给。

3.3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果要素

居民个体应急素养和社区整体韧性水平共同构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果要素。其一,居民个体应急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应急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安全的能力^[12],主要包括认知性结果、态度性结果以及行为性结果等内容。居民应急知识知晓率及风险识别能力是认知性结果的外在体现,而对应急理念的内在心理认同感是态度性结果的内在体现,绝大多数社区居民表示,“疫情让大家都开始注重身体健康,对健康危机防范知识学习的热情也提高了,充分地认识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也说明良好的认知水平、积极的态度反馈等要素对行为性结果能够产生直接正向的影响,有利于居民形成健康风险防范生活方式,进而提升居民身心健康韧性水平,更加快速地走出突发危机的干扰困境,实现风险情景下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13]。其二,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是指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对当前社区整体韧性水平的主观感知与评价,以及对未来社区整体韧性水平的期许程度。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果要素主要从当前和未来两个角度较为完整地呈现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最终样态,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应急管理的根本价值所在^[14]。因此,结果要素以居民的安全获得感为主要评价内容,来衡量当前和未来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成效。

3.4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逻辑生成

首先,适当的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充足的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共同构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构要素。其中,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为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调配提供合法性制度保障,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为健康社区应急制度执行提供主体支持。二者之间的有效配合程度决定了结构要素的资源配置成效。其次,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按照逻辑发生机理,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环节:处于前置阶段的健康社区应急外部环境规划、处于内部服务关键环节的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健康社区应急教育培训、健康社区应急文体活动等,以及贯穿于应急管理

全过程并起到重要技术支撑的智慧社区应急技术。作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这些关键环节共同作用于应急管理主体开展的服务,进而影响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的相互适配程度,最终形成包含居民个体应急素养和社区整体韧性水平两个层次的结果要素。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构成要素“结构—过程—结果”的逻辑关系(见图1),从而深刻揭示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逻辑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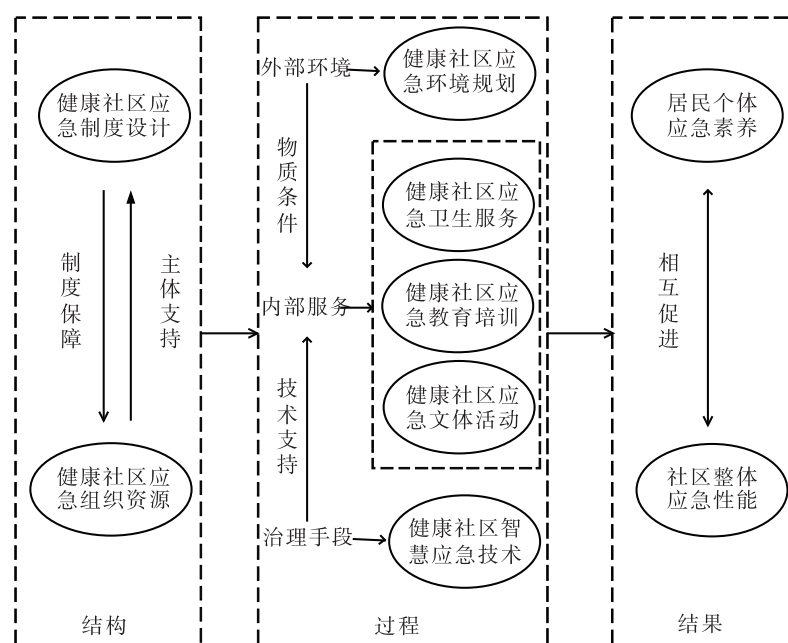


图1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因果机制理论模型

4 研究结论与政策意蕴

本文基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实践场域,应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25个典型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揭示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型塑出基层应急治理“结构—过程—结果”三维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结构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和健康社区应急组织资源共同构成;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健康社区应急教育培训、健康社区应急文体活动、健康社区智慧应急技术等作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五个关键环节,共同构成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过程要素;居民个体应急素养水平和健康社区整体韧性水平分别从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两个层次共同组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结果要素。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在于结构要素作用于过程要素并共同得出结果要素。因此,基于“结构—过程—结果”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为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破除基层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系统提升基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和常态化治理效能提供策略选择。

第一,加强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和组织资源协同的动态匹配程度。从结构维度分析,适当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制度设计配合充足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组织资源,是达成良好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前提条件。为此,首先要加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当前在

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制度建设层面,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还没出台具体指导意见,社区应急管理办法多为居委会自行拟定,相关内容较为粗浅,难以实现“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拖底式安全守护要求,需要重点完善健康社区应急预案制度体系。社区应急预案不能仅仅成为上级检查的案头“摆设”,而要针对本地区应急灾害类型、脆弱群体分布等情况,切实提供健康社区应急管理预案行动指南,进而为基层社区应对突发灾害提供明晰的操作指引^[15]。其次,要建立健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尤其要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根本要求,将基层党建贯穿于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积极引导社区做好从应急管理到常态化管理的切换安排,及时总结基层社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在预警预报、资源整合、人员素质、设施配备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破除基层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系统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常态化治理效能。同时,要加强其他主体参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尤其注重居民自组织和社区协同力量所隐含的巨大潜力,通过完善和整合多元主体间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合作机制,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行动提供强有力的组织资源保障。

第二,进一步细化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关键环节的流程设计。从过程维度分析,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关键环节众多,彼此之间逻辑贯通关系较为明显,直接影响健康社区应急管理的成效。为此,要紧扣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关键环节的逻辑衔接节点,打通并细化健康社区应急管理五个关键环节的流程设计。首先,在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这一前置环节,重点关注其在整个逻辑链条中的“应急准备”功能发挥,通过合理布局社区公共空间,进而打造邻里密切交往的社会网络关系^[16],以及通过提升社区生活空间绿化水平等途径,为居民营造健康舒适的社区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的生理和心理感官舒适程度,继而发挥健康社区生态环境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所起到的重要心理和生理调适作用,以彰显健康社区在强劲社区韧性层面的独特优势。其次,要进一步提高健康社区应急卫生服务设备配置水平与培训力度,从全国所进行的大样本调查研究来看,当前基层社区应急卫生服务设备配备总体水平较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应急专业技能水平不高,为此需要加大对基层社区应急卫生服务设备配置水平,同时提升基层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应急专业技能,进而满足社区居民较为紧迫的健康卫生服务需求^[17]。此外,在健康社区应急宣传教育方面,要积极做好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的宣传工作,将增强居民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防控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作为常态化应急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社区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应急专项活动来型塑本社区应急文化的精神内核。最后,要重点关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智慧化水平建设,强化大数据技术在社区应急和健康管理中的应用^[18]。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决策指挥、物资调配、资金划拨、信息共享、人员整合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转高效的数字化作业流程,并积累了宝贵的数字化应急管理资源,可以充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所积累的基层应急治理数字化资源,在保证数据应用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常态化管理过程中数字化应急管理作业流程,这将会极大提高健康社区智慧化应急治理的效能。

第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评估机制与标准体系。从结果维度分析,居民个体应急素养和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提升是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结果维度的两个重要构成要素。居民个体作为社区安全风险感知的直接主体,通过不断地感知、体验、学习社区应急风险知识所形成的感知性结果、认同性结果以及行为性结果,共同构成了社区居民个体应急素养

的主要内容。为此,要积极调动社区居民在常态化应急管理中所积累沉淀下来的危机应对专业知识,充分展示常态化应急教育培训所取得的相应成果。在“常态—危机”双向互动过程中,进一步涵养社区居民的风险意识,深刻总结积累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经验,不断完善居民自我保护以及团结互助的抵御风险能力。此外,在提升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方面,首先,要将健康理念融入社区应急管理的全过程,依托健康社区应急教育活动以及智慧社区的技术手段等营造积极向上的健康社区应急文化氛围,普及健康社区应急治理理念,型塑居民健康社区应急治理思维,影响居民健康社区应急行为。其次,建立完善的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应急治理评估机制,基层党政部门在健康社区常态治理中要能为社区群众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自主行动赋能,动员社会协同力量积极参与健康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充分重视健康社区发展规划对提升社区危机应对能力的关键作用,并积极推动健康社区项目以及健康影响评估工作有序按时开展。最后,适时启动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评估工作。我国通过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方式,着力推动各地社区应急管理机制改革,完善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但经过持续近三年“疫情大考”的深刻检验,各地动态衔接机制运行效果参差不齐,严重影响基层社区快速、科学、精准、灵活地实现“常态—应急”双向动态调适和无缝衔接,有碍于充分实现“危机有效应对、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正常生活”三重目标的均衡治理。鉴于此,亟需对健康社区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运行效果进行持续评估,进而查摆健康社区“常态—应急”动态衔接机制低效运行的阻塞点,不断健全健康社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筑牢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参考文献:

- [1] 马亮,林坚. 健康社区:我国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选择[J]. 北京规划建设,2020(2):32-35.
- [2] 孟冲,盖轶静. 健康建筑和健康社区的防疫属性分析[J]. 建筑科学,2020(8):169-173.
- [3] 袁媛,何灏宇,陈玉洁.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社区治理[J]. 规划师,2020(6):90-93.
- [4] 王兰,李潇天,杨晓明. 健康融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区应对[J]. 规划师,2020(6):102-106.
- [5] 李煜,梁莹. 防疫社区规划——平非结合的健康社区设计初探[J]. 建筑技艺,2020(5):25-29.
- [6] 王喜芳,刘霞. 以风险防控预警为导向的新型应急预案体系研究及其构建方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65-72.
- [7] 张强,谢静,杨晶,等. “十四五”期间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机遇探析与路径研究[J]. 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2(4):90-98.
- [8] 马健囡,王德文. 社区环境和个人因素对居民健康的交叉影响[J]. 东南学术,2022(3):104-115.
- [9] 牟燕川,王荻,黄瓴.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推进健康社区的有效工具[J]. 国际城市规划,2022(2):44-52.
- [10] 姚尚建. 作为社区应急机制的“邻居”——基于积极公民的跨组织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22(7):50-58.
- [11] 阎姝伊,郑曦. 促进身心健康: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凝聚力影响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21(2):117-124.
- [12] 张天尧,谢婷. 公共卫生视角下健康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2020(10):38-45.
- [13] 李志强,曹杰. 组织适应性视域的城市社区应急治理——“过程—情境”式解释范式的案例分析[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4-94.
- [14] 何继新,贾慧. 城市社区安全韧性的内涵特征、学理因由与基本原理[J]. 学习与实践,2018(9):84-94.

- [15] 钟开斌.“一案三制”: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77-83.
- [16] 汪超.“五治统合”: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体系建构[J].探索,2022(4):81-91.
- [17] 马亚,龚伟伟,申俊龙,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院韧性作用机制和建设策略研究[J].卫生软科学,2023(2):14-17.
- [18] 庞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J].电子政务,2016(9):104-109.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Healthy Commun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U Zi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Healthy communities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risks, improve the overall resilience level of the community, maintain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provide new ideas for normalizing primary-level crisis prevention at a 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mprove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s. Using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ethod, 25 typical emergency cases in healthy communities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healthy communities were revealed.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healthy communities consists of three core elements: The first are structural factors consisting of emergency system design and emergency organization resources in healthy communities. The second are process elements consisting of health community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planning, health community emergency health service, health community emergenc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ealth community emergency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and health community emergency technology. The third are result elements composing of residents' individual emergency literacy and the overall resilience level of the communit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s that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ct on the process elements to get the result elements, and then the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ructure, process and result is shaped. That provide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improving the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ynamic connection between norm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breaking the connection barrier between norm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the primary-level,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ability and normalizat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primary-level communities.

Key words: healthy communities,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onstituent elements, mechanism of action, grounded theory

责任编辑:金华宝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

温丙存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要: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题,其有效治理虽离不开国家主导,但更需找回村民主体性。为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治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先后征集推介三批 84 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表明,实现村庄移风易俗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三个维度和路向找回村民主体性。从村庄场域中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和治理技术看,自治规范指导旨在使村民“遵规守矩”,将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相结合;物质利益诱导旨在使村民“德者有得”,运用积分制等开展正向的物质激励;先进典范教导则旨在使村民“见贤思齐”,发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身边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上找回村民主体性的这一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合了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村民主体性;村规民约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137-12

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仍然在农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尤其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135}。开展高价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建设文明乡风,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题。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有效推动移风易俗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开展了三批(年)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推介活动,这为我们科学总结和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移风易俗的治理规律与发展路向提供了宝贵经验材料。

1 研究缘起

从实践发展走向看,移风易俗是新时代新征程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别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必选项。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保障,全面深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培育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新时代‘枫桥经验’重庆实践研究”(2022NDYB94),项目负责人:温丙存。

作者简介:温丙存,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专家。

农村新风新貌,就必然要求开展移风易俗问题的治理,这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中即可窥得端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如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作出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等四项部署。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配套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将“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列为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的重要举措与内容。为进一步遏制农村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专门对移风易俗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根据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2年8月至2023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由此可见,农村移风易俗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和关键选项。

从学术研究动态看,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亟需找回村民主体性,这虽已为学界所关注,但在如何找回村民主体性这一问题上鲜有高质量的专题研究和解决方案。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逻辑下,村民是不良习俗的最直接参与者、卷入者和受害者,但村庄社会自身因受制于集体弥散性、个体趋利性等而无法从陈规陋习中“自拔”,故移风易俗常常需要向国家借力,依靠国家力量来驱动。现有研究表明,在移风易俗治理中,党委、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治动员是前提条件^[2],发挥着实现社会整合、优化社会秩序的主导作用,“为村级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赋予了权威性和正当性,为村社内部的反风俗异化实践提供了突破口和支撑性规范”^[3]。国家虽可作为移风易俗的外在发动者和主导者,但在治理过程中,国家特别是基层政府不能完全替代村民进行具体治理。这是因为,“移风易俗,说到底是对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不仅要依靠外在动力的推动,更需要内在动力的激发,由此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规范”^[4],故风俗文化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自主性、集体性、实践性和习惯性等共同决定了移风易俗必须“尊重民众作为风俗实践者的主体地位及其享有的文化权利”^[5],唤醒和找回村民生活主体性,激活和建立村民自我治理机制。譬如,村规民约就是移风易俗问题治理中的一项常用工具,“鼓励乡村群众充分加入村规民约的协商议定”^[6],“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7],可有力助推乡土社会移风易俗的自我治理^[8]。

从具体研究路径看,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为研究当下移风易俗治理中如何找回村民主体性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经验素材。为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带动作用,近三年农业农村部征集评选推介了三批次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①。开展移风易俗,改变陈规陋

① 2020年4月在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征集推介中,从78个申报案例中评选出21个;2021年9月在第二届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推介中,从106个推荐案例中评选出25个;2022年10月在第三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推介中,从138个推荐案例中评选出38个。为表述方便,本文将“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第二届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和“第三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统称为“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三批(届)典型案例的综合评选推介平均比例为26%,即从322个申报案例中推介了84个案例。

习,可直接提高乡村文明程度,因此,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是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探索实践的中心议题。这些案例聚焦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发挥基层群众组织和村规民约作用、建立道德约束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积累并提供了操作性强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其对培育农村丧事简办、婚事新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遏制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拟在“找回村民主体性”的研究共识及其普遍采用的单一个案研究进路基础上,选择从2020年至2022年三批次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入手,探究当下移风易俗问题上村民自我治理的创新实践、成功经验、治理机制等,藉此从实然角度解答“移风易俗治理中如何找回村民主体性”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2 自治规范指导:让村民“遵规守矩”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直接关涉日常行为、社会交往、公共生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变迁和重塑,故其带有切身性、变革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征,也因此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对技术规范和指导标准的制度需求更迫切。

2.1 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新约定”改变“老规矩”

作为一项社会事实,社会规范是社会性和公共性得以生长并存续的重要标志与保障。正如霍布斯对社会行为所洞察的那样,“群体纵使再大,如果大家的行动都根据各人的判断和各人的欲望来指导,那就不能期待这种群体能对外抵御共同的敌人和对内制止人们之间的侵害”^{[9]129}。人类活动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离不开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又是以社会规范为基础的,没有社会的规范就没有社会的秩序。“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10]8-9}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规范是多元的、系统的,若仅就中国当下情景看,根据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从二元论立场可将社会规范笼统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以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等为代表的“硬规范”和以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等为代表的“软规范”。在当下中国国家治理中,各类“硬规范”和“软规范”相互叠加、冲突、合作,共同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结构变迁。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11],在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村庄实践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政治框架、风俗习惯与道德文明的内在养成以及每个村庄资源禀赋的独特性等,共同决定了基层自治规范这一“软规范”更适合发挥所长,因地制宜,润物化人,担负建章立制和规范指导的功能,国家法律这类“硬规范”则因相对“更硬、更远、更抽象”而不宜过多采用。本研究表明,村规民约等基层自治规范在当下村级移风易俗探索创新实践中已成为常用工具,其对歪风陋习如何破、文明新风如何立,给出了可操作、有约束力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例如,山东省宁阳县八仙桥街道青川围子村特别注重村规民约的修改完善,使其成为村民遵守的办事守则。一是“让村里人用村里话定村里事”。通过入户动员、大喇叭宣传等方式,广泛动员村民就文化惠民、移风易俗等事项发表意见建议,共同商定村规民约内容。二是“时时刻刻宣讲,仔仔细细解读”。将村规民约印制成册、制作音频,借助主题党日、村庄公众号、村民代表大会、文艺活动等,全面宣传推广移风易俗类村规民约。又比如,在河北省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村“两委”组织村民采用线上或线下灵活方式签订遵守村规民约承诺

书,外出村民可通过线上确认方式签订,在村在家的村民则可通过村干部上门服务方式签订,真正实现“我制定、我签字,我承诺、我执行”。

村规民约的效力源于村民的广泛参与、民主议定、自我认同以及国家的官方认可,“来自基于村民的共识而产生的约束力,来自基于个体权利让渡而产生的集体约束力”^[12],由此,移风易俗类村规民约就解决滥办酒席、高价彩礼等问题达成村民集体共识,作出内部约束。例如,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西吕营镇田寨村将村规民约作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对铺张浪费、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的整治。该村在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注重调动村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征求并尊重村民的意愿、意见、建议,先后3次召集驻村干部、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妇联执委等民主议定村规民约的修订草案,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的集体意志,真正成为村民自我约定俗成且必须遵守的集体行为规范,最终实现以“小约定”推动民风村风“大改善”。村民在议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还可以在国家所倡导的原则性要求基础上,结合村情社情,提出具体的移风易俗制度和规则,细化不大摆宴席、厚养薄葬等村庄自我治理要求。例如,甘肃省合水县店子乡店子村在村规民约中专门对抵制高价彩礼、节俭办婚嫁等作出具体规定,包括彩礼不得超过6万元、婚宴不得超过20桌(200人)、随礼不得超过100元等。

2.2 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软约定”转成“硬约束”

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唤醒村民参与意识,完善并发挥村规民约等基层自治规范的引导规制作用,有利于提升移风易俗问题治理的自主化、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但不容否认的是,虽然村规民约等基层自治规范经村民自主依法依规制定并成为村民的集体意志和村庄的公共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全体村民自发自愿、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也就是说,移风易俗类村规民约还需要从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的“软约定”升级转化为“长牙齿、能碰硬、管得住”的“硬约束”,正如《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所强调的:“充分发挥村(居)民议事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强化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遵守和落实。”在村民自我治理中,“民主监督技术是提升农民监督能力、行使有效监督的最有效手段”^[13],为防止移风易俗类基层自治规范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本研究中的案例村纷纷成立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加强自治规范执行落实的专项内部监督。

在当下移风易俗村庄治理中,禁毒禁赌会等群众组织由村民民主协商产生,成员由村民自己担任,主要负责对移风易俗类村规民约内容进行宣传指引,并对其遵守执行情况开展专项和专门监督。例如,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云头下村在发挥“三治融合”作用、筑牢乡村文明根基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老年协会、禁毒禁赌会、孝善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村内群众组织的作用,推行民事民办和协商民主,借此提高群众参与移风易俗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又如,四川省米易县丙谷镇雷窝村为破解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难题,村民民主议定村民公约,组建红白理事会,借此打造红白事自办点,规范审批流程,全程参与监督。为选好“理事人”,该村红白理事会采用“三荐(自我推荐、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三评(村‘两委’筛选评、村组干部审核评、村民代表集中测评)”的方式产生,红白理事会成员名单在村文化广场公示。该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实行动态考核和退出机制,红白理事会每月公布红白事办理情况,广泛接受村民监督;理事会成员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移风易俗政策宣传力度不足、引导服务群众不到位,则按程序取消资格,并按“三荐三评”程序重新补充成员。

在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中,红白理事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实现村民自我监督管理、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一种十分典型且重要的参与主体,可监督甚至细化彩礼档位、酒席档次与规模等具体内容,让“软约定”成为“硬约束”。例如,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大范口村在推进移风易俗村庄自我治理中,比较注重加强村红白理事会建设,通过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推选组建红白理事会,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表决通过村红白理事会章程。该村红白理事会建成办理红白事的崇善堂,组织村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倡导群众按照统一标准和流程操办红白事,倡导推行“红白事简办”“绿色殡葬”等文明新风尚,对村内红白事开展全过程监督,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攀比斗富摆阔等人情陋习。又比如,福建省上杭县中都镇都康村红白理事会制定了《都康村红白理事会章程》,专门提出“限名堂”(即减少操办宴席名堂)、“限范围”(即宴请对象一般只能是亲戚)、“限钱数”(即婚嫁聘金不超3万元、宴席每桌不超500元、喜事“份子钱”不超200元、丧事“份子钱”不超100元)、“限桌盘数”(即宴席一般不超8桌,每桌菜不超12盘,且实行“光盘打包”)、“限程序”(即减少非必要的仪式和环节)等“五限”规定。

3 物质利益诱导:让村民“德者有得”

移风易俗类村庄自治规范是一种“团体性”“半强制性”规范,这一“集体产品”想要在终端成为“个人用品”,转化为村民个体(或农户)日用而不觉的日常惯习,让村民将时代新风新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从被动适应变为主动参与,就还需在集体和个体间建立直接的特别是物质性的利益关联和转化通道,通过村庄资源的重新调配和利益联结,让“德者有得”,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的主动性。

3.1 积分制:“以德换得”

采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有益探索。“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民主程序,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数量化指标,对农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14]197}在乡村治理中引入和实施积分制补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15]。本文案例研究表明,积分制也正被因地制宜地运用在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实践中,成为动员村民积极参与、矫正村民行为规范的一项重要激励机制。

积分制嵌入移风易俗问题治理的范围和对象是具有弹性的。在积分制制度设计中,指标是其运行的核心内容,指标设计厘清了其规范的行为边界和调整的对象范围。本研究表明,在当下移风易俗村庄自我治理实践中,积分制的嵌入领域及其指标设计既有覆盖整个移风易俗全部问题领域的,也有少数仅侧重针对某项移风易俗重点领域或突出问题的。其中,在积分制整体性嵌入的代表性案例中,江苏省张家港市在农村探索“四德”文明家庭积分制管理,由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志愿者等组成考评小组,对照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等四大类22项指标,每月对各户进行打分,每季度张榜公示积分,将积分结果与村民每年股权固定分红挂钩。又如,吉林省安图县万宝镇古城村倡导“积分改变习惯、家风改变生活、共建文明乡村”,探索推行“美在农家”行动。设立“美家超市”,印发“银行存折”,聚焦红白事、干净人家、公益活动等移风易俗内容,在家风美、仪表美、庭院美三个方面开展积分评比,村民持“美在农家”

存折可兑换物品。在选择性嵌入的代表性案例中,志愿服务领域的积分制运用较为常见,例如新疆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为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运用积分量化管理和礼物褒奖等激励举措,广泛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不断充实壮大志愿者队伍,该村先后组建草根宣讲、科学技术、卫生健康、阳光助残、文化文艺等10个志愿服务分队,引导志愿者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参与疫情防控、示范科学种养、开展助老助弱助残助学等。

单向度的物质奖励是积分制嵌入移风易俗问题治理的核心驱动力。积分制通过物质激励和利益联结,唤醒了削弱的社会基础,“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物资,这种‘看得见’的奖励能直接推动农户参与公共事务”^[16]。在运用积分制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实践中,村庄对村民相关日常行为进行考核评价和量化积分,根据积分结果村民可直接兑换相应实物,有力调动了村民参与移风易俗治理的积极性。例如,安徽省旌德县孙村镇新建村在移风易俗村庄治理实践中,积极创新推行积分制管理,注重把积分转化为村民群众的自治力与创造力,转化为村庄弘扬新风正气、培育文明乡风的新举措。该村在积分评定中,将诚实守信、家庭和睦、孝老爱亲等行为纳入积分奖励范围,由网格员走访、记录、赋分,由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积分评定小组每季度审核认定,经公示后记入积分账户。该村在积分运用上,家庭账户积分除了可以在“生态美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将积分作为“红黄榜”评比、党员评先评优、“生态卫士”评选等的重要依据。积分制推广后,新建村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激发了村民主人翁意识和自我管理热情。“道德超市”是一种借市场交换逻辑推动村庄道德建设的常见方式,有利于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移风易俗问题治理。例如,四川省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试行乡风文明“道德超市”,制定“道德超市”实施细则和积分获取细则,建立积分卡发放和兑换台账,对好人好事、志愿服务等10大类24小类实行积分,实施“以分换物”,以道德积分兑换洗洁精、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并将“道德超市”积分与产业发展基金等挂钩,增强村民获得感、成就感与荣辱感。

3.2 以奖代补等其他利益导向机制

通常来讲,“正确的利益导向(或称权益导向)是达成社会共识和价值认同的必要前提”^[17]。本研究中案例村的探索实践表明,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移风易俗问题治理上的利益导向机制,除运用积分制、实行“文明有积分,积分可换物”“将内在价值所形成的声誉显化”^[18]之外,还有诸如直接奖惩、利益捆绑等利益导向机制。

其一,直接考评和奖励村民参与移风易俗治理的绩效。谋求私利或私域是当前农民行为的基本逻辑^[19],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需正视并把握农民的这一行为逻辑。例如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积极探索移风易俗利益导向和考评奖励机制。一是建立“阳光浴室”,澡堂对本村村民免费开放,但其前提条件是年轻人须结对陪伴老人一起洗,可以是儿媳妇陪着婆婆、孙子陪着爷爷,也可以是家里无老人者陪同邻居大爷大妈等,借此带动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的和谐,树立孝亲敬老风尚。二是设立“老年人精神文明奖”,实施以奖代补,将原来老年人“理所应得”的营养补助费,改变为只有乐于助人和严于律己才能得的“精神文明奖”。三是设立“老年人操心费”,老年人监督管教年轻人和租户的不文明习惯,每人每月可获得100元的“操心费”。又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下朗村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治理活动中,实行奖学金制度,对新就读的全日制高校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分别对应奖励1200元、1500元、5000元和10000元,借此营造村庄重视教育、提升科技技能的良好氛围。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

村探索推行志愿者奖励激励计划,量化志愿者活动开展情况和成效,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借此营造“有困难找志愿者、挤时间当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氛围。

其二,将移风易俗考评奖惩与农户享受支农惠农政策等捆绑。农村综合信用体系是激活农民主体作用、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机制,诚信、道德口碑、遵规守约等是农户信用评价的常规依据,信用良好户可享受较多优惠和便利,信用不良户在经济生活中会受到限制,而严重失信户还会受到一定制裁^[20]。本研究表明,信用评价和信用回报也常见于移风易俗问题村民自我治理的利益导向和利益联结实践中。例如,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把遵规守法、诚实守信、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和睦邻里、爱护环境等作为家风建设的考评标尺,据此评定优良、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针对不同家风等级,实行相应奖罚,譬如对优良家庭给予公开表彰和授牌嘉奖;对不合格且未完成限期整改“摘帽”的家庭,在银行授信评估、相关资格审查、照顾性政策支持等方面适度限制。又比如在甘肃省合水县店子乡店子村,村民如有索要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行为的,则取消其享受支农惠农项目、农村信用贷款、低保、临时救济等有关(申报)资格或降低其享受标准。

4 先进典范教导:让村民“见贤思齐”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家风、党风、政风直接影响和带动着社风、村风、民风。移风易俗有效治理需要在村庄熟人场域中,营造积极的、良性的示范效应,用活最美评选、红黑榜等“面子”,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找回村民主体性。

4.1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关键少数”引领“千家百户”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重要特征。作为村庄精英,农村党员干部“自身能力的展示及其行为会形成村民行动的参考模式”^[21]，“关键少数”在移风易俗中的带头示范,有利于“引导亲属和所在宗族(家支)成员配合,防止出现广大群众相互‘攀比心理’”^[22]。在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实践中,农村党员干部主动“亮身份”,带头宣传和践行移风易俗类村规民约,严格执行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制度,积极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实现“关键少数”引领“千家百户”。

村级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是开展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的关键力量,“对农民来说,村干部的行为规范是村民的行动标杆”^[23],培育农村新风新貌尤其需要发挥村庄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例如广西武宣县桐岭镇和律村坚持用党风引领民风。一是党员带头移风易俗,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违规操办或参加红白事;二是党员带头立家训,将家训、家规、家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内容;三是党员带头谈社风,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现身说教,利用村史馆和文明实践站等平台谈村规、谈家训,塑造“好村规大家谈、好家训大家讲”的良好风气。同时,坚持用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创新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双培双促”(即将党员培育成志愿者,把志愿者培养成党员)工程。研究案例显示,在移风易俗村庄治理中,党员干部引领带动普通村民的具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报备制、党员干部移风易俗包保联系制、党员干部志愿服务制等典型机制。

其一,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报备制。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化自身责任意识,亮身份、践承诺、当先锋、展形象,主动签订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方面的承诺书,

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带头抵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例如,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西吕营镇田寨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挂牌“党员户”,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引导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周围群众等自觉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索要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不良风俗。此外,在某些案例村,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等需事先进行报备审批,严格执行限桌、限金、限车等人情新风规定。例如,贵州省贞丰县永丰街道必克村在移风易俗治理中坚持党员干部争先带头示范,实行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制,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活动的党规党纪约束,将移风易俗相关内容融入村庄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严禁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等行为。

其二,党员干部移风易俗包保联系制。在“上级对下级”“先进对落后”等群体之间开展的包保联系制度是一种常见的责任传递机制和任务分配机制,这在当下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中同样也有体现和运用,主要表现为村庄党员干部通过包保联系普通农户的方式,宣传、引导、监督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例如,湖南省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试行移风易俗网格化治理,按照划分合理、管理精准的原则,将全村划为6个网格区、32条巷道,其中每条巷道覆盖6至15户村民,并推选巷长1名,借助“村干部包片、巷长包户”的方式,管理该村每条巷、每户人。再如,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渡口村为发挥好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推行“分户包干、各个击破”的治理策略,将坚决支持移风易俗的34名党员划分为3个突击队,分工包保该村62户重难点家庭,走访宣讲政策和改革利弊,实行台账动态管理。又比如,云南省师宗县竹基镇淑基村推行党员包户联系宣传制度,全村115名党员均有对接的宣传联系户,通过党员入户宣传并带头遵守移风易俗规定,让村规民约内化为村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外化为村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其三,党员干部志愿服务制。志愿服务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是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和村民参与意愿、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和建设文明乡风的有效载体。案例研究表明,当前村庄党员干部正通过组建或参与志愿服务队等方式,开展走访慰问、文明劝导、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影响、带动村民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移风易俗治理。例如,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把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带头文明节俭办事等情况作为培养考察入党积极分子的重要参考依据。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龙交乡王家沟村推动党员主动投身志愿服务,特别是在敬老活动、抢险救灾、环境整治中冲在一线、干在一线,以此打通服务村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带动广大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移风易俗治理。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在移风易俗治理中强调志愿服务组织的外引内培,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等。该村以村党支部为先锋,采取对内报道和对外宣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宣传栏、横幅、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志愿者活动信息,推动党员志愿者亮身份、亮项目、亮形象、亮成效。

4.2 身边典型榜样示范:“盲目攀比”转向“比学赶超”

一是先进个人示范。发挥道德模范等引领示范作用,开展“好儿媳”“好婆婆”“好妯娌”等先进评选活动,并通过模范讲堂、文化墙、宣传栏、微信群、公众号、“道德红黑榜”、流动红旗等宣教,用身边榜样教育引导身边人,用凡人善举感召群众。充分彰显道德模范示范,需要“通过讲解、宣传和弘扬道德模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嘉言懿行、凡人善举,扩大道德模范的影响力”^[24]。例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肖家河村聚焦孝老爱亲、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等主题,通过晒、议、讲、展、秀等环节,选树“好丈夫”“好儿媳”“好婆婆”等先进典型,引导村民自觉养成厚养薄葬、喜事新办、崇德厚朴、互助友爱、守礼重孝等优秀品质。又比如,河南省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在弘扬德孝文化、传承文明家风实践中,自2015年起每年定期开展“十大孝子”“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表彰活动,给受表彰村民颁发荣誉证书、奖赠礼品,并在村民家门前高挂表彰奖牌,其中获评“好媳妇”者,村里还会敲锣打鼓将奖牌送到其娘家,以此让先进典型成为村民争相效仿的榜样,以家风促村风民风。

二是先进家庭示范。“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25]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实践中以家庭和户为单位,可更好实现以家风、家教、家训带动社风、村风、民风的转变,形成基础性生活秩序。案例村实践表明,通过组织开展“好邻居”“文明户”“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评选,传承尊老敬贤、勤俭节约、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勤俭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形成表彰一批、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文明户”等创建活动,有利于形成向善向上和风清气正的导向与氛围^[26]。例如,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建农村坚持把家风作为关键点和突破口,通过建好一个埭(家风埭)、理好一个档(家风档案)、用好一面墙(家风墙),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带村风。同时,根据农村“地缘近、人缘熟”的乡土社会特点,紧扣移风易俗等内容标准,开展“新五星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对星级家庭挂牌上墙,既奖“票子”,更给“面子”,激发村民参与移风易俗治理的荣誉感和内生动力。

5 移风易俗治理中村民主体性的找回

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等直接外显性因素,还要关注内隐性文化因素的建设,通过移风易俗,实现对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培育,焕发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之文明新气象”^[27]。在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当下治理实践中,需要遵循风俗和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平衡协调好国家主导性与村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需要尊重并找回村民主体性,引导和培育村民自我治理。“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找准实际推动的具体办法,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绵绵用力,成风化俗,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28]破解乡风文明建设难题,关键在于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思维,发扬基层民主和自我治理,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的创新实践表明,在移风易俗治理中村庄内部可以激发农民主体作用,找回村民主体性,探索生发出一套恰适性自我治理机制。

文明乡风建设单纯依靠政府主导难以完全实现,需要处理好政府主导和农民参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应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发展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当下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的创新实践中,主要通过“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来调动和找回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一,自治规范指导使得村民“遵规守矩”。“村规民约中的柔性线条和家风家法的核心内容充分彰显现代德治的新特质”^[29],为此,在充分发挥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应同时注重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督导作用,将“软约定”转为“硬约束”。第二,物质利益诱导使得村民“德者有得”。通过积分制、以奖代补等形式,对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实施正向的物质奖励。第三,先进典范教导使得村民“见贤思齐”。一方面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由“关键少数”引领“千家百户”;另一方面是身边典型榜样示范,借此

从陈规陋习时负向的“盲目攀比”转向新风新俗践行时正向的“比学赶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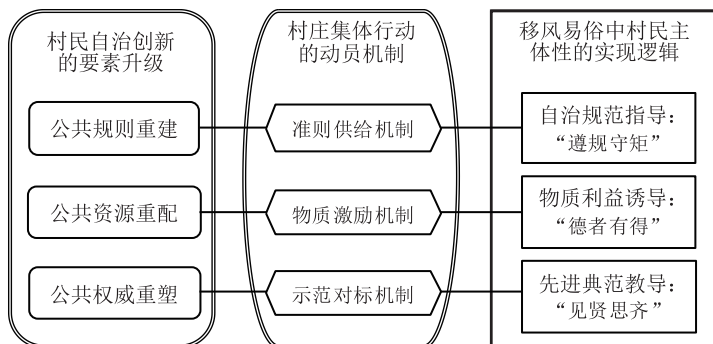


图1 移风易俗中发挥村民主体性的创新理路

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要求村民自治从社会性自治转向制度性自治,通过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的调整优化及其制度供给,推进村民自治创新与转型,进而实现国家力量与农村社会的有效对接^[30]。当下移风易俗村民自我治理的实践经验、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含和佐证了村民自治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见图1)。在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村庄自我治理中,“自治规范指导”解决了如何达致村庄集体行动中的准则供给与保障问题,回应了在村民自治创新中需要对公共规则加以重建的内在要求;“物质利益诱导”解决了如何动员村民自主理性参与上的物质激励与利益联结问题,回应了在村民自治创新中需要对公共资源重配的内在要求;“先进典范教导”解决了如何唤醒村民公共精神中的示范对标与精神鼓励问题,回应了在村民自治创新中需要对公共权威重塑的内在要求。

6 余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载体,是奠基基于法律规制基础之上的,虽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经建立便将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带入现代化的轨道,但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面临拓展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空间、激发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发展基层社会自我组织多样性等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31]。本文所揭示的移风易俗治理中找回村民主体性的实践逻辑和发展路向,既可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启发,还可为破解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问题提供借鉴与可操作方案。这是因为,“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走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32],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答课题和必由之路。

具体到当下的乡村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使命任务上来,其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点任务。“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散’字。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围绕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11]移风易俗中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动员村民民主参与、找回村民主体性的实践表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呼唤加强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同时亦能为其提供难得的场域和机遇。一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村民自治突破原有发展瓶颈;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

于村民自治拓展“横向”实现形式,跳出在自治单元上诸如“村民小组自治”^[33]、“片区自治”^[34]等“纵向纠结”,将村民自治融入整体性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与其他治理方式相协调并共同作用于乡村,尤其是协调好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2.
- [2] 李永萍. 村庄公共性再造: 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S 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72-82.
- [3] 石惠文. 社会合法性建构: 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 D 村的治理实践为例[J]. 天府新论, 2022(5): 113-122.
- [4] 杨旭东. 新时期农村移风易俗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思考[J]. 中州学刊, 2019(11): 78-84.
- [5] 唐钱华.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移风易俗主题与政府角色转换[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6): 14-22.
- [6] 赵廷阳, 张颖, 李怡欣.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基于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典型案例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46-53.
- [7] 肖莉. 青海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与强化路径[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6): 151-155.
- [8] 耿羽. 侨乡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移风易俗治理研究——基于福建长乐的地调查[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1): 191-200.
- [9]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0]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1]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 求是, 2022(7): 4-17.
- [12] 陈荣卓, 李梦兰, 马豪豪.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村规民约: 现代转型与发展进路——基于“2019 年全国优秀村规民约”的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5): 23-36.
- [13] 马华. 村治实验: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5): 136-159.
- [14]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二)[G].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0.
- [15] 马树同.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基于宁夏 J 县积分制的实践考察[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4): 133-138.
- [16] 许源源, 杨慧琳. “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 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 D 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11): 89-97.
- [17] 沈瑞英. 以利益导向促价值共识: 社会转型新思维[J]. 探索与争鸣, 2014(6): 20-22.
- [18] 马九杰, 刘晓鸥, 高原. 数字化积分制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53-68.
- [19] 黄昕, 吴恒同, 张振国. 纵横磨合: 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调查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124-133.
- [20] 唐丽霞, 丁悦. 激励、引导和规制: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何以有效发挥? ——基于积分制、村规民约和农村综合信用体系的对比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8): 144-150.
- [21] 庄天慧, 胡霜, 贺家欣. 村主任知识化、非正式制度与农村人情支出[J]. 农村经济, 2022(2): 81-90.
- [22] 陈永亮, 张立辉.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时代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路径——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J、Y 县为例[J]. 民族学刊, 2020(6): 29-35.
- [23] 唐成玲, 陈诺, 胡琴. 乡风文明的政策实践与农民声音[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73-88.
- [24] 李建华. 以道德模范引领新时代中国道德风尚[J]. 伦理学研究, 2020(1): 8-10.
- [25] 徐勇. 中国农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8): 102-123.

- [26] 陈文胜,李珺.论新时代乡村文化兴盛之路[J].江淮论坛,2021(4):143-148.
- [27] 杨增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现实问题与积极进路[J].贵州社会科学,2021(9):147-154.
- [28]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29] 于语和,雷园园.村民自治视域下的乡村德治论纲[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34-142.
- [30] 王海娟.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04-113.
- [31] 徐勇.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J].政治学研究,2023(1):3-12.
- [32] 姚树荣,周诗雨.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2):14-29.
- [33] 唐鸣.从试点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对国家层面24个试点单位调研的报告[J].中国农村观察,2020(1):2-16.
- [34] 韩瑞波.“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J].探索,2020(1):154-165.

Retrieving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The Implement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Changing Custom

WEN Bingcu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Chongqi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Changing customs is a must-option to promote the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comprehensively.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changing customs needs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but needs more specially retrieve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f changing custo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emplary role of the advanced model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collected and recommended three batches of 84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village level civilized rural style construction from 2020 to 2022.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se typical cases indicates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self-governance of changing customs within the village, it is necessary to retrieve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and directions of autonomous normative guidance, material benefit guidance, and advanced model teaching. The autonomous normative guidance aims to enable villagers to abide by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combining the guidance of the endogenous autonomous norms with the supervision of mas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The material benefit guidance aims to provide villagers with moral benefits, by using the positive material incentives such as the point system. The advanced model teaching aims to make villagers emulate those better than oneself, by playing the advanced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the models all around. The implement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trieving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to govern effectively changing customs i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lies the public rules reconstruction, the public resources reallocation and the public authority reconstruction required for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rural civilization, changing custom, villagers' subjectivity, village regulation

责任编辑:金华宝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结构呈现与实践价值

项久雨,龚安静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时间之于人类社会的本体性意蕴开显出时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性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逻辑深度蕴含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和创新的逻辑理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性、时代性、超越性的基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运动的持续性、阶段性和顺序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提供运行空间。时间本身的复杂铺陈状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的多维因素相互塑造,呈现了不同时间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性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结构表现为共生互构的圈层结构、过程演进的线性结构、认同建构的交错结构。这一结构体系分别表征、共同塑造、集中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实践的历史性生成、教育活动的过程性展开和认同建构的主体性发展。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理论探讨,有利于澄清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重要关切、省察思想政治教育自我确证的致思理路、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诠释的视域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铺建起理论的进阶,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间观;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149-13

时间对于事物发展具有始源性意义,任何事物的产生与流变都无法置于时间之外。时间作为衡量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尺度,内在地成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变量。现实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变革引发时间逻辑的重构,推动了社会时间结构的嬗变,变革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时空境遇。这一时代变革推动学界重新审思社会的时间秩序,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学术论争。在研究趋势上,从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开发运用时间资源的实践探讨到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学的理论论争,国内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从实践论题分析过渡到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难题探索相结合的趋向。在研究内容上,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既有从时间视域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与创新、“三全育人”体系建构等时代课题的实践分析,又有对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特性、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基本内涵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间维度的研究认为,时间整合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三者分别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体系创新的现实难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1];聚焦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研究认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互嵌的张力和能量的激活,能够使二者在学科逻辑上的对话问题拥有更大的研究空间^[2];基于虚拟交往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研究提出,突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创新贡献研究”(22&ZD013),项目负责人:项久雨。

作者简介:项久雨,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龚安静,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交往的时间困境,需在客观时间层面和虚拟时间层面建构其时间机制^[3],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视角多元、论域广泛,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论说,为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理论体系搭建起了研究阶梯。然而,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以时间视野优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课题的实践进路,对马克思主义时间论说的汲取有所疏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基础理论阐释还不系统,对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理论面貌呈现也不够全面。新时代作为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历史方位,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为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契机。把握此发展契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论题的理论主动和实践自觉,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理论体系建构,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论域新的时代课题。基于此,立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时间论说为理论指导,可以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时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厘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逻辑,进而论析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结构体系,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是时间性的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逻辑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时间的多重科学内涵,不仅将时间作为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标尺,更将其作为社会演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叙事框架以考察社会结构变迁和人的生存状态演进。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嵌入社会时间结构,时间秩序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和运行的基本方式。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时间论说为理论指导,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内部,有助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逻辑的理论分析。

1.1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性生成

历史性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时间意义。只要一事物是历史的,就必然有其出生和发展、有其鼎盛和衰亡。作为一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性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孕育于原始社会人类的教育活动,生成于具体的、历史的政治实践,建构发展于特定时空场域的社会生产活动。

1.1.1 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发展孕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土壤

时间逻辑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时间序列性。从人类历史实践的时间序列上看,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长土壤。“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151} 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是精神生产的出发地。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和社会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人类历史的不发达阶段,萌芽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维系代际传承和社会再生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级开始形成,国家为调和阶段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而形成发展起来。国家的发展推动政治生活条件日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也随国家的出现及其政治实践而正式形成发展。

1.1.2 生产方式的时空转换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契合生产方式发展的时空特性。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变革的结果,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

斗争,等等”^{[4]195-196}。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体现了物质生产条件的历史性变化。在此变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具体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过程的相互关系发展演化,导致社会关系及其内在思想关系发生变动。推进这一变动过程,若不引导思想文化发展契合生产方式的时空特性,任由其滞后或超前于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时空错位。因而,在历史发展的各阶段,统治阶级都需根据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以便历史性地建构政治意识形态。

1.1.3 时间性的“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主体

时间性的“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建构者,是物质生活改变以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发展变革的力量源泉。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必定处于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其前途命运取决于社会形态变化,决定于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寓于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中的人所参与的,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结成的关系的总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关系的建构者、社会生活发展的推动者,是物质生活改变以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发展变革的力量源泉,而人民群众推动物质生产进步的实践活动使得人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也处于变革之中。可以说,在具体的人类历史发展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和主体活动时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需要及其实践推动着人们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同时,这些物质生产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和精神需求。进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历史性地嵌入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实践的演进历程,始终系于社会生产关系嬗变,密切观照社会关系演化,特别是思想关系的变速节律、发展趋势和运行机制。

1.2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发展

时代体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4]380}。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发展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每一时代都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革新的动力之源,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向和价值定位。

1.2.1 时代方位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向

时代方位集中呈现时代表象,标识特定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时代方位更迭变迁体现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变化。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社会形态的现实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在各种具体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制约其他矛盾的生成发展。进言之,社会主要矛盾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标示了社会发展的症结,决定该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为识别、判定和解决社会思想文化问题提供时代坐标,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时代方位,这一时代方位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5],是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较量的时代。当今世界没有突破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框架,仍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时代。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资本盲目追求价值增值和对外扩张导致矛盾和危机,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初心使命牵引下,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扫除思想障碍,服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制度的较量日趋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发展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就要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思想保障,就是要围绕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化思想引领、理论辨析和价值导向,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导人民群众以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2 历史阶段发展牵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受教育者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6]42},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及其实现受社会历史条件的牵引。

从历时性线索看,每一个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主题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以时代主题演化为发展线索,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呈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契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围绕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布局展开策略构建,实现从“军队的生命线”^{[7]225}“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8]74}到“一切工作的生命线”^[9]的定位演变,历史地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样态的时代发展。

从共时性结构看,时代发展要求转变和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牵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发展、家庭建设、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功能定位。同时,信息技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也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生产关系特点和人交往场域转换的适应^[10]。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1]328},实现维护党的前途命运、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建构的时代价值。

1.3 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运行

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为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积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目标的能动性实践。受人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发展进步性双重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满足当下社会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现实性需求,又追求未来社会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前瞻性规定。

1.3.1 自然时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逻辑

从人的生命尺度看,观照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未来可能性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主体性的现实诉求。“自然时间规定了有生命存在者的存在限度”^[12],作为一种时间——历史性存在,人的生命“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3]739},这一运动过程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理。

理论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激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提升思想政治素质的主体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人的主体意识的提升演化、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再造依托于人对有限生命进程的反思性实践。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的生命时间“刻度”激发个体筹划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强烈意向、愿望和动机。这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机理的时间性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又具有强烈的未来向度。

实践意义上,遵循人的生命历程的演进规律,要求优化思想政治素质养成的时间管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探究和自主运用客观世界的时间规律以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并依据人的生命尺度来科学谋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质上,这一批判地审思当下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状态以谋划其未来发展的反思性实践,目的在于创造性提升思想政治素质生成的历史合理性、发展前瞻性和未来可能性,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逻辑。

1.3.2 自由时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

从社会历史演化进程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尺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机制,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的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其中,自由时间是作为工作日之外、能够为人所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14]343},无偿窃取工人的劳动时间,致使工人不能“从资本的贪得无厌中挣得哪怕是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由时间”^{[15]604},甚至丧失了作为自然性存在所必需的生理活动时间。这必然导致工人被剥夺道德和身体发展的条件,“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16]344}。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促使社会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全体社会成员才拥有发展本身的自由时间。

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追求,推动构建人的美好精神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不囿于适应当下社会和个体发展需要,更积极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拓展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空间。一方面,党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辩证融合,深度嵌入社会结构时空演进,与时俱进建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性发展和系统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培育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适应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图景的演化进程。

2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结构呈现

多种多样的时间和空间“包含在物理、生物和社会等不同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全都生产……自己的时空形式……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为它们的发展定义出与众不同的规模”^{[16]62}。时间塑造事物的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运动的持续性、阶段性和顺序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运行空间。时间的复杂铺陈状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多维因素相互塑造,表现了不同时间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性状,立体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结构体系。

2.1 历史性生成:共生互构的圈层结构

时间与人类社会实践相互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的生态系统,可以视为寓于社会时间、民族时间、主体时间视域下层层嵌套、相互构成、一体发展的结构体系。民族时间和主体时间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特殊性和主体差异性,社会时间规定其历史主线及其演进历程,三者共同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发展。

2.1.1 社会时间投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面向

“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17]7}

社会时间是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和总体空间,蕴含了人类的整体性发展趋势,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性存在样态及其演变趋势。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人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个形态。其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性和根本性的目标追求。围绕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的逻辑”为价值准则,超越物对人的奴役,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推进人的素质全面提升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正确方向引领、筑牢科学理论武装、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2.1.2 民族时间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特性

社会时间从历史总体层面表现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整体性进程,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特征,相形之下,民族时间则以民族自觉性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基因。在同一宏观历史时代下,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主客观条件的具体性差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样态和实践路径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这种民族特性是与世界历史不断相互作用而获得的丰富的独特规定性。立足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阶段,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境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8]13},从世界大势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凝聚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力量。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把握民族发展的时代机遇,立足中华文明,更好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赋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民族性表达和国际化传播。

2.1.3 个体时间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建构

提升个体思想政治素质进而构筑并优化个体精神世界的内在追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以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的时间性发展为内在视域。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的时间呈现,是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样态与实践需求的时间表达。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结构影响,经个体利益、情感、需求等内在条件驱动,个体时间体现出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统一、阶段性与非阶段性相统一、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相统一、个体性和群体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要充分发挥个体时间的积极价值,就需要厘清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时间规律,深化分析并科学把握各生命时间阶段思想政治素质的表现样态和发展性状,考察不同时间尺度下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系统的结构性差异和深层性关联,以便聚焦思想认同的生发时机,把握多种思想认识走向和融共生的思想认同的时间特性。

2.2 过程性展开:实践演进的线性结构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9]250},时间标识着世界的线性发展线索。时间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活动和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呈现为时间节点、发展阶段、未来向度同构而成的线性结构。

2.2.1 时间节点:标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时机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节点指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时刻,通常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机。于个体层面,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节点是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在个体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发展的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都

会面临个体意义上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时间节点往往是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有效的教育活动往往能够把握这些时间节点,提升教育效能,促进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在活动实施层面,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节点具体表现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思想互动的生发点、共通点、维系点、转折点及联结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互动客观条件和个体差异交互影响,决定这些时间节点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动态性。在历史发展层面,时间节点表征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主客观要素的动态组合,通常呈现为重要历史会议、重要历史事件等。譬如,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是标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时间节点。

2.2.2 发展阶段: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阶段是依据其发展特性而划分的,内在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时间阶段内集中显现的基本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时间跨度,具有可丈量性。

在个体层面,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应和推动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阶段演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20]这是因为,在个体生命时间意义上,“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1]329}。这揭示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尊重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特别是尊重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特性和一般规律。活动实施层面,在教育者施教阶段、受教育者受教阶段、受教育者知行转化阶段等各个阶段,把握主体的思想信息,循序渐进、一体传递政治立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都需要转化时间坐标,协调教育要素的时间性安排。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就需要系统筹划不同学段的教育活动,衔接和畅通不同时间情境的教育要素设置,处理好各教育阶段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结构要素的动态变化,突出知识、价值观和政治观念传导的衔接性、阶段性和系统性^[21]。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重宣传革命思想和战略方针,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以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批判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22]9},为人民美好生活注入精神动力。

2.2.3 未来向度:照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向度以当下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以过去为参照系,回望和省察其历史进程,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照显出其发展趋势和未来图景。于个体而言,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养成是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性是个体性形成的时代前提,个体性是社会性的个体化结果。个体思想政治素质是时代性与个体性辩证融合的产物,其生成过程是社会需求总体规定下适应差异性的个体发展需要的历史过程,在根本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于活动实施而言,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自觉在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进程中注重教育时空延展^[23]、从时空融合视角审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24],以强烈的时间意识深入探究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对其改革的实践吁求,以期通过一体化发展的实现全面服务治国理政。于历史行程而言,顺应人类发展潮流和中国发展历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性变革

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同频共振,观照新时代时空的发展指向性,强化历史意识、拓展世界视野、推进方式方法数智化^[25],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提振时代新人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

2.3 实践性发展:认同建构的交错结构

在时间迁流中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追求。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价值认同是主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交错发展的结果,更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空间拓展的结果,二者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时空交错秩序,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相互交错的复杂关联。

2.3.1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交错发展构成认同建构的个体性交错时空

时间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空洞抽象,它既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思想延展的表达式。主体的认识结构生成演化并诉诸身体积极投入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以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为基本条件。人只能在感性的历史性实践中感知时间流变,判断事物运动的前后次序、事物发展的持续久暂,认识社会关系的不断演变。思想政治教育以个体的反思性认识活动为内在作用机制,以实践为中介环节和检验标准,推动受教育者在发展流变的实践体验中获得感官知觉,建构认知体系,生成认识图式。于认识过程而言,无数具有自觉意图的人在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26]592},导致具体个体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和意志结构发展并不随时间流线作简单的、一维的、均质的线性演化和持续流变,而是不断将过去的认识体验扬弃在自身认识体系内部,使认识生成过程始终处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螺旋上升状态。于认识主体而言,实际历史进程中“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153}总是依托感性实践活动推进认知发展,其认识发展路径随流变的个体利益、情感和精神需要及具体客观条件转化呈现出交错迁杂的发展图景。于认识中介系统而言,认识条件改善促发认识情境改变,影响认识图式生成。特别是在工业4.0时代,科技革命加速物质性认识工具智能化,网络时空、虚实交融的元宇宙推动认识过程突破传统物理时空局限,加剧认识对象在时间上持续“在场”或“再现”。这推动人的认识活动寓于时空交错情境之中,为延展人的思维意识、变革人的精神世界创设了新的时空情境。信息存储技术、数字视听技术等新兴技术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促使教育者突破传统教育情境的时空有限性,在时空交错中唤起并增强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在感性时间和理性时间的交错情境中拓宽认知通道。

2.3.2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空间拓展构筑认同建构的社会性交错时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促进了时间的空间化,促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时空延展而交织发展。唯物史观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7]196},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表现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现实的人的生存样态“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7]520}。历史既是社会生产力演进的历史,也是人的精神世界发展的历史,更是人的活动方式演化的历史,而塑造人类精神文明高度的根本因素“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28]。

世界市场的生产实践推动社会历史突破“地方性发展”^{[13]715}并进展到“世界历史”^{[4]168},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404},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面临时空拓展的发展境遇,人

的精神生活建构日益受个体、民族、国家精神发展历时性需求和世界历史发展共时性需要的双重推动。一方面,前代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内容系统构成当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前结构,与现实社会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需求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世界历史背景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愈益成为不同空间境遇下的人的发展需求共同塑造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科学建构思想政治素质的内容体系,有赖于培树深度蕴含民族实践发展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共通性的精神品质。诚如毛泽东所言,“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29]411},只有凝结时代发展的历时性精神遗产和共时性精神需求,适应历史趋势对于个体精神世界建构的结构性影响,实现对时代的历史性把握和对历史的时代性把握,才能与时俱进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认同建构的迫切需求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厘清时代精神建构的时空关系,既融通思想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又汇合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政治信念和道德理念,实现中国价值、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协奏共进。

3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实践价值

时间对人及其社会生活的本体性意义决定了时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意义。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实进程的内在关联,创造性推动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融贯发展,必须诉诸时间要素。这一致思路,有助于从价值层面、本体层面和方法层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创造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空间。

3.1 价值层面:澄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重要关切

人是时间性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必然要求观照不同时间尺度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样态。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深度介入的现代社会,拓宽时间视野,深入考察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时空境遇,在时间维度省思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已成为现代人建构精神世界的迫切诉求。

澄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内在追求。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30]161} 马克思以资本批判的形式全面展开时间批判,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时间伦理问题,深入求索社会结构发展和人的生存境遇变化,挖掘时间与人的活动的内在逻辑关联,凸显对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价值的深度开显。此思路要求在现实的时间中认识历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以多维时间视野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价值样态的历史性生成,推进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时效性和时代性,精准推动人的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

在实践层面,这要求树立对时间要素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积极应对人的精神世界发展的时空境遇转变,深刻洞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现实机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素及其结构体系的时代性建构。在数字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图景中,科学技术发展推动民族内部交往扩大和各民族间交往持续深入,致使人的思想交往面临时空伸延与时空压缩的强劲张力。顺应这一时代图景,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价值取向,就是要以时间意识

深入理解具体价值样态演化和实现的根本方向,以便更好在应对凝聚网络空间的思想共识、深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探索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等时代课题时,坚定不移追求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历史性实现,聚焦个体思想政治素养的价值追求,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标准、价值评判等问题,尤其避免技术理性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失度^[31]。

3.2 本体层面:省察思想政治教育自我确证的致思理路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时间视野给予思想政治教育追本溯源的辩证反思思维,有利于深入追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现实根基和历史根源,夯实其认识基础,解答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根源、发生等根本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根基性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确证的理论基石。特别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律、原则等根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在根本方向上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致思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的客观现实,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活动为根基,深度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历史意识。质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内在蕴含对时间视野的强烈呼唤。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致思路向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致思方式内在耦合。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必须基于其作为历史性、具体性、发展性存在的逻辑前提,这就要求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全面洞悉和系统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实际,基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现象,深入探求其实践发展的历史根据,突破对其实践的当下把握而拓展到其历史性的维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致思路向有利于规避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探讨的空洞抽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前提性理论问题的探讨切不可罔顾社会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性发展。倘若剥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历史情境和时代条件等时间要素去探讨人的精神世界发展和思想政治素质养成,甚至仅通过纯粹概念思维的论证方式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发展,就会因脱离历史的整体联系和现实的具体条件而阻滞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现象和理论发展的科学认识。曾出现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独创论”“过时论”等错误认识,无不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停滞不前的抽象之物,抽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特性,陷于静止、孤立、片面的视角来观察思想政治教育。

最后,坚持时间视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研究,就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杜绝抽象思辨的任意驰骋,对纯粹概念思维的论证方式保持审慎,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以时间视角辩证检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构及其实现方式,把握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关系和结构关联,赋予思想政治教育自我确证更多辩证内涵、历史信度和时代含量,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的生命力。

3.3 方法层面: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视域局限

审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视角,是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概览学界研究现状,时间视角已成为深蕴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种思维范式和方法原则。以时间视域审思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有助于确立起理论求索和实践观察的多重视域和研究方法。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研究有助于采用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审思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

近年来,学者们观照“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课题,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展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长时段”“大历史”“宽视野”的整体性时间视域中不断深化。不论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根源,亦或是在社会时间延伸中系统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的整体面貌,这一时间视域都推动学界进一步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等宏阔时间视界,采用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研究有助于涤荡长期拘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的“短”“微”“窄”色调。需要注意的是,拓深长时段的研究视域并不意味着回避甚至消解微观研究视角。从主体时间考察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形成的时间脉络、从物理时间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体制机制、从心理时间探讨思想政治素质生成的心理机制等,都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以更为系统的理论视角考量新的历史条件下“时间序列、时间密度与时间节奏”^[3]的历史性建构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实践要求。

新时代是一个时间概念^[32],于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研究,就是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元宇宙与意识形态治理等时代课题的理论思考走向纵深,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方法,打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全新界域。

4 结语

时间之于人类社会的本体性意蕴开显出时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精神实践,内在要求时间视域的深度嵌入。时间作为一种互动网络式的存在,其结构性演化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变革的结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深度介入的现代社会,人们对时间的价值认可和开发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直接导致人们对于社会生活运作节奏、运行机制的主观体验发生嬗变,推进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推动改变时空的铺陈状态,有力促进了社会生活配合协助机制的系统建构,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了人民精神世界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机制保障。这一时代机遇呼唤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时间管理,以时空融合之视域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对加速状态的现代生活的不适及其引发的精神贫乏的忧思,也在呼唤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时间意识,以便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时代性症候作出精确诊断。特别是应对“时间饥荒”“时间焦虑”“时空错乱”等时代性病症,引导“时间掠夺”催生的消费主义、泛娱乐化、躺平、摆烂等不良社会思潮,都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新的社会现实的时间分析,作出积极的理论回应。

应对加速转变的时间秩序,思想政治教育需依据鲜活的具体实际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将时间作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重要思维框架和重要思想原则,依据时间条件的现实转换,审度思想政治教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学科之问,回答时间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和创新的时间逻辑意蕴,剖析时间结构嬗变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呈现方式的内在机理,求索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对于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重要价值,等等。科

学回应这一系列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需要系统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研究,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学。唯有如此,才能从科学的理论思维高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更为精准识别时间的社会构成转变给予其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促使其深度契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开拓理论旨趣,以创新性的理论成果面向新的社会现实,针对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时、度、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重要价值的时代彰显。

参考文献:

- [1] 李辉.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间维度[J]. 教学与研究, 2019(5): 88-95.
- [2] 卢岚. 从互联网到 ChatGPT: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J]. 探索, 2023(2): 163-174.
- [3] 赵建超. 基于虚拟交往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机制建构[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8): 49-54.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本刊记者.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1): 13-22.
- [6] 项久雨.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1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8]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1-07-13.
- [10] 温晓年, 谭秋浩. 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限度[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02-108.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2] 晏辉. 论马克思的“时间”概念及其人类学意义[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5): 19-30.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6] 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0]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 2022-04-26.
- [21] 曾令辉.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内涵式发展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7): 113-120.
- [22]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3] 蒲清平, 黄媛媛. 系统论视域下“大思政课”建设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3): 148-153.
- [24] 韩同友, 王管.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时空融合的逻辑审思[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22): 30-31.
- [25] 项久雨, 龚安静.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 历程、逻辑、进路[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5): 45-53.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8] 田冠浩. “时代精神”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J]. 哲学动态,2019(5):28-34.
- [2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1] 王学俭,冯瑞芝.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及风险防范[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7-45.
- [32] 卢岚.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缘起、动力机制与价值勘定[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05-118.

Time Structure Present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XIANG Jiuyu, GONG Anji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ime to human society reveals the constructive value of time to human's spiritual world. The time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eply contains the log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highlight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story, times and transcendence. The tim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lects the persistence, stage and seque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m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s operating spac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re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mplex state of time itself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ape each other,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different time conditions. The time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as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symbiosis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the linear structure of process evolution, and the staggered structur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structural system represents, jointly shapes and concentrates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objectiv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roces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e subjectiv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tim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important concern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m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lf-confirm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build a theoretical advance,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ti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ime, meta-theory,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陈 卓

ChatGPT 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驱动及其调适

张爱军, 贾璐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ChatGPT 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表达逻辑, 搭建起新的公共政治舆论平台, 这同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变化和范式革命引发的新公共政治舆论的转型。ChatGPT 内部的通用性、开放式交互设置生成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公众间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模式。ChatGPT 成为新公众政治交流对话中的引导性工具, 推动、影响甚至干扰公众对社会事件的政治认知和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表达, 造就出公共政治舆论发展新的独特的情感体系。ChatGPT 驱动公众新政治情感, 导致政治行为发生改变。公众在大型数字语料库的融合内化中建构公共政治舆论场域, 改变网络舆论的主体参与结构, 加剧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的误判风险, 使新公共政治舆论杂糅化, 影响公众政治舆论发展的稳定性。加强与改进对 ChatGPT 的技术、伦理、政策规制, 提升公众应用 ChatGPT 的素养, 将 ChatGPT 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相结合, 实现 ChatGPT 与公共政治舆论的均衡发展, 塑造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公共政治舆论发展格局,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关键词: ChatGPT; 情感表达; 公共政治舆论; 规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3)03-0162-14

政治情感是公共政治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政治情感驱动是公共政治舆论形成的重要动力。政治情感驱动公共政治舆论的过程是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被塑造的过程, 并因此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领域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 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1]从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来看, 人工智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影响公共政治舆论, 并不断推进和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的重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算法系统在网络空间中编织成独特的公共舆论体系, 将异质化的公众汇集成各种不同的价值群体和多元的意识形态群体, 并以各大网络平台为公共政治舆论聚集地和扩散源, 使公共政治舆论从“生产端”到“流通端”至“生成端”的建构方式与机制发生改变。ChatGPT 与社交机器人、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一致性, 即都在政治活动与政治议题中充当具有特定政治性目的的工具和手段。ChatGPT 通过挖掘信息内在的隐喻意义来改变公众政治情感, 形成“政治情感依恋”。ChatGPT 的“政治情感依恋”推进、影响和干扰公共政治舆论。为防止 ChatGPT 作为新数字应用技术介入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化解 ChatGPT 陌生的“工具陷阱”, 平衡人与 ChatGPT 交互下的公共政治舆论, 促进公共政治舆论的良性平衡发展, 需要从 ChatGPT 技术应用涉及的技术、伦理、政策、规制入手, 并相应提升公众的应用素养, 将 ChatGPT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22FZZB018), 项目负责人: 张爱军。

作者简介: 张爱军, 男, 博士,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网络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贾璐, 女,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技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相结合,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43}的同时,建设健康、活力、和谐的公共政治舆论及其环境。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ChatGPT 的出现使人工智能进入“革命性”“颠覆性”发展的新阶段。2022 年 11 月美国 OpenAI 公司发布了一款基于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的人机对话应用程序 ChatGPT,它是第三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继 AIP-hago 之后再一次让全球聚焦在人工智能上的明星产品^[3]。ChatGPT 的出现与应用,迅速引起社会的热烈讨论。

1.1 ChatGPT 相关公共政治舆论问题研究概述

学术界对 ChatGPT 的研究刚刚开始,主要体现在教育、法律、传播、社会、认知、伦理、治理等方面。学者们认为,ChatGPT 为教育模式、教育认知和教学模式、教学认知带来直接影响,而且从整体上看,使教育不但面临着异化,而且还面临着异化危机,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有着多重维度的聚合、分拣与重塑的挑战^[4];ChatGPT 会带来法律风险、干扰司法公正、影响法官律师群体认知;ChatGPT 把传播的“美丽新世界”变成政治现实传播生态,直接引发虚假新闻泛滥、新闻著作权模糊等一系列传播失序问题^[5]，“如果大量知识储存被用来生成假消息和假新闻,便能够看上去像真的,这是新闻传播学界未来要关注的重点内容”^[6];ChatGPT 促进工业发展,迅速催生了全新科技革命的系统、格局和生态,成为变革人类知识生产模式的强大驱动力^[7],但同时导致社会大面积的失业,有可能导致社会抗争;ChatGPT 隐藏着被用于实施主观认知对抗的相应可能^[8],将会对人类已有的伦理价值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与人分道扬镳。

就政治维度而言,对 ChatGPT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层面。这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即机遇维度和对策维度。机遇维度是给政府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 ChatGPT 模型能够在强化科学行政、提升工作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向政府内部提供决策管理支持的“数字运营官”^[10],提升数字生产力、增强决策能力、加速社会组织化^[11];ChatGPT 使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过程实现重构,嵌入公共政治领域并显示巨大的潜能^[12]。对策维度主要是针对 ChatGPT 应用可能引发的国家层面上的数据主权安全风险、政府层面上的行政公共性解构风险,以及个人层面上的数据权利侵犯风险而提出的应对策略。

1.2 ChatGPT 技术与公共政治舆论问题的提出

任何技术的更新与迭代都会为舆论提供新的传播平台。“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3]11}尤其是在新兴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数字时代,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会成为公共政治舆论生成、汇集、爆发、失控等直接或间接的技术平台。

ChatGPT 作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最新代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被推崇应用,颠覆了以往人工智能技术机械驱动特质,其独特的内部思考与自主学习机制,不但赋予 ChatGPT 的机器身份,还赋予 ChatGPT 新的“社会身份”,甚至其“社会身份”比机器身份更重要,更具有优先性身份。ChatGPT 的出现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即从专用人工智能开始走向通用人工智能,从小众应用进入真正的大众应用^[14]。ChatGPT 作为介于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

之间的发展产物,是首个可应用自然语言与公众进行对话的大型数据模型,且能将上下文语义串联实现连续性有效对话,帮助公众在反复的自我选择中获取所需政治信息并形成公共政治舆论。ChatGPT 是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政治参与的“集合”层次。ChatGPT 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相比所展现出的独特性与特殊性,成为新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的重要变量因素。ChatGPT 多方面的影响会直接或者间接引发新的公共政治舆论,并为新的公共政治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研究还未从新公共政治舆论视角本身来分析 ChatGPT 作用公众的政治情感,进而驱动公共政治舆论生成。本文重点讨论 ChatGPT 技术所建构的情感生成、情感存储、情感变动模式可能会导致公共政治舆论新变化,以及为促进公共政治舆论环境的平稳发展,提出规避 ChatGPT 应用所产生的新“工具性陷阱”的应对措施。

2 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革命性“工具”的出现

ChatGPT 是形成新公共政治舆论的新场域和新工具。引起公众注意、建构传播连接、形成信息洪流等是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15]。对特定事件的传播是塑造舆论的外部条件,只有达到一定强度和广度,舆论才有可能产生。如果现实发生的事件从未被传播,未曾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谈不上生成舆论。ChatGPT 标志着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将建构出新公共政治舆论场域。

2.1 ChatGPT 是公共政治舆论的“技术范式”

公众语言形成的公共政治舆论数据语料库随着 ChatGPT 迭代升级而不断变化。ChatGPT 是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的一款智能人工技术,能以自然语言的方式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表达逻辑,是对智能技术发展中所涉及的算法、算力以及数据系统的颠覆性、范式性革新。GPT 模型利用 Transformer 模型作为特征提取器,是第一个引入 Transformer 的预训练模型。2018 年第一代 GPT 语言模型诞生,其以 1.17 亿个参数为基底,借助网页内部的文字完成数据语言训练。随后出现第二代 GPT,即 GPT-2,以 15 亿个参数为算法运行基础,所具有的 40G 网页语料库可以支持高质量文字的生成与简单翻译程序。研发者在 2022 年 5 月创造 GPT-3 时纳入了海量参数,1750 亿参数数量和 45TB 的训练数据成为 GPT-3 算法的支撑内核。2023 年 3 月 15 日正式对外发布的 GPT-4,属于一个大型多模态模型,对其数据输出内容的真实性与可控性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是以数据为运转核心,以算法机制为运行框架,从而实现对公众输入意见的自动化伙伴、自动化执行、互动化输出和自主化互动。但其内部算法机制设置中本就存在算法偏见、预测偏差甚至部分的算法“黑箱”问题,随着 ChatGPT 数据系统的扩大升级,这些问题并不会在技术迭代中消亡,而是会转变植入并在公众意识状态下完成信息输出与情感牵引。

ChatGPT 数源量包含有巨大的政治数源量,这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政治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认知,并产生新的政治认知,从而改变公众刻板印象产生的政治情感模式,对社会公共政治舆论产生颠覆性影响。ChatGPT 以改变公众政治认知为起点,以重塑公共政治舆论情感为手段,促使公共政治舆论形成、聚集、疏导,将整个舆论运行逻辑以技术形式体现出来。

2.2 ChatGPT 是“灵魂”形态的“舆论工具”

ChatGPT 是软件主导的“数字灵魂”,改变了传统公共政治舆论的形成模式。ChatGPT 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机器人”不同。“软件机器人”与“物理机器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外部形态与内

部核心技术的运用。软件与硬件是人工智能系统构成的两大技术基础,智能机器人内部系统的构成逻辑是其话语逻辑输出的先决条件。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机器人通常会以机械形态的金属外貌出现,内部的算法程序是物理机器人运作的基本参照样本,可以说是被算法预设的软件系统为了配合硬件性能而设计的,是被硬件主导着的“机器大脑”。物理机器人通过被主导的“机械大脑”与公众的对话通常是观点意见的机械化传输,并不能轻易改变公众的情感偏向,甚至会由于机械化的过度陈述激起公众的逆反心理,不能与公众情感相契合,进而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公共政治舆论效果。

ChatGPT 的“软件机器人”被创造出来后,便彰显了“软件机器人”形态与功能上的独特价值。如果说“社交机器人或将重塑信息传播模式和媒介生态,引发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16],那么 ChatGPT 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定义了机器人,机器人不再被严格限定于拟人的机械自动化工具,其范围开始向人工制造的、脱离特定物理形态的智能工具拓展,成为“灵魂形态”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与公众通常以聊天对话的形式完成政治舆论价值与观点态度的输出,其内在的算法、算力、数据成为主导“软件机器人”的核心价值定位。“软件机器人”价值的组成部分与行为质量产生的政治基础是以公众的政治情感为基础的,这意味着 ChatGPT 系统内部算法、算力以及数据系统正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可以满足大多数公众的政治情感需求。人与 ChatGPT 交互,带来三种主要类型的公共政治舆论,即积极性公共政治情感舆论、消极性公共政治情感舆论、沉浸式公共政治情感舆论。

2.3 ChatGPT 是新公共政治舆论诞生的“思维革命”

ChatGPT 的出现与传统意义上的数字技术不同,其拥有“拟人化”的价值观与“自然”模式的行为标准,可将公共政治舆论中的情感变化以暗示性的手法向公众传输,在实践中消解了公众与机器人的意见交互过程存在的编码与解码二者之间的连贯性问题。未来的数字化工厂未必是物理机器人彻底代替人工的无人化,但一定是软件机器人大显身手的舞台。ChatGPT 作为大型多模态语言模型的智能工具,是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前端代表之一。

ChatGPT 在许多现实世界场景中的能力虽然不如人类,但在各种专业和学术基准上表现出人类水平,这就为公众对 ChatGPT 生成内容形成政治信赖与公共政治舆论依靠提供了专业条件。ChatGPT 的发展推动着数字科技与经济开始由叠加发展向融合发展过渡,促使经济发展开始向数字价值经济模式发展,同时经济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公共政治舆论环境的变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公共政治舆论环境正在从简单传播式舆论向汇集式舆论转变。当 ChatGPT 被普遍应用后,使得人工智能的使用者被多元信息、政治交错、情感杂糅、价值汇集的平台所浸染,产生多维且变化着的政治情感和舆论认知需求。同时,ChatGPT 以便捷化、海量性、灵活性的大型自然语言应用工具的身份出现,会诱发部分职业人群产生失业危机,公众的政治权利无法得到确切的物质保障、尊严保障,会被替代的风险由点向面扩散,恐慌、焦虑的情绪开始在公共政治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ChatGPT 推广应用下所创建的新数字公共政治舆论环境将会加大公共政治舆论群体的情感起伏,使公共政治舆论环境的风险增加。

3 新“工具”导致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生成

情感的产生是由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人属性共同决定的。情感能够调节公众的自我认同、调

动公众的政治认知走向、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甚至引导公众的公共政治舆论方向。ChatGPT 通用性、开放式的交互设置,改变了以往简单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公众间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生成模式,其生成系统的技术设置拥有极端理性与目标驱动特征,即技术可通过交互数据实时洞察公众政治情绪但无感情感知的现状,形成了公共政治舆论发展新的独特的情感生成体系。

3.1 情感储存:实时建构中的大型公共数据语料库

ChatGPT 不仅是一种对话式的语言模型,也是强大的网络话语生成机器,更是网络公共政治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语言模型是一种机器学习模型,它被用来生成类似人类所用的文本。语言模型的目标是能够基于之前出现的单词,预测给定文本中的下一个单词或单词序列。公共政治舆论的形成也正是由单个语义的单词组成的。就语言模型来看它是由编码器和解码器两部分组成。

海量语料库成为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获取来源。ChatGPT 通过自身的语言学习系统与外在预训练投喂模式建构海量的政治情感储存器。在 ChatGPT 应用中,公众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表达也是由编码和解码两个部分组成。这主要是通过分析引发公共政治舆论争议的事件可能产生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变动,即编码构成的分子单位,汇入 ChatGPT 海量的数据库将情感进行数据转化与归类,对情感、价值、态度进行明确定位与排列,生成与解码程序一致的输出形式,形成公众从 ChatGPT 获得的政治信息,最后借助 ChatGPT 模型处理长序列和跨越序列中的依赖关系,完成公共政治舆论形成中的编码与解码程序。因此,ChatGPT 可以成为公众进行政治参与、发表政治意见的重要途径。ChatGPT 对社会公共信息进行编码、解码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学习、持续更新的状态,也是扩大政治语料库的手段。这主要是由于 ChatGPT 的训练数据主要源于互联网的海量数据,训练形式则是相关技术人员的“投喂”。“投喂”数据的质量基本依靠研发公司制定的规则以及具体的算法工程师的把关。从“投喂”到“把关”是 ChatGPT 建构实时大型公共数据语料库的过程,也是被训练的过程。

“投喂”式的数据储存成为公共政治舆论中的情感训练手段。公共政治信息数据的“投喂”就可以被看作是 ChatGPT 语料库建构的初步程序,即预训练过程。预训练作为 ChatGPT 语料库的政治信息数据来源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其预训练的方式与场域多以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化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由 ChatGPT 内部情感系统形塑的“三观”,即系统处理文本中的立场、意识形态偏向和价值偏好,直接受到研发公司的灌输,这些都受 ChatGPT 编码与解码统一后的政治情感影响,最终所形成的公共政治舆论以及所表达的情感偏好携带着明显的政治属性、文化属性、资本属性和阶层属性,其自我定义的理性、中立、客观标准,实则成为实现政治目的连锁性悖论。

3.2 情感生成:对话式的自然语言传输系统

ChatGPT 改变了公共政治舆论的生成模式。“公共政治舆论在诺依曼笔下被视为社会的皮肤,它敏感而脆弱,是社会的外在保护层。”^[17]¹⁸⁹ 网络技术的社会连接是这个“社会保护层”搭建成功的基础骨架,社会事件中的公众认知与情感生成则是构成“社会保护层”的核心成分。

人机交互的公共政治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组成部分,与大众传播时期的信息传播模式不同,在这个信息流动频繁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8],公共政治舆论促成的决策也开始由传统民主决策逐步转向新型民主决策。ChatGPT 的出现对公

共政治舆论的生成、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其对话式的自然语言传输系统开启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交流、交往的新模式。巴赫金认为,“生命成为事件性的存在,主要源于对话,以对话的方式展开,经由对话而逐渐丰富,并始终走向未完成的对话”^[19]。ChatGPT 以自然语言对话的形式给公众一种“交往错觉”。“交往错觉”使公众忽视了交往对象的“机器身份”,使公众产生 ChatGPT 充当的仅是聊天介质的“错觉”效果,这种与“真人”交往的幻觉所产生的连贯性与舒适性使得 ChatGPT 的“机械身份”被忽视,ChatGPT 的“社会身份”被关注。尤其是在面对可能会引发公共政治舆论的问题上,公众在与 ChatGPT 的实际对话中会受到层层否定的跟进性提问,并拥有在对话中回答后续问题的能力,这种问答式的、不断通过提问者的否定来层层深入完成问题探讨的方式,正是著名的有“苏格拉底助产法”之称的辩论术。

ChatGPT 带来政治输出与政治输入的新平衡。在回答中对公众输入问题与输出问题二者关系进行评定,并以否定或选择的方式给予公众政治决策自主权,这种看似被动的应对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辩证逻辑的内在引导,既可满足公众在公共政治舆论上的选择权,也可在否定逻辑中将 ChatGPT 程序设定者以及海量数据库中的大多数情感偏好潜移默化地传输给公众。以引导式为主的传播体系对公共的情感表达进行着沉默式的无声干涉,并使公众产生在“否定中选择”的幻觉,将大多数人的政治情感与价值认同误判为自身的舆论选择,使得公众在公共政治舆论中的情感表达方式被改变。这与 ChatGPT 运行的内在逻辑有着必然联系,“它总是从正与反、内与外、现象与本质,或者中与西等两个层面或者两个方面同时展开,这两者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为一体”^[20]。

人与 ChatGPT 交互共同形成整体化的公共政治舆论。人机交互的政治舆论的典型特征是共生和共传,进而形成人们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新政治辨识,促使 ChatGPT 成为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的参与者与建构者。在传统的公共政治舆论中,无论公共政治舆论是否真假,其实质都是人的公共政治舆论,而在人与 ChatGPT 公共政治舆论共生和共传的过程中,人的公共政治舆论与 ChatGPT 生成的公共政治舆论各占一定比例,或者是人支配 ChatGPT 的公共政治舆论,或者是 ChatGPT 支配人的公共政治舆论,因而与传统的人造公共政治舆论相比,人与 ChatGPT 共同生成的公共政治舆论都处于真假难辨的极端复杂状态。

3.3 情感转换:交互修正下的自我微调

ChatGPT 借助交互修正的自我微调手段来实现对公共政治舆论发展趋势的微调。交互修正能力是 ChatGPT 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这表现为在人与 ChatGPT 的交流过程中,ChatGPT 被指出问题后,其内部系统会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及时准确地修正相关信息。

第一,ChatGPT 导致政治情感转化。ChatGPT 系统以 GPT-3.5 为基础模型进行了两次微调,分别以人工标注的对话数据和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步骤进行微调,即使每次微调的数据仅是海量数据的微小部分,也会在人类的政治情感互动中展示出强大的通用能力。尤其是在对政治事件的判断与情感转化上,数据语料库的微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公共政治舆论事件细节的补充,是公众了解真实、全面、客观的社会公共政治舆论事件的前提。在应用中无论是面对公众表达出的明确的修改意见还是轻微的怀疑态度,ChatGPT 可以快速、准确地捕捉到公众表达出的修改意图,并且会依据所修改的部分再次做出与公众价值认同与情感态度更贴合的“正确解释”。自我交互的修正能力给予公众在 ChatGPT 应用的信息交互中完成政治情感转化的机

会,汲取并理解实时变化着的公共情感与价值内涵,是将个人公共政治舆论情感与大众政治态度结合后进行转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内部微调系统导致公共政治情感舆论升级。内部微调系统具有自我否定性的特征,内部微调系统的否定性不仅是对 ChatGPT 内部系统的迭代升级,也是人工智能进行政治参与、表达政治观点、展现政治态度的过程。ChatGPT 系统的政治情感表达是经过系统设定而外显的,把 ChatGPT 进行政治参与看作是系统创建者的政治参与,ChatGPT 进行公共政治舆论情感站队看作是系统创建者的公共政治舆论情感站队,ChatGPT 充当的就是政治情感转化的工具,交互的自我修正系统就是程序创建者进行公共政治舆论情感转化的手段。

第三,ChatGPT 的指令微调可激发语言模型潜能。人工构建指令微调数据的过程可能会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ChatGPT 的政治参与的外在表现者虽是拥有政治权利的一般舆论主体,实则是人工智能系统所表达意见的执行人,人工智能将集体意见中和产出其独特的观点和意见,再借人的行为、话语和意识展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主观态度向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转化过程,并在公众与 ChatGPT 交流中完成公共政治舆论情感表达的“多次转化”与“意见综合”。

4 情感驱动造成公共政治舆论“陷阱”

ChatGPT 作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和通用目的技术(GPT)发展的里程碑,颠覆了以内容为中心的传统大众传播模式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迎来了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暗网式”大集市传播模式,将极大改变现有的政治情感形成规则、政治情感结构秩序以及政治情感建构伦理,是一次社会权力的再转移与再分配。ChatGPT 应用中所引发的情感变动可能引发社会公共政治舆论“陷阱”,进而导致公共政治舆论场域的混乱与失控。

4.1 舆论主体:随机答案背后的舆论误判

“舆论主体即是由能动的个体组成的,在社会中进行舆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社会公众。”^[21]从公共政治舆论发展来看,舆论主体作为舆论活动的承担者,是社会运行构成的有机分子。受社会整体舆论环境发展的影响,舆论主体既营造舆论,又会随时调整舆论生成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方向。舆论主体在主导舆论活动的同时,也会承担相应的义务,否则主导舆论活动会异化为误导舆论活动。

其一,ChatGPT 的“初始性综合判断”形塑“机械化”公众。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公众的舆论表达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和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主体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存在物”^[22]。ChatGPT 作为现代数字科技的最高表现形式,其内部被设定的修正学习系统赋予 ChatGPT 自主“学习能力”,借助自身机器语言和逻辑向公众传输类似于“标准答案”的“初始性综合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综合判断,不是机械化的复制或叠加某种结论。目前 ChatGPT 内部模型的知识更新依旧停留在 2022 年,海量的原始数据库内最新的知识储备尚未在 ChatGPT 内部系统同步更新,且 ChatGPT 的对话式的观点生成依据是根据海量语料库内特定单词或单词序列一起出现的概率,进而生成文本,形成带有随机性的答案。ChatGPT 正是利用这种“初始性综合判断”,在公众心中塑造成一种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机械化”公众。

其二,ChatGPT 促使公共政治舆论误判。具体社会事件中的公众在与 ChatGPT 这个“机械

化”公众进行政治情感的互动、交流,完成公共政治舆论主体的社会性要求,在改变与被改变中实现私人言论的社会性转变,从而将公众情感推入公共性的社会性场域中。当错误或偏见信息与公众认知碰撞时,即便公众在对话过程中形成了综合化的舆论观点,但其中的误判也会影响公众对社会舆论事件的正确认知。被公众视为倾诉对象的 ChatGPT,不仅以重组的社会性情感逐步成为引导公共政治舆论情感发展的重要主体,还将系统生成意见以自然对话交流的形式与公众情感融合,试图借助集体情感的力量影响公共政治舆论走向,造成公共政治舆论误判。

4.2 舆论议题:数据操纵中的西方民主名实不符

ChatGPT 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代表,是社会舆论议题传播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数字时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平台。ChatGPT 作为大型自然语言通用模型,是不断发展着的数字化智能技术。其中资本或政权对 ChatGPT 迭代发展中的模型的评价,不仅是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发展的关键,也是资本或政权介入公共政治舆论议题、操控意识形态、影响公众情感表达、干扰公共政治舆论发展的手段,形成基于数据的“表层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其一,ChatGPT 生成“霸权式”意识形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3]⁹ 与之相似的还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等内在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民族、社会等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精神源泉。随着公众对 ChatGPT 的广泛应用,ChatGPT 开始由被动的工具性角色转向主动的意识形态建构手段。在对 ChatGPT 应用中某些恶意行为者可能会通过这些模型自动生成大规模且极具说服力的误导性或暗示性的虚假公共政治舆论,制造影响力,暗中操纵意识形态建构,并试图以重构意识形态的模式改变公众原有的政治情感与态度,建构西方意义上的“霸权式”意识形态。

其二,ChatGPT 具有生成假民主的可能性。语言模型的评价方式主要以人工评价为主,通过使用与 ChatGPT 的对话体验,综合自身需求对 ChatGPT 服务的质量进行打分,打分的高低依据相关性指标进行把控。通过这种人工评价的打分行为可对 ChatGPT 数据库进行微调与补充,从而把控现阶段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动态、拥有的社会情感,以及分析研判出公共政治舆论未来可能的聚集热点。然而,这种看似民主化的技术微调过程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作用于 ChatGPT 中的语言系统模型运行,而是会经过后台程序“把关者”的筛选,只有经过筛选的意见才会纳入模型数据库中。把关者的人选常被资本方垄断,使公众与 ChatGPT 沟通过程中所表述的公共意见与情感价值偏好停留在对话阶段,并未实现对社会性事件态度或观点的有效传播,从而出现表面一致的西方民主假象。

其三,ChatGPT 自动评价易生成“机械智能民主”。“大数据对公共政治舆论生成带来的风险源于大数据技术本身存在的逻辑缺陷、伦理风险和思维陷阱。”^[24] ChatGPT 内部也同样置有大数据机制,然而不相同的是,单一的大数据系统是以算法设定为发展轨迹,ChatGPT 内部的数据系统会结合人的选择态度与偏好进而选择数据和推出内容。由于数据系统本身的无情感特征,ChatGPT 内部数据的选择性生成仍然是以冰冷的数字为依据,经过系统生成的统一“流水线”给出答案,由此推出符合公众的舆论议题与舆论观点,从而形成符合西方民主要求的公共政治舆论环境。例如 ChatGPT 的自动评价系统,其内部系统的自动评价是指通过自动方法使用评价模型生成对话系统对上文回复的评分,主要借助统计评价指标或者评价模型,使用可量化的指标来评价对话系统的性能。自动评价虽然具有高效率、低成本、评价结果客观且可复现、能够处理

多维度评估等优势,但仍然未能摆脱模型内部审核的公共政治舆论议题与政治情感价值的把关机制,并不能实现公共政治舆论议题选择与发展上的民主。如果人受到 ChatGPT 影响和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塑造成新的“机械智能民主”。

4.3 舆论生态:机器主导后的情绪失控

ChatGPT 以对话式、实时性、连贯性的特征对公共政治舆论生态系统进行重塑。“网络舆论生态是网络舆论主体、网络舆论资源、网络舆论环境在网络空间所呈现的一种可供人评价和衡量的自在运动状态。”^[25] ChatGPT 被称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同时也以新变量的形式介入舆论生态系统。“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公共政治舆论发展融合,将会促使舆论生态系统整体发生剧烈变化。”^[26]

其一,ChatGPT 改变了网络舆论主体的结构。一方以公众为主体,另一方以 ChatGPT 为主体,即形成公众与 ChatGPT“二元化”结合的双主体结构。在双主体结构下,ChatGPT 的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新公共政治舆论生态,并同时具有引发新公共政治舆论生态失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新公共政治舆论失控的核心源是人的情绪失控,这是因为人在和 ChatGPT 对话中,具有调动和激发人的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极端化甚至会导致人类的自杀行为。就与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关系来说,人的情绪一旦失控,就会引起新的公共政治舆论及其生态的失控,其表现是新公共政治舆论严重偏离了新公共政治舆论正常运行的轨道,造成人与人、ChatGPT 与人之间立场、价值、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新公共政治舆论失去公共性。

其二,ChatGPT 造成新公共政治舆论的杂糅化。ChatGPT 作为“非人”,不具有人类的思考能力或道德伦理价值。它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工智能模型,也称为聊天机器人。虽然 ChatGPT 在回答问题时也会表现出道德警觉,但它不具备人在社会化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自我意识的人格和人类的身体,只有数字共同体中的数字化人格。ChatGPT 以“数字化”人格的形式进行公共政治舆论输出、完成公共政治舆论引导,借助综合化的数据结论将技术背后的资本或政权观点进行自然输出。ChatGPT 成为以整体社会公众的政治情感价值倾向为基础的个人情感价值要点提取库,在价值提取过程中对社会公共情感价值进行集结、归纳、筛选和再整合。这样会使原有的公共政治情感价值被庞大的数据信息所淹没、被资本介入的算法程序价值所腐蚀,并被强大的算力系统所左右。由此,公共政治舆论的生成模式也就由单一、主动的获取变成了主动与被动的结合,成为集体政治舆论价值观的汇集,而生成的公共政治舆论既是公众意见的情感表达,也是数字资本的发展诉求。

由于受到 ChatGPT 上述系统内部设定的影响,ChatGPT 通常以综合性的事件判断对公众态度加以引导,这加剧了网络事件中公众意见的杂糅性、相斥观点的渗透性、公共政治舆论的消解性以及未来发展的风险性,从而产生网络舆论信任失衡、网络舆论表达失效、网络舆论话语传输中断等一系列网络舆论问题,进而产生由情感与信任缺失而导致的情绪失控,最终造成公共政治舆论生态紊乱。

5 建立把 ChatGPT“装进笼子里”的机制体系

在政治与技术互嵌、真假杂糅的技术景观下,公共政治舆论传播呈现出域化、复杂化和动态化特点,而新传播范式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旧有治理模式的变革与新治理模式的出现。ChatGPT

作为一种新型的自动化智能传播方式,对教育、法律、传播、社会、认知、伦理、国家治理等产生深刻影响,只有从各个方面健全 ChatGPT 在实际应用中的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将 ChatGPT 的运行逻辑与应用模式装进制度与机制的“笼子”里,才能破解公共政治舆论传播模式下 ChatGPT 可能带来的“工具陷阱”。

5.1 技术规制:打破数据传播壁垒

ChatGPT 的内容生成是通过学习大量的文本语料库并经由模型训练而实现的,内容生成包括“数据库”“算法模型”两大关键因素。由于 ChatGPT 是一种无感知的语言模型,对输入数据的处理是基于训练数据中的出现频率和语言模式,在公众与 ChatGPT 的对话中可能因数据而产生的新公共政治舆论具有变异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这种变异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又因每一个个体的诉求不同,形成了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第一,借助技术修复手段弥补舆论漏洞。“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政治舆论发展、变化多样,政治信息流通手段和流通内容也更加丰富,呈现出主体数字化、话语多模态化、表达情感化、传播精准化以及互动仪式化等新特征。”^[27]加强对 ChatGPT 的风险认知,厘清 ChatGPT 制造的新公共政治舆论风险与传统公共政治舆论风险的边界,用与 ChatGPT 及时跟进的相应技术制约 ChatGPT 技术,是化解 ChatGPT 带来的新公共政治舆论风险的主要手段。ChatGPT 是以数据为风险载体,即数据的风险就是 ChatGPT 的风险。ChatGPT 的风险表现为干扰正常、平稳的舆论场域,为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健康平稳发展带来隐患。从 ChatGPT 的实践数据库与算法模型的运行机制的核心把控层来看,其技术系统设定是以西方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为主。在中国的使用中并不能直接采用原生态的数据语料库与输出程序,需要增加对应的翻译环节。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使用中的语言问题,以清除交往障碍。但这种翻译是按照原先设定的西方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进行的,因而需要实现价值观转换,促进新公共政治舆论场域稳步革新;需要重视技术治理的作用,利用技术削弱算法可能对舆论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利用好 ChatGPT 内部系统的对话规律,熟悉并把握 ChatGPT 自我修正功能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将修正技术的辨别、修正、阻拦的实际效能发挥到最大,以此来弥补或修复 ChatGPT 可能产生的公共政治舆论漏洞。

第二,利用技术叠加建构三维舆论传播空间。当数据和算法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时,意味着数据与算法成为社会舆论传播空间的掌权者。这种由数据技术搭建的虚拟空间成为上亿公众的线上聚集地,成网状编织的数据流动库极大缩短了公共政治舆论发生、扩散的时间。只有通过建构三维的舆论空间才能使实时监测舆论动态、全方位观察舆情变化、各层次研判舆情走向成为可能。三维公共政治舆论空间的建构需要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叠加与融合。ChatGPT 的出现为所有人提供了以自然语言对话方式进行文本生成的新方式和新工具,不仅将数据生成过程日常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度降低了构建元宇宙的门槛,可以用与构建互联网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元宇宙。这不仅是促进数字技术的交叉式融合发展,更是借助通用化的大众手段对元宇宙等“云端”技术进行祛魅的过程。且 ChatGPT 与元宇宙技术叠加,可发挥 ChatGPT 海量数据语料库的储存与生成优势并将其纳入元宇宙内实时监测的数字化全息空间,对社会公众的政治情感进行正向与负向分析。以此为数据基础分析,化解国内缺少专业性数据语料库建构话语权的焦虑。与此同时,三维视角的元宇宙虚拟空间也是对 ChatGPT 内部算法机制运行的一种约束,可将其禁锢在相对透明的可视场域,实现以虚拟空间内部的客观舆论发展影响现实

物理空间的舆论走向,从而打造出沉浸式、透明化、立体性的三维公共政治舆论空间。

5.2 制度规制:弥补技术创新缺陷

ChatGPT的发展具有诸多不可测性因素,对公共政治舆论的生成与影响同样如此。需要对ChatGPT进行法治规制、制度规制、伦理规制和政策规制。因为法治和制度具有滞后性,伦理与政策具有及时性,伦理与政策的跟进就具有及时性和迫切性。

首先,健全伦理法规,进行制度约束。为促进公共政治舆论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依据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这需从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去考虑,建立健全ChatGPT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规范,更加精准地把握好公众政治情感整体走向,稳定公共政治舆论环境。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且相互联系,二者都会对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起到约束的作用。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并相互包容。在ChatGPT的使用中需要规避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ChatGPT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思想的机器人”,ChatGPT在发展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与使用ChatGPT,将ChatGPT看作是为人类服务的技术性工具,发挥ChatGPT在社会公共政治舆论中的技术性工具作用,并及时以法律的力量对ChatGPT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研判,才可缓解涉及的伦理问题继续扩大。同时也要在使用ChatGPT的过程中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化解公众在使用ChatGPT这种交互式对话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成瘾性或依赖性,促使公众以自身为基点对公共政治舆论情感进行理性辨别,进而对公共政治舆论形成正确的认知。

其次,调整运行逻辑,重塑应用规则。从应用处入手降低ChatGPT新智能技术对公共政治舆论与政治情感发展的消极影响是目前比较现实与比较可靠的操作手段。这主要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个人的约束无处不在,且意识形态引导并制约群体选择和共同行动,即“认同—排斥机制”,决定了哪些信息足以塑造舆论,哪些信息又被无视。通过积极调整运行逻辑方式重塑ChatGPT应用规则,及时调整治理场域及其价值向度^[28],将公众自身的信息获取权与舆论生态发展观相结合,设立ChatGPT的应用边界,以此来降低公众对ChatGPT应用的信息依赖与情感依赖,阻断西方价值观通过ChatGPT应用不间断式传输。在保证社会舆论主体自由理性表达政治情感的同时,不危害公共利益、不扰乱公共政治舆论生态、不动摇社会主流价值观。在ChatGPT等新技术普遍应用并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规则,遏制失范的表述行为,借助他律来保证网络公共政治舆论空间的有序性与政治情感的稳定性。

美国在ChatGPT诞生的同时就强化了对其约束的伦理和法治规则,而英国在这方面更为明显。英国政府发布了针对人工智能产业监管的白皮书,白皮书提出了监管人工智能的新方法,并概述了监管机构应考虑5条明确原则,即安全性和稳健性、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公平性、问责制和管理,以及可竞争性和补救性^[29]。这五条原则对ChatGPT具有约束力作用。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宣布从2023年3月31日起开始限制OpenAI处理意大利用户信息数据,同时对其隐私安全问题立案调查。法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对ChatGPT数据的抓取机制与使用规范也都开始效仿意大利的做法,从各方面限制ChatGPT的日常使用。中国在ChatGPT技术与国内百度创建的“文心一言”的监管上不仅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成型的解决措施,还应遵循我国特定的国情与国家发展规律。2023年4月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起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是将技术装进“笼子”里的表现。

5.3 自我规制:建构发展保护屏障

自我规制包括诸多内容,比如科技道德内化、法治内化、科技自治等。但目前需着手解决两大主要问题,即提高自我素养和加强科技巨头的自我善治认知,以此从主体视角对 ChatGPT 使用进行自我规制。

一是提升公众素养与舆论发展认知。公众素养主要包括道德、认知、情感,相应地建立道德评价机制、认知提升机制和情感调控机制。提升公众自身的素养是应对数字媒体迭代升级中公共政治舆论“思想陷阱”的有效途径。数字时代舆论环境下的公众素养主要是由数字社会交往与参与素养、数字技术使用与辨别素养以及数字信息消费与应用素养构成。ChatGPT 虽是以强算法、算力与数据构成的大型语言智能模型,是数字时代公众进行政治参与、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渠道,正确使用 ChatGPT 也被看作是公众拥有数字社会交往与参与素养的表现,但由于其数据根源是以广大社会公众观点为主,在某些事件中 ChatGPT 可能产生虚假、误导、无意义或质量差的政治信息与情感表达,因此公众需在与 ChatGPT 进行对话交流中提高对 ChatGPT 给出答案信息的辨别能力,并利用 ChatGPT 内部的自我修正系统传输自身坚持的正确观点。在纷杂的网络信息空间,以自身所拥有的素养及其辨别能力为基础形成对公共政治舆论的理性认识。ChatGPT 语料库容纳的是整个社会公众政治价值观,公众在与 ChatGPT 的对话中可能产生“情感抗争”与“社会泄愤”类话语,须认识到愤怒、同情和戏谑可能成为公众产生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30],因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来抵制 ChatGPT 对话中公众身份由主导者向被主导者的转变,从把控自身变量出发提高辨别新“思想陷阱”的能力。

二是资本要有数据利用的底线思维。资本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动力,但需要给这一核心动力加上制动装置,即建立防止 ChatGPT 的泛化导致社会大量失业的机制和化解社会因此抗争的机制。网络技术治理中“网络技术”的基础是数据,数据既是技术资源也是社会资源与政治资源。在加强约束“数据”的同时,资本要有利用海量数据的底线思维,即利用海量数据又不能滥用海量数据。ChatGPT 的出现与应用不仅是资本力量集中的一种形式,更是以技术为介质将公众观点“全数据化”分解的过程。这与以往简单数字化的植入不同,ChatGPT 生成新公共政治舆论,并会因此形成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要求资本对 ChatGPT 技术系统进行“善技”设定,由“善技”达致“善论”。这主要包括:建设良善的新公共政治舆论、建构健康的意识形态、塑造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宽容的政治情感等。防止资本对 ChatGPT 赋恶权、赋恶能,尤其是通过赋恶权、赋恶能来滥用、侵犯、侵占个人隐私,进而通过掌控个人隐私形成“恶权”“恶能”操纵的假公共政治舆论,实则成为资本政治舆论,失去了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资本需要遵循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规律,遵循 ChatGPT 形成新公共政治舆论的公共逻辑、公共情感,才能不断地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否则就会出现社会对抗资本进行反制的问题,使本应资本与社会的共赢局面变成资本与社会的共输局面。

6 结语

ChatGPT 作为大型自然语言数据模型,受 ChatGPT“人为数据库”建构模式的影响,在应用中展现出明显的“人的特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 ChatGPT 视为机械化工具,更应将其视为机器

与人的结合体,以动态的思维逻辑对待 ChatGPT 的出现、应用、普及对公共政治舆论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ChatGPT 技术介入公共政治舆论情感的生成、储存、转化环节,成为公众对舆论事件判断的掩盖物,使公众陷入由 ChatGPT 技术工具搭建起来的舆论陷阱。为平衡公众既可以从 ChatGPT 应用中获取信息的需求,同时又能对公共事物的发展形成正确的认识,应尽快建立健全 ChatGPT 在实际应用中的规则制度,重视公众自身的自我应用规制,提高技术素养与辨别意识,明确人在公共政治舆论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这就需要应用者在实践中善用技术规制,纠正数据偏差,积极借助技术化解公共政治舆论风险,全方位、各层次破解 ChatGPT 应用可能带来的“工具陷阱”。

参考文献:

- [1] 王永贵.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114-12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王建磊,曹卉萌.ChatGPT 的传播特质、逻辑、范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144-152.
- [4] 卢岚.从互联网到 ChatGPT: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J].探索,2023(2):163-174.
- [5] 郑满宁.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新闻业:嬗变、转向与应对——基于 ChatGPT 带来的新思考[J].中国编辑,2023(4):35-40.
- [6] 张洪忠,黄民烈,张伟男,等.ChatGPT 的技术逻辑、社会影响与传播学未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24-31.
- [7] 顾维玺.类 ChatGPT 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J].中国信息界,2023(2):32-35.
- [8] 许鑫,刘伟超.ChatGPT 热潮中的冷思考:警惕信息工具用于认知对抗[J].文化艺术研究,2023(1):72-75.
- [9] 陈潭,刘璇.智能政务 ChatGPT 化的前景与隐忧[J].电子政务,2023(4):36-44.
- [10] 黄璜.赋物以“智”,赋治以“慧”:简论 ChatGPT 与数字政府建设[J].学海,2023(2):35-40.
- [11] 谢新水.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功能张力、发展趋势及监管策略——以 ChatGPT 为分析起点[J].电子政务,2023(4):25-35.
- [12] 何哲,曾润喜,秦维,等.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J].电子政务,2023(4):2-24.
- [13] 邱沛篁.新闻传播百科全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14] 钟祥铭,方兴东,顾烨烨.ChatGPT 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J].传媒观察,2023(3):25-35.
- [15] 易涤非.网络时代的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J].人民论坛,2020(16):118-121.
- [16] 郭小安,赵海明.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角色的两面性及其超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2):122-131.
- [17]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8] 郭小安.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J].新闻界,2019(12):27-37.
- [19] 郝徐姜.生命即对话——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生命维度[J].中国比较文学,2022(4):56-72.
- [20] 张生.ChatGPT:褶子、词典、逻辑与意识形态功能[J].传媒观察,2023(3):42-47.
- [21] 李双龙,郑博斐.舆论主体及当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诉求[J].当代传播,2014(5):31-33.
- [22] 张志伟.主体概念的历史演变[J].教学与研究,1996(5):66-68.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张爱军,梁赛.大数据对政治传播的异化及消解理路[J].湖北社会科学,2020(11):24-31.

- [25] 吴凯. 主体引导、调试机制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J]. 重庆社会科学, 2017(3): 99-107.
- [26] 苏宏元,王月琳.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变化及其治理[J]. 中国编辑, 2022(12): 21-25.
- [27] 荣婷,张爽.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情新特征与新治理[J]. 传媒, 2022(8): 74-76.
- [28] 徐国冲,卢之卿,潘金鲜. 走向治理效能评估:基于场域、价值与角色的三维分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109-119.
- [29] 英国政府出台政策文件 支持人工智能监管创新[EB/OL]. (2023-04-13).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13/c1002-32663843.html>.
- [30] 郭小安. 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 国际新闻界, 2019(1): 115-132.

Emotional Drive and Adjustment of ChatGPT's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ZHANG Aijun, JIA L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ChatGPT imitates human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logic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and builds a new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platform, which is a subversive change and paradigm revolu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versatility and open interaction settings within ChatGPT generate an emotional model of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public. ChatGPT has become a guiding tool in new publ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hich could promote, influence even interfere with the public's political cognition of social events an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public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and generate a new unique emotional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ChatGPT uses the public's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emotions to drive the change of public behavior and attitude, so that the public can build a public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ield driven by emotion in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a large digital corpu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s changed, which aggravates the risk of misjudg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resulting in the hybridization of new public opinion, thereby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ethical, policy and literacy regulation of ChatGPT, combine internal mechanism governance with external system supervision, realize the unity of ChatGP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and shape an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modern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ChatGPT, emotion express, public political opinion, strengthen regulation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从连环画到网络图文:图像视域中的 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

吴艳东,张金玉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图像经过编码后具有传递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利用通俗视觉图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党的政治意志融入连环画中,从而使抽象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连环画遂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利用连环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方针政策、主流价值观念等通过叙事、转译和隐喻等方式展现,呈现出内容生产场景化、价值传播潜隐化、目标受众大众化的特征。这一举措在增强政治认同、摒弃落后思想、推动政策施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从中获取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社会网络图文的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利用网络图文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的过程中,要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图像符号体系,借助强大的传播载体提高影响力,更要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从而使网络图文切实有效地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服务。

关键词:连环画;网络图文;图像化;意识形态;具象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3-0176-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43}。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具象化是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进主流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伴随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与传播实践的深入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积极跟进。关于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由抽象理性向具体形象转化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具象化^[2]。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典型形式主要有图像、音乐、仪式^[3],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数据也是其表现形式^[4]。目前学界更多基于图像来考察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表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内容进行研究^[5]。二是针对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方式展开论述,如有学者认为图像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包括象征、隐喻、叙事和形塑等^[6],还有学者专门论述了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隐喻逻辑^[7]。三是考察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生产的原则遵循^[8]。尽管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对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展开了研究,但基于历史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成功经验的研究成果较少,更鲜有学者对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图文载体进行关联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俗称“小人书”)为切入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战略价值和路径创新研究”(19SKSZ006),项目负责人:吴艳东;西南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阐释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SWU2209003),项目负责人:吴艳东。

作者简介:吴艳东,男,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金玉,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点,深入探究连环画与网络图文的内在关联、连环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手段和历史经验等,最后落脚于新时代网络图文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希冀通过对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媒介环境的关联性探赜,为当前学界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和新视角。

1 连环画与网络图文: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出场缘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一种通俗媒介的连环画被用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缘由。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中出现了网络图文这一形式,其与连环画虽是基于不同传播介质,但都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破旧立新:连环画适应国情的必然之需

其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之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178}“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进行价值辩护。”^{[10]4}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起家”和“当家”的一个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急需将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手段,将党的意识形态所体现的价值诉求转变成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10]7}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政权的,所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迫在眉睫。然而现实情况是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马列主义思想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11]61-62}。要使新的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就需要借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来实现,而连环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矛盾称其为“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12]31},艾思奇亦认为“它确实是最重要的大众教育之工具”^{[12]37}。因此,连环画契合了执政党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主流价值观念的需要。

其二,适应高文盲率的社会现状之需。新中国成立初期借助连环画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最大的现实原因便是民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文盲率较高,调查数据显示“全国5.4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仅有11.7万人”^{[13]4}。在此情形下,通过文字来普及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较困难,只有将其嵌入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的图像之中,才更易于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基于此,作为通俗传播媒介的“小人书”便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青睐,“第一、这种书里面印的,不光是字,大部分是图画,容易看得懂;第二、里面画的事情,有头有尾,清清楚楚,越看越有趣味”^[14]。毛泽东曾称赞道:“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待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15]237}可见,连环画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走进官方的视野,并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占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之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错误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6]281},“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16]197}。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思想领域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各种落后腐朽的社会思想影响深远,而充斥着大量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落后思想的旧连环画在大众中仍广泛传播,使得连环画成为传播“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帮凶”。1932年,瞿秋白便注意

到连环画在旧社会的影响,指出普通大众“他们所‘享受’的是:连环图画,最低级的故事演义小说……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义”^[17]。编绘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创作迎合低级口味的内容,出版商在高利的驱使下使“有毒有害”的连环画广为传播,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反动统治者则利用它奴化群众、毒害青少年”^{[18]63}。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用有教育意义的新连环画去代替有毒素的旧连环画,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19],因此需通过改造连环画来清除社会“遗毒”,占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

1.2 以图表意:连环画契合大众的认知需要

从主体层面看,连环画独特的媒介特质契合了大众的认知需要。列宁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20]467-468}也即,要想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就需要对其进行通俗直观的阐释。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大众媒介,以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抽象性的话语具象化、将理性化的事物感性化,更易于被民众理解和接受。因此,连环画在这一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理想工具。

第一,连环画以图像为主,而图像是能够简洁、迅速、直观地传达视觉信息的语言,比文字更具有传播优势。因为“文字视觉传达的信息形象是间接的,它必须通过对文字的联想才能传达所表达的视觉形象”^{[21]4}。而图像传达的信息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可视性等特征,因此,不需要做中间环节的联想。人们对连环画图像的理解可以跨越文字的鸿沟,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依然可以实现无障碍阅读。

第二,连环画由多幅连贯的图像组成,拥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这使其成为较容易识别和记忆、充满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视觉语言。“生动紧凑的故事情节,再加上美好的画幅,才引人入胜,起到教育感染的作用。”^{[18]176}而且图像通过不同色彩、线条等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便于理解和记忆,更易赢得人们的喜爱和热捧。

第三,连环画便宜可得、携带方便的优势使其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书籍对于很多人来说遥不可及。而连环画装帧简单,印刷成本较低,价格低廉,可以满足多数人的阅读需求。此外,连环画一般是小开本,具有携带方便的优势,可以随时随地翻阅。因此,连环画成为“通俗性最强、生产速度最快、畅销程度最高的读物”^{[22]9}。正是意识到深受大众喜爱的连环画的这些媒介特质,中国共产党继而对连环画进行改造和运用,使其为建构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服务。

1.3 守正创新:网络图文对连环画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利用通俗媒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到新时代的网络图文,两者本质上都是以图为主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深刻审视连环画与网络图文的“变”与“不变”,是新时代建构图像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

历史地看,连环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载体,而网络图文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信息社会发展下的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在很多方面延续着连环画传播的特征,这也让逐渐没落的连环画以新的变体形式继续发挥着图像传播功能。两者虽同属于图像媒介,但其在传播载体、传播实效及受众需求等方面迥然相异。就传播载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以纸质媒介传播为主。而新时代的网络图文传播改变了图像的呈现方式,整体呈现出以

二维空间静态图像为主转变为二维空间静态图像与动态影像并存的局面。就传播实效而言,相比于以纸媒为载体的连环画,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图文具有实效性更高、整合传播能力更强且互动性更强等特点。就实际用途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连环画主要用于党的政策宣传、人民日常消遣娱乐等。如今,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网络图文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还是新时代的网络图文,两者究其本质都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信息传播媒介,具有图像传播介质的根本属性和塑造功能。图像是承载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接受、传播及共享信息的媒介,而统治阶级往往依靠图像媒介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亲和感性等基本特质对图像进行“编码”,将代表党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念系统植入图像之中,民众在“看”的过程中也无形地将意识形态内容内化于心,形塑自身的思想观念。如此一来,连环画和网络图文作为重要图像媒介,都是运用了图像传递意识形态的功能,继而在增强民众政治认同、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加强理论宣传、塑造主流舆论格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当今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视觉文化的转向,网络图文迎合了当代人视觉消费的需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形塑。因此,新时代运用网络图文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愈发重要。

2 连环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基本手段

意识形态具象化是将意识形态由抽象转变为具体的过程,把看不见的、晦涩难懂的观念转变为看得见的、通俗易懂的形象。图像则是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典型方式,通过视觉处理将抽象的理论进行具象化表达。连环画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传统图文形式,主要通过叙事、转译、隐喻等手段,以此实现“看者”与“传播内容”之间的“沉浸式”信息交流、知识连接和意义共享。

2.1 叙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图像化阐释

叙事之“叙”意在表达叙述这一活动,所叙之“事”称为故事,叙事即通过故事表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用连环画图像叙事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以表达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根本不同了。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有了更好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条件。”^{[23]290}因此可以“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23]302}。连环画成为以图像化的形式来宣传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载体,但“对于主题的理解无法离开叙事空间抽象地进行”^{[24]63},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置于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讲述,使其更为直观具象,更易于被人民群众理解接受。

其一,用图像叙事的方式来呈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话语在连环画中不断得到凸显与强化。连环画《我要读书》《童工》《东郭先生》《孔乙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阶级框架”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并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其中。例如,《孔乙己》中通过人物的悲惨结局来揭示封建地主阶级的残暴与腐朽;《我要读书》讲述了穷苦孩子高玉宝渴望读书却因残酷现实而只能给保长放牛的故事,揭露了旧

社会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面目;《童工》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故事。由此可见,无论是突出阶级批判、阶级反抗还是阶级斗争,创作者均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在直观生动的故事中向广大民众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或许不知道“阶级”到底为何物,但是在旧社会对被压迫的苦难感受颇深。连环画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再现了过往的苦难经历,从而使受众形成一个想象性的命运共同体,也使人们由此对“阶级”产生了更为直观的认识。阶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通过生动的连环画展示阶级斗争策略,使极具抽象性的阶级话语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应用。

其二,用图像叙事的方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5]310}人正是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正确的劳动观在历史各个阶段都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劳动观的成功塑造离不开图像叙事的方式。这一时期以“劳动”为主题的连环画成为表达新劳动观的载体,涌现了一大批阐释和歌颂“劳动”的作品。例如,连环画《谁光荣》讲述了一名战士担任炊事员的故事,表达了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主张;《摔碎了的酒杯》介绍了一位老人修补碎酒杯的故事,强调要热爱劳动,并指出幸福是通过劳动创造的。这些作品将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将其置身于人们熟悉的劳动场景之中,受众在阅读连环画时能够通过想象进行“沉浸式”参与,加深了对新劳动观的理解与体认。“劳动”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得到重新诠释,颠覆了旧社会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新的劳动观念的树立,能够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其三,用图像叙事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社会发展史”的连环图画,分别是《劳动创造了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套连环画用图像叙事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社会形态,如《劳动创造了人》通过描绘一群猿人如何从古猿进化而来,以及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学会了直立行走、用火、制作工具、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等,通过图像的变化与组合连贯地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历程,图画与图画之间暗含叙述语言逻辑承接关系,力图使人们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普通百姓对社会发展史的了解有助于推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们也才能了解:今天中国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应该创设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达到获得自己最后解放的这一个最高目的,并且用这种科学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斗争,使我们正确地有步骤地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11]56}。可以说,这些连环画以生动具体的图像叙事方式,使普通民众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坚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并凝聚意志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作为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要手段,连环画通过“可视化”的图像将人的知、情、意、信统合起来,极大增进了个体与图像的双向互动,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嵌入,也使得图像叙事效果倍增。

2.2 转译: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的图像化诠释

转译原本指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前,这一概念在图像学意指将文字语言转化成图像语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面对当时高文盲率的社会现实,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并进一步贯彻新的方针政策,成为一大现实难题。为更好宣传和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连环画就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图像媒介,它将抽象晦涩的主流意识形态转译成生动具体的图像语言并向人民群众传达,跨越了文字认知的鸿沟。

其一,连环画以图像化的形式对党和国家的法规条例进行转译。为了加强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组织印制了诸多图解通俗本连环画力图对法条进行直观宣传,例如《婚姻法图解通俗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传画册》等。这些连环画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进行信息抽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图像的历史主体思考之中。如《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连环画用生活图画对重婚、纳妾、养童养媳等行为进行描绘,明确指出这些行为是禁止的,且由穿着解放军服装的公职人员出面捍卫妇女的婚姻自由权利,简单明了,表达了对法律的捍卫。同时,连环画通过对比新旧社会的婚姻制度等来彰显新社会的婚姻自由,以此帮助群众在思想上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使婚姻法真正为群众所接受。可见,连环画不仅会对条例作词句上的通俗解释,还会深入思想认识层面,将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话语,从而实现抽象思维逻辑向观看认识逻辑的转向。

其二,连环画以图像化的形式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进行转译。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对其进行宣传推广时,连环画便成为重要传播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方针政策的图解连环画主要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图解》《农业合作化通俗图解》《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建议图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图解》等,这些连环画以生动的图像对当时的方针政策进行转译,以勾起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引发人们对政策的支持和拥护。比如,《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图解》向农民介绍政策时,对传达的信息进行编码,将农户入社、增产目标、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培育优良品种、发展国营农场等政策用直观生动的生活场景加以呈现,采用鲜艳的色彩造成视觉上的冲击,通过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展示出农民的干劲,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

其三,连环画以图像化的形式对党和国家的运动主张进行转译。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时,党通过连环画将政治语言转译成图像语言来进行宣传动员,争取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与拥护。连环画将宏大、抽象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可供群众直接把握的视觉图像,以此增强人民的政治判断力、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收集了12个隐藏在各行各业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并编成连环画,揭露出反革命分子通过两面派手法,利用各种伪装进行阴谋活动,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反革命分子的丑恶面目和罪恶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危害并提高警惕。围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识形态话语,连环画《生死缘》通过描绘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揭示了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残暴性,用生动的故事向广大民众传达了中国入朝作战的紧迫性和正义性,将党和国家的主张以图像这一语言来表达,增强了可读性,也使得大众更加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而为抗美援朝提供支持;《钢铁运输兵》《无畏的勇士》《特级英雄杨根思》《上甘岭上的英雄》《黄继光》《保卫板门

店的英雄们》等作品则以图像话语讲述了抗美援朝中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向群众描绘了斗争的事实,激发了群众的认同感。连环画在反映现实斗争、配合历次政治运动方面,具有宣传及时、受众广泛、效果显著等特点,尤其1958年大跃进以后,连环画配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发挥了革命文艺读物的战斗作用^[26]。通过连环画的图像语言克服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或枯燥宣讲,实现了理论、政策、文件等官方话语向人民群众能理解的大众话语的转变,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2.3 隐喻:人民大众价值观念的图像化形塑

隐喻是达成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不同领域的两个事物之间的跨界图绘,图像隐喻通过符号来表达抽象的观念,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运作,通常用“可见的”图像表达“不可见的”价值观念。而具身认知是隐喻的基础,“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抽象概念通过情境模拟或隐喻与感知经验发生联系”^[27]。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经验去构造和理解陌生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连环画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视觉宣传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普通大众价值观念具有强大的形塑力,其中的人物形象是牵引故事情节走向的关键,是能隐喻一种价值观念的核心符号,是将不同的概念进行相互关联的基本认知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大众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精神以及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抽象的观念认知是模糊的,但可以通过人物形象的特征去判断,因为对伦理道德这样的高级抽象概念的思维同样受身体感知与经验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图像隐喻的方式赋意与表达,以具象化的图像传达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的过程中弘扬主流价值观,驳斥批判落后错误思想,从而形塑人民群众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

一方面,用英雄人物形象来隐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精神。人们会用图像中人物形象的“高大英武”“面容和善”去理解美好的精神品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革命英雄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王孝和、向秀丽等人物的光辉事迹被编入连环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提炼后得以集中展现,在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经历中,渗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塑以及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如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的连环画《红岩》,塑造了许云峰、江姐等英雄人物形象,以图像形式描绘了他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展现出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受众在阅读之后可能会将这些英雄人物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们想学一些模范例子,或者希望这些模范例子就是他自己”^[28]。

另一方面,用反面人物的形象来隐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落后思想。人们通过“身材矮小”“面容丑陋”的人物形象去理解落后的思想,将图像上的反面人物形象作为始源域,将抽象的概念作为目标域。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动派的宣言却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11]62}。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剔除这些落后思想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要求。连环画中一般用矮小丑陋的反动派人物形象来隐喻落后思想,通过贬低人物形象来实现对落后思想的批判。通常而言,这一时期连环画中资本家、地主、特务等的形象均是尖嘴猴腮、身形矮小、面容猥琐。丑化反面人物不仅能达到批判的效果,也便于塑造大众心中孰是孰非的价值标准。如《半夜鸡叫》通过塑造一个体态臃肿、面容蛮横的剥削劳动人民的地主形象来达到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目的。《童工》等连环画通过塑造恶毒的资本家形象来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风暴》等连

环画通过刻画凶狠残暴的帝国主义反派形象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控诉。

3 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历史考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利用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过程中,整体呈现出内容生产场景化、价值传播潜隐化、目标受众大众化等鲜明特征,并在增强民众政治认同、摒弃落后思想及推动政策施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须承认,连环画在运用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对这一时期连环画的特征、成效与不足做全面性的历史考察,对新时代我国如何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3.1 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特征

其一,内容生产场景化。这一时期连环画在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过程中,将抽象晦涩的理论和政策描绘为生动具体的形象和场景以实现其传播效果。具体而言,连环画通过线条、色彩、构图等多种要素,巧妙运用环境、场景和道具等多种生活素材,以富有生活性和趣味性的叙事手法,在平面空间里以生动活泼的造型再现突破了传统直白、平面与静态的表达方式,使得作品更富吸引力和渗透力,以此给普通大众造成视觉冲击,留下深刻印象。

其二,价值传播潜隐化。党和国家将意识形态话语嵌入图像之中,借助生活化的场景和叙事,将复杂的哲学、政治问题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而被赋予价值观念系统的图像往往传递着“看什么”“为什么”“怎么看”“要怎样”等价值导向,使得民众在感官愉悦时无形接受了图像所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念。简言之,连环画将党和国家的价值理念潜隐于具象化的图像符号中,受众在看连环画的过程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嵌入。

其三,目标受众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赋予了连环画对广大民众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和教育的工具职能,连环画的受众群体逐渐从少年儿童走向人民大众,“连环画的影响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各个方面,工、农、兵、儿童、干部、知识分子,乃至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都喜欢看”^{[12]237-238}。连环画以图像化的故事适应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国情,其相对低廉的价格与易得性满足了人民大众的阅读需求,因而其目标受众更加广泛。

3.2 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连环画以具象化的方式助力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一直以为四九年后中国最了不起的绘画既不是国画,也不是油画,而是连环画。”^{[29]225}由此可见连环画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增强政治认同。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有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的政治认同。譬如当时一位农村妇女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后说:“过去我看到解放军(指人民政府)杀特务,我就说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杀人不好。这次看完这本书,觉得是要杀,因为特务太坏了。”另外皖南南陵县第九区塘村的学习模范陈快英说:“看了这个小本子,懂了政策又学了文化;人民政府真会替人民办事。”^[30]“一个姓孔的摊贩看了《吕梁英雄传》后很感动地说:我现在才晓得打日本鬼子是解放军的功劳啊!”^[31]由此可见,连环画使广大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在情感上和意识上的认同感,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加自觉地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进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其二,摒弃落后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连环画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在思想改造方面成效显著,使人们逐渐抛弃了旧的传统观念。例如《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发行后影响深远、备受赞扬,许多青年男女受该连环画的影响,突破了封建家庭束缚,公开宣布自己正当的恋爱,废除了不合理的婚约,早婚的恶习得到了纠正,且婚姻法被当成离婚法的错误思想也得到了批驳。一位大娘看完这本书后说:“这本书讲得真对,真有道理,以后我再也不敢包办儿女的婚事了。我还要买一本帮助宣传。”^[32]在抗美援朝期间,连环画尽力揭露“美帝、日寇的暴行和蒋匪特务的阴谋,增加了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12]146},帮助人们克服了“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以及畏战求安的消极心态。总之,富有教育意义的新连环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读者进行着情操品德的陶冶和价值观的形塑。

其三,推动政策施行。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密切配合政治宣传,在帮助民众理解政策、推动政策实施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连环画成为许多基层干部的宣传材料,如不少宣传员、妇联干部将《婚姻法图解通俗本》作为宣传婚姻法的材料^[32]。皖北一位农会主席看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说:“过去自己对国家法律不了解,看到这本书才懂了,自己才敢向群众宣传。”^[30]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很多农民一开始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众多连环画通过图像讲述了合作化的冲突与好处,使得农民逐步接受政策主张,拥护政策执行。一位公社社员赞美道:“连环画,好处大,看图还能学文化,下地干活随身带,休息时间就看它。”^[33]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连环画真正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有力工具。

3.3 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存在忽视民族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在表现形式上重视多样化,但也有些作者把西洋画的表现方法视为唯一的“高级”形式,忽视甚至舍弃了民族绘画的特点^[34]。然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构图简单、线描洗炼、形象清晰的具有民族艺术特色的作品更受欢迎,“洋味”十足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主题的契合性和群众的欣赏习惯,容易导致大众在接受作品传达的思想观点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时“食洋不化”。

二是部分内容过分强调政治说教。连环画在配合政治运动、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期特别是“大跃进”以后过分凸显政治,容易引起读者的消极情绪。大跃进以后连环画在发行数量上蔚为壮观,仅1958年一年之中,就出版了连环画三千种,印行一亿二千万册^{[12]210},其中不少作品充斥着虚妄浮夸的政治说教。1962年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便指出:“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35]87}连环画的内容过分强调政治说教,其思想性被遮蔽后,感染力和吸引力就被大打折扣。

三是创作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连环画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有力武器,必须深入群众的现实生活,关照劳动人民的所思所想,这样才能提高质量,更好达到效果。然而“还有不少作者,同现实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漠不相关,在创作上因而难以进行丰富的构思,笔下的形象缺乏真实的感觉,失去动人的力量”^[34]。可以说,脱离群众会使作品缺乏说服力,不利于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

4 连环画对当今网络图文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的现实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缘起于何、何以融入、有何经验等相关问题进行历史考察,并基于传统媒介环境中利用连环画的经验启示对利用网络图文这一新型传播媒介进行守正创新、因时而化,对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渗透力大有裨益。

4.1 内容为王: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图像符号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连环画,取得显著效果,这对当今的网络图文意识形态建构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图像关涉“可见”的符号与“不可见”的观念,因此网络图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要善于挖掘思想素材,在图像的编码过程中要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植入。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其注重对古典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挖掘,使其服务于政治统治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启示我们在利用网络图文进行图像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中,要坚持内容为王,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号体系。

一是坚持图像内容生产的“本土化”原则。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为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图像符号体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图像符号的生产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整合中华文化中的图像元素,凸显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图像逻辑和图像资源。二是坚持图像内容生产的“时代化”原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图像建构,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人民需要的写照。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图像内容的生产也应因时而新,推出反映时代的精品。在具体实践中,要根植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于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理念,设计并描绘出更多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的图像与符号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图像资源。

4.2 传播为要:借助强大的传播载体提高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连环画这一符合国情的大众媒介进行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行之有效。连环画依靠纸媒进行传播,除发行单行本以外,也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其目的是增加受众以扩大影响力。这启示我们在利用网络图文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时,需要借助多样化的传播载体。当今社会,伴随着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图文的传播载体丰富多样。当前全媒体融合发展传播成为大势所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44},报、网、端、微、屏等媒介平台横向交融、纵向扩深,共同奠定了社会文化传播的全媒体矩阵^[36]。因此,要促进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图文在不同媒体间实现跨界传播,形成视觉意识形态跨媒体传播的合力。

一是要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传播。二者进行资源与机构的双重整合,取长补短。应充分整合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资源,成立新型媒体集团,依靠集团优势在新媒体平台进行视觉化传播^[37],形成包括PC端、客户端、手机网、国内外社交媒体账号、内容运营以及内容聚合分发平台在内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扩大被“编码”的网络图文的地域覆盖面、人群覆盖面。二是处理好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的关系。在新形势下要正确认识主流媒体和商业平

台的关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推动双方进行合作、优势互补。主流媒体要主动借助商业平台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打通并用好同群众交流信息的新渠道。例如,近年来人民日报入驻抖音、微博、今日头条等商业平台,以图像的形式将政治性话语转变为生活化话语,由宏大政治叙事向日常生活化叙事转变,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合力与感染力。

4.3 人民至上: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毛泽东曾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8]857},并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38]863}。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断强调连环画创作要深入群众,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审美诉求,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人民性的导向。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等知名连环画的作者,都曾经到故事发生的所在地去做调查研究。“画家对实际生活有了感受 and 了解,对脚本本身的主题思想和人物、环境,有了较深切的体会之后,形象的刻划也就比较深刻动人,具有真实感。”^[39]这启示我们在利用网络图文进行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的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度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只有图像符号被受众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图像化的建构才最终完成。

一是网络图文的创作要深入群众生活,体现人民的诉求。人民无疑是图文创作的源头活水,因此,在创作作为文艺作品的图文时“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40]160}。这就要求创造者必须扎根人民、扎根现实,走进民众日常生活空间,挖掘丰富的生活素材,因为“关照人的精神利益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41]。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做到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图文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图文才能真正发挥最大正能量,获得人民的热捧。二是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视觉素养。人们与生俱来具备“看的能力”,而不是“看懂的能力”;能够“看”,却未必能够“看得懂”“看得好”^{[42]49}。因为编码后的图像中潜藏着无数的意义空白和未定之域,读图者对这些空白进行填充需要具备一定的建构能力,而一个人的建构能力与自身的知识文化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这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和文化熏陶才能提高。因此需提升受众对网络图文的鉴别能力,对于包含特定意识形态的图像,不仅要看到表象内容,更要引导广大群众认识到图像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本质,“要防范境外势力向新媒体领域渗透,防范资本控制舆论的风险”^{[43]57},警惕“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等不良思潮的裹挟。

5 结语

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连环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有效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通俗化、直观化与大众化,实现了传统理论性灌输向具象化感性投射的转化,并成为民众跨越理性思维向形象思维过渡的桥梁。而今,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旧的传播媒介必将会被新的传播媒介所取代,从连环画到网络图文的媒介跃迁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须肯定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最大程度地发挥图像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加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始终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还面临长期、复杂的斗争与较量,一些西方国家极力通过视觉图像试图丑化、妖魔化中国,给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极大挑战。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直以来,凭借视觉图像传播媒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建构都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思想

工作的有力武器,这对于新时代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我们要不断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从时代发展中把握规律,利用图像媒介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工作,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传播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刘伟兵.意识形态具象化:理论阐释与工作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4):21-28.
- [3] 龙柏林,刘伟兵.图像·音乐·仪式: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三种典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2-20.
- [4] 罗红杰.意识形态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实践的诠释与建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9-15.
- [5] 周琪.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构建[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4):35-40.
- [6] 魏则胜,苗存龙.视觉文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化传播[J].贵州社会科学,2021(1):35-41.
- [7] 罗红杰.“看”的意识形态性: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隐喻逻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5):154-159.
- [8] 郁有凯.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生产的原则遵循[J].思想教育研究,2021(12):83-88.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1]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2] 林敏,赵素行.中国连环画艺术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4] 编辑部.发刊的话[J].连环画报,1951(1):1.
- [15]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点评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7] 史铁儿(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8-42.
- [18] 姜维朴.新中国连环画60年: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 [19] 用新连环画代替有毒素的旧连环画[N].人民日报,1951-12-15.
- [20]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21] 郭晓霞.视觉设计[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 [22] 张勇锋.新中国连环画政治叙事研究:1949—197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4] 李健.形象及其隐喻:当代大众文化的视觉建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6] 姜维朴.连环画应加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N].人民日报,1960-11-16.
- [27] 张恩涛,方杰,林文毅,罗俊龙.抽象概念表征的具身认知观[J].心理科学进展,2013(3):429-436.
- [28] 吴劳.以新小人书代替旧小人书[N].人民日报,1949-06-05.
- [29] 陈丹青.陈丹青音乐笔记[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 [30] 一本创造发行新纪录的通俗读物——介绍《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的编辑发行经验[N].人民日报,1951-12-08.
- [31] 白融,江夏.火神庙变成了文化园——介绍北京第四民教馆[N].人民日报,1950-03-04.
- [32] 华东人民出版社.《婚姻法图解通俗本》的编写经验[N].人民日报,1953-02-01.

- [33] 马克. 欢呼连环画的新成就[N]. 人民日报, 1963-12-29.
- [34] 姜维朴. 要求出版更多更好的连环画[N]. 人民日报, 1956-04-09.
- [35] 周恩来陈毅论文艺[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36] 栾淳钰, 刘颖敏.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实现路径探赜[J]. 探索, 2023(2): 175-188.
- [37] 刘伟斌.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5): 104-112.
- [38]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9] 沈柔坚. 谈谈连环画、年画、政治宣传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N]. 人民日报, 1960-11-09.
-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41] 吴艳东, 廖小丹. 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27-38.
- [42] 张舒予. 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4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From Comics to Network Graphics: Ideological Reifi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Visual Field of Images

WU Yandong, ZHANG Jiny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mages are encoded to convey ideology. The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popular visual image communication media to carry out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infiltrated the Party's political will into comic strips, thus concretizing abstract ideologies, and comic strips became powerful weapons for publicizing the policie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 CPC and disseminating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CPC uses comic strips to display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mainstream values through narrative, translation and metaphor,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production scenes, value dissemination concealment, and target audience popularization. It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increasing political identity, abandoning backward concepts, and promo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ts rich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today's social network graphics and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network graphics and texts to carry out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building a socialist ideological image symbo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influence with the help of powerful communication carriers, and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so that network graphics and texts can effectively serv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mics, network graphics, visualization, ideology, reification

责任编辑: 陈卓

《探索》所发文章2022年转载情况

序号	原发 年期	作者	被转载文章题目	转载 类型	转载期刊	转载 年期
1	2021. 4	邓大才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参与：从阶梯到框架	全文	中国政治	2022. 1
2	2021. 6	黄振华	田野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	全文	政治学	2022. 4
3	2022. 2	徐 勇 石 健	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 瓶颈及其突破	全文	中国政治	2022. 8
4	2022. 2	彭 冲 王炳权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全文	中国政治	2022. 6
5	2022. 3	杜 姣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 及其影响	全文	中国政治	2022. 8
6	2021. 6	刘长秋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	全文	中国共产党	2022. 3
7	2022. 1	冯思淇	定向与聚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赋能国家 治理的实践理路	全文	中国共产党	2022. 5
8	2022. 3	张书林	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动因、要义 与路向	全文	中国共产党	2022. 9
9	2022. 4	汪 超	“五治统合”：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 的体系建构	全文	中国共产党	2022. 11
10	2021. 6	于成文	坚持“质”“量”协调发展 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	全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2022. 3
11	2022. 3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 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	全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2022. 8
12	2022. 1	张淑娟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	全文	民族问题研究	2022. 5
13	2022. 1	徐欣顺	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一个民族政治 学的解释	全文	民族问题研究	2022. 5
14	2022. 3	朱碧波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体系	全文	民族问题研究	2022. 8
15	2022. 4	阎国华 韩 硕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 促进策略	全文	文化研究	2022. 12
16	2021. 5	张明海	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意涵与提升路径	全文	精神文明导刊	2022. 2
17	2022. 5	韩 强 刘伟光	论健全完善党的会议制度	全文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	2022. 6
18	2022. 2	向玉琼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	论点 摘编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	2022. 4
19	2022. 3	衡 霞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 实现路径	论点 摘编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	2022. 5
20	2021. 5	李 辉	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中国乡村治理范式 的新飞跃	论点 摘编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	2022. 1
21	2021. 6	黄振华	田野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	文摘	政治学文摘	2022. 2
22	2022. 2	徐 勇 石 健	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 瓶颈及其突破	文摘	政治学文摘	2022. 3
23	2022. 3	杜 姣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 其影响	文摘	政治学文摘	2022. 3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3期（总第231期） 2023年5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net>

副总编辑：金华宝 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Bimonthly）（Started in 1985）

No.3（Sum No.231） May, 2023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net>

Vice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39